

工农解放报

RSF续刊第二期

工农解放社-原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 2026.11.11发布

目录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2

编辑部的话 编辑部的话 4

工人工作 工厂通讯：一个发展巴布石金式工人同志的案例 8

工人工作 左转以来融工工作的简要总结 25

工人工作 工人工作专栏 32

理论战线 论融工派和政治报派的分野 52

理论战线 从何出发？——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64

理论战线 反驳子时夜半黑文 90

理论战线 燎原大群路线的实质是林彪主义 101

理论战线 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在群众工作中建设——«左派幼稚病»揭露“野火”反动的纪律路线 114

理论战线 旧教训与新斗争 123

理论战线	大字报专栏	139
学生工作	学生群众工作经验	150
学生工作	怎样看待安陆斗争	160
学生工作	是斗争的胜利！论伟大的“九十学运”的意义	167
学生工作	长沙学生们的斗争	198
学生工作	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技巧	205
社会评论	论什么是革命形势和我们应该怎么准备	225
社会评论	红楼梦中的怠工	245
社会评论	改革开放的历史提纲	250
社会评论	改开没有“解放生产力”	281
社会评论	论中修的“军队经商”	360
社会评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	396
社会评论	中修一带一路的性质	414
社会评论	21世纪的"社会谋杀"	429
革命安全	如何正确使用邮箱	448

革命安全 如何正确使用Proton搭配邮件加密技术 452
革命安全 Tor_Browser使用指南 456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网站

- 统一战线博客：https://blog.cmlmuf.org/
- 统一战线论坛：https://forum.cmlmuf.org/
- 统一战线书库（内含大量书籍）：https://bookstore.cmlmuf.org/
- 统一战线刊物：https://bookstore.cmlmuf.org/理论培训/统一战线刊物
- 文章音频博客：https://huggingface.co/datasets/wpec/audio/tree/main

订阅

- 《工农解放报》邮箱订阅连接：https://mailsub.cmlmuf.org/subscription/form
- 《工农解放报》仓库及报纸生成器：https://git.cmlmuf.org/wpec/wpep
- 统一战线论坛RSS订阅链接：https://forum.cmlmuf.org/latest.rss

群组与频道

- 电报（telegram）频道： https://t.me/WPEC2025/

- 电报讨论群：https://t.me/Liberation1917/
- XMPP讨论群（与电报群桥接）：https://joinxmpp.cmlmuf.org/
- XMPP**免翻墙**下载：https://codeberg.org/monocles/monocles_chat/releases/ （安装后选择创建账户—选择其他提供者**免翻墙**注册，然后右下角➕新联系人或频道，输入 gnjfs@conference.macaw.me 加入我们的xmpp群）

服务实例

- 图床： https://imgbed.cmlmuf.org/
- Gitea： https://git.cmlmuf.org/
- PrivateBin 实例： https://pb.cmlmuf.org/

联系方式

- 联络邮箱：contact@cmlmuf.org
- 备用联络邮箱：wpec@proton.me
- XMPP联络号：contact@cmlmuf.org

编辑部的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在当前推进革命工作的进程中，融工派与政治报派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纲领性问题。我们继续出版工农解放报，正是要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战斗旗帜，在理论上彻底批臭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实践上坚定不移地服务于线下的工人与学生群众工作。

要在实践中把革命推向前进，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划清界限，这也是本期理论战线版块的核心任务。长期以来，政治报派企图用各种华丽的辞藻掩盖其脱离群众、畏惧实践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实质。本期刊登的《从何出发？——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论融工派与政治报派的分野》，从根本上剖析了两条路线的哲学基础与阶级实质，指明了只有从实际的群众斗争和融工工作出发，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先锋队。为了进一步揭露“政治报”派代表性组织的破产，我们再版了工农解放报秋冬季合刊中的《燎原大群路线的实质是林彪主义》、以及此前在仅在频道上发布过的《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在群众工作中建设——〈左派幼稚病〉揭露“野火”反动的纪律路线》。这两篇文章指出，无论是燎原大群还是“野火”，他们妄图在脱离群众工作的温室里靠搞宗派、立清规戒律来建设所谓“无产阶级纪律”，实质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官僚主义，最终唯有走向分崩离析一条路。

正如列宁所言，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破产后，往往会转向无底线的造谣与谩骂。面对融工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节节胜利，日暮途穷的政治报派残余势力只能靠编造谎言来维持其内部摇摇欲坠的统治。为此，本期特别收录了《政治报派的造谣合集和辟谣》以及《反驳子时夜半黑文》，将他们阴暗角落里的冷箭一一折断，放置在阳光下展览，让革命同志看清这些造谣者的卑劣面目。同时，革命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过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内部的积极思想斗争。《旧教训与新斗争》回顾了我们在路线探索中的曲折历程，而首次设立的《大字报专栏》则展现了同志们运用“四大”武器开展路线辩论、清除错误思想的生动局面。 理论上的彻底，归根结底是为了指导实践的深入。政治报派最喜欢污蔑厂内无法进行政治灌输、融工必然走向经济主义，而反击这种谬论最有力武器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成果。在本期的工人工作版块中，《工厂通讯：一个发展巴布石金式的工人同志的案例》生动地记录了一位同志如何在工厂的日常劳动与交往中，通过耐心的政治灌输，发掘出如俄国革命时期巴布石金一般坚定的先进工人同志，这无疑是对“厂内灌输无用论”的一记响亮耳光。同时，《左转以来融工工作的简要总结》从宏观上梳理了一位青年左转运动以来融工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配合《工人工作专栏》中同志们的具体探讨，标志着我们的工人群众工作正在从自发、零散的尝试，走向有计划、有总结的自觉阶段。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同样需要革命知识青年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只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的力量。在“学生工作”版块，我们收录了《学生群众工作经验》和《怎样看待安陆斗争》，通过总结最新的校园工作实践和剖析现实的自发斗争，为如何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了体现理论准备与历史经验的传承，我们特

别再版了RSF时期的两篇重要文章——《九十学运》与《长沙学生的斗争》，希望同志们能从近几年来的学运风潮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此外，针对部分青年同志在理论学习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倾向，本期收录的《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技巧》一文，可供参考，可以引导同志们更好地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在线下同志深入工厂和学校的同时，线上的写作与研究工作必须紧密配合，为线下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即高质量的政治灌输素材。本期的社会评论版块正是线上同志在线下需求指导下结出的硕果。《论什么是革命形势和我们应该怎么准备》从全局高度分析了当前的客观阶级矛盾与我们的主观任务，驳斥了等待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了帮助工人同志认清自身受苦受难的根源，彻底揭穿统治阶级的谎言，我们集中刊登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提纲》、《改开没有“解放生产力”》、《论中修的“军队经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以及《中修一带一路的性质》等一系列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从历史到现实、从内政到外交，全方位地剥下了当代中国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和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画皮。而《21世纪的“社会谋杀”》与《红楼梦中的怠工》两文，则分别从现代工人的悲惨境遇和古典文学中的反抗细节入手，深浅出地揭示了剥削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劳动者自发反抗的历史逻辑，适合在日常融工交谈中作为启发阶级觉悟的切入点。

最后，一切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严密的安全保障。在阶级敌人拥有现代化监控手段的今天，任何安全上的麻痹大意都是对革命事业和同志生命的不负责任。为了夯实同志们的安全基础，本期革命安全版块再版了RSF时期的三篇基础性技术指南：《如何正确使用邮箱》、《如何正确使用proton搭配

邮件加密技术》以及《Tor Browser使用指南》。我们希望每一位参与革命工作的同志，无论线上线下，都必须将这些安全规范内化为日常习惯，铸牢地下工作的防线。

本期刊物的顺利出版，再次证明了“线上在线下领导下为线下群众工作服务”这一路线的正确性。那些妄图割裂线上与线下、挑拨同志关系、破坏群众工作领导权的政治报派分子，在铁一般的事实和丰硕的成果面前，只能沦为历史的笑柄。我们将继续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纯洁我们的队伍，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也热切期盼广大有志于投身工人和学生群众工作的读者同志们，能够通过这些文章有所收获，并积极与我们取得联系，汇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来！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工人工作

工厂通讯：一个发展巴布石金式工人同志的案例

编者按： 同志A完全信任我们的工人同志，我们认为主要源于这位同志长时间的沟通，以及他偶然注意到A的留言动态，通过内容来判断，由此进行关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同志在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应当是没有架子，做到了群众化的。在A的视角，我们的同志只是具备理论知识的打工人，他们之间是可以“随意”交流的，在他们的沟通和相处中，我们的同志取得了A的信任。为什么他能够得到信任呢？在客观上，是A的部分改良主义思想破产及资产阶级爱情观的打击，在主观上，我们的同志及时注意到了同志A的情绪低落状态，然后在这个节点，采用了解和关心的方式方法，首先在情感上取得了A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逐渐从情绪或者说从感性的层面，逐步发展为理性的灌输阶段。 并且同志A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同志也可以解释并很好地回应，这反映出在对待同志A的工作中，同志的方式方法充分得到了现实的结果支撑。总之，这次成果主要来源于对现有感性材料的合理判断，加上同志的主观努力。这也说明了具体的灌输工作的曲折性：在不同的工人之间，这种灌输往往并不是直线的，所以需要注意保持恒心，善于发现工友关注的矛盾的点，并进行针对性的交流，这点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锻炼。

说明：

- 我 – 厂内同志
- 同志A – 我本地发展的工人同志

之所以开始写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边发展的同志A的工作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可以做阶段汇报了。

一、当前的工作进展

同志A已能够独立发展新同志

同志A所在厂年轻人很少，他让一个老员工推荐些同龄人给他认识，老员工把自己孩子微信给他了，他通过他孩子认识了好几个学校被霸凌的孩子。和他们讨论社会问题，指出他们受到压迫是资本家造成的，其中一些学生是认同。同志A说原来现在的学校里压迫是这样重，学生是这样躁动。

有个女孩最近受不了家庭暴力从家里跑出来了，睡楼道饿了两天，后来找到家愿意收她做学徒的店。我们资助了她点生活费。她原来说也联系过陪酒之类的工作，那些都要她，同志A就和她说不要干那些，干那些事的人就会学成资本家一样，所以她最终没去。这做得很对，就是要避免她变成流氓无产阶级，那种人更乐于受资本家收买，为他们服务。

女孩自己生活困难，但乐于助人，别人让她给十块二十块她也会给。她社交能力很强，一两天就能认识一个人。同志A跟她说，如果认识像我们一样的人，就约出来一起见面聊。但聊了几个，发现还是流氓无产阶级，同志A就跟她说断掉不要联系

了。有另一个被霸凌的女孩可以继续联系。同志A说这个女孩现在就是白纸，不要让她被不好的人影响。那个女孩说，见到同志A就感觉和之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很愿意和同志A讲心里话，也能听他劝。

还有两个被霸凌的学生准备去别的省份打工，他们对于资本家已经有了应有的认识。我让他们假期去打工，攒路费很重要。要能在正经行业干下去，不然之后也可能变成流氓无产阶级。

目前同志A是采取和工人和学生两条路线发展，学生方面团结没有上升幻想的、意识到自己之后要进厂的学生，同志A先通过接触他们做初步的思想工作后，约出来我和他一起做进一步的灌输。

二、接触和发展同志A的过程

1. 取得信任与政治启蒙

同志A我最开始是在一个厂里的宿舍里遇到的，其实线下接触就一个晚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特别：他不打游戏，不刷视频，而是喜欢抽烟发呆**。

那晚上具体聊的什么记不清了，大概先是说今天试岗看他们管太严了，然后我就和他一起骂老板，进而就谈些社会问题，他在想之后出路的事。他早些年进过几个厂，后来主要干物业行业，做小区保安。那天他来看了一下厂里的岗位，认为保安这个行业还是比进厂好，说当上班长以后工作轻松工资也不错。他说马上要跑路，还是去当保安了，还说我也可以去，我们就

加了联系方式，方便他推人事给我。第二天他就跑路了。**这时他还有通过保安行业摆脱压迫的幻想，我不了解他的行业，没法反驳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得等再被铁拳以后继续做工作，也就没有进一步联系**。

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发现他在空间里发了些悲观的言论，就在QQ上问他怎么了，他说现在他的岗位一直罚款，工资也低。我这才了解到他之前当上班长是比较偶然的。他当班长对下面人特别好，帮别人顶岗，让人去睡觉。结果老板看他不爽了，就雇了另一个人排挤他，他后来自己辞职了，到下一个保安岗位就成了最底层，根本不可能往上升。虽然比厂里轻松，但工资更低，还会被以各种名义罚款。**如果我不先向群众学习，不了解一个行业，就不可能去说服群众。以后再遇到觉得保安好的，就可以拿这位的经历去打碎这个幻想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女朋友嫌弃他，和他分手了，他想再找一任，结果对方直接说她要有钱的。于是我和他分析现在的两性关系，其实就是利益交换、买卖关系，最有利于资本家花钱找女朋友，跟他说要解决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对立不可能解决，要不男方嫌买的贵了，要不女方嫌卖得便宜了。有女的骗男的钱的，也有男的骗女的身子然后跑路的。而毛主席那时候女性精神面貌就截然不同，这就是社会决定的。

如果我不去留意好友动态，不去留意这些接触过的人的状况，就根本不会发生后续的交流。需要结合他现在最关注的矛盾去和他做灌输，说明是资本家造成的。他有的时候会认为主要是女性的问题，女性被腐化了，就要去纠正说男性其实也被腐化，因为这种两性利益交换的关系是资本家去塑造的，应该把矛头对准资本家。

他晚上时候就容易抑郁。他说他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意思就是想通过这个来获取女生真心，我就告诉他，即使他这么做，也达不到对方的要求，因为他需要给资本家做牛马，就没有钱和时间去对她好。只有资本家才有充足的财力和精力。资本家总是在制造幻想，那些资本家的生活是我们达不到的，幻想超出实际就容易抑郁。而**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然后我们讨论怎么解决社会问题，讨论到现在人们的贫穷是资本家造成的，毛主席时代则好得多。他也说希望人人平等。但**这个时候他还认为自己以后如果能有出息，就去帮助穷人。于是我告诉他开厂的成本有多高，举出我在工厂中了解的机器的价格，说明我们干一辈子的钱都不够买一台流水线的机器**。还告诉他资本家赚钱来源于剥削，不剥削就不会有钱。**往上爬也是得做他们的走狗，例如他自己做班长照顾下面的人，结果只能被排挤走**。

2. 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和错误倾向纠正

一开始我给他注册了tg号，他却拿那个号加虚拟货币的群，认为能赚钱。这些**错误思想发现了我就会纠正，解释过的也会反复出现，要反复纠正**。

期间他遇到各种困难我都给予了帮助，同时也结合起来做灌输。比如房东乱收水电费钱不够付，我资助了他一点，然后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工人在厂里受压榨后，回去房东等又向他们扑过来。**应该多引入一些原著的话让他提前接触，为后面给他读书做准备**。

因为他的住处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远，他租了个电动车骑车上班，但他视力很不好，又不愿意配眼镜，说习惯了戴眼镜再脱下来就看不见了。因此就经常撞车，有次车撞坏了，维修也要花钱，还有一次被撞了腿很疼。他说之前出车祸，手受过很重的伤，都动不了，就是躺出租屋里躺好的。**他认为遇到这些事很倒霉，我说根本不是倒霉，而是作为穷人就容易遇到这种事**，他如果有钱，就不用去那么偏的地方找便宜的住处，就不用每天骑车上班，也就不会发生这些危险。

我们有些时候是语音交流，刚开始聊的时候经常打电话打一晚上，后来我有空都会直接去他做保安的地方找他。每次过去会针对他之前的一些问题，给他看一些左派的视频。引导他自己没事也多刷b站。

最初的往上爬搞改良的右倾路线纠正以后，他还有别的错误倾向。比如无政府主义，认为没有老板就万事大吉，下面的人就能随心所欲。我说工人必须能自己组织生产，不然如果打倒了资本家，生产的纪律性就没有了，生产搞不好，那资本家还会回来。必须组织起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

有段时间，他们保安公司的管理突然放松了，原来管得严老是给人开罚单的队长突然不管了，他觉得这样就很好，我说队长不管了肯定是因为降了队长的待遇。他们的公司之前有不少老员工整天混工资睡觉，之前的经理不管，现在那个经理被撤了，队长后来也被调去搞人事了，经理换成了老板的老朋友。

我说这些老员工在这边混工资，资本肯定不乐意的，只是原来那个经理摆烂上面不清楚下面的情况。现在把这个队长撤了，换新经理自己过来，那肯定会管得更严的。不久以后，果然公

司就开始在每个岗位加装监控，经理自己来巡查。中间因为物业费收不上来，让保安他们去催收，一直被骂。之后物业费收少了，公司就拖欠工资几个月，把老员工都逼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员工，每个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原来以为资本家管理疏忽的地方可以暂时安稳，但很快现实就证实了我的判断，资本家的疏忽不会持续多久，压迫只会越来越重**。

还有一种错误路线，认为可以把我们的人都安排进一个工厂去和他们斗争，被开除了马上再换一批。但这需要太多人了，还得和中介有一定关系。他对通过中介来和政府斗争也还有幻想，就需要说明中介也是资本家，不可能依靠资本家去和资产阶级斗争。

灌输初期，群众会开始有社会主义觉悟，但是路线主要是错误的或空想的而不是科学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路线都要去纠正，纠正了又会有新的错误，一直纠正到正确为止。

我给他看**江油事件这种群众包围政府的案例**，说明我们也需要去占领政府。结果过了阵子他和我说能不能搞到点家伙，想去把政府绑了。**我就给他看《怎么办》里，列宁反驳恐怖主义的话：“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说讲得有道理**。

我进一步说，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那么你把政府绑了也守不住。**群众中的政治宣传是最关键的**，对政府夺权时厂内要能够发动群众夺厂罢工进行配合，要让他们知道对政府夺权是为了使得他们能得到工厂。群众中的宣传广泛了得到信任后，也会

渗透到军队中。**我给他看了萨布林的军人造反得到全舰基层士兵支持并尝试向全国发广播这一案例的视频**。他比较认同萨布林的做法，但又想直接学萨布林去占领政府去发广播。于是**我和他谈革命形势的问题，讲《怎么办》里的路线：建立革命地下工会和革命家组织**。我还和他说明了应该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等最有利的时机再行动，那时政府最弱，也最有利于发动群众。

我一直鼓励他去和自己身边的人做宣传。他说和周围人讲社会黑暗讲不通，来做保安的很多是家里有钱来躺平的。他会和周围人辩论，说不通。他做保安期间只有认识一两个军人有稍好的，应该确实是职业的问题。我就建议他进厂去发展同志。他因为经济困难直到最近才进厂了。为了进厂最后一个月工资被扣得只剩下五百，因为没有在他要求的时间走。我劝他不要再一直被限制在那里浪费时间了，最后拿不到钱我赔给他。

他喜欢说在保安岗位上怎么不听老板的话，以及故意把车放走不收停车费让他们损失。但对导致自己离职或可能有财产损失的斗争就犹豫。我问他，他爱谈的那些斗争对于别人有什么帮助呢？他如果能通过斗争，使得他即使早走也能拿到工资，那以后也能教别人怎么做，这样才会对别人有帮助。实际上这就是因为他还是太顾自己，不够考虑别人，另外也不够考虑政治，只是考虑这点钱，为了这点钱而一直被他们拖着浪费时间。

3. 个人经历对革命路线的影响

应该结合他生产上的地位来分析这些路线，这位同志之前在工厂里做过，厂里有次几个人在厕所抽烟被抓了，本来说要罚

款，大家都不同意，只好作罢。他也觉得厂里的人会比别的地方的更可能反抗。他说要是厂里人都罢工，资本家是没办法的，他只能求你动一下、动一下，工人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不过他因为搞物业当保安，并且之前还和一些流氓无产阶级有交往，认识的人很杂。唯军事论、缺乏政治挂帅的路线就是来源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影响，还有保安这种非生产的行业也会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他在这些经历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种思想，就需要结合他在厂里受到过的好的影响去与其他经历中一些不好的影响做斗争，以及去改造他的社会关系。比如他认识的流氓无产阶级，我接触他以后就让他断掉了，和他说那种人和资本家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也能理解。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能把新同志拉到正确的路线上。他说我是他遇到的对他最好的人，他自己会比较冲动，而我比较理智，像他的军师一样，他愿意听我的意见。

要发扬他之前经历中的积极方面，通过分析这些经历去提高到更科学的路线，并且与错误倾向做斗争。他在做保安的过程中，也有积极的经历，就是一次保安公司开始要求大家全天在保安亭外站岗。他带头说最多上午下午各站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站出去，大家也支持他的主张，后来实际就没有落实全天站岗的要求。

这位同志是很能团结，也愿意反抗的人，之前他在别的地方的厂认识很多人，但那时没注意加联系方式，很多都失联了。现在他还和那边的一个工友有联系，有天那个工友联系他说压迫太重了想造反，在想办法搞家伙，还想让他回去带头。**我告诉他们如果直接去冲塔然后被抓了，什么经验都留下不下来，我**

只会知道他失联了，其他方面一无所知。正确的方式是建立起能传承经验的秘密的领导部门。

以前他在厂里的路线是自己跟上面对着干，吸引也有反抗精神的人，然后串宿舍讨论反抗的问题。但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是兄弟义气拉帮派。这种帮派也容易被拆散，组长会把他们拆开调去不同部门。我说他如果不能团结别的工友的话，还是为自己的小团体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不会理解。**我们交往中应该慢慢把私的东西去掉，留下公的部分**。

他之前当保安的时候经常自己和资本家对着干，照顾手下人，去各处主动给业主帮忙，这会让他很开心。他之前在另一个新物业的工作时候，设施不全没有监控，他就偷偷帮人把车放走，不收他们钱，车主都给他递烟。**这种行为确实有毛主席的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工人的感觉，我们要发扬这种公心去对抗私心**。

"左"倾的思想往往就是急于解决个人的问题。他自己生活上受到的压迫很重，有时急于解决，就容易犯"左"的错误。**应该注意提醒他少想自己，多想着全世界受苦的人。自己以身作则，完全不要考虑个人利益。还要在生活上多帮助他，减少他生活中的焦虑**。

以下几件事在我的正确解释下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

- 女朋友总是以钱为主要目的。他最初一段时间还是反复提到这个问题，我问他你能想象江青问毛主席说要多少彩礼嘛。现在社会的男女关系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应该专心与资本家斗争。

- 他原本以为保安行业好，实际上并不好。也确定不可能再爬回班长的位置，资本的压力下那个位置也不可能不压榨人。靠上升搞改良的道路确定行不通。
- 新经理来后压得更狠还拖欠工资，把原本摸鱼的那群人全整掉了，和我预测的几乎一样。打碎了“在资本家疏忽遗漏的地方摸鱼也不错”的想法。
- 身体上的问题。经济更加困难，也认识到不能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经济越困难越自己卖力干，甚至保安12小时下班后，还要继续去很远的地方再去做兼职，反而身体上的一些问题让他损失更大。先是胃溃疡，我给了他保护胃黏膜的药，基本治好了，之后又出了牙疼的毛病，又拔牙又补牙的。年轻时太早出来闯荡都没有注意身体健康，后来问题越来越多了。他还视力不好，骑车老是撞车，很危险。**我就让他千万别再逞强了，告诉他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个人主义，不依靠组织而只依靠自己是行不通的。结合问题给出善意的批评，对于同志A的提高是很必要的**。

4. 安全意识的培养

不过最近他因为牙疼经常请假，倒又能因此抽出时间去见联系到的人。他联系的学生见面了以后，前些天又通过他之前别的地方认识的人联系到一个刚好来我这边的老革命，不过那个路线比较激进，他谈完也觉得和他联系要注意安全。

关于革命机问题，因为完全没有技术基础以及之前他自己不够重视，最近才开始落实了。之前他因为技术经验为0，翻墙老是出问题，再加上他自己不重视，还是用微信交流，革命机联网出问题了也不说，拖了非常久才解决。这次线下和学生同志会面算是帮他把革命机的技术问题基本解决了。然后他联系完

老革命后主动和我说通过革命机来讲这件事，算是很有进步了。

对于安全问题，不是我们定了纪律新同志就会遵守，如果遇到新同志在墙内和我们讲革命问题那也只能讲，所以我们教他在交流时应该避免直接的关键词、约定敏感词用字母缩写，并不断引导他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5. 培养看左派视频和读书

日常交流主要是他向我吐槽保安物业各种管卡压和傻逼规定，还有讨论他之前的经历，比如以前当保安时看到起纠纷报警，警察就站在富人那边，他那时就看懂了。

我结合他的这些亲身经历讨论问题，经常给他看一些b站视频，让他养成看这些视频的习惯，**他原先没有b站，我就过去帮他下载和注册(只和他说他容易拖)，这之后他才开始频繁地看了**。一开始借书给他看时，是夜班时让他出来摸鱼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躺在小区楼下沙发那边聊到很晚，打着手电筒一起看书，我先给他看一些书中经典的论述，引起了他的兴趣**。

关于读书问题，他做保安有阵子夜班管得松，空闲时间比较多，是就从图书馆把能借到的一些原著借给他读了。他没怎么上学，原来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这种同志读书和知识分子不一样，首先是看过去觉得那些话说得有道理。他的目的不是像一些知识分子一样建立理论体系但是不能用于分析实际的阶级斗争，而是找他觉得说得好的话**。比如最近我和他讨论和他接触的学生做灌输，给他看列宁谈论教育的文章，他看到"用自

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就说这句话说得很好。然后用这句话来对比自己遇到的社会现象。

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导师写的东西是对现实感性经验的理性分析，因为精要地解释了现实，就会让工友觉得说到他的心坎里了。**社会经验丰富的工友会更重视理论是否解释他的实际经验**。而脱产知识分子因为缺乏实际经验才会更重视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但是往往不能够将这种知识用于实际，不能把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当作行动的指南。

如列宁所说：

> 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 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6. 发展过程中路线的重要性

但**最重要的还是路线问题，考虑路线是一个工人开始成为革命干部最重要的标志**。所有的这些学习讲解中，最关键的就是我

们要不断把他引导到和我们一致的路线上。

有时我们的一些实践也会影响他对路线的看法。比如我上个厂里斗争没能带动产线上的人，他就说这让他觉得还是要找到真正能够一起行动的人。他举出之前有次看到一个城管欺负摆摊的，周围街坊和店主站出来帮他说话，城管就拿他没办法了，他觉得那样好。他说想要先从发动村庄中的小贩开始做（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案）。

他说想了很久想的这个路线，我说不能只靠自己想，要总结前人的实践。我说，群众不行动也要考虑到是我们的方案还不够好，还不能发动他们。**我告诉他他说的小摊贩是小资产阶级，反对压迫但不见得支持社会主义。反对政府的并非都支持社会主义，刺杀列宁的就是反政府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走资派原来也是反政府的，但只是为了自己当资本家。所以必须政治挂帅。这方面应该注意引用各种导师的话来说明。

我们在路线上必须自己足够明确，这样才能去纠正新同志的错误路线，不然如果新同志真的执行错误路线，也会对我们自己造成安全威胁。

要高度重视路线学习，以及在我们组织内外的做思想路线斗争锻炼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和影响新同志的错误路线做斗争，让他真正在路线上和我们统一，这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这位同志就确定了进厂发展同志的路线。目前他通过厂里联系到学校受霸凌的学生，和他们讲政治谈对社会的看法，引导到反对资本家，然后去尝试把他们引导进厂组织起来。

三、厂里好苗子的一些特征：

- 对线长及以上的管理人员高度戒备，和工人贵族划清界限。
- 对于工友的遭遇总是站在工友一边，不替老板说话。
- 对工友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有团结意识。
- 社会阅历多，各种受压迫的经历丰富。
- 不沉迷游戏和短视频，积极思考现实问题。 消费节俭。
- 不内卷，也没有脱产玩乐的想法。
- 上面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还应进一步交流观察他对于社会和资本家各方面的认识有多少是正确的，是否有幻想的地方，严不严重，能不能松动。适当时机直接和他表达反抗的愿望，看他是否也有这种愿望。
- 以及还要在一起活动中去检验他是否能在行动中和大家团结配合。

从厂内发展工人同志，应该采取筛选加培养的策略。**线下交往中我们了解先进工友实际所处的社会生活，可以借助他的各种现实经历对他做政治灌输，也可以借助我们自己的现实经历对他言传身教**。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要有彻底的理论，就必须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而绝不只是给工友念经、给工友读书、或者用别的网左式的或脱产知识分子的方法。**我们要结合现实的斗争做灌输，展现马列主义的威力，让工友发现马列主义对现实能解释、能预测，工友就会觉得马列主义灵，我们就会树立威信，工友就会认真考虑我们说的话，逐渐在路线上向我们靠拢**。这需要我们在厂内的实践中先做好群众的学生，再做好群众的老师，不断去锻炼发展先进工友和工人同志的能力。

四、同志A与其他同志的接触

我安排同志A和我本地的学生同志见面，他说感觉学生同志和我们是一类人，没有架子，帮他解决革命机的技术问题。我说之前给他的革命机就是学生同志帮忙弄的，我们接触很久了，路线是一致的。

另外，我给同志A看我和我认识的其他地方的同志B的聊天记录，他在新的厂和工贼斗智斗勇，和工友谈论政治，同时发展一个想造反的先进工友。他说同志B是和我们一类的人，也挺有意思的。我说同志B比我能说，很会和工友相处，能斗争也能聊政治，我只需要在他讨论时给他补充一些。

我和同志A说现在有的马列主义者只是埋头读书，却不能到群众中做灌输。同志A说那样子读书是没用的。

五、同志A是巴布石金式的工人同志

我之所以说同志A是巴布石金式的工人同志。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工人群众中发展出来的同志，原本就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和群众的交往是游刃有余的，他会从一个宿舍串到另一个宿舍，一个楼层串到另一个楼层，让一个工友从微信把别的工友推给他认识，他的社会经历使得他更会和工友交心，这些都是我要学习的。

同志A接受马列主义是因为马列主义和他多年的社会经验产生了共鸣，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和实践结合的，这也和先学理论再去了解社会的学生是不同的。同志A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那种学了知识就感觉高人一等的想法，而是人人平等的共产主

义的思想。在我们讨论发展工友的问题时，同志A讲得最多的就是平等和团结。同志A跟我说，如果没有平等和团结的意识，在厂里就不能认识很多的人、不能和他们深入交流。同志A善于和工人交流思想。他说老是打游戏那种工友不成熟，要找不沉迷游戏的，和他们讨论资本家的压迫，告诉他们要团结，告诉他们社会的腐败，让他们和我们团结起来，建立人人平等的世界。

列宁：“**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同志A就是这样一位列宁所说的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的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我和组织的任务就是协助这样的革命工人去使得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工人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我们呼吁越来越多的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实践，厂内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左转以来融工工作的简要总结

在“左转”以前，我是一个具有朴素爱国情怀和进步倾向的青年，对“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一些模糊的感性认识，仅仅将其视作政治考试中的标准答案。接触到马列毛主义对改革开放的批判后，我很快认清了当下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本质。在“左转”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四处搜集并学习不同的观点与资料。

我的第一阶段融工是自发的，目的一半是打工挣钱，一半是社会调查。在这一阶段，我有过几次融工经历，但斗争范围仅局限于个人经济利益层面。

我的第二阶段融工，始于接触到墙外的融工理论后，开始主动联系同志共同实践。当时我联系了一位主张“合法斗争”的同志。在共同参加面试时，我们立刻感受到了工人阶级低下的社会地位：工厂和中介把我们晾在一旁，甚至连座位都不提供，我们只能苦苦等待厂方出来“挑选”。工人只能被动接受各种霸王条款，否则就无法通过面试获得工作机会。在此期间，我还对部分群众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在交流中，这位同志认为体制内“大多数依然是好人”，我们融工是为了工农利益做些实事、宣传共产主义，但行动必须局限在合法的框架内。此外，他存在盲目的民族主义，认为必须高度警惕“境外势力”和日本间谍，甚至宣扬“原子弹下无冤魂”，声称在中国人原谅日本之前，日本平民同样有罪。我就这些观点与他进行了几天的激烈交锋，但即使搬出毛主席的原

话也无法说服他；邀请他观看红色电影，他也毫无兴趣。最终，他愤然离去，我便开始了独自融工。

这次独自融工持续了约两个月。我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便打成一片，并开始向他们传播马列毛主义思想，启发大家认识到“工人阶级才应是社会的主人”。

有一次，一位与我相熟的工人追问我在想什么。我反问：“‘无产阶级专政’你懂吗？”他回答：“你说‘无产阶级’我就懂了。”旁边一位线长听出端倪，开玩笑说要举报我。我坦然道：“你尽管举报，反正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那位与我相熟的工人立刻严肃地劝阻了线长（两人私交不错）。这位线长属于管理层中的“温和派”，不像其他线长那般动辄辱骂体罚，但他终究脱离了普通工人，依然会催促干活、指责怠工。

在此期间，我与那位相熟的工人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也因人而异地向其他工友传播了思想。那位工人虽认同“共产党已经变质”，但对改变现状抱有极大的悲观情绪，认为几乎不可能。当我批评他的悲观与不作为时，他反问：“那你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开始在厂内串联，带领工友一起进行怠工，以此揭露和激化阶级矛盾。

随后，我们在厂内发起了一次反对强制加班的斗争。厂里名义上是“自愿加班”，但实际上何时下班全凭线长和领导一句话。我们每天在厂内的时间至少14小时，扣除吃饭休息也高达12小时，且月休仅四天。我多次以此为切入点与工友们讨论。在一次公司会议上，我公开抗议工作时间过长，质问如何真正落实“自愿加班”。我发展的进步工友立即声援：“虽然加班

工资高，但我们的工作时间确实太长了！”其他工友中，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保持沉默；而兼任管理职务的工友则避重就轻，绝口不提加班问题。公司领导更是傲慢地偷换概念：“只有公司赚了钱才能给你们发工资，不能胜任就随时离职。”他们对“自愿加班”的质问避而不答，这次斗争最终未能达成实质性解决。

经过这一阶段的实践，我深刻体会到：仅凭个人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是远远不够的，群众工作与组织工作必须紧密围绕实际的阶级斗争来开展。于是，我开始寻找真正革命的组织，寻找真正革命的同志。

我的第三阶段融工，是在与几位同志就建党与组织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大家决定结伴开展的。我们选定了一家环境恶劣、工资低廉、充斥霸王条款且签订非法合同的机械制造厂。该厂规模较大，设有多部门、多项目，包含普工、钳工、电工、文员等工种。

厂里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在气温屡超40度、频发高温红色预警的酷暑中，车间既无空调也无高温补贴，连风扇都不够用，厂方每天只施舍般地发些廉价冷饮。工人需频繁搬运重物，一天劳作下来，衣服就没干过。

厂方的霸王条款更是令人发指：发一件工作服要扣100元押金；工作不满五天不结薪；异常打卡（如迟到）三次后每次重罚50元；首月时薪仅16元，次月才调至18元；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领导随意决定加班时长且无加班费；甚至随意无故辞退员工。基于这些现象，我研判该厂普工层面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然而，在面试时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仅有少数人放弃，

过半数人仍选择了入职。后来经工友了解得知，由于该厂地处农村边缘，周边工资普遍低下，加之许多毫无经济来源的学生工，大家只能被迫接受剥削。

我认为，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以下素养：

1. 具有不怕苦、不怕累的斗争精神；
2. 既要坚信无产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又要客观承认具体工人群众中存在的落后思想；
3. 勇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并讲究方式方法帮助他人进步；
4. 准备好开展长期的群众工作，以扭转当前资产阶级思想在群众中占主导的局面。

在具体行动中，我始终从阶级矛盾的切身体验切入，引导工友思考并组织斗争。入职第一天，我从早上八点半（八点前就得起床）一直被强制加班到次日凌晨一点。厂领导嚣张地冲我们吼叫：“不干完这批活，谁也别想下班！”一位老工人不屑地说：“我吃过的盐比他走过的路还多，还没谁吓得住我。”我借机多次在工友间挑起关于强制加班的讨论。

起初，大多数工友未作表态，有人甚至无奈地说：“我们打工的，听领导的就行了。”但随着夜幕加深，情绪开始发酵。我刚结识的一位工友，因领导频繁朝令夕改，加之基层头目的死板，导致他做了大量无用功。结合我一早便向他灌输的压迫理论，这位工友开始公开抱怨。我一边帮他分担工作，一边趁热打铁，向他揭示资方与工人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此时，厂里一位高管企图安抚情绪，夸赞这位工友“想干好活的态度是对的”，还画大饼说等他熟悉业务后提拔他当组长。

这位工友私下向我嗤之以鼻，表示绝不相信老板的鬼话。果不其然，第二天他便被厂方无故辞退，且未获分文补偿。但以此事为契机，我向他系统阐述了马列毛主义的核心观点，他深受启发，逐渐成长为一名认同我们路线的先进工人（下称工友1）。

后来，我继续运用同样的方法，因人而异地与其他工友开展了探讨。除工友1外，我还接触了以下几位典型：

工友2：老员工，对我的政治宣传颇感兴趣。他承认我们的观点有道理，但思想仍有妥协，感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这么高尚”，主张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理论“结合起来”。不过在实际行动中，他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只是受制于个人主义残留，尚不敢参与正面激烈的斗争。

工友3：在校大学生。每当我谈及政治，他就故意装聋作哑；但当我停止灌输时，他又会主动找我搭茬聊“阶级”。当我指出“资本家雇工剥削本质上是吃人”时，他抬杠说：“有本事你也开厂去啊。”我反问：“难道我自己也去吃人吗？”他顿时语塞。尽管他在口头上拒不认同马列毛观点，但在行动中却能自发地进行怠工，甚至组织了小范围的“互助小组”。

工友4：年过半百的老大哥。我较少同他谈论深奥的政治理论，主要聊社会大环境，他唯一的诉求就是让自己的“小家”过得更好。我告诉他：“大环境烂了，想独善其身顾好小家是很难的。”他干活极其卖力且古道热肠，时常帮别人分担。由于我也常帮他，他总抢着替我干重活，念叨着“我年纪大无所谓，别伤着你们”，并信奉“众人拾柴火焰高”。领了奖金后，他是全厂唯一一个自掏腰包买冰淇淋请大家客的人。他总

幻想着以后做小生意挣钱，让子孙后代跨越阶层。得知我要离职时，他十分不舍。

工友5：备考研究生的学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荼毒，坚信“剥削是你情我愿”，认同官方关于分配制度的教条。我与他展开辩论，指出“亿万富翁即使是个傻子或残疾也能活得滋润”，这从根本上推翻了他所谓“适者生存”的谬论；并强调打工是出卖劳动力的被迫求生，绝非自愿。他虽无言以对，但骨子里仍拒绝改变，反劝我像他一样去追求高学历。

限于篇幅，许多细节暂不赘述。客观总结这次融工：在组织层面上，我们依然较为松散，多停留在聚会讨论阶段；参与的同志普遍缺乏经验，有待改进。我也在同志内部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同志还不能坚持在艰苦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还不能坚持与群众相结合。有时候又急于看见成绩。部分同志难以快速主动地交朋友，没能与群众拥有充分的共同语言。这是同志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实际成果上，除了完成社会调查，我成功发展了一名先进工人，并影响了一名立场动摇的工人；我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赢得了不少工友的尊重。在我的组织下，我们开展了诉苦与怠工行动，敢于当面抵制管理层的强迫劳动，并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在理论认知上，我更加坚信：融工要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发芽，注定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融工必须在坚强的核心小组领导下有序开展，地方群众组织中应当尽量保证有先锋队的“党员”驻扎引领。

中国未来究竟要走什么路？是走向帝国主义，还是回归社会主义？答案无疑是后者。然而，当下的中国已被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今天，马列毛

主义者却依然山头林立，队伍中充斥着机会主义思潮。当前的革命事业能否走向胜利，取决于左派能否团结一致、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纪律严明、勇于自我批评、具备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与革命作风的先锋队政党；取决于左派能否统筹兼顾各项工作，全面协同发展；更取决于左派能否将马列毛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并将其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同志们，我们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在原则争论中走向团结，坚决抵制无底线的“开盒”倾轧与组织分裂；我们必须克服右倾保守与“左”倾盲动，主动走向最困难的地方，扎根群众，开展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必须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在资本主义复辟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在新时代重建社会主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宏伟任务，只能由崭新的共产党，带领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并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共同奋斗来实现！

工人工作专栏

#工人工作

本栏目发布工人群众工作讨论，收集反馈

物流行业的阶级斗争

群体： #物流行业工人

关键词： #员工画像　　#斗争性　　#阶级意识

1.普通员工。

这些员工中的男性员工，**特别是三十多到四十多岁的男性员工，又特别是从事装卸岗等重体力劳动的那一部分，斗争性最强**。他们中敢于直接向基层管理吼骂甚至挥拳，或者敢于直接撂挑子不干的比例，**显著的高于其他岗位**，并且特别的显著高于女性工作岗位和年轻人工作岗位（二十岁左右）。那么，我就给装卸岗这部分人做一个画像。

a.总的来说，**年龄较大的但不是特别大的，比年轻的更有斗争性，更“不服管”，更“吃软不吃硬”，更“需要讲理**，你不占理就说服不了他们，就很难指挥他们”，更不怕管理人员的狐假虎威，更敢于在认为不满意的时候吼人。

b.大多家庭经济压力大。这类岗位工资显著高于本厂其他岗位（可以高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但也显著较其他岗位劳累。他们大多需要养家糊口，未成家的很容易跑路。未成家的部分常常可以称得上长辈口中的“踏实能干，能吃苦”。

c.脾气大。这个群体总的来说脾气更大，更需要“有点匪气”，敢吼人的管理人员来管理。

d.不怕。纵使是有点匪气的管理人员，他们其实也不怕，**他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的，你平时牛逼爱吊人，我是不想搭理你，但你别触犯我的利益，否则你可以试试”**。软弱的管理也常常被他们“欺负”。

e.特别的“吃软“，你给予明确的尊重，他们对你特别的友善，**他们渴望被尊重，但常常得不到尊重**。

f.年轻人相对较“软”，更好被拿捏和恐吓。

g.***出门是为了赚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前提是你不能触犯我的利益***。他们一般不做出头鸟，**但遇到损害自己的利益的情况，相对于其他工人，他们更敢吼人**。

h.很能吃苦，并且身材较为精瘦。

以上是关于这个群体我目前所能想到的特征。接下来我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方面对本厂所有员工做一个画像。

2.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方面来看普通员工。

a.主力军是男性，并且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显著较电子厂比例低。*总的来说，男性员工斗争性最强，并且依然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更容易被拿捏和吓唬。*

b.特殊群体。有部分和管理人员关系较好的人，他们常常“舔”管理，并且适当的用请客吃饭，送礼物，甚至出卖色相来维护这份关系，他们中不乏飞扬跋扈的，有些部分，他们扮演管理角色，而管理人员借此摸鱼；也有些部分，他们扮演少干活，或者干好岗位的普通工人角色，其他工人常常对他们很不满。以上两部分都只是与管理关系好的人中的小部分人，大多数是较为正常和健康的。

但有这样一个规律：越是靠送礼物、请客吃饭、出卖色相来维持关系的人，其在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是不健康和不正常，就越是容易成为那种飞扬跋扈的狗腿子，越是容易更露骨的比其人工人少干多拿。

c.不满。工作劳累，工资低，远离家乡，熬夜，没有自己的时间，工人都这样抱怨。***他们的抖音和朋友圈常常呈现出悲观的文案和音乐，特别是男性员工，更爱叹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女性员工喜爱忙里偷闲的“臭美”，她们不轻易休息，但很愿意借休息的时候拍一些漂亮照片，试图弥补自己平时被剥夺的作为女性的爱美的权利***。

d.女性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显著较男性员工复杂，勾心斗角，相互攻讦的事情时有发生。

e.两性关系较为自由和开放，男性和女性较容易建立起恋爱和性爱关系，其中本身就有配偶的不算很少见。

f.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想法依然是存在于绝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中的。

思考：

1. 为什么年龄较大但不是特别大的员工更具有斗争性？这和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存在什么联系？

2. 为什么员工在面对不同人群时表现出强硬和温和两种态度？这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3. 依靠各种方式和管理拉关系的人员为什么更容易成为“狗腿子”一类的角色？

小恩小惠免不了资本剥削

群体： #钢铁工人

关键词： #特殊情况 #改良主义

1a：有一个工人同志在钢厂工作，他说资本家很愿意改良对工人很好，经常请工人吃饭，也没有管卡压制度，他觉得那里没有多少做工人工作的可能性

b：小恩小惠，黄鼠狼给鸡拜年，可以揭露资本家实际省拿走了多少，只是拿点塞牙缝的东西出来骗人而已

b：看工资多少，可能实际偏低，工资低，然后管得松加一点小恩小惠，让人不要走

“以为大家都不懂吗”–唯有组织起来推翻中修

群体： #外卖员

关键词： #工人想法　　#外卖

以下为某同志送外卖的体会，真情实感挺好的：

之前有段时间晚上下班我自己去跑了美团外卖，还是最坑人的*畅跑计划*，一单两块五，一次能挂五六单那种，跟着导航在城里转。有一次等单的时候，碰到一个老骑手，年纪比我大不少，车停在路边，一边抽烟一边刷手机。我就跟他搭话。

他一听我也是刚跑没多久，就笑，说新来的吧，多跑几天就知道了。他说他已经跑了三，四年了，以前在北京跑，从一开始觉得先干着再说，***到现在基本就是混个温饱***。*他跟我说现在最怕的不是累，是规则变得太快，今天还能这样跑，过几天可能就不行了。有时候系统一个调整，一整天白干*。他说这话的时候挺平静的，好像这些都已经见怪不怪。

我问他一天大概能挣多少，他就跟我掰着手指算，说扣掉租电池、租车，吃饭、房租，其实剩不下多少。但也没别的能干的。他说。我当时脑子里其实有很多话，想说这些规则是不是太不合理了，想问他有没有想过大家一起去争取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有点说不出口，最后还是问了。他听完就笑了，摇摇头，说你想得有点多了他接着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你以为大家不懂吗？都懂，就是不敢，也没那个时间。他说谁都不想惹事，一旦出头，号没了，人就没了。还有人要养家，哪有心思去折腾这些。以前总觉得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没看**

清、没想明白，但他说的那种都懂，反而让我更难受。原来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也只能那样。

后来他还问我，你是全职干这个吗。我说不是，就下班之后跑一跑。他点了点头，说那你还好，体验一下就行了。语气不算讽刺，*但也不太像是认同，更像是在说我们不是一类人*。这话让我有点不自在。我这几天觉得挺累的，已经觉得这活挺难干了，但对他来说，这是全部。他没有下班之后，也没有别的退路。再后来他接了单，临走前跟我说了一句：能不干就别干这个，真没啥前途。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不像是随口抱怨。我那天晚上继续跑单，但心里一直有点乱。之前总觉得，只要多接触、多了解，总能慢慢找到一些方向。但真正站在这个位置上，听到这些话，反而有点不知道该往哪走。跑单的时候你会一直盯着时间，算路线，怕超时，怕差评。慢慢就会发现，人其实很容易被这种节奏裹进去。你不会去想太多别的，只想着这一单能不能顺利送完。那种状态，其实挺消耗人的。现在回头想，那几天更像是一种短暂的进入，但也正因为短，才更明显地感觉到差距。我可以随时停下来，但他们不行。而很多我们平时觉得很重要的讨论，在那种生活里，很难占到位置。说不上完全失望，但确实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好像看清了一点东西，但这点看清，并没有带来什么力量，反而有点沉。甚至有时候会怀疑，我们到底能不能真正触碰到这些问题的核心，还是只是站在边上，看了一眼就走了。。。。

思考：

1. “你以为大家不懂吗”，确实是这样，工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被压迫，相反是没体会过的人不懂。但也不是说什么都

懂，他对于马列毛主义还是不知道的，他想的反抗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

2. 资本家会通过让利甚至亏本的方式来抢占市场，但在完成垄断之后就会成百上千倍的通过各种方式压低人力成本攫取剩余价值，而在这一环节中作为个体的工人则毫无反抗的能力。同时，这位老骑手的看法一方面佐证了资产阶级在通过这种强迫劳动的方式来阻碍无产阶级的团结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某些方式团结起来才能拥有和资本家对抗的能力。

3. 认识到规则不合理，这是改变现状的愿望，更进一步的，我们需要锻炼自己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

护工行业调查

群体： #医院护工

关键词： #职级差异　　#工作强度

1.医院的性质和内部情况

- 这个生产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算做政府的呢？因为我们的实习规则是必须是二甲医院及以上的，所以几乎都是公立医院，**那么应该算是一种国有资本吗？**

- 基本上在科室里面都是听护士长的安排，且护士长权威大，不过这个护士与护士长之间关系是否可行也主要在护士长，在我实习期间，一些科室内部的护士也对护士长私下有所不

满，很多时候也是会因为一些小事就被批评，同时也只能主动承认错误**哪怕不是自己干的** ，*算是一种封建式的家长权威？* 因此很多时候除非护士们觉得对护士长的安排实在不满什么的，才会说有争议，同时这个是否出现争议且有商量余地的情况下是**本身这些护士算是科室内部干的很久的老资历** 才有一定可能，不然穿小鞋的概率大大提高，同时很多时候都是年轻护士愿意和我们这些实习生分享与吐槽，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就是在科室待的时间够久的老护士（只不过这部分比例很小）。

2.护理人员之间的等级差异

- 除了护士，护师，主管护师这种职称以外（职称提高也能多拿几百的工资），还有就是具体的聘用方式了，**从高到低是：编制人员，合同工，劳务派遣这三大类，** *劳务派遣进*入医院的，第一年的工资通常只有1000多人民币一个月，干的活大多与合同工以及编制的相同，只不过这第一年可以不需要上夜班，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才能拿科室绩效奖金的百分之50，**同时医院也会有转成合同工的考试，听说通过概率不太高，** *有关系门路的能提前知晓大概范围从而更有”优势“*，通过合同工的考试相对应的待遇也会随之提高，编制的话现阶段都没有名额，按照之前我了解到的除了财政问题以外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也是就是有编制的人退休了才可能会放名额让大家竞争。* 这里就拿我目前知晓的一个内容来说明编内外的差别吧，关于生育期产假的，**编外人员只有60天，而编内人员有180天（不过只针对女性护士，男性护士只有区区7天不清楚是不是编内外一致），所以说光是这种待遇之间的鸿沟也算是一种很难真正团结的障碍之一了** 。

3.护理人员劳动强度问题

- 似乎不少人觉得说，护士在医院里面风吹不到下雨淋不到是比其他体力劳动强，但是在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接触当中，其实也说很难以言说的，如果碰到不讲理的还不愿意配合的，护理工作是很难推进的，如果试图和患者及其家属理论严重点的直接动手打护士，如果还手了，***可能就是得不到什么赔偿，而且可能面临双方行政拘留（除非和解）***，警察只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必然就没有什么所谓公平可言了。**而且护理部那边大概率觉得是这个护士的问题，为什么不好言相劝什么的，反而要那种年轻气盛的样子；至于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搞所谓的服务态度，明明一个相对而言是技术行业的情况下，让护理人员以服务行业的方式对待病人，当然我觉得确实是礼貌相对患者没错，但是患者及其家属在蛮横无理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

- 同样，护士不仅仅需要承担给患者进行护理治疗的责任，还需要书写护理文书（纸质版和电子版都需要），同时还要校对医嘱并及时让医生添加，并且患者出院的时候还要核对他们的花费清单等等是否无误，**这就相当于一个人要身兼数职，无论是不是责任护士都需要做这些，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用一个员工的工资实现了三到四个人的工作，导致很多时候都需要无偿加班；** 不过科室之间也是有分忙闲的，前面我说的情况在病人很多的科室是最多发生的，特别是大的内科外科，但也因为病人多，所以绩效相对偏高，不过因为医保有指标不能开出超过多少的药物，以及医保都会以现行标准去倒查前几年的花费，最后对医院实施罚款，以上这些导致了护士的工资绩效越来越低，但是工作强度不减，同时如果科室的护士增加也会导致到手的工资绩效稀释，**所以很多医院选择少找人或者不招人，只要有和学校合作，就能提供**

源源不断的实习生，然后来帮助做基础工作甚至是上手正式员工该做的工作，同时医院不需要支付一分钱，我们还要倒贴给医院实习费用，同时资格证考试还必须要求我们至少实习8个月，规培生的处境也十分类似，有时候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好像大家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盼头"吧。

4.最后的一些总结

- 像护理这个行业，如果说要以容易的方式进医院，那么小一点的医院就是有关系和护理部联系联系即可，同时本身有在三甲医院实习的经历以及本身在学校里面成绩比较突出的，那么优势自然更大。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也很难到医院去工作，很多医院招聘不多。**大点的医院比如在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护士想进去工作除了说这些医院放出的那极少的招聘名额以外，就是需要足够的关系和金钱开道才可以，当然自身能力也是需要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所以像我这种没有关系，本身技能也是掌握基础的情况下，想去很多时候可能只能靠劳务派遣了。

- 在提提前面说的护士与我们这些实习生交流的，年轻的护士很多会与我们有共鸣，***除了他们本身工资不高以外，就是面对奇奇怪怪的患者使得她们很崩溃，处理各种就是与她们自身专业不是很相关的事物以及其他的东西***，她们会觉得自己的工资无法匹配这个工作强度，特别是病人居多的科室，这意味输液病人很多，再加上文书什么的，非常忙碌，我们这些实习生同样也是连轴转，还有就是老护士对新护士的压迫，很多时候特别是换输液瓶的时候，都是老护士让新护士去或者让实习生去，或者是做其他的杂活什么的，如果不去的话，可能就是会什么故意针对以及直接找护士长告状诸如

此类的，所以说我们实习生和新的年轻护士之间讨论就可以放的开了。

- 最后的最后，如果让我和她们说马列毛的相关内容，就我那时候的情况而言，可能讲不了多少，不过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说我要与她们的关系更熟悉，然后我自己也能把这种马列毛的分析融入到里面告诉她们，目前我也不能确定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另：

同志，你们那里的医生是否有连续24小时的值班呢？我之前实习医院是有听到过

就是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压力大，情况是有的

思考：

1. 为什么护理行业仍然能保持浓厚的行会特点？这和职业本身的特点存在什么联系？

2. 医院在商品—货币循环中承担什么职能？

3. 服务业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的矛盾一般体现在什么方面？在目前环境下如何通过宣传缓解这一矛盾？

关于宣传对象

群体： #正式工　　#临时工

关键词： #同工不同酬　　#诉求差异

某同志：找签长期合同的正式工是否比临时工更适合作为宣传对象？

C：正式工会在乎自己的饭碗，临时工不把厂规放眼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式工都想加班，一些临时工不想加班，也不准时上下班，这些行为在正式工眼里，就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刚出来打工的有部分会这样。还有就是因为***正式工工资靠加班费，临时工是小时工，加班没有1.5倍和双倍***。也有正式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因为正式工不容易被开除（临时工这样容易被退掉），不在乎工资的。还是看人。

C：富士康就是个例子，正式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思考：

1. 正式工和临时工的诉求差异在什么地方？

2. 不同工作身份差异会产生什么矛盾？对于罢工、怠工等集体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

电子配件厂的工人阶级斗争

群体： #电子配件厂工人

关键词： #罢工报告

a：某同志的小型电子配件厂罢工事件调查报告：

x市的某一个小规模电子配件厂发生了因拖欠工人工资而应发的集体罢工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工厂本来规定承诺的是工人薪资还在每个月15号之前全部付清，但是自从×月份开始，工厂的就推说资金链紧张暂时周转不开，并且口头承诺最多只晚一个月一定把工资结清，可是一个月后工厂依然迟迟没有动静**。有几个工人代表前去找领导层询问，结果遭到了辱骂和羞辱，原话是：

“工厂的情况也跟你们讲了，你们tm是听不懂人话吗，工厂能少的了你们这几个钱！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天天问问问真烦。”工人又去找了*劳动监察大队，结果对面直接踢皮球，要求打市长政务热线或者是直接找警察，毫不在乎工人的死活*，在其位不谋其政，一群蛀虫。据了解这些工人有些年龄大一点的家里都等着用钱，子女上学，老人看病都需要，可是在紧要关头这些工厂却如同吃人不吐骨的恶魔，剥削压榨着这些工人，*而且这个工厂还有很多不合理乱罚钱的恶劣行为*，以及对工人辱骂有的年轻一点的受不了就早早的辞职不干了，但是很多有家庭的都迫于无奈，只能继续在那里干着。

由于求助无门，**在欠薪第二个月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工人便带头不干，以罢工的方式要求立即发放工资，刚开始只有八九个人响应，到最后规模演变成了100多人。据了解是堵在了老板和工厂主任的办公室门前，否则就集体罢工，时间维持了两天**。

第二天警察赶到了现场将一些带头的带走进行调查，后来工资在月底全部发放了。带头的几个年轻工人据说只是被问话调查，后来又放回去了，总共有五个人带头有三个还在工厂干，还有两个已经辞职走了。事后警察还在周围的工厂进行了走

访，要求保存当地派出所的电话，*然后强制要求下载国家反诈App*。

我认为这算是一次小的胜利，并且认为这对于做融工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去接触这几位比较先进的工人，可以发展成我们自己的成员。现在的整体社会情况时，很多职能部门并不能真正的为工人做主，资本剥削着工人的血汗与利益，这也是很多工人切身体会到的。

思考：

1. 本次罢工中工人使用了哪些合法和“非法”的手段？

2. 为什么资本家敢于无限期拖欠工人的工资？

3. 警察在整个罢工过程是如何进行维稳的？这一现象如何指导组织集体行动？

中修教育集团与工厂的勾结起来，如何进行斗争？

群体： #技校实习生

关键词： #在校实习　　#校厂勾结　　#学生斗争

a：该同志了解到的一个厂里的情况，同志们看看有什么建议：

我了解到大概是学校是个技术学校，这个学校和工厂强制送学生进厂打螺丝作为毕业前实习的一部分。***说是给的时薪是13元但实际上只给6块钱一个小时***。进厂学生们觉得是学校负责人

吃回扣了把他们工资给吞了一部分，因为他们去厂子里闹过一次，厂里的人说是就是给了13块钱一个小时但这帮学生要求厂子出示凭证，厂子又不出示，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工厂吞了还是学校吞了但现在只问过工厂所以暂时认定是学校的人吞了钱，*但又怕找学校的话，学校不让他们毕业就很难*，这种情况同志们有没什么好的建议。

b：坚持让他们出示凭据，要同学们以厂方出示凭据为斗争的最低要求去厂里面闹事，然后根据凭据再去做斗争，是继续在厂里闹还是回学校闹

b：如果是厂方克扣那就坚持不离厂斗争，通过吵架或其他方式干扰生产秩序，直到警察过来，向警察诉苦后坚持要钱的要求，可能可以当场解决。如果被警察撵走就去劳动局举报。如果是学校过来，也要求厂方必须出示凭据，坚决不离厂，对付学校见下

b：如果是学校克扣那就回学校闹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软方法(堵负责人门，跟踪)或者硬方法(线上发帖，大量举报转发，线下聚会伸冤，大字报)逼迫学校回应解决。向学生灌输法不责众的团结观念，**建议无论如何都要集体行动**，学校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开除，如果要开除带头的，其他人就跟上说如果要开除他那把我们都开除了

a：好的同志，我也跟这边的学生说一下

c：这种签了三方协议的基本工厂和学校都吃了很多回扣，从哪个场所施压得看具体情况

c：我觉得最好是能在厂内斗争，可以点燃其他工人的斗争决心，这样也能在本地工业区传得比较广，校内斗争最多是搞舆论施压，这个不仅考验学生的能力，还得考虑校方那边对于舆论的把控力度

c：第一个月工资已经发了，实际只拿到6块钱一小时吗？还是说工资还没发，是老师这么和他们说

a：是发了的，但没有工资单，这小孩也不说是什么方式发的钱也是难搞。这是我结合大家的意见跟学生讨论一个的解决方案。首先确定学生手里是没有纸面上写的清清楚楚时薪多少钱的白纸黑字合同，***学生给的回复是他们只知道只有学校跟学生签署的实习证明，真正的合同是学校和工厂签署的***，我跟他们商量目前想办法去获取一下，保留三方协议实习协议原件或照片，重点看薪酬条款怎么写的（时薪13元有没有白纸黑字），保留他们考勤记录、打卡记录，证明实际工作小时数，保留工资到账记录（比如银行流水、工资条、C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这个钱是怎么给这些学生的保留记录。要求他们老师提供厂方、学校老师的沟通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尤其是厂方说”就是给了13块”这类表态

b：要求厂方出具正式的工资明细，计算方式说明（书面形式，别只是口头），对比协议约定时薪与实发时薪的差额，算出每人每月被克扣的具体金额，如果多名学生情况一致，那就是系统性问题，不是个案误算，举荐一个学生成为学生代表去和校内厂内交涉，要求书面说明和补发，如果学校以”不让毕业”施压，这属于胁迫性质，直接向当地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把证据收集一些之后直接拨打去人社热线或当地劳

动监察部门举报,必要时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有老师敢说什么威胁毕业的话直接举报教育局。

a：看看最后他们行动之后的结果如何，我想写成大字报

b”关于工资数额，就算是劳务合同的时薪换算过来也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如果找不到相关的13块钱的证据，可以直接拿劳动法第48条作为依据，用当地最低工资÷21.75÷8得到最低时薪，一般都在12-16之间，直接拿这个作为依据也可以

b：同学之间讨论怎么办很重要，任何东西不得到群众的认同都做不下去

a-我看就是找工厂让他解决，不管他怎么踢皮球，工资就是没发够就是违法，别人中间截了也要他去解决。

b：不补发就拒绝加班，上五天八小时，依法我们有权拒绝加班，相当于每天每周罢工一段时间，影响他正常的生产

b：在学生中鼓动看看能否得到支持，团结先进的学生带头来做

c：是的，若没有群众支持，只有几个光杆司令，反而使这些先进分子暴露在反动派势力之下了，白白丢失几个可能可以发展成同志的引导对象

b：在学校斗争比在厂区斗争更容易被逐个击破，领导和老师可以分别向不同班施压，学校对他们来说是天然的分割线和战壕

b：而且等回到学校再斗争时间上可能来不及，这些是我个人的经验

a：好的同志 这些经验很宝贵 我会慢慢给学生传达。感觉他们目前还是缺乏一些胆量，怕这怕那的。

思考：

1. 和一般工人相比，在校实习生具有什么特别的特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2. 为什么毕业证书会卡住学生？毕业证书对学生意味着什么？

3. 在给出的建议中提到了哪些可能利用的不易受打击的维权方案？这些方案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时成功率更高？

4. 组织工人维权应该注意保存哪些证据？

关于工人伙食的一次讨论

群体： #工人

关键词： #伙食

（前提：正在讨论墙内两个小组之间的冲突）

a: 说到这个想和线下同志确认一下，现在工厂伙食应该不至于像他们说的一样烂吧

b: 他们怎么说的?厂里自准备的伙食都很烂,味道不好是次要的，有时候容易拉肚子

a回复b: 除了主食外最多只提供素菜甚至土豆等淀粉糊湖的供应

b: 感觉很符合小资幻想，人家食堂都是签承包合同的卖的死贵死贵，**工厂的餐补打卡里逼工人吃食堂，但是不好吃又不卫生就是了，他那样搞食堂也赚不到钱**

c（具有入厂工作经验的同志）:（针对仅提供主食和素菜的回应）胡说八道，***厂里伙食差不多就是外面自选快餐店水平***。只有素菜怎么可能有人干?

c回复b: 包吃的食堂 ，我们不吃他也拿不到钱

d: 哪有工厂用玻璃保鲜盒塞几块土豆糊糊和一份米饭的。要是真有工厂这么做，估计所有人都提桶跑路了,**现在的中国是发达的工业社会，工人食物的问题主要是高油高盐**

补充：实际在厂工作同志的伙食情况反馈

1. 我这边外面自选快餐店的行情，**一荤两素12元，两荤一素15元**，食堂价格和这个也差不多，会稍C便宜点。然后再加上现煮的窗口，看不同厂不一样，有的种类多些，盖浇饭、金汤肉片之类的，15块这样

2. 肉菜一般10元吧，普通炒菜大概六元（比如韭菜炒鸡蛋豇豆炒肉莴笋炒蛋），纯素菜三元，米饭一元，我工作的地方食堂是这样的，也是基本每天13-17，两个菜的话

思考：

1. 中国工人的剥削率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的伙食就一定比过去要差，工人就一定是啃地瓜喝稀粥就咸菜的。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只能且必须在工厂中，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中才能得到答案。

理论战线

论融工派和政治报派的分野

序言

在我国马列毛主义或者说更为广泛的一切支持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目前越来越清晰分为“融工派”和“政治报派”两大相互对立的派别。

这种派别的划分与派别矛盾绝不是一些庸俗的学理主义者或纯粹从理论（或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认为的那样——这种分歧只是由于纯粹理论、观点上的分歧所产生的矛盾，只是学术上的矛盾。

不是的。它是客观的分歧，是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也就是不为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会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而相应的发展、变化着的一种现实分歧。

随着事态的发展（即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各种革命工作的发展），这种分歧也在相应的不断发展，分歧早已从单纯的理论斗争开始转变为更加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

两派不同组织的各自迥异的组织活动与革命实践[1],使这种分歧开始发展到各自的革命工作和群众工作中。两派组织愈发激烈的政治斗争[2]，如：求是系组织和其他某些政治报派组织之间的斗争，叛徒工革报一伙（以子时夜半为首的）、秦始皇一类

的货色对工解的开盒、污蔑和悬赏等恶毒打击，使这种分歧逐步的发展为具有互相冲突、互相敌对性质的政治斗争。

这些都足以证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的较长一段时间中（也许是好几年，也许是更长），两派之间的矛盾只会继续发展，只会越发激烈、鲜明。这种矛盾也会随之扩展至未来两派发展起来的组织工作与影响的群众运动中。

正如我们早已在《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这篇小册子开头就大致谈及的观点，即这种斗争从一开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有着它的物质基础，它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不同的路线之间的矛盾。两派矛盾本质上说来就是要工人阶级独立自我的领导我国革命还是由知识分子或别的什么阶级来领导我国革命之间的一种阶级矛盾。

如今，随着这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它越发清晰的向人们展示出自身的物质基础、阶级根源，展示出它的真实矛盾构成。展现出它们方方面面截然不同的差异和根本对立，大致来说，这种矛盾也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众路线和精英路线、线下利益和线上利益、厂内利益和厂外利益之间的矛盾的现阶段集中体现。

当然，单纯从“融工”或“政治报”本身的问题出发，已经不足以完全说明两者之间的全部 矛盾，随着未来事态的发展，这种提法或派别名称、意义、划分方式本身也会发生新的变化（因为两派矛盾已经有往不同阶级组织发展的趋势）。但目前以这两点为线索出发来研究，引申出两派的大部分重要分歧、根本差异，并大致判断出他们的性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就工农解放社其本身的实践和所提出的“工人革命路线”和“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等内容来说，属于现阶段的融工派阵营的一员。工解在整个融工派中也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组织。虽然我们并不能代表其他融工派组织的观点，我们同求是系等其他融工组织之间也有许多不小的差异与分歧，但总的来说还属于融工派、我们与政治报派差异更大更根本、我们自身实践现阶段也完全没有跳出两派的界限。

融工派内部的差异和分歧一点也不比政治报派内部的差异和分歧小（融工派中也有机会主义的部分），至于这些差异中哪些因素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因素能够在未来把这整个事物、整个矛盾发展到新的阶段的，还是更加细微、更需研究和更需实践说明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能够包含的命题。

本文在这里主要还是说明现阶段融工派和政治报派之间的问题，而其各自派别内部的差异和问题则不详细阐述。且本文也主要是从工解的观点出发（而不能代表求是系和其他融工派组织的观点）来说明自身和其他政治报派的差异。

重要的分歧点

工农解放社认为，我们目前和其他政治报派比较统一的重要分歧为如下几点（其实更多，这里只 举出重要的几点，未来可以再加）：

1. 以工人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其他工作为中心？

工解一向坚定以“工人工作为中心，明确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的观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各种方式、提法或实践做法把工人工作首要性抹杀的而以其他工作为中心的政治报派组织。

有提出过“现在最缺的是职业革命家”观点的东风，也有要用“政治报建党”的前进报、列宁道路等组织，也有“工人工作同其他某些工作一样重要”的观点（东风等部分政治报派组织曾经的折衷主义提法），也属于此类。同样，这样来区分双方的线上和线下观点也是可以的。因此也就产生了融工和政治报的在中心工作上的分歧。

2. 线上领导线下还是线下领导线上，工人革命力量领导还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阶级领导

因为前面那个问题产生分歧和斗争，随着革命实践与路线斗争的发展，就进而产生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后者），全部政治报派组织都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在RSF时期，我们在和大群、东风等组织斗争时，就明确的提出“线下领导线上，线上工作为线下工作服务“的观点，由此开始进行转型。大群、东风等后来一系列政治报组织对这个问题是一向是含糊其辞或干脆避开的，东风的重要干部曾经在同我们的论战中提出过”线上和线下同样重要，线下和线上的同志都可以参与领导“的折衷主义观点，这种折衷主义观点后来在前进报等政治报组织那也有体现[3],还有类似

大群等实际上唯纪律论、唯组织论、唯暴力论的“线上先锋队”等观点（实际上也是在抹杀与回避革命组织自身的阶级领导、主要的阶级工作的问题）；因而实际上也就演变为了无所谓线上线下谁来领导、谁都可以领导，也就出现了外国留学学生领导工革报，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也包括留学生，各种知识分子，体制内人士，流氓无产阶级）领导的东风等等现象。

而我们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同这些政治报派组织论战的过程中，我们也明确提出了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重点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的观点，进一步清晰了和发展了同政治报派组织的分野。

从组织现状来说，工解的核心干部以革命工人为主。其他重要干部即使还不是革命工人的，我们也要求其能带头融工、进行工人工作的同时并深入的结合工人，因为各种原因还不能融入工人或主要从事工人工作的，我们也要求其为工人工作服务，努力使其受工人革命力量所领导。

因此。不管从客观的阶级性质上来说，还是以主观上的革命路线来说。工解和其他政治报派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阶级性质差异。

政治报派的主要成员和领导力量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甚至是学生为主，并且继续贯彻着一种同工人革命力量发展与领导需求相矛盾的路线。他们也经常打着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学说的面貌，也时常装扮为代表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未来的模样。但他们和真正工人革命队伍差别始终是巨大的，而且未来还会越来越大。

这种差别比一切民族之间的差别还要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是要不断产生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为其经济的发展服务，但又总是要迫使相当大一批社会各阶级成员濒临破产或使他们陷入到坠入无产者队伍中去的境地。在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和爆发的阶段，这一批群体就会不得不愈发明显的陷入选择加入革命或是反革命的路径。自然我们必然要尝试团结和改造他们，没有他们的力量，革命的发展是要更加困难和曲折的。但是，他们绝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这样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从其自身的阶级特点、阶级习惯以及从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资本主义社会对一切阶级造成的长期影响上来说，他们自然会把许多非共产主义的东西带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就是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

这里我们只需要稍稍运用一下列宁的观点就可以明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在历史实践上的可行，迫使这些群体、这些阶级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不得不被马克思主义所“俘获”（在我国这一点尤其明显），迫使他们许多人不得不成为或装扮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又总是自发的或自觉地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生活习惯、世界观中的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带进马克思主义中来，进而把它解释为、歪曲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一贯精神的东西（这种原则和精神主要来说就是它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质）。因此也就不得不产生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而也就要自觉或不自觉的倒反天罡地去领导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他们是难以承认这一点的）。

政治报派的基础就是这个。

因而他们有时就采用教条的办法。经常用革命的词句来反对革命，用列宁的词句来反对列宁的一贯精神（抽出政治报计划但不看前提和条件，不看更多联系起来的原文和相关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总的来说。我们同政治报的分歧就在于，是要用革命工人力量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去领导其他阶级走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政治报则是反过来代表其他阶级利益领导工人，进而要客观上也就不得不导致他们同工人一起走向重复资本主义结局的道路。

3. 融工还是政治报？

或者进一步说，以厂内工作、工人自己的革命化组织工作为中心，还是以抽象的（抛弃前者为主要基础的）地方工作、政治报工作、线上工作、革命家组织工作或先锋队工作为中心？

一开始两派分歧只是停留在“融工”和“政治报”工作谁为主的分歧上。但随着革命工作的实践与理论斗争的发展，只是这样来看分歧已经不够了。融工派在发展，政治报派也在发展。

融工派建立了自己的厂内组织和地方组织，政治报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的组织。两派也有自己的墙外或线上组织，两派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人工作。在这一切地方，也产生了各种重大分歧。

工解认为，融工的目的是革命化的组织工人阶级，进而推动我国革命与工人革命力量对我国革命的领导，而融工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步和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工解建立的地方组

织一般是由工人革命分子领导，要求能融工的融工，不能融工服务工人工作，一切工作完全服务于厂内的工人组织工作；而政治报派则是反过来，各种非工人的知识分子或各个阶级，他们通过其他各种工作或组织方式建立自己的组织，然后反过来尝试去领导工人。

所以工解并不反对各种地方组织工作、厂外工作以及线上工作和政治报等工作，而是要求客观的、正确的评判这种工作，理解这些工作的作用，善于利用这些工作来为中心的工人工作服务，来为工人革命事业服务。

当然政治报有的也不反对工人工作或线下工作。比如工革报就不反对线下工作，而是实际要求线下工作、工人工作为其他工作或其他非工人革命利益的东西服务。

4. 如何建党的问题。

许多政治报派都提出了要求建党的需求，并把融工派打为不要建党或者至少不积极建党的组织。但实际上工解等融工派组织也是追求建党的，即使是求是系组织他们成员也经常私下自比为最接近先锋队组织。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建党，而在于怎样建党的问题。

是以工人的革命化组织、工人革命工作、工人革命力量的发展为建党和建党工作的基础来逐步建党，还是抛开前者的主要性来以政治报工作、线上工作、统合现有小组工作、加强组织性或纪律性等其他某些方面为基础？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多一个其他阶级的政党。

在建党的基础问题上，我们最早提出了“实质建党”的提法（虽然前进报借用了这个说法，然后冠名在政治报工作上），认为必须依靠工人工作的发展为基础来一步步完成整个无产阶级建党工作。

而大群实际上的“线上先锋队”，各种政治报派的政治报工作。他们认为工人工作者或者厂内的一线工作者只负责组织罢工、发传单，搜集群众意愿，只掌握有限组织机密。而最优秀的革命者在厂外秘密存在，他们负责指挥，掌握组织核心机密和操控全局；以此引出需要一个严密的组织，相应先锋队或政党等等。

虽然将来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能会需要采取这样的保密隔离制度和如此严密的组织，但以此作为需要建党的理由、并把这种特征当作党的主要标志，尤其是在现阶段提出来，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或以目前的条件执行起来必然要变为反动的东西。

作为一个纯粹观点来说，这是没有考虑到现状的，没从现实出发，没有结合无产阶级的长期利益出发来考虑。以及没有考虑好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每一现实步骤，特别是每一步骤中都要保持它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有每一步骤中如何保持加强这种性质。简单的从斗争需要的安全、保密、分工、纪律等角度出发来考虑是不够的。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这相当于只考虑手段，不考虑后果。只想着吃到胜利的果实，不想着谁来吃这个果实、吃果实的人是谁。几乎所有政治报都在这个问题上

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产生表面看是由于空想，但实际上也是和其脱离工人阶级、脱离社会实践、脱离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产物。

从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无产阶级的党来保证。但这样党在它实现和发展的每一步骤中，甚至在它没有产生萌芽阶段起，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工人革命力量和工人工作程度都是在不断的加强的，从现实步骤来说。完成这一系列革命和建立与发展这样党是同步的过程，那么在阶级性质上它的工人阶级性质一开始就不能含糊而是应该越来越加强，它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样需要大量工人革命力量为基础，否则共产运动就不能发展，党也不能产生和发展。我们只能在这样的路线上加强它的纪律与组织，开展各种工作，团结和改造各阶级，革命改造整个社会，不是把主次反过来。

简单来说，工人革命工作的发展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提供领导基础、提供性质保障、提供核心力量。我们一切工作包括建党工作的基础也全部建立在这里。

如果建党的路线错了，即使是再有秩序、再庞大的政治组织也不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党，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5. 关于”工业化”的问题

一切政治报派空谈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基础来作为抨击融工派的重要观点。实际上，工业化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空谈

工业化就和上面谈及的空谈纪律、空谈组织犯了一样的错误，即不要阶级、不讲主次的错误。

同时，我们认为工业化基础也同样在于工人工作的发展。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工人运动还很初级，我国革命分子同工人运动相分离，我国革命工作也极端落后。在这个基础上小组阶段，即那种必要去让革命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推动工人运动、推动工人工作的小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而政治报派则幻想依靠“团结”或统一现有的革命组织，或者说靠政治报把现有政治资源结合起来就可以建党了（当然从现在的实践条件上来看这也是做不到的）。

哪怕就以“团结”和统一现有革命组织来看。东风的遭遇已经足够说明这个观点的失败的了，团结各种所谓革命组织的东风，变成了各色机会主义的大染缸，然后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互相篡夺，最后濒临灭亡。

因此我们“工业化”是要求在工人工作发展基础上逐步的加强组织和实现工业化。而政治报派的工业化更多是靠招兵买马。

工解和工解前身的两次墙外统一战线的尝试，即试图团结较好一批政治报组织和融工派合作，试图平等合作，结果也证明了不可行。部分政治报派不参与，部分参与了的政治报派不积极，少数政治报派试图夺权，背叛了两次墙外统一战线和我们共同的工人革命利益，破坏了工人工作的发展。从实践上来说，政治报派也难以团结（或者说难以整个的或大多数团结过来），也证明了一些政治报派组织的不可靠，和政治报派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或只能被工人革命力量所领导的结论。

1. 这里只需要明白求是系、工农解放社之类的组织在工人工作与革命组织工作方面与新十月、燎原大群之类组织之间的差异就能明白了。 ↩

2. 一般是以政治报派组织（如大群、工革报、新十月、前进报、东风、列宁道路等等）对融工派的恶劣进攻为主，另外也包括部分融工派的反击或部分融工派组织中的机会主义成分与行径（如部分求是系组织的行为）。 ↩

3. 前进报的观点是：“不是‘线上服从线下’、‘一切先进分子都到工人中去’，而是全部工作‘服从革命需要’，全部工作统一由地方核心小组领导安排。”当然，按照前进报的完整提法，这种地方小组又由通过理论学习以及非工人革命工作中产生的人主要构成。 ↩

从何出发？——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前言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政治报出发，通过政治报笼络群众，以建立新的革命党的道路。另一条路线是从各地的革命组织出发，通过各地革命组织的联合，以政治报作为这一联合的辅助，建立革命党的道路。从政治报出发的一派构成了空想政治报派，从各地革命组织的实践出发的一派构成了工人革命派，或者被叫做融工派。

这两派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关于该话题的详细文章。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揭示空想政治报派的最新动向。以说明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

一、评工革报批判工农解放社一期的路线动向

在这一期中，工革报好不容易写出来了一个路线式的段落。我们把这一段落摘录如下：

工革报编辑部坚持辩证的、螺旋上升的列宁主义政治报路线。这条路线强调政治报纸作为革命舆论机关和组织成员与群众之间的耦合器作用，通过“报纸——实践——报纸”即“从报纸到报纸”的良性循环，实现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它既反对机械融工对自发性的迷信，也同时反对把政治报变成脱离实践的孤立任务，而是要把政治报纸与有组织的群众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从理论到群众、从群众到理论的反复飞跃： 首先通过政治报纸广泛聚拢先进工人、革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揭露和政治灌输，形成初步的理论共识和革命骨干。接着，把这些聚拢起来的人有计划地反向推动到有组织的地方革命实践当中去，然后在工厂、社区等阵地建立基层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和斗争锻炼，同时把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反哺到报纸中。进而，以扩大了的群众基础和丰富了的实践内容，进一步提升政治报纸的理论深度、报道广度和组织凝聚力，形成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的螺旋发展，最终服务于实质性建党。

我们坚持列宁同志关于从外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原理，同时强调灌输必须与有组织的群众实践相结合，不能使斗争工作变成少数人的清谈。我们主张通过政治报纸培养出称职的兼职革命家和群众组织，反对任何把自发斗争绝对化或把报纸作用绝对化、极端化的偏差。在当前阶段，重点是把政治报纸作为组织工具和连接线上、线下各部各组织的纽带，吸引先进分子，并把他们反向派往工厂实践，建立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基层组织，通过实践检验和丰富报纸内容，形成全国协调统筹的先锋队组织架构和力量，并最终在不断的线下

实践斗争当中去促成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组织（革命党）的形成。

以组织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卫星式的报刊体系。分层建立起一套分属适用于各个阶段的刊物，例如《工人革命报》、《反修》、《文汇报》等，作为革命舆论机关和组织的耦合器。其内容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实际，揭露修正主义政权的本质，传播革命的理论，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报纸要坚持独立性，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革命力量，但绝不允许变成任何小集团的工具。当前的重点是提高理论质量、扩大发行网络、建立稳定供稿和发行队伍，为实质建党去搭建组织框架，并通过一切方式把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反向推动实践与战斗组织建设任务。把通过报纸聚拢的先进分子有计划地通过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地方串联小组，来组织起来反向派往工厂、工业区和社区，在有组织的状态下开展群众工作和斗争。不是散漫或自发，而是以革命理论为指导，融入、建立基层小组，培养出工人骨干，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锻炼。实践成果要及时反馈，形成“实践出真知、报纸出方向”的良性循环。重点工业区域要实现协调，避免各自为战。

通过这一过程，把先进分子锻造成兼职革命家，逐步建立地下革命组织与地上群众组织相结合的战斗体系。

组织建设与地下网络任务。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逐步建立地下革命组织与地上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体系。通过报纸和实践双重筛选，培养出一批无产阶级的兼职革命家，剔除机会主义分子。严格地上地下划分，发展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为未来战略进攻准备力量。要坚决地反对小集团宗派主义和个

> 人野心，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要把革命力量从分散状态引导向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方向发展。
>
> 思想斗争与理论武装任务。深入批判机械融工对自发性的迷信以及机械政治报的教条主义偏差，批判一切把自发斗争绝对化或把报纸作用绝对化的错误路线。要尽一切可能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路线辩论的进行，把广大革命者团结到正确路线上来。加强理论学习，把马列毛原著与当下的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高革命者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

“报纸——实践——报纸”——这就是工革报的所谓新路线，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煞有介事地说，这条路线“既反对机械融工对自发性的迷信，也同时反对把政治报变成脱离实践的孤立任务，而是要把政治报纸与有组织的群众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从理论到群众、从群众到理论的反复飞跃”。然而，我们在下文中就可以看到它的实质。

在下文中，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阐述了这条路线。通过提炼他们语言冗长的无效段落，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下面几条思想观点：

> 主张通过政治报纸培养出称职的兼职革命家和群众组织

> 首先通过政治报纸广泛聚拢先进工人、革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揭露和政治灌输，形成初步的理论共识和革命骨干。接着，把这些聚拢起来的人有计划地反向推动到有

> 组织的地方革命实践当中去，然后在工厂、社区等阵地建立基层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和斗争锻炼，同时把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反哺到报纸中。

> 在当前阶段，重点是把政治报纸作为组织工具和连接线上、线下各部各组织的纽带，吸引先进分子，并把他们反向派往工厂实践，建立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基层组织，通过实践检验和丰富报纸内容，形成全国协调统筹的先锋队组织架构和力量，并最终在不断的线下实践斗争当中去促成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组织（革命党）的形成。

> 把通过报纸聚拢的先进分子有计划地通过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地方串联小组，来组织起来反向派往工厂、工业区和社区，在有组织的状态下开展群众工作和斗争。不是散漫或自发，而是以革命理论为指导，融入、建立基层小组，培养出工人骨干，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锻炼。实践成果要及时反馈，形成“实践出真知、报纸出方向”的良性循环。重点工业区域要实现协调，避免各自为战。

也就是说，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的路线是，首先，通过政治报纸广泛聚拢先进工人、革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第二，把报纸聚拢的先进分子，通过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地方串联小组，组织起来，反向派往工厂、工业区和社区，有组织的开展群众工作和斗争，融入、建立基层小组，培养出工人骨干，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锻炼。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认为，在当前阶段，重点是把政治报纸作为组织工具和连接线上、线下各部各组织的纽带，吸引先进分子，并把他们反向派往工厂实践，建立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基层组织，通过这种手段，把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反哺到报纸中。

从这里，在工革报政治流氓们的长难句背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这条路线，并不是他们所吹捧的一条所谓的新路线，而正是已经被中国的实践所抛弃，为许多地方组织所唾弃的，空想政治报派路线。通过办一个政治报纸，而自命为中央，并幻想通过这个中央指挥各个地区的组织——这就是空想政治报派路线，这种光杆司令式的路线，早就出了无数次历史教训，在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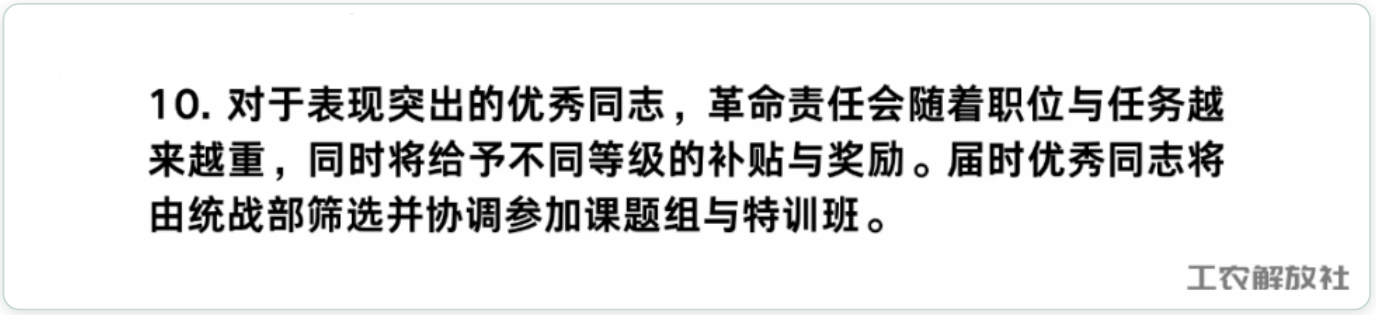
二、堕落的空想政治报派

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的产生，是空想政治报派堕落的表现。为了反对正确的路线，他们甚至不惜把历史上已经被打倒了的人物给重新抬起来。他们的行动，以及这一行为的阶级实质，反映了他们只是一群贪图权力的政治流氓。

他们指控我们：

> “工农解放社对钱的贪念极重。很难想象一个线上组织能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信赖他们的同志当作提款机，找各种方式去要钱。”

这个指控给到工革报的长江之辉才是合适的。长江之辉之前就说什么现在革命的不足是因为缺钱。难道撒几个亿厂内小组就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长江之辉又解释道：“三五千万就够了，我搞几个中介直接掌握工人，不比挨个去发展快得多。”长江之辉能说出这样荒谬绝伦的话，可见他是一个"资本主义专家"，因为资本主义“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中介革命”是哪门子的革命路线，这分明就是长江之辉靠着“工革”做他的剥削梦路线！ 而工革报之前联合自由派分子“九”搞出来的统战大纲也明确提到了等级制和经济刺激。



九的《统战大纲》

重复一下我们之前的批判：

> «统战大纲»就是夜半-九-长江之辉为首的“工革”机会主义团伙以利润和名誉挂帅演出的闹剧，而“工革”内的部分机会主义者还厚颜无耻地把责任往工解这边甩，但是只要梳理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就能看清谁应该对此负责！看看这份“统战大纲”，里面九又扯什么“革命资金补贴”“等级奖励”“经济支持”，和长江之辉完全就是一丘之貉！

工革报后面又贴出来所谓的“工解要钱事件”，那个ai的事情无非就是写作改开史需要ai帮忙查资料，写其他的揭露材料也要，grok的查资料功能很强但是老是要会员，所以就考虑本地搭建，考虑到子时夜半在国外方便买服务器就去询问他跟他商讨，最后也没给钱，无非是商讨一下。子时夜半为什么这么有被害妄想症呢？ 我们不否认子时夜半曾经给了我们一点经济帮助，作为列宁选集常驻嘉宾的司徒卢威先生也给罢工工人提供过经济帮助，详见《列宁回忆录》，不过司徒卢威先生可没有拿这一点来显摆过，子时夜半却如此看重，好像一个资本家看重他的投资一样。 然后所谓的东夏吃喝事件，就是那个政治骗子“九”捏造的，线下见面吃个饭给这家伙添油加醋编了很多东西，而工革报虽然口头承认这家伙是政治骗子并切割，却不加任何怀疑地采信了这些说法，可见他们的毫无原则。

> 这里我们必须把群革社和工解的勾结，以及他们的头子明天见（之前叫做123）这人揭露出来。明天见这个人的人品实在是难堪，一些个人的私生活的不堪内容我们就不说了。他曾大搞个人崇拜，学林彪弄了什么《123语录》，好的不学尽学坏的。他曾要组织内的每个人向他报告，类似于思想精神控制、以及对组员进行PUA，而且还很多次因为内部的性压抑问题而逼走了多名同志。

这些完全是捏造的。所谓语录是2年前就退出小组的一个人当时为了乐子搞出来的，后来此人就退出了。所谓个人崇拜，不如看看这次工革报的插图吧，把子时夜半的虚拟形象拼接到文革时期宣传画的毛主席的位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因为“性压抑问题”逼走人，也是子虚乌有。 “报告”是什么

呢？是汇报每天的时间构成，其中有多少时间在干革命工作、多少时间在学习、多少时间在自由散漫，来了解小组成员，如果这是“思想控制”的话，那么列宁要求党员必须是组织的成员、承担具体的工作，要求“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1900.12《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也是所谓“思想精神控制”了。

这次工革报承认了自己的破坏xmpp群聊的行为：

> 4月5日晚，当谈判破裂，局面进一步恶化后，子时夜半同志艰难地做出了夺权的决定（子时夜半同志出于对昔日革命同志的惋惜，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错失夺权的最佳时机），然而，潜伏在工作群内的群众革命社的特务凌桥，已经偷偷把消息传回了解放社，导致子时夜半等在Telegram外群的夺权行动失败了，锤王方面，Xmpp的夺权行动顺利进行，成功控制了领导权几个小时，但后期由于工农解放社更高层的技术手段导致领导权被反革命集团再次夺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宝贵的经验。 工革报的夺权，不是像工农解放社污蔑的什么形同华国锋、叶剑英之流的反革命政变，恰恰相反，工革报的夺权是类似王洪文上海民兵发枪但夺权胎死腹中的翻版，以及类似群众革命社的凌桥那样的特务的渗透告密所造成的失败。 虽然工农解放社捣毁了解放公社的行动，但他们夺回的只空有一副皮囊罢了。他们的行动是不得人心的！是必然失败的！公道自在人心！工革报的全体成员就在这里，随时可来问询。

宣布自己的阴谋活动多么”高尚“，这是谁都会的，这方面不妨看看中修是怎么美化大闹怀仁堂和十月政变的。不过，工革报的流氓分子比中修的手法更露骨，更直白。他们搬出林彪的《政变经》作为他们阴谋活动的理论基础，这反映了他们为了自己的阴谋目的，已经不择手段了。

然后他们关于朝霞开盒林苏的这一部分言论，简直是把林苏这个辱骂毛主席的恶俗狗东西当成了受害者，还说什么这是因为个人恩怨。我们认为，哪怕是政治报派或托洛茨基派，以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只要是左翼分子，都不应该使用公开个人信息的手段反对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还打着左的旗帜，即使他们事实上反对革命，我们也不应当联合反动当局打击他们。而对于右派分子，公开个人信息是无用的，他们和反动当局本是一丘之貉。朝霞开盒林苏，是由于这个政治流氓在当时篡夺了一个左翼群组，发表恶毒攻击革命领袖的言论。此时朝霞以为林苏对革命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于是发布林苏的个人信息，目的是让受打击的同志知道复仇目标。虽然事后我们发现，这个左翼群组并不是革命的，但是，工革报却站在林苏这个政治流氓这一边了，从这件事情看，他们的立场已经很明白了。

> 工农解放社的开盒是历史过往一以贯之的，早在2024年，工农解放社的朝霞就已经因为和林苏的个人恩怨而开盒了林苏，在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根据当事人林苏的控诉，朝霞这个人就是个两面派、其所作所为之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截至2026年7月，朝霞（工农解放社）已经累计开盒林苏和子时夜半同志各两次，开盒林苏第一次是在2024年，第二次是在2026年6月，开盒子时夜半同志则是在2026年4月5日和7日。 对意见不合者开盒，这是多么阴险和恐怖的手段，朝

> 霞以及工农解放社，不是什么“革命组织”、“融工组织”，他们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恐怖组织，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实行本拉登式的恐怖活动，对其他组织的同志，甚至是对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痛下毒手，简直是骇人听闻！工农解放社的开盒行径，彻底地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第二次开盒林苏后朝霞马上就撤回并做出了自我批评，当时工革报还说什么”工解宁可给林苏道歉也不愿意给我们道歉“。这不更能证明我们没开盒子时夜半吗？这次，工革报没有提这件事，因为他们就像中修的御用史学家记载”文革史“一样只记载有利于他们的。在中修的走狗文丐记载下，文革十年是”造反派随便打人杀人“的地狱。

把这一段话还给他们：

> 列宁曾经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 工农解放社如今在争论中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恼人的软弱无力”。他们在实践中已经陷入了死胡同，当被神圣化的“融工路线”在现实的工人阶级斗争面前被撞得粉碎，当他们发现自己深陷低效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时，他们无法在原则层面上回应论敌的科学质疑，于是便只能在网络上疯狂地跳脚、谩骂、开盒。那些充斥着人身攻击的字眼和词汇不过是他们掩盖自身思想破产、束手无策的遮羞布。 在任何严肃的政治与路线斗争中，通过造谣、抹黑和虚构事实搭建起来的“斗争论台”，

> 无论一时间叫喊得多么响亮、围观者多么众多，其必然崩塌的结局，从它刚被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这个自我介绍写的多么好啊！

工革报是不承认报纸的主编是管理者而供稿人是劳动者，理由是”胡说八道“。

谩骂工解组织的领导人，就类似中修御用文人的那些”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了，充斥着情绪宣泄和谩骂。

看看工革报是怎么回应《论中国的孟什维克》的：

> 第三点，工农解放社说：“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群孟什维克们到底要做什么。霍金在发言中大肆指责我们‘脱离群众’，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对于外围网群上的人不够关注，‘不提供理论培训和群众答疑，不引导政治方向，不开展任何讲座或系统学习’。这番话十分动听，但我们一分析，他们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了。他们文章的实质，就是要以网群作为群众工作的核心 ①。在他们的逻辑里，一个革命组织去鼓动、组织、宣传群众的主要成果，不是体现在线下的工人工作的发展上，而是体现在线上聊天群的喧闹上②。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网群优先论”③。这帮孟什维克不了解也不参与中国广阔的群众工作，躲在屏幕后面，把Telegram聊天群当成他们全部的‘革命事业’。”

> 工革报回应： 工农解放社说什么①“他们文章的实质，就是要以网群作为群众工作的核心”，这是公然扩大打击面，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子时夜半同志和当时在场的同志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要以网群作为群众工作的核心”这样的话出来，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意思。是工农解放社为排除异己、留存脸面，所以扩大打击面、疯狂攻击以子时夜半同志为首的革命派的恶毒行径！ 工农解放社说什么②“在他们的逻辑里，一个革命组织去鼓动、组织、宣传群众的主要成果，不是体现在线下的工人工作的发展上，而是体现在线上聊天群的喧闹上”，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网群优先论不正是反映在工革报的实践中吗？工革报叫嚷着“工学联合”，活动范围却仅限于tg，看着自己有几个吹吹拍拍的小跟班就自豪地宣布工革报是“中国革命的领头羊”！这真是一个笑话，一个对我国工人和学生毫无影响力的tg小团体，竟然能宣布自己是“领头羊”，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也可以宣布自己是俄国革命的领头羊了，虽然他们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实体政治组织。 工农解放社从来就注重工人和学生的组织工作，而工革报上自从子时夜半当了主编之后就没有几篇学生工作的文章。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他们是网群优先论吗？ 揭露中修干的坏事，中修也可以辩解“我从来没说过！”，然后“欲加之罪”云云。这是小孩的吵架把戏。 然后他们又引用那篇说“培养不如筛选”的文章，说这是工解在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路线。他们看文章是不看历史背景的。正如他们批判我们是经济派的时候，并不看经济派产生的背景，不知道列宁批判经济派，是因为经济派只搞经济斗争，拒绝把经济斗争提升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而绝不是因为经济派“深入了工

厂”一样。他们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所说的墙外线上的限定词，不了解当时的具体背景是我们还处于初创阶段。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政治谩骂。

> 第四点，工农解放社说：“他们中有人曾荒唐地提出，要让Telegram网群里那些未经考验的外围人员，来‘监督’我们同志的日常工作！这不仅暴露出他们对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一窍不通，也说明他们连‘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最基本的区别都分不清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须是由觉悟的革命者组成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严密战斗堡垒；而包括外围网群的群众组织则是广泛联系群众的纽带。如果让一个松散的、充斥着各式人物的网络聊天群来‘监督’甚至指挥革命先锋队的日常核心工作，那无异于取消革命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彻底葬送在小资产阶级清谈客的口水中。① 霍金在发言中还声称，线上群聊的政治引导职责‘根本就不是一两个还未毕业尚未经过实际斗争和通过群众考验……的学生能够承担得了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们是真的体恤学生，或者真的尊重工人阶级的领导吗？绝不是！②他们真正的目的，不仅是要把线下工作的工人同志拉到网上去伺候他们这些孟什维克老爷，去满足他们‘线上网群’无休止的清谈需求，更在于，他们妄图让具有革命经验的工人同志，反过来接受他们这群孟什维克网络清谈客的指挥 和领导！”

> 工农解放社说什么①“这不仅暴露出他们对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一窍不通，也说明他们连“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最基本的区别都分不清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须是由觉悟的革命者组成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严密战斗堡垒；而包括外围网群的群众组织则是广泛联系群众的纽带。如果让一个松散的、充斥着各式人物的网络聊天群来“监督”甚至指挥革命先锋队的日常核心工作，那无异于取消革命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彻底葬送在小资产阶级清谈客的口水中。”

> 最不懂理论的反而是他们！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什么列宁的建党原则，实际呢？他们只是把伊里奇的谆谆教诲拿出来当他们反动清算的背书，甚至连教条主义都算不上。列宁的教诲不是给你们这种热衷于清算异己、开盒他人的恶棍来用的，要说你们的组织程度？狗屁！

工革报除了会大喊大叫以外，还会什么呢。就像我国的“自由”派先生们一样，张口闭口就是“饿死几千万”“打死几千万”，说的总是那么危言耸听，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只会宣泄情绪。这种声音更应该出现在疯人院。 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批判，只需要把谩骂搬上来就够了。

工革报这次把十一月评论这个托派组织的那篇又臭又长且不明所以逻辑混乱的“批判”文章放了上来。这篇文章无非就是一句话：“你们融工派是经济主义！”在这里的ai贴图中，工革

报直接赤裸裸地宣布：“真正的政治报路线好!”，曾经他们可是宣布过“我们不是政治报派”的！看来实际上是什么对工革报有利，他们就信什么。

顺便一提，这次工革报用了很多ai插图，最奇异搞笑地一个把子时夜半虚拟形象贴到了文革宣传画中的毛主席的位置，真是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之所以工革报会有如此多的荒谬绝伦的丑剧，只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披着左派衣服的流氓分子。他们跟空想政治报派走，是因为空想政治报派恰好可以满足他们贪恋权力等等恶习。这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决定的。

三、“工学联盟”？谈工革报的新谬论

工革报这一派空想政治报派，在他们的新文章中，抛出了一个新的谬论——“工学联盟以达到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体的优势互补、劣势互扶。”

那么，他们口中所谓的“工学联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从他们语焉不详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抽出下面的几个要点：

> 这份文件不是鼓动全社会各领域去放手串联、不是鼓动去搞起工学联盟以达到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体的优势互补、劣势互扶，而是力图让这场革命风暴前夜的风向右转。这个提纲用一大堆冗长的、虚伪的词句，抹杀掉了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学生群体的尖锐的反抗，特别是抹杀掉了这场无声风暴中的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发际的学生群体、小组、读书会的极其

重大的正面意义。他们的实际做法不提子时夜半同志一再重申的联合学生这个急迫问题，而是一意孤行地搞工人崇拜。

他们根本否认学生和工人的大联合，根本否认学生群体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这份文件是反对革命学生与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反对以子时夜半同志为首的工革报推行的群众革命路线

各组织要立即停止执行‘工人革命路线’。要高举工学联盟齐头并进的旗帜，彻底揭露工农解放社的所谓‘工人革命路线’的工人迷信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文件特别强调“工人”，却是用弥天蔽日的手法，根本上歪曲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在延安所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所讲的，抹杀了我国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全国知识青年们，青年学生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是能够和愿意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他们开始是爱国主义者，然后逐渐地走上革命主义。这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可是工农解放社呢？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把力量统一起来”，回过头又在实际行动中大搞“统一口径”，搞“一言堂”。他们所要的

> “联合”，是联合赞成他们的人，不要联合有不同意见的人。

（注：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

民主义[11]，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这篇所谓的工革报批工解期完全是Ai生成的，Ai幻觉中毛泽东同志的话改都不改，可以说完全是不学无术）

从上面好不容易摘录出来的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以下的观点：

- 学生群体在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
- 联合学生
- 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体的优势互补、劣势互扶
-

- 工学联盟齐头并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已经把学生群体提升到同工人阶级相同的地位，这两者可以“齐头并进”，并且可以“优势互补、劣势互扶”。

这事实上是将知识分子群体提升为一个能和工人阶级占据同等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同等看待的做法，已经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

哪怕这些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只能认为，他们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的一层“毛”。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去同工人阶级“齐头并进”。

事实上，正如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所说的那样，“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

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革命中的位置，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而不是搞什么平起平坐的“联盟”。正如毛主席在1968年《红旗》杂志中所指出的：“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这段话彻底粉碎了所谓“工学齐头并进”的谬论。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只有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虚心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工革报妄图建立“优势互补”的“联盟”，实质上就是拒绝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拒绝思想改造。

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将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并列的做法，正如是姚文元所言的，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他们在文章里大谈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他们一碰到进入工厂去和工农结合革命组织时，就说和工农结合是“右倾工人主义”，并且还无知地说，“先生们对融工的崇拜和对政治报的轻视反映出他们实际上在走经济派的老路，迷信自发性能够产生工人革命组织。这只能说明工农解放社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幻想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只要进入工厂，通过工作场所的闲言碎语就能使工人革命化。以求是系为代表的融工派已经在中国实践十年以上，依然对中国局势毫无影响，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相较于欧美依旧普遍落后，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这种幻想能够成为现实。但我们仍然承认，如果之后

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仍然有将工人工作作为中心的可能。”使尽各种手法，污蔑与反对工人革命工作，实际上只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厌恶工人阶级的观点披上红色的皮表达出来而已。无论他们的文章里出现多少个“革命”，还是他们将自己的文章字号调成红色，都不能掩盖他们不愿意和工农结合这一事实。现代的一批叶公－－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四、“工学联盟”式的提法在历史上的教训

“工学联盟”这一提法，并不是工革报的政治流氓们的独创，它是有其阶级根源的，并且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这一错误路线的组织现在已经因为这一错误路线而消亡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早在20 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新左翼运动的失败，就宣布了这种“学生阶级论”的彻底破产。1948年，全学联首任委员长武井昭夫抛出了所谓“作为阶层的学生运动论”（层理论），妄图确立学生作为阶级斗争独立主体的地位，拒绝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的岛成郎等人更是将其发展为荒谬的“学生先驱性理论”，宣称尚未被出卖劳动力的学生群体具备最高的理论敏锐度，能够率先起义，作为“先驱”去唤醒沉睡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结果如何呢？在1968年的全共斗运动中，这群自诩为“独立阶级”的狂热分子，在校园里构筑街垒，高喊着“大学解体”与“自我否定”。由于他们没有同工农相结合，事实上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影响力，因而，这场建立在沙滩上的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政权的强力镇压下迅速地土崩瓦解了。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极端脱离群众的空想恐怖主义的道路，在自我内斗的暴力清洗和暴力迷梦中走向消亡。

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的北美与西欧，激进学生同样炮制过类似的谬论。美国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激进派，捡起了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牙慧，大肆鼓吹“新工人阶级”理论，把学生荒唐地视为“学徒智力劳动者”。法国的激进学生联合会则抱着《格勒诺布尔宪章》，自封为享有劳动权利的“年轻的智力劳动者”。他们自命不凡，试图脱离工人群众，鼓吹学生是现代知识工厂体系下的新型剥削对象与反抗主体，妄图用“学生权力”直接向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发起冲击。而正是由于这些派别将运动拉向后退，运动随即遭到了失败。

工革报试图将学生拔高为独立主体、甚至妄图与工人阶级“齐头并进”的论调，不过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与日本新左翼“学生先锋主义”和“学生阶级论”的借尸还魂罢了。工革报口中的“工学优势互补、劣势互扶”，正是这套将学生过度拔高、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修正主义逻辑的当代翻版。

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列宁早就在1903年的《革命青年的任务》中给予了迎头痛击。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生是最敏感的部分，而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同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指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的派别在力量和人数上完全成比例，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中也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有哪些派别。”

历史证明，脱离了物质生产关系，不同工农群众结合的“学生先锋主义”，注定是一条死路。那些曾经在街垒里不可一世的“革命学生”，在结束了大学生活、脱离了校园后，绝大多数人迅速脱去了激进狂热的外衣，凭借着文凭重新顺畅地回归了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摇身一变，成了官僚、建制学者与管理精英。这些“革命学生”大规模的投降与收编，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生仅仅是一个具有流动性、依附性的过渡群体。知识分子只是依附在某一个阶级的“皮”上的“毛”。

五、两条路线分歧的哲学实质

空想政治报派路线实际上是脱离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路线。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贪权而向唯心主义方面的堕落，另一方面是他们理论上的无知，小资产阶级的拼命想保住自己地位的庸俗思想与其投机心理造成的自觉地向唯心主义方面的转变。

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想拼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名声、生意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了他们各类空想政治报派的文章及言论中。从子时夜半等工革报流氓集团的明显的贪图权力的表现，到十一月评论之流的政治报集团使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西马）派别的晦涩难懂的术语来充实自己的文章－－或自比毛主席，将自己的画像放在毛主席的位置上，或以晦涩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语言体现自己拥有“知识”的优越性，这一切无不体现了这些人事实上的，拼命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名声等等私有权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顺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往往最终走向唯物主义；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往往最终陷入唯心主义。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排除这些派别有时候往同最终方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不排除顺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是唯心主义的；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在某一个时期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这些曲折终究是不长久的。从长远的历史看，顺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最终是走向唯物主义的。而逆历史趋势而动的力量，最终是走向唯心主义的。这是历史的趋势，在人的思想上的体现；是人的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反映。

工革报所标榜的“从报纸到实践再到报纸”的所谓良性循环，在哲学实质上正是林彪那种“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翻版。正如1973年《红旗》杂志《“倒过来”的哲学和复辟资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林彪鼓吹“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工革报的路线，不是从各地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去总结理论，而是先在主观的、脱离实践的“政治报”上建立共识，然后再以此去“反向派往”工厂、“指导”实践。办事情是从客观到主观还是“从主观到客观”，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工革报来一个“倒过来”，“从报纸到报纸”，就把认识和实践完全割裂开来，使主观违背客观，思想脱离实际，这必然让他们滚入了反动的唯我论泥坑。

空想政治报派路线的这些思想观点，正是他们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他们虽然一开始以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的形式出现，但是执行了一条在没有在线下进行各地区的联络工作和工人工作的物质基础上，通过一个小组发行一个政治报，以达到统筹全国各个地区的组织的空想政治报派路线，这条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希望充当中国革命的领袖又不愿意为此付出精力

的反动的路线，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这是他们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所在。

反驳子时夜半黑文

前言

列宁同志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子时夜半从来没有，也做不到在政治路线上打倒工农解放社，无能的人要通过声嘶力竭，撒泼打滚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子时夜半找来找去，他找到了政治谩骂的办法，试图以此打倒工农解放社。子时夜半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捏造事实，篡改事实，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推测写成事实等办法进行造谣。政治谣言的特点是，制造的成本低，辟谣的成本高，子时夜半随口说一句侮辱和造谣工农解放社的话，我们要找截图，要对此加以批判。如果他自知反驳不了，就会当作没有看见，如果他觉得还能辩一下，就按这种的办法继续造谣。我们在《工革报总批判》中，对子时夜半方面的主要造谣做了罗列，截图，逻辑分析和观点批判，但是呢，子时夜半只要当作看不见，就能继续进行他的可耻的造谣活动，比如他用臣民的事情说我们多喜欢打击异己，当我们把详细的证据和逻辑链条摆出来后，就装作看不见，不说话了。耸人听闻和极其可怖的谣言也许能暂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情绪，但是归根结底，造谣的时候越愚蠢，越浮夸，等到谣言破产，就越显示造谣者的可耻，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这篇文章将从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介绍工农解放社的革命路线以及和工人革命报分裂的本质原因，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分析，并且批判他们对我们政治路线的攻击。第二部分，是就

开盒问题揭露工人革命报的造谣本质，揭露子时夜半这个人的可耻面目，和此人机会主义的实质。

我们和工人革命报分裂的根源是因为要为工人阶级服务

一句话解释工解和工革的分裂，就是因为越来越开展的工人工作和学生工作，对墙外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要求。而子时夜半不能适应这个需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和工农解放社发生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他个人决定利用政治造谣——工农解放社开盒了他来打倒工农解放社（至今为止他们完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采取最科学、最自觉的办法同工人阶级相结合，深入工人的实际生活和生产斗争，组织和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为未来的政治运动和社会革命准备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

围绕这一问题，政治报派和工农解放社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作路线。政治报派认为，当前最自觉的工人工作策略是以厂外工人工作为主要形式，并把创办和发展政治报作为整个组织的中心工作；工农解放社则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深入厂内开展工人工作，只有建立在坚实的厂内工作、群众工作和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步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并在这一基础的形成和发展建立真正发挥作用的统一的中心报纸和政治中央。打个比方，是列宁这些本来在地方工作上就正确的人领导全国性的地方工作，而不是马尔托夫这样的经济派

集团来集中全国的小组力量，推广经济派的政治纲领和实际策略到全国去。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需要全国性的政治报，也不仅仅在于是否需要统一的政治路线，而在于：全国性的政治工作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物质基础之上，又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同工人群众发生实际联系。如果脱离具体的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和工人斗争，仅仅依靠在厂外进行宣传、讨论和传播政治报刊，就很难使社会主义意识真正同工人群众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相结合；因此，正确理解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关系，中央工作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之上，地方工作又可以通过正确的中央政治路线获得统一的方向。政治报的作用，也只有建立在这种实际工作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培养革命干部和加强组织联系的工具；否则，政治报就很容易脱离群众实际，成为少数人在厂外进行自我循环的活动。

同样，学生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必须放在这一关系中加以理解。这就是在说他们应当把自己的理论、工作的力量同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需要结合起来，为工人工作服务；所谓“学生服务工人”，也不是取消学生群众自身的政治工作的特点，而是要求这种活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方向相联系，并在实际工作中促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发展。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者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到工人群众中去，就不能脱离工人的现实生活。工人的经济处境、劳动条件、思想状况、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实际矛盾，都是政治工作的现实基础。只有在同工人群众的实际接触、共同劳动、互相帮助和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才能把分散的、朴素的反抗意识提高到自觉的

阶级政治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培养和组织工人中的先进分子。 因此，所谓“把社会主义带到工人中去”，绝不是单纯把若干理论文章、政治口号或者报纸送到工人手中，而是一个以实际群众工作为基础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下，对很多学生同志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学生同志，不应该把自己的革命工作理解为纯粹的组织一般左派群聊或者群众性组织的工作，应该使得自己一切的工作服务工人工作。首先，厂内工人，也包括学生的一部分，如高中生同志，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和揭露研究，比如一个工人同志向我们提出需要，需要一份关于“特色经济腾飞和经济衰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分析”，这就需要有时间的线下和线上的学生同志去积极写作，为他们服务。这个客观需要，是催化工农解放社和子时夜半分裂的基础，子时夜半领导主持的工革报在这方面就是完全错误的，而由于工革报是政治报路线中水平最低下的政治报组织，所以他们的不适应体现的尤为可怕。

第一，子时夜半不能提供服务群众工作需要的揭露是分裂的巨大的诱因。工人同志和学生同志需要的是政治揭露，需要是能同他们联系，并能把他们的意识提高到政治高度的揭露。子时夜半领导的工革报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同志们可以从工革报的第一期看起来，或者从子时夜半开始主办工革报的20期左右开始看起。工革报实际上是一个文章质量非常低劣的政治报，一个自诩工人革命报的报纸，一直以来充斥着大量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关系、既不能服务工人工作、也不能服务学生工作的文章。比如什么"中日物价对比"（第004期）、“夜半采访英国留学生”（024期）、“墨西哥毒贩分析”（034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到了日本就步入人间天堂啦？"以及充

满对幼稚的左派群众的高高在上的观点的文章（第007期，在006-007合订本），而且还左右互搏，一会说什么左派同志的幼稚都是什么压迫出来的，另一期又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不足是因为网左的"教条主义"太多了而不是根本没有到群众中去，而不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活动！还有一篇在台湾问题上持护国主义立场的，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点门面外，简直像是墙内粉红大V的言论的文章（第035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仅仅脱离国内的工人，还脱离国内的学生，脱离初中生，脱离高中生，脱离大学生，脱离厂内工人，脱离无产阶级，他们只能代表自己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极其狭隘的眼界。对社会主义的分析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工革报对文革的分析，脱离了文革产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脱离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详细分析，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塑造成一种纯粹冲锋的悲剧英雄，这是小资产阶级基于狭隘的政治经验所想象的。上述鲜明的例子，体现了工革报的政治水平低下，工革报这么多期有水平的揭露文章，一大堆由工农解放社提供，这种政治水平低下造成的宣传困难，子时夜半还洋洋得意宣传，未来要学习“大群”，采取机器人造声势的办法来吸引群众，和丝毫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去关心和服务工人和学生同志，使得自己的报纸能成为服务群众实际需要的报纸。工革报纸反驳我们这些批判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反驳这些关于水平低下的指控，只能说一些排版和数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报纸都是公开的，质量低下是工农解放社和很多政治报组织公认的事实，从整个报纸的历史来说，有水平的政治揭露和政治路线观点，不是工农解放社提供，就是由工革报外的，其他政治报组织提供。水平低下不是可耻的事情，水平低下，但是不愿意改变，还谩骂，侮辱，造谣给他们提出意见的工人同志，拒绝承认错误和改正，这才是

值得可耻的事情。子时夜半的反驳文章扯了这么多废话，谈了这么多宏伟的计划，又遭了这么多谣，辛辛苦苦这么久都不为自己理论水平低下辩护一下，可以说是很有“自知之明”了。

第二，子时夜半拒绝改正自己的问题，拒绝从服务群众工作需要进行写作，揭露，排版和编辑。子时夜半说来说去，各种形式，子时夜半的工人革命报是最独立的组织，是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其他组织的组织，是这个那样灵活的谨慎的组织。但是只要这个组织打着一天工人革命的这个招牌，就要回答怎么服务工人革命的需要的问题。我们说，在现代的报纸行业中，编辑反过来成为了一种举足轻重的职位了。为什么呢？因为编辑可以决定什么文章的登刊和排版，决定头条、版面位置。谁掌握编辑权，谁就掌握了‘可见性’，能放大某些议题、淡化另一些议题，一句话，谁掌握编辑权，谁就决定了 这篇报纸主要刊登什么内容，就能决定这个报纸到底是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子时夜半就说了一句反驳，他说“工农解放社在这里是夸大其词，往自己脸上贴金。当时讨论的重心无非是 文章审稿问题、排版的好坏与讨论的中心问题毫无关系。”，也就是我们放屁，然后马上转进。工农解放社为什么向子时夜半提出关于改进工作的要求，就是因为群众工作有需要，因为墙外工作不是纯粹组织群聊和写一些报纸的工作，墙外的写作，要包括服务群众工作的政治揭露工作，脱离具体矛盾产生的根源，讨论产生具体矛盾，规定具体矛盾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服务工人阶级，服务群众工作，把整个辩论和政治斗争拖到泥潭里面死斗，试图迷惑群众们的视野，把整个政治路线斗争矮化为纯粹权力斗争，也就是夺权，大篇大篇的篇幅下来，都谈不清楚怎么具体为工人阶级服务，工人革命报当时，就工农解放社提出的这个决定性的质问，为群众工作服务的政治揭露，做了什么样的反驳回复和解决呢？没有！！！工革报把这种矛盾

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夺权和政治斗争，特务，造谣和阴谋活动，哪来这么多破事和算计，线下的工人同志谁有时间算计你们，一天上班10-12h，下班要读理论，要宣传工人要组织工人，还要处理各种组织工作，谁有时间精力算计子时夜半这个“妄想症”和“造谣狂”。

我们引用一下工革报总批判的内容收尾一下：

> “工革报曾收到一则反馈意见，指出工革报的内容不能为线下工作服务：我们认为工革报现在属于一个地方报，还不是全国报。这主要体现在工革报的内容上对于国内国际社会上的种种事情的反应太少，影响力也并不很大。

由于当前线下工作的受限，任何报纸都无法反映全国性运动、说明全国性问题，而只能反映地方运动、说明地方问题。但是工革报却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从你们经常刊载的内容上来讲：历史问题讲太多，现实问题讲太少。是什么讲太多，怎么办讲的太少。批判思潮多，点评时政少。这就是工革报问题的表现。你们拿你们的报纸给刚入门的王座看，估计是够的。但是给有水平，尤其是线下工作者看，完全不够。一方面，因为里面可以用的宣传鼓动材料太少了。另一方面，里面关于线下工作经验方面的东西太少。

拿你们发的发的43、44两期合刊的报纸来说，一个时评都没有，非要说有的话，顶多算上群革社搞的那篇文章。其他的基本都是在谈历史问题。如此，你觉得线下工作革命者可以从你们那一期里面取得多少材料直接用于、便利于对群众的宣传鼓

动工作呢？反正我是用不了多少，至多算群革社那篇有用。在现在中国革命的线下工作开展刚刚起步的时候，为号召所有马列毛主义者们多做群众工作，就必须多提供些线下工作经验，用于指导他们的工作。由此可见，脱离群众(尤其是脱离工人)就是工革报的问题所在。我建议同志可以多做些调研，尤其是面向线下工作者。多了解他们的工作需要，也多总结他们的工作经验。

这个反馈意见充分说明了所谓的"工人革命"报，一是内容不切合革命发展实际：“是什么讲太多，怎么办讲的太少”、“因为里面可以用的宣传鼓动材料太少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农解放社立即着手筹备了学生工作专栏，而子时夜半却根本不将其登报。这个反馈意见，子时夜半对此也丝毫不重视。”

我们应该花费篇幅，批判工人革命报的路线文件的，但是当笔者仔细读完这个文件后，笔者认为，任何一个了解电报的左派生态的同志，都应该意识到工革报的这种实际路线，是大群的线上建党论的一种翻版，并且呢，很多论述是其他政治报组织的观点的翻版，简直没有任何批判的意义了，我建议大家阅读工农解放社的关于这些的《燎原大群路线的实质是林彪主义》《回击前进报——正确的融工路线》《论工人革命路线》《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等政治路线文件，然后对比一下。友情提醒，请大家仔细阅读大群和前进报，列宁道路，新十月这些政治组织的路线文件，揭露文件，仔细对比下他们的理论水平，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和子时夜半的水平。在充分的对比下，你们会发现，之前子时夜半总是自称为独立于“融工派”和“政治报”的中间的清醒人士，现在在纲领上这样，在生态位上，工革报是完全不如其他政治报组织的，如果一些

同志们真诚认可政治报路线的某些观点想要为革命服务，也不应该加入工革报。

就开盒问题揭露工人革命报的造谣本质

最重要的谣言始终是开盒问题。这是整个辟谣问题中最重要最可怕的谣言。这个问题说起来逻辑非常简单，子时夜半是一个本科留学生，开盒出来的消息却是一个99年生的人。子时夜半被“开盒”后的第一反应是在电报积极活动，神一般的排除中修警察和牛肉堡等破坏分子的嫌疑，迅速定位是工解，然后呢，被开出来后，是中国国籍的英国留学生，也没有在英国申请政治避难，也没有被警察传唤回国内。这就是关键了，真的是让人奇怪了，明明是一个人发了一条不是他的身份信息，一会是他，一会是替他挡刀的群众（开盒怎么挡刀？我们都知道他是本科生，开出99年的身份证我们发出来我们像子时夜半一样逻辑混乱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开了一个挡刀的会发出来？），子时夜半宣传他是留学生的信息到处都是，但是开出来的一个大头照为什么是99年出生的呢？子时夜半在公开文章批判工解开盒的文字信息2w字也有了，在无数左派群聊哭诉，到处去诉苦，说工农解放社如何如何官僚主义迫害他，请问，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明，是工农解放社开盒了子时夜半呢？工农解放社开盒了子时夜半。至少需要证明三个环节：

1. 被公开的信息确实属于子时夜半本人
2. 该信息确实来自一次“开盒”行为，而不是第三方开盒；子时夜半要保证不可能是中修，不可能是牛肉堡和一切破坏分子开盒的他。
3. 信息最初发布者是工解 或者和工解有直接从属关系。 首先是开出来的信息本身不是真的，就算信息是真的不等于工解

发布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能力开盒子时夜半，也许子时夜半自诩我们技术高超，那既然如此，我们得从电报渠道开盒你，那你为什么还在电报活动？只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看开盒这场闹剧，看子时夜半说的这些话都不能证明，甚至他自己说的话前脚说出去，后脚马上打自己的脸，这不可笑吗？

而且我们说的证据是什么呢？是能技术上证明工农解放社开盒子时夜半的文件，调查不调查，搜集都没有搜集，上嘴皮和下嘴皮碰一下，张嘴开盒子时夜半，但是呢，子时夜半开盒或者散播革命组织的机密，却是他们这里隐瞒不说的事实。

图1

图2

“云水怒小组”公认该文件的信息是工革报分子泄漏的，刚好是在工革报阴谋夺权期间泄漏，为的就是把工解打为所谓“求是系”。"揭露"左翼组织，泄漏所谓"求是系"领导人的个人信息、造谣工农解放社为"求是系"领导的文件"万炮齐轰揭露求是系"的内容 就是工革报泄露的。哪怕所谓"求是系"真的是个机会主义组织，公开他的领导成员个人信息，宁可让警察知道这些信息以更好打击左派，这完全就是反革命叛变行为。就算要解决不好影响，完全可以不暴露这些个人信息也能批判他们的错误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公开了，谁喜欢开盒，谁喜欢利用别人的个人信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某些人自己心里面是黑的，才喜欢把自己代入到别人身上去。

这里还有个事情，子时夜半他们通过我们的墙外成员打击林苏的行为来作证，哎呀，我们会开盒，既然有人开盒了林苏，那

么我们也开盒了他。真是神人逻辑。

林苏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在文革时期是会被枪毙的人，到处公开的侮辱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把国民党反动派和西方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毛主席的恶毒的人身侮辱和丑化照片发的到处都是，到处破坏革命组织的活动，有个群众受不了他就开了他，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在林苏趁机篡夺了云水怒的频道权的时候，在那里肆意侮辱毛主席和革命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盲动的同志抓住这个机会就打击了他，并且因为自己的盲动自我批评了。但是呢，子时夜半在沾沾自喜，子时夜半认为，既然我们有个同志不小心开盒了反革命分子林苏，那么子时夜半就一定会被开盒了。那看来，也许可以认为子时夜半和林苏是一种人，不然怎么能把自己和林苏的处境随意代入呢，这种公开侮辱造谣毛泽东主席的人，子时夜半在这里为他喊冤，也真的是可笑。

燎原大群路线的实质是林彪主义

编者按： 这篇文章材料充分，逻辑清晰的论证了大群的林彪主义实质。我们确定大群所谓的纪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毫无共同之处，其本质是一种庸俗的反毛主义的林彪主义。大群现在已经不是堕入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了，其内部被一些德才均不配位的小人和野心分子窃取了领导权，这些人借抽去了革命内容的纪律形式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外搞政治流氓行为，大群正在被这些贪图个人名利的可怜虫带上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号召大群内部的同志造他们的反，打倒这些扮演拿破仑的波拿巴小丑。

自23年远山高炬等发布黑路线以来，“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燎原/布站）由高呼“到工人中去”的先进组织，一路堕落成一个不断阻碍同志融工、疯狂污蔑推进融工的组织是“无组织”的反革命大群。本文试论大群黑路线的实质，希望深化对大群修正主义本质的探讨，把真理越辩越明，以打击修正主义的根源。

林彪主义始于离开阶级意识谈组织程度

远山的五篇文章[1-5]系统提出了大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林彪主义。从马列主义到林彪主义，是从远山论述目前制约革命发展的主要因素开始的。

远山说：

> **以前** 我们在考察这方面的内容时，往往把实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细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很容易理解，但是阶级力量是什么呢？**现在**的答案是，阶级力量取决于组织程度。**组织程度就是制约革命形势发展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第二主要的条件**。[4]

而列宁说：

>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 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

可以看到，列宁表述的是远山所指的“以前”的认识，即革命发展需要使得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思想一致”，成为马克思说的”自为阶级“，在此基础上”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统一的阶级意识，形成一支大军。而"现在"，远山把阶级意识抽掉(讽刺的是他说“阶级意识很容易理解")，说“阶级力量取决于组织程度”，并把“组织程度”定为现在制约革命形势发展的主要条件。这个修正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毛主席说：

>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列宁说：

> 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

离开阶级意识和思想路线谈组织程度，组织者就能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实际去做“掌权的资产阶级”了。让我们看看远山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纪律评判思想，枪指挥党的林彪主义

> 远山：一切都说明，革命的普遍性是阶级力量对比，阶级力量的普遍性是组织性和纪律性。[5]

远山刚刚把组织程度放到阶级意识之上，现在再次强调了这点，并且又把纪律性提到和组织性并列的位置，也即提到了阶级意识之上。于是纪律就成了思想的标准。拥护纪律、维护民主集中制就是朋友，不拥护纪律、不维护民主集中制就是敌人：

> 任何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的人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
> （什么叫党组织的原则？在秘密地下组织和融工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在，党组织的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

而马列毛主义的党的组织原则，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毛主席说：

> 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
>
> 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
>
>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远山玩了个绝妙的文字游戏，说组织性和纪律性就是路线，说他们是革命最普遍的东西，是现在的决定因素。所以坚持革命路线，就是维护纪律，维护纪律，就坚持了路线。纪律就是思想的标准，枪就指挥党了。马列毛主义就变成了林彪主义：处处说先锋队、路线，其实说的都是枪、枪维护的纪律。

大群严密组织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大群里的同志、大群试图领导的工人，只能变成修正主义者的“可怜仆从”，接受资产阶级的“纪律性”。枪指挥党后，纪律的标准，就可以由远山等资产阶级灵活制定了。他和林彪一样，把“活”字挂在嘴边：

> 远山：必须抓住活的民主集中制。[3]

《红旗》批判林彪道：

> 林彪猖狂反对部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政治教育首先应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路线觉悟，妄图以所谓抓“活思，想”，来冲击、代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

民主集中制本就是生动活泼的、在充分民主下产生的自觉的集中。其在各革命阶段的具体形式，是在各层级最充分民主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形成、并由全体成员自觉遵守的。大群非说一个“活”的民主集中制，只是要混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以至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织的区别只是其中填充的人的区别：

> 远山：还有比中修的组织方式更为先进的组织方式吗？当下至少是没有了，…，**飞机大炮既然可以为我们所用，组织形式为什么不行**？[3]
>
> 远山：中修的组织里填充的都是受雇于资产阶级的无产者和少数资产阶级中聪明的大脑，而马列毛主义组织中填充的是革命家，代办员，先进工人，工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同样的一项制度**，中修实行下去就是形式主义标杆，马列毛主义组织实行下去就是清晰化组织工作的利器。[3]

大群确实做到了同样的制度，比中修还彻底的剥削。投稿到“马列毛主义广播站”的《一位前燎原成员的自述》控诉道：

> 在燎原和在特色那里都是作为一个官僚，为了官僚干活，而区别在于特色会发工资。

《红旗》在批判邓小平混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密”规章制度时就说：

> 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 、榨取工人

> 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

大群的”严密组织”正是资产阶级专政。自从大群从马列毛主义蜕变为林彪主义，大群的基层同志就从大群的主人，变为了官僚的奴仆。

《一位前燎原成员的自述》控诉道：

> “燎原强调说义务劳动纪律是为了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我加入燎原并在其中任职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可我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是被说成“逃兵”、“机会主义”、“危害革命”、“本该滚蛋！””

大群欺骗说义务劳动是在建立信任，但实际上只是让所有成员“一刻不停地表现出来自己的性质”，反复确认他们是否是一个“驯服的工具”：

> 远山：在某些泛左翼机会主义分子还没有因为自己的落后性而被大群开除的时候，大群和他们的观点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就像之前的两个苹果一样相似。然而因为某些泛左翼机会主义分子必须一刻不停地表现出来自己的性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的机会主义性质和大群的马列毛主义观点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他们被抛下。[2]

所以，一旦“驯服工具”表现不好，他们就要被鉴定为“机会主义”。《一位前燎原成员的自述》控诉道：

> 在收到我申请的第一时间（加班到凌晨实在做不完组织工作），他们不是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我的理由，想想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马上以一种“你居然不听话了”的态度把我定性为“逃兵”、“机会主义”，就连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同志也马上翻脸，顷刻之间我就从一个好同志变成了一个坏分子。那么对我的信任又何在呢？从中我们也能看出，线上形式的组织所能建立的信任是有限的。

这位成员的遭遇并非说明线上组织能建立的信任有限，而只是大群的林彪主义必然要这样清理门户：

> 远山：原先与机会主义者走在一条道路上仅仅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拒绝组织纪律，攻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行为，而在日后表现出行为之时，就是清理门户之日。[1]

《一位前燎原成员的自述》中的同志怕提出异议被视为“攻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以主动引退抗议大群的问题后律，想促使大群反思，但：

> 结果是他们不仅没有反思，直接把我打成了“逃兵”和“机会主义”，然后以极快的速度移除了我的管理权限，接着沉浸在“我们又发现并处理了一例机会主义”的自我成就感中。

这是自然的，大群以纪律性替代思想性，那还怎么会“反思”呢？这位成员破坏了纪律，那就是敌人了。而其他管理则要通过处理这例机会主义，来表现自己“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从而得到组织的赏识：

> 远山：重申，任何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的人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1]

大群的林彪主义就是这样筛选驯服的工具，并培养深得枪指挥党的“为官之道”的“同志”，以组建他们反革命的“大小舰队”。所以他们修正赤眉“到工人中去”的路线，而以组织纪律为纲：

> 远山：在融工问题上，**组织问题是主要方面，接近工人是次要方面，前者不能有半分妥协，后者可以根据情况周旋**。机会主义者们拿组织问题上的退步换取了接近工人上的

> “进步”，这种进步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半分进展的，毕竟纲举目张。[5]

必须在“到工人中去”的过程中建成基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的组织纪律

列宁说无产阶级先形成马列毛主义的思想一致，然后用物质组织巩固：

>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而中修纪委网站把列宁的话篡改为：

> 靠组织纪律性形成思想一致

大群和中修何其一致呀。缺乏无产阶级自觉性，而把组织纪律作为思想的标准，那么巩固的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就是大群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据原大群同志透露，大群网罗一群官老爷，选中某些人封以“革命干部”称号，给予特殊保护。远山所说违反纪律，不就有一条“攻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吗？诚如林彪在黑笔记中所写：“诱以官、禄、德”。

培养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无产阶级的自觉的纪律。在大群还没走上林彪主义前，赤眉等领导人说：

> **到工人中去”应是当前马列毛主义者的战略中心任务**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有计划地、自觉地”到工人中去”，也就是说要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主动地调配力量，把最大的力量分配到最具斗争潜力、最适合开展工作的工人群众中去** …左翼分子为了就业自发选择的工作单位不一定是最适于开展群众工作的…应该鼓励、引导他们根据开展群众工作的需要，**有计划、自觉地融入或接近工人群众**
> 。

赤眉强调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中去，努力实现进厂做工。革命组织有计划地提高革命知识分子和所接触工人的无产阶级自觉性，从而提高思想统一，使他们自觉地遵守纪律。任何一个马列毛主义者都知道：

>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关键看他为什么阶级服务。革命知识分子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但因为他们缺乏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所以并不理解工农群众，甚至与之格格不入。这使得当前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不够，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知识分子要抓住大大小小的机会去融工，平时要虚心积极向融工的

先进同志学习、接受融工同志的领导、努力为他们服务。革命组织要搞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典型，要总结公布融工经验，要大力宣扬到工人中去的大有可为，帮助还在动摇的同志下定决心。无产阶级自觉性提高，才能真正建立思想的一致，进而用组织来巩固。

所以赤眉说：

> 很多同志认为，革命知识分子（大多数为在校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觉力量，似乎只有先把这个自觉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才能去与自发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担负起领导工人革命运动的任务。然而这是不符合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自觉力量绝不是主要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而恰恰是只能在进步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接近、融入工人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建成自觉的无产阶级组织纪律。而大群却污蔑说这是“组织问题上的退步”，再次说明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资产阶级的组织。所以他们敌视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断阻碍同志们个人融工、不断污蔑推进融工的组织是“无组织”。而他们的“大小舰队”还没有组建完，所以无限期拖延地融工。他们要等大小舰队组建好了，用这个资产阶级组织去压迫和利用工人。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里论述他们的图谋。

小结

远山通过修正阶级意识和阶级力量的含义与关系，把组织纪律放在阶级意识之上。颠倒了本质关系。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成一股战无不胜的革命力量，因为他的战斗大军是代表着一整个阶级的利益，首先代表着的是一整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共同的阶级意识的基础之上，建成自觉的集中统一的大军。抽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填进去的一定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远山的林彪主义就是要做“掌权的资产阶级”，让基层同志和工人做“可怜的奴仆”。远山的美梦不会得逞，占大群大多数的要革命的同志是不会容忍的，他们必将造反推翻远山的统治！

黑路线链接：
[1]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2284
[2]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6812
[3]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6884
[4]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7652
[5]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31151

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在群众工作中建设——《左派幼稚病》揭露“野火”反动的纪律路线

野火说他们学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为《左派幼稚病》），就纪律问题对我们进行了回应，结果却好像根本没看过《左派幼稚病》一样。《左派幼稚病》中已经说明了纪律形成的条件：

>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 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

> 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列宁已经清楚地总结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所需的纪律的三个形成条件。脱离这三点进行工作的话，是无法建立和维持革命政党的纪律的。革命路线的制定，不能不考虑这三个条件，也只有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才能让这些条件在革命者的工作中逐渐形成并成熟。可以看见列宁的纪律路线完全是政治挂帅的。

>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

革命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不充分不彻底的局面仍然是当前的紧迫问题。愿意进行融工，投身到工厂中去，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是抱有极大觉悟的。他们在厂里劳动的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时间进行革命工作，这无疑彰显着他们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就像我们所纪念的洪流同志那样。长期的革命工作，也在磨练着融工同志的这些品质。

> 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

这正如我们在对野火的回应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厂内的革命地下工会。融工同志们需要自如地结合生产斗争和大小阶级斗争做政治灌输，以此与先进工友达成政治上高度的共识，形成地下工会的核心；并且能够团结一般工友，使得地下工会领导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同时也要和落后工友和管理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准备好他们在运动中用资产阶级路线影响群众时的应对方法。另外，我们在《论工人革命统一战线》一文中，也说明了用厂内工作领导其他阶级，建立服务于厂内工作的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 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融工同志在与群众建立政治联系，与他们打成一片的基础上，要参与到厂内一切大小的阶级斗争中去。通过地下工会，我们应该有把握使得政治思想工作与厂里一切大小斗争结合起来。在日常长期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在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时，应该在领导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扩大政治宣传范围和深度，以至于使得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交织起来。这正是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认识到我们的领导的正确性的过程。

取得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个之前已有广泛的经验，如“到工人中去”的经验，以及沈梦雨在广州日弘厂做的工作，这在我们长期扎根的情况下不难做到。而要能够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与资产阶级的路线进行斗争，与工人阶级中的自发性进行斗

争，没有斗争前已经开展的地下工会中的思想路线工作，是做不到的。

> 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列宁所列出的这几点，就是为了强调要同志们认识到“发挥与培养自觉性”、“与群众广泛联系”、“坚持政治挂帅”的重要性，而野火不正是这么装模作样地，脱离工人工作等方面来谈组织纪律吗？他们批量产出对厂内工作毫无帮助的水文的纪律，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纪律，恰恰是对无产阶级的与群众联系这一纪律的最大破坏。

>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我们说我们仍然处于手工业阶段，是因为工业化的组织和自觉的纪律，只有在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的运动实践中才能够形成。线上线下要共同工作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融工同志去把线上组织改造成能够一起进行工人工作的组织。

像列宁说的，这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实现。当然了，前提是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的革命路线的指导下的努力和实践。机会主义的路线，不管口号说的多么动听，实际则是在抵触工人群众，拒绝同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缺乏了与群众性的紧密联系，这些条件难道能顺利形成吗?

麒麟说：“这篇文章一发出来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曾经面对大群两天打来十几篇千均棒都一声不吭的你们竟然在短短一周之内就作出了回应，看来还真是戳到你们的痛处了”。难道革命派分析林彪刘少奇等走资派的文章，是因为走资派的戳到了革命派的痛处了吗？我们回应完全是因为麒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与其回应大群赛博奴隶写出的水文，不如去分析一个真正的林彪主义者的路线。野火鼓吹纪律挂帅，猖狂向列宁的政治挂帅的纪律建设路线进攻，在群众和同志们面前最好地暴露了其资产阶级专政路线的实质。

“依稀记得在今年某个小长假前夕，你们曾号召所有同志去离家最近的工厂打黑工，说干了一天就直接跑路，连工资都不要。”在暑期来临前，通过一天的打工学习进厂，这本身不是融工，而是为暑期融工做准备。因为在之前某次组织融工的时候，很多同志第一步就卡在了进厂上。本次暑期的融工组织，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仍然是进厂的困难（很多厂不想要暑假工），实践已经证明融工同志们提出的一天学习进厂的方案的正确性。

“工农解放社狡辩说：如果一位同志在之前的工人工作实践中受过锻炼，那对于线上的工人革命路线宣传，以及线上招新工人同志，是很有利的。有利？怎样有利？”“不知是我瞎了还

是怎么的，我还真看不到你们的‘融工’带有半点政治任务。”认同工人革命路线的同志们，无不重视与工人阶级结合，为融工同志服务。而麒麟为什么看不到工人工作的作用呢？麒麟不是瞎了，而是脱离了工人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路线。面对当前的组织理论都已经进入到要在工人工作中开展路线的阶段了，结果却不愿意沉下心在现实中进行路线工作，就急着寻求短期捷径而陷入了实用主义，进而被野火的修正主义路线俘获。革命者不和工人阶级结合，资产阶级就要来和他结合。麒麟这位反面教员应该引起所有同志警钟长鸣。

关于线上工作的纪律性问题，主要的是关于线上工作者与厂内同志的结合的问题，首要的是厂内同志领导线上的问题，而厂内同志要能真正领导线上，是需要经过实践的探索的。正如工人阶级真正占领上层建筑需要通过艰苦的继续革命一样，厂内同志要学会领导线上同志为厂内工作服务，也需要艰苦的实践。

麒麟在文中提到了线上供稿中的一些积极性的问题，这主要地是供稿是否真正为工人工作服务的问题，供稿如果不为工人工作服务，写作的方向就会不明确，线上同志写作中就不会明确感到自己在走工人革命路线，那自然就难以积极地进行写作。麒麟的老前辈远山，早就就线上组织中的纪律问题提出：

> 先扪心自问一下，机会主义者们内部是否存在以下这种情况：布置下去一件任务，但是最后没有人管理，也就没有人完成；或者是某天同志提了一个建议，但是当时有人进行回

> 应，之后就没有人管，提出建议的本人也根本想不起来自己提出过这个建议。

远山所说的和麒麟所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修正主义者往往通过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然后提出修正主义的解法，以此刮起一股风来修正革命路线。为什么会出现远山和麒麟说的，一项建议就连提议的本人也根本想不起来呢？这是因为这个建议没有真正地切中厂内的需求。

真正的建成革命的纪律性的方法，正如上面我们论述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路线，在于真正把线上工作和线下工作结合起来，让线上工作者在工作中真正认同线下的路线，真正感受到是在为线下的工作服务。线上线下的脱节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麒麟这样不愿意接受厂内同志领导的，这种相对较少的，更多的是因为厂内同志还没有学会领导线上工作，以及还没有很好地改造线上工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说：

>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

> 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

融工同志是最直接地参与到厂内的三大实践当中的，他们是有最明确的工作需求的，所以融工同志真正需要的东西，那是不可能提出来又忘记的，因为这个需求会在厂内实践中反复反映出来。所以，一切线上和其他群体中的因为缺乏方向而停滞的工作，融工同志一旦发挥领导作用，很快就会有进展。所以，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唯线下工作论，真正的融工工作应该是同时利用线上和线下的力量来推进厂内工作。正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说：

>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

融工同志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改造线上的一切工作，让线上工作服务于线下工作。在线下领导线上的过程中来让线上了解线下的需求，并且让线上得到工作成果的反馈，这样才能让线上了解线下，实现线下工作和线上工作的充分结合。线上如果没有线下的指导，就不可能为线下服务。工人如果不来领导，那么线上的同志就容易被机会主义分子，被其他阶级领导。

野火批判我们没有纪律，然而我们正是依靠同志们自觉的纪律迅速揭露了麒麟这一林彪主义者。在同志们自觉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下，麒麟连自己批判我们的文章都不敢公开在我们群上发表，还是我们在他叛逃后帮他发布的。在厂内的领导下，同志们继承批林批孔运动的精神，就这位反面教员开展了生动活泼的集体批判、研究和写作。

我们相信野火中仍然有受蒙蔽的要革命的同志，相信他们学习了《左派幼稚病》后，会意识到脱离厂内工作来建立革命纪律是何等幼稚、野火吹嘘量产对厂内工作毫无用处的水文是多么可笑。要革命的同志们终究会和工农解放社的同志们一起，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投身融工与服务融工工作的浪潮中。还是那句老话，厂内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旧教训与新斗争

前言

20世纪下半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由于苏修官僚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的投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者一方面需要面对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需要面对旧共产党的背叛，这就使他们一方面要承担起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反对本国修正主义党的任务。

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分析一些国家里共产主义者的教训，是为了今日中国的新斗争。

下面，我们举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革命者斗争的例子，谈谈旧的教训与新的斗争。

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

1.日共的战前时期

日本共产党，在它放弃武装斗争，彻底走上议会道路前，是领导日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日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受挫，变修，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日共的诞生是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必然产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天堂。广大日本劳动人民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日本的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明治宪法》和各类反动法令，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夺的同时，剥夺他们集会、言论的自由，以愚化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疯狂发动侵略战争，驱使劳苦大众充当炮灰。

黑夜总有尽头。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良社会，反对专制体制，从西方引进了社会主义学说。随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成日语，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废除私有制，日本的劳动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日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涌现出站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组织。1920年12月，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发起成立“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此后，各类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他们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开展活动，并针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工会运动的方针等核心问题，与当时颇具影响的大杉荣无政府主义流派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些思想交锋，使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日本革命运动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片山潜、堺利彦、山川均等早期站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组织领导人，后来直接成为日共的创立者和中坚。日本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建立，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准备，领导核心与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爆发了。

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震撼统治阶级根基的全国性工农暴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十月革命后，日本政府为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在国内大肆搜刮军粮，大地主和投机米商趁机疯狂囤积居奇。米价的暴涨使劳动人民忍饥挨饿，生活难以为继。同年7月，富山县渔民妻子为求生存，自发组织抗议。这颗反抗的星火，迅速在日本形成燎原之势，短短一个月内，抗议就席卷全国，演变为捣毁米铺、反抗警察镇压的阶级冲突。

“米骚动”虽然最终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但是，这场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不仅直接迫使当时的军阀内阁倒台，更唤起了日本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米骚动”的爆发，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刻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建立属于自己阶级的组织已经提上日程。日本工农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1919年至1921年间，川崎造船厂、足尾和釜石矿山、八幡钢铁厂以及三菱造船厂的工人，相继发起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的斗争，日本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在这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各类全国性组织相继涌现。1921年，具有全国性质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以及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赤澜会”正式成立，1922年4月，日本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群众组织“日本农会”宣告成立。此外，领导未解放部落民众争取平等的“全国水平社”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也纷纷建立。这些组织的发展，为日后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群众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日本无产阶级终于建起了自己的共产党。1922年7月，八位日本革命先驱在东京一处民宅内秘密集会，正式宣告日本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协助日共起草了《1922年纲领草案》。它提出，要彻底废除压迫人民的“天皇专制”和地主制度，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干涉中苏革命。

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对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极度恐惧，并开始了疯狂的白色恐怖。

1923年6月，天皇政府基于《治安警察法》以“社会主义者阴谋发动内乱”为借口对日共实施第一次大镇压，包括堺利彦、市川正一、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等党的领导人在内，约80人被捕、29人被起诉，日共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受到当时日共缺乏秘密工作经验，以及日本反动政府的严密监控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共产党成立不到一年，天皇政府的军警就精准地将堺利彦、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核心领导层“一网打尽”。反动政府之所以能够直接锁定这些党的领袖，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日本共产党早期核心领袖本已是当时进步运动的知名人物，早已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堺利彦、山川均、野坂参三等日共早期领袖，并不是地下工作者。早在明治、大正时代，他们就已经是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元老级人物。日本政府在1910年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事件”后，于1911年设立了专门针对左翼思想和政治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即特高课）。在日共成立前，其领袖的住所、活动轨迹以及他们创办的《前卫》等合法左翼杂志社，早已处于特高课

的全天候监视下。对于特高课而言，这批人本是“重点关注对象”，警方只需对他们进行长期定点监控，就能顺藤摸瓜地掌握日本左翼运动的核心动向。

进一步加剧安全风险的，是早期日共在秘密工作经验上的匮乏。日本共产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其初创时期并未得到明确区分。第一代日共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普遍缺乏进行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们没有明确地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进行区分隔离。当时的许多日共核心领导同时兼任合法学术团体、工会或公开左翼杂志的负责人。当时，日共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批人员，同时开展合法的出版集会与秘密的党务活动。这种运作模式导致只要警方搜查或查封公开的左翼机构，其背后的地下党网络就会随之暴露。

1923年5月，早稻田大学左翼学生团体（如“晓民会”）因反对设立军事研究会与右翼组织爆发冲突，史称“早大军研事件”。警方借此对左翼组织及相关劳工阵地进行大规模搜查与逮捕。在搜查中，特高警察查获了未被销毁的秘密文件、会议记录及组织名单。这些物证向日本政府证实了日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存在及其领导层架构。

同时，日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线也遭到暴露。初创期的日本共产党在理论和经费上高度依赖共产国际，而日本警方通过海关与谍报网，多次截获或追踪到从苏俄归国的代表及秘密联络员。警方通过监控这些携带资金和指令的人员，顺势锁定了接收物资的日共核心干事。物证泄密与国际交通线的暴露，导致日本政府于1923年6月展开全国性的大逮捕（即“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使建党仅一年的日共早期组织陷入瘫痪。

同年9月，日本政府借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社会混乱，再次对左翼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期间，共产青年同盟会委员长川合义虎、社会主义者平泽计七、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枝夫妇，以及部分日本革命分子、进步工人、数千名朝鲜人和中国人等遭到杀害。

1923年的两次镇压后，以山川均为代表的部分日共领导人提出“向群众中去”的主张。他们认为日本当时建立先锋党“为时尚早”，主张将力量退回合法的工会和群众运动中。这一思想被称为右倾的“山川主义”。在此路线下，1924年3月，日共核心成员在未召开全党代表大会的情况下秘密集会，作出了实质性的解散决议。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片山潜等人的推动下，日共开始重组。为躲避特高课监视，1926年12月4日，佐野学、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代表以“东京日本蓄电池株式会社员工”举办年底慰劳会为名，在山形县米泽市的宗川旅馆秘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告组织重建（史称“第二次共产党”）。重建后，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极左派提出“分离・结合论”，即“福本主义”。该理论主张在政治结合前，需先通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斗争纯洁队伍（即“分离”），认为只有精通理论的知识分子才能组建先锋队。这一极“左”路线导致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相脱节。

为解决日共内部的思想与组织问题，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日本问题特别委员会”。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福本和夫等人赴苏参会（山川均拒绝前往）。会议出台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27年纲领》。该纲领对日共内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既批判了右倾的“山川

主义”，也批判了脱离群众的极“左”的“福本主义”。福本和夫在会后承认错误并离开党的领导部分。《27年纲领》将当时日本革命阶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将“废除君主制”（打倒天皇制）列为核心目标。同时，纲领指出日本资本主义依赖中国的资源与市场，要求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干涉中国革命。这一论断为日共随后的反战反帝斗争确立了理论基础。

1920年代中后期，原本带有激进色彩的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在铃木文治、松冈驹吉等右翼干部的控制下，开始全面走向改良主义，主张通过和平妥协的方式与资本家合作，以换取生存空间。然而，以渡边政之辅（即后来的日共中央委员长）为代表的左翼工人领袖坚决反对这种妥协退让的路线。随着路线矛盾的不断激化，1925年5月，32个坚持斗争的左翼工会被总同盟强行开除或被迫主动退出。这批无产阶级中坚力量随即在大阪集结，正式宣告成立“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简称“评议会”）。“评议会”的诞生，是日本工人阶级内部“阶级斗争路线”与“劳资协调路线”相斗争的产物。这一历史性分裂，标志着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直接影响、具有明确阶级斗争意识的产业工人队伍正式走上了日本的历史前台。

尽管评议会拥有坚定的斗争意识，但其初期的发展却遭到了党内极“左”思潮——“福本主义”的严重破坏。在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受福本和夫“分离・结合论”的影响，评议会内部的一些核心干部开始陷入教条主义。他们轻视普通工人如涨薪、缩短工时、改善恶劣劳动环境等切身的日常经济诉求，甚至荒谬地要求工人在参与罢工前，必须先接受并理解深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更有甚者，他们将“打倒天皇制”等最

高政治纲领直接作为发动日常罢工的先决条件。这种“唯理智主义”的极端做法，实质上是用理论检测取代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它把大量缺乏理论基础但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普通工人拒之门外，将一个本应广泛团结劳苦大众的工会，扭曲成了少数“理论精英”的封闭宗派。这种脱离实际的极“左”宗派主义，直接导致评议会在1926至1927年的多次重大劳工斗争中（如著名的日本乐器公司大罢工中）失去了群众的广泛响应，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这也是共产国际帮助出台的《27年纲领》中对福本主义进行清算的原因。

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实施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了《普通选举法》（即“胡萝卜”），给予所有成年男性选举权，以安抚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但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随着普选权的放开而扩散到下层民众，日本政府在极短时间内配套出台了旨在镇压共产主义的《治安维持法》（即“大棒”）。评议会察觉到了天皇政府试图用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来掩盖其法西斯专政的险恶图谋。面对这种局势，评议会迅速联合了受日共影响的合法左翼政党——劳动农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请愿与抗议运动，极大揭露了反动立法剥夺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本质。

1928年2月，日本举行了《普选法》颁布后的首次大选。在日共的暗中指导和评议会的全力动员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合法政党“劳动农民党”获得了近20万张选票的惊人成绩，并成功将山本宣治等著名左翼人士送入帝国议会。这种体制内的重大政治突破，让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感到了极度的恐慌。为了彻底掐断共产主义与合法政治框架的联系，1928年3月15日凌晨5点，田中义一内阁和内务省指挥全国各道府县的警察和宪兵同时展开抓捕。此次全国协同行动切断了左翼组织的通讯预警

渠道，各地负责人未能及时销毁机密文件或转移人员，大量核心文件被警方缴获，日本政府借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大搜捕（史称“三一五事件”）。数千名日共党员、评议会骨干以及劳动农民党成员被捕入狱。随后，政府依据《治安维持法》下达命令，强行解散了劳动农民党和评议会，并展开扩大化逮捕。除日共核心干部外，劳动农民党党员、评议会工人、赞助左翼活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借阅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生等，均以“图谋变更国体”的罪名被捕入狱。日本政府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彻底暴露了。

评议会虽然仅存在了短短三年，但她作为日本二战前唯一一个真正贯彻了革命路线的全国性工会，用鲜血为日后日本工人运动的复苏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与宝贵的革命火种。

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日共及相关组织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主要是由于其未能很好地区分公开活动和地下活动。

在1928年2月《普通选举法》颁布后的首次大选中，日共的地下党员公开支持合法左翼政党“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散发地下机关报《赤旗报》，并在集会上展示共产党标语。这种将地下组织公开化的策略，虽然获得了议会上的成功，但由于地下网络的暴露，也导致了日共在白色恐怖中的失败。此外，日共采取“核心地下结合外围公开”的模式，日本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劳动农民党、评议会及无产青年同盟等合法组织中兼任骨干。在此期间，由内务省主导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暗中追踪并记录了日共的集会地点、资金流向和人员网络。特高课还在左翼组织内部安插间谍并收买人员，掌握了日共和评议会的整体组织架构。由于组织架构的不安全，这些合法机构的办公地点、活动记录、会员名册及《赤旗报》订阅名单尽数暴露

并成为警方的侦查线索。警方通过查抄外围组织，抓捕了大量工会骨干与左翼分子。

“三一五事件”中，日共因缺乏严密的保密措施，遭到日本政府的全面镇压，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创。

“三一五事件”后，日共原有组织架构遭到破坏。以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等人为首的残存领导干部迅速展开党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日共吸收了大量新成员，在数量上填补了人员空白。但快速扩充导致人员背景复杂，且普遍缺乏严格的地下工作训练。同时，重建后的日共，其路线陷入了“左”倾盲动错误，开始了“武装共产党”时期。为了保护集会并对抗军警，日共成立了武装的“自卫队”与“武斗班”，在罢工和抗议中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没有大规模两面政权与地下组织的支撑的，公开的武斗路线使许多新生党员和外围群众暴露并被警方锁定。

不仅如此，内务省主导的特高课在日共内部实施了“内线作战”，成功安插并策反了包括“间谍M”（饭岛荣吉）等在内的高级别间谍。这些内线掌握了日共重建后的全国联络网与秘密据点，并将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汇报给警方。基于这些情报，警方在掌握日共内部人员与活动信息后，实施了针对性的抓捕行动。

在法律层面，1928年6月，田中义一内阁通过紧急敕令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史称“治安维持法改恶”）。修改后的法律对共产党骨干增设了死刑，并增加了“目的遂行罪”条款。该条款扩大了逮捕范围，规定凡是提供房屋、捐款或传递传单等

提供协助的普通人均被视为“援助者”，与正式党员同等论处。这一法律直接导致被捕人数迅速攀升至上千人。

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是日本政府利用内线情报与修改后的法律，对缺乏地下斗争经验的日共新生代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镇压。此次逮捕范围更广、定位更精准，导致包括市川正一在内的核心领导人悉数落网，重建仅一年的日共中央再次陷入瘫痪。

1931年至1932年间，日本共产党发生了一场关于当时形势的路线斗争。1931年，日共委员长风间丈吉带回的《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即“31年纲领”）受后来被证实为两面派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导者萨法罗夫影响，将日本定性为“金融资本专政”国家。这一纲领忽视了封建地主阶级势力，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导致日共在策略上脱离了农民阶级，影响了反天皇制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这一时期，围绕日本国家性质和革命阶段，日本左翼阵营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大论战。脱离日本共产党的“劳农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极“左”分子）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只看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表象，抽象地将日本定性为纯粹的“金融资本专政”，主张无视天皇制的特殊性，直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坚持正确路线的“讲座派”和后来的《1932年纲领》则运用阶级分析法，彻底批判了回避反对天皇制的斗争的劳农协和解党派。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日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独裁制”，必须首先开展推翻天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

为纠正这一路线上的错误，1932年5月，在共产国际库西宁（后来被证实为从革命路线跳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墙头草，但在1930年代执行了革命路线）的主导下，片山潜、野坂参三等人参与制定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即“32年纲领”）。该纲领将当时的日本界定为“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君主独裁制”，并明确现阶段的任务是“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转变趋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先打倒天皇制、再迈向社会主义的路线。

在开展路线斗争的同时，日共开展了地下宣传与反战工作。在“三一五事件”的公审中，市川正一等干部利用法庭进行公开宣传。地下党组织突破警方封锁，根据他的法庭证词，出版了《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1931年新中央成立后，地下机关报《赤旗》建立活字印刷所，单期发行量达数万份。

1931年底，日共指导成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吸纳了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文化人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共在《赤旗》上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及“保卫中国革命”的口号，并向出征日军发放反战传单。

然而，日共在尝试建立工厂“细胞”时陷入了教条主义。指导干部向普通罢工工人强行灌输“武装保卫苏联”等最高政治纲领，脱离了底层劳动者的认知和实际需求。

日本共产党为突破《治安维持法》的封锁，指导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全协）等群众组织作为掩护，派遣党员潜伏于兵工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中建立秘密“细胞”（支部）。在宣传方面，除中央机关报《赤旗》外，日共重点在各

工厂发行油印的《工厂报》，通过揭露监工打骂、克扣工资等具体压迫来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

然而，日共的宣传并未能在产业工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是其受“福本主义”的“左”倾路线影响，地下党干部在工人工作时陷入了教条主义，无视底层工人的认知程度所造成的。例如，在普通女工为缩短工时而罢工时，干部却在传单中强行灌输“武装保卫苏联”或“推翻天皇专制”等政治斗争的最终口号。这种最终的政治诉求不仅未结合工人减租减息、反对克扣工资等迫切生存诉求，难以被工人理解，反而因极高的风险引起了工人的恐惧。此外，当时的日共骨干多为知识分子，其宣传品充斥着生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没有能够将它们转化为底层劳动者日常的语言。这样的一种党八股，使日本共产党员干部与底层劳动者之间产生了沟通上的鸿沟。而在失去了工农群众的认同与掩护，工厂中的地下党员就完全暴露在警方的视线中了。

在外部环境上，日共的地下网络同时面临反动政府和改良势力的双重打击。特高课通过向“全协”和工厂支部内部安插特务，对日共组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与高频破坏。许多地下支部刚建立或首期《工厂报》刚付印，人员名单便已被警方掌握，导致基层干部被大量抓捕，根本无法形成长期的群众信任与组织积淀。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缺乏严密的保密纪律，运作模式带有“合法政党”色彩。在地下联络中，日共未严格执行单线联系，基层党员常在工厂频繁举行多人集会，一旦特务混入，即可以破坏整个网络。同时，基层党组织缺乏地下工作常识，记录并保留了许多包含真实姓名与住址的党员名册、《工厂报》订阅名单及会议纪要等书面记录，这为特高课提供了直接的抓捕线索。此外，为在镇压后迅速恢复力量，党

组织盲目扩大招募（即“火线入党”），审查机制的缺失，致使高级内线（如“间谍M”）得以轻易打入内部。

然而，同一时期，右翼“劳资协调”工会通过合法谈判为工人争取到了部分微小的经济改善。对于多数以生存为首要诉求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种风险较低的合法改良路线，往往比面临残酷镇压的日共的激进路线更具吸引力。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日共早期的工人运动在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与严酷封锁的外部环境中走向失败。

早期的日共领导层多为帝国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对日本实际情况的掌握，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特殊的“天皇制法西斯”社会结构有效结合。党的路线在右倾取消主义与极左盲动主义之间摇摆，始终未能提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本土纲领。1933年，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白书，声明公开“转向”（支持天皇制与侵略战争，公开背叛共产国际），导致大量党员和同情者脱离组织，严重打击了日共地下宣传的公信力。

2.对日共战前斗争的总结

共产党人的建党事业，从来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的产物。党是在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实际斗中锻造出来的。当代政治报派歪曲列宁在沙俄时代创办《火星报》的策略，轻视工厂一线的融工斗争，妄想仅仅依靠地下刊物和网络平台作为核心组织工具“联络各地组织”，幻想仅靠几份地下网刊、建几个电报频道，就能凭空搭建起高高在上的“党中央”，试图在没有和工人打成一片，缺乏群众的基础上“办工人小组”来

指导工人，主张建立以厂外人员为核心的“厂外领导厂内”组织路线，脱离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正确路线。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战前日本共产党的建党史，就能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绝不是靠几份报纸在空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各地扎实的革命群众工作基础之上的。

战前日共的早期领袖，如堺利彦、山川均、野坂参三等人，根本不是躲在幕后作为发号施令的神秘人物。早在大正甚至明治时代，他们就已经是活跃在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第一线的元老和干将，有着极深的社会斗争基础。日共在建党及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视具体的劳资纠纷和产业斗争。例如，以渡边政之辅等为代表的左翼工人领袖，坚决同右倾改良主义工会决裂，带领32个左翼工会、1.2万余名具有明确阶级斗争意识的产业工人，于1925年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评议会）。在日共的影响下，评议会广泛发动全国工人开展反对“三大恶法”、反对解雇的斗争，短短一年会员便发展到3万余人，成为当时日本二战前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工厂战线上，地下党员更是脱下长衫，作为普通工人，在大型兵工厂、纺织厂和金属加工厂内扎根，实打实地建立秘密的“细胞”（支部）。他们发行《工厂报》，专门针对监工打骂、克扣工资等切身压迫进行揭露。这种一线斗争工作，才是党组织建立，成长的基石。

反观当代的政治报派，其理论源头同极其反动的“福本主义”幽灵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宗派主义。战前日共内部的极“左”派福本和夫，主张在所谓的“政治结合”前，必须进行绝对严格的理论斗争以“纯洁队伍”。他们认为党只能由所

谓“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组成，陷入了极端的“唯理智主义”泥潭。今天的列宁道路之流，不正是叫嚷着要革命工人“必须通读列宁全集第x卷”吗？当劳动者仅仅为了讨要血汗钱而斗争时，他们不仅不去与群众同甘共苦，反而急于去“办工人小组”向工人强行进行“政治教育”，“通过长期系统的马列主义读书会来建立“发起小组””。这种灌输，不仅无法唤醒普通工人，反而会引发群众的警惕和排斥，彻底切断了先锋队与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血肉联系。

政治报派们自以为能通过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方式，骗取工人阶级的信任。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用毛主席的这把尺子一量，政治报派们不仅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甚至连“革命的知识分子”都算不上，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清谈客，是革命队伍中的绊脚石。

日共早期的建党与发展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党只能在各地的工人斗争中，通过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自下而上地锻造出来。**政治报派企图靠一本刊物、一个网站就主观地确立“党中央”，再幻想用这种网络之上的“空中楼阁”去联络各地，这种沙滩上建高楼的颠倒路线，注定要在无产阶级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彻底破产。

大字报专栏

读《论工人革命路线》笔记

> 《论工人革命路线》文章出处：工农解放社路线文件

> https://blog.cmlmuf.org/archives/wei-ming-ming-wen-zhang

1. 工农解放社的路线是“工人革命路线”，其中融工是首要但不唯一的策略。 本路线是基于我国国内阶级构成情况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而提出的。本路线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重点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2. 1989年六四运动，2022年末群众运动都具有一定进步性，也存在局限性，体现在学生群体的机会主义和改良倾向，而工人表现出斗争性和团结性强的特点。富士康工人运动的教训则说明工人阶级需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战斗准备。这些运动说明工人阶级是社会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革命者必须与工人相结合。
3. 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前提下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无产阶级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可能表现为一段或多段革命，但总是要求无产阶级领导、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力量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要走“工人革命”路线。

4. 工人革命路线要求争取工人阶级领导和增加工人阶级力量，重点是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把工人组织工作当作一切工作的重心和基础，要把组织成员越多地变为工人阶级、把组织成员的工作越多地变成为工人工作服务，为工人组织提供干部和帮助，线上工作服务于工人工作，线上组织服务于工人组织，非工人阶级成员与工人阶级结合。实践上要克服自身非无产阶级因素，和非工人革命路线进行长期斗争。
5. 巩固社会主义依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改造旧制度，工人阶级要从政治高度理解和赞同这个改造，要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进行这个改造。前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化、组织化条件，到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要继承和利用，还必须加强这个条件。工人革命路线可以为社会主义下的继续革命提供条件，以正确的策略带领工人阶级完成每个革命。
6. 在争取、巩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继续革命的不同阶段，都要由社会中最革命的群体来主导，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是发展和实现革命的根本条件。我国革命运动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尚无工人阶级组织，仅有较小规模的工人阶级自发经济运动。这个阶段的任务是要建立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由革命工人领导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整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整个社会被压迫阶级，团结革命力量共同走上工人革命路线。
7. 目前融工是我们首要策略，要采取正确方式方法来落实我们路线，其中怠工组织方法是能够把工人们直接进行阶级组织的一种办法。统一战线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策略。在坚持工人革命路线的独立与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团结和帮助更多革命力量。
8. 总结：本文论述了工人革命路线，从社会运动，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与巩固，以及继续革命方面来说，讲了要进行工人革命路线的原因以及融工与团结的方法论。

点评《一个发展巴布石金式工人同志的案例》

> 文章出处：工农解放报RSF续刊第二期

文章要点

文中记录了作者在厂内工作培养一位工人同志的过程。这位工人同志最初幻想当保安改善自身处境，后遇到问题时，作者及时结合具体困难进行分析，纠正了工人同志的错误倾向，通过持续帮助和灌输，工人同志逐渐认清了资本主义本质，开始主动进厂并引导身边受压迫学生。

这位工人同志还与一个线上联系工人只讲理论的偏政治报路线的读书小组进行了交流，他感觉聊不来因为讨论哲学在厂内实际工作中作用不大，这反映了政治报和融工派两条路线的差距。

文中案例展示了发展工人同志的有效方法，应围绕工人当下生活矛盾展开工作，在提供实际帮助的同时，持续进行思想教育和斗争，帮助发展对象在路线上达成一致。

案例对我做学生群众工作的启发

目前我正在逐个接触学生进行一对一灌输宣传，文章提供了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逐步开展思想工作的完整例子，可以指导我对单个学生的宣传。

案例里，作者并不讲大道理，而是从他遇到的实际问题切入，围绕具体矛盾分析原因，同时提供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引导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纠正他改良主义和冒进想法。

学生群众工作也是同理，不要急于输出理论，而应先了解对方生活处境和内心困惑，从真实需求出发，给予关心帮助并结合他们经历指出问题根源。大部分学生受中修教育影响容易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趣甚至反感，通过结合对方真实处境从日常话题逐渐引导到政治上，学生更容易接受。

另外，文中案例还强调了要耐心进行思想工作。这位工人同志在转变过程中反复出现各种错误倾向，作者反复纠正引导，持续跟进，最终确立了正确方向。我在宣传时也有同样问题，一个道理要讲很多次，对学生的宣传也要做好长期准备，要建立持续的联系，在不同阶段针对性地做工作。

同时，作者还很注意发扬对方身上的积极因素，把他的优点引导到更自觉的层面上去。接触学生时，也要多观察和肯定他们身上正面的东西，把这些引导到阶级意识上来。

总之，对于我而言，这个文章最直接的用处就是帮助我改进宣传方法：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和生活矛盾出发，把关心帮助和思想引导结合起来，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

对学生组织路线建设的启发

从学生组织发展方向的角度，文中案例还能辅助小组跟政治报路线斗争。从这位工人同志和那个读书小组的接触可以看到，政治报派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宣传的问题。学生组织若长期停留在读书会，容易变成“左派知识分子”小圈子，失去工人阶级基础。

学生组织不能满足于在学生圈子里开展活动。学生应当利用自身长处发挥桥梁作用，实现学生与工人力量的真正结合。

应当以融工为学生组织建设的主要方向，同时保留必要的理论学习，让理论学习服务于融工工作。

把融工作为主要方向，才能在路线斗争中统一认识，让组织朝着革命方向前进。

点评《论工人革命路线》

> 文章出处：工农解放社路线文件
> https://blog.cmlmuf.org/archives/wei-ming-ming-wen-zhang

“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以及这两种运动尚未结合。工人运动的不发展主要体现在斗争的纯粹经济性质、工人整体参与斗争的比例低、斗争组织的缺

乏；革命运动的不发展主要体现在我国革命分子普遍远离工人工作，或者说工人工作不是我国革命分子们的主要工作：而未结合体现在缺乏大量的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缺乏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结合起来的力量，也缺乏在这种基础上的活动。”—来自前革社刊物内容

我国是一个大工业国

工人革命路线要求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发展工人阶级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在大工业国里，需要有工人阶级才能实行这个路线。另一方面，我国恰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规模庞大，能够为工人革命路线提供肥沃土壤。实行这条路线符合我国国情，我国革命也将影响世界。

工人革命路线

工人阶级在历史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七十年代末，先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被镇压了，新的各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他们代表各自阶级利益形成了各种政治理论和组织，出现了各种诉求的运动。在六四运动里，学生知识分子集团先初步组织起来，影响了先进工人，工人阶级形成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等先进组织，提出先进诉求，规模和范围迅速发展扩大。但学生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其理论和诉求大多不相同，机会主义严重，犯下了诸多错误，导致运动失败了。相比之下，工人阶级更先进，但缺乏群众组织。 历史上的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也体现出坚决的革命性。而22年末的群众运动，只是自由派黑暗前的夕阳罢了，同时期的富士

康斗争展现了工人阶级强大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力量全部发挥出来，由先进工人阶级以正确路线和斗争组织把整个工人阶级武装起来，让工人阶级提前做好战斗准备。 另外，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按照阶级意志和利益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就成为了社会统治阶级，所以这是工人革命路线，而不是民主革命。

点评《论工人革命路线》

> 文章出处：工农解放社路线文件
> https://blog.cmlmuf.org/archives/wei-ming-ming-wen-zhang

“工人革命路线”的出发点是推动和实现我国社会运动和革命、争取和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下继续革命。它是基于我国国情、马列毛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对革命规律综合考量而提出的长期路线。（选自原文）

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工业国之一，我国工业不仅决定国内各行业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的最关键力量，甚至也会影响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中国工人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一切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否则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革命路

线”是适应现代工业国的革命路线，其核心是优先发展工人阶级力量，让工人阶级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能更有力推进中国革命，并为未来创造更好条件。“融工”是其中最重要策略，也就是革命者融入工人劳动生活和组织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人阶级更快参与革命事业，并取得社会运动领导权，为未来创造条件。工人革命路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重点发展工人阶级革命力量。”

通过群众运动理解工人革命路线

通过1989年六四运动、2022年白纸运动以及富士康工人运动三个案例的对比，证明了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最关键的群体，而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由于其本身特点，容易放弃和妥协。六四运动中，学生组织拒绝工人诉求、排斥工人参与谈判，让运动脱离群众，而工人群体则表现出更强的进步性。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会走向失败或偏离劳动群众利益。白纸运动迅速发展，是因为社会矛盾积累导致的工人群众广泛不满，而富士康工人运动则展现了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斗争能力。工人不仅有组织潜力，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关键地位，工人的斗争能够真正冲击社会秩序，但也有缺乏组织、统一路线和全国联合问题，因此必须提前建立工人组织、培养革命力量，并加强革命者与工人阶级的结合。

“工人革命路线”进一步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层面。无论未来中国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最关键的始终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变，更要政治上实现无产阶级统治，这离不开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革命化。工人革命路线不仅

有利于推动革命胜利，也有利于未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路线能够不断培养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和政治意识。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也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力量，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范资本主义复辟。我在阅读后觉得，“工人革命路线”不仅适用于革命夺权阶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继续革命阶段，它的核心始终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服务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

点评《论工人革命路线》

> 文章出处：工农解放社路线文件

https://blog.cmlmuf.org/archives/wei-ming-ming-wen-zhang

文章要点

工人革命路线是中国当前最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是基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国、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物质条件，结合马列毛主义革命经验提出的。工人革命路线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工作为工人工作服务，重点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推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社会主义下继续革命提供基础。

融工，是现阶段最重要策略，是实行工人革命路线的首要任务。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革命路线必要性。六四运动由学生和工人集团参与。学生集团早期积极号召末期却妥协、背叛，工人集团则革命性更强，说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运动必然走向妥协和失败。

2022年末起于乌鲁木齐火灾迅速发展的白纸运动中，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斗争激励了学生，但自由派脱离群众，引入资产阶级反动诉求，再次证明了脱离工人阶级领导的运动会背离劳动人民利益。

在富士康工人运动中，工人为维护劳动者权益与武警激烈对抗，展现了工人阶级坚决的斗争性，但因缺乏组织、正确路线和广泛联合，总体成果有限。这说明经济斗争必须上升为政治斗争，地方阶级斗争需要联合扩展到全国，更需要科学和明确的路线。

这三场运动共同证明了工人阶级是我国一切社会运动最有力的推动力量，也证明了工人革命路线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革命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所有制。俄国两段革命和中国一段革命都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和力量壮大，核心都是工人革命，也就是增加无产阶级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领导。这条路线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最有力推动革命。路线要求组织成员融工，思想立场向工人阶级转变，为专政准备组织和思想基础，它必然与各种知识分子路线进行长期斗争。

工人革命路线对巩固专政与继续革命也有重要作用，文革失败经验表明，工人阶级政治力量是继续革命的根本。工人革命路

线在革命阶段就培养这些条件，能为巩固专政和继续革命奠定基础。

点评

当今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工业生产基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核心。中国工人阶级的规模巨大，组织和斗争潜力无可匹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核心是阶级领导权问题。工人革命路线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动员起最广大的革命力量。

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实践都表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和巩固。脱离工人阶级的运动必然失败或变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社会运动历史验证了这一点。

工人革命路线也能有效防止机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易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滑向知识分子领导等错误路线。工人革命路线要求革命者融工，改造世界观，一切工作服务于工人，以锻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

融工与统一战线的组合，也能应对当前中国革命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分子脱离群众的困境，在工厂中灌输、斗争、提高觉悟、积累力量，符合列宁所说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需要灌输的理论，也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教育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学生工作

学生群众工作经验

前言

经过四个月左右的学生群众实践，形成了一些工作经验。目前工作仍以点对点方式缓慢推进，尚未形成稳定的小组力量，多次因自身问题或客观条件陷入停滞。这些困难和对困难成因的反思，以及在工作中形成的应对方法，构成了可供参考和讨论的经验。

一、起步阶段的基本方法与困难

我是从高二开始做学生工作的，入学已经两年，班级里的社交圈基本固定，多数同学早已结成稳定的小团体，再加上性格劣势，存在明显的社交障碍，在班里没有现成朋友关系。起步阶段没有社交圈是最直接的障碍，由于过去在学校的一些人际关系矛盾，被排除在外后很难从头融入。自身性格原因进一步限制主动出击，常常找不到自然契机，也不敢主动创造机会。初期曾出现长时间无进展的情况。

在这一阶段，我遇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最大程度克服自身性格的劣势开拓新的接触面，形成初步创造小组的条件？这方面依然是我一个有待解决的难点，目前也只做到不再像之前那样抗拒同学间的日常闲谈交流，而是尝试将其作为建立关系

的契机，但也主要都是来自线上聊天，线下依然交流困难，依然没有克服心理障碍做到主动创造交流，主动交友。

应该做到不要等待“合适的契机”自己出现，而要主动创造日常的交流契机。学业互助，一起应对作业压力，兴趣分享，共同抱怨具体压迫，都是相对安全的入口。先让对方感到有共同点共同话题，关系初步建立后，再仔细观察对方最愿意反复提及的不满，作为灌输的内因突破口。

这一阶段我在实践中的的核心困难在于起步极慢，即使找到接触点，也常因自己畏手畏脚而无法深入，如何在让自己迈出第一步，如何更系统地调查班级或学校中潜在的共同利益点，而不是被动等待偶然的交流场景，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接触群众并根据内因宣传的实践

宣传必须紧扣对方个人利益与经验。说教感并非来自形式本身，而是来自强加与对方无关或对方没有感触的内容，比如一上来就谈政治，有效切入永远是对方已经在抱怨的东西，把这些与其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再逐步引向更深层根源。

具体操作中，先从对方暴露的不满出发加以提高，或在对方已有认识基础上引导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群众经常表现的不满有对学校规章制度，应试压力太大，家长的压迫等等，讲完一个具体问题后，不急于上升，而是观察对方是否主动追问，主动追问就说明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如果只是听完点头随即转移话题，说明没有触及真正利益，需要继续积累共同感受。旧思想的反复是常态，因为旧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

生活中不断被再生产，不能指望一次讲透就一劳永逸，而且自己认为讲透了也不一定代表对方真的听进去，还需要长期的联系，针对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具体地宣传。

比如和一位简称a的群众（具体情况见后文），刚开始交流的时候他经常骂学校骂老师，情绪化地批判应试教育，这是很多学生都会有的心理，要引导的就是从情绪化的的辱骂到精确地理解为什么应试教育如此压迫人，比如对方吐槽的时候可以附和“对啊，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么让人难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呢”之类的话来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对方自然就会抛出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从中可以了解到对方的思想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引导灌输，群众一开始认识有错误很正常，不要急于反驳说教，要以一种平等交流的不带目的性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就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和对方讨论，用充分的分析论证让对方信服并逐渐扭转原本的错误观点。和a聊到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中国人口太多所以太卷了，而且现在的教育就是纯为了洗脑”，于是我就顺着他的话提出观点“我觉得其实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于人口而在于分配”然后详细阐述分配问题并适当引入马克思主义。这就引发了他的兴趣和思考，并且愿意继续和我讨论。虽然不可能一次性说服，但也是在逐渐认同。

但仅仅这样做群众也不一定会左转，前期和a揭露中修时，他只是大为惊讶，感叹“政府居然这么黑暗”等等，虽然做出附和却很少提出自己的想法加以讨论，而且一个话题聊完也就结束了，不会继续做进一步的思考，或者在后续生活中想到这个新了解到的观点，很容易遗忘，又回到原来的观念上去。说明对方可能只是在听故事而可没有真正吸收所讲的东西。仅仅是讲故事可以让群众获得对理论的一定了解和对中修本质的一定

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持久也并不坚定，群众的确听了灌输，但是否真正听进去并且内化了或许不一定。

当对方把宣传当作听故事时，需从两个角度检查，一个是客观上是否真正分析到根源，一个是主观上是否帮助对方把所讲内容与自身经历联系起来。对方出现明显抵触，冷淡或不感兴趣，就需要转移话题，避免安全隐患。例如在初期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学生群众，通过碎片化的日常闲谈熟悉起来，通过对方抱怨和喜爱的事物了解其内因，但无论怎样针对其个人利益引入灌输话题对方都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主动引开话题，让我不要老想这些，等等，最终实在找不到突破口，就没有发展成群众工作对象，只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流就渐渐疏远了。

我陆续接触到三位主要对象，分别记为a,b,c。

a是较早建立联系的同学，是接触交流最多的一个，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最初是在学校的聊天群里接触到，通过闲聊和共同兴趣混熟，后来自然谈到应试教育。他对此有自发的反对情绪，我引导他思考问题的根源，从学校压迫延伸到社会制度。他对社会现状有朴素不满，但归结为人性自私，人口过多，还认为集体主义洗脑害人，个人主义才是清醒等等。就由此批判人性论和个人主义，用理论说服他，他口头承认有道理但依然保留着原本观点，之后在分享社会新闻，揭露中修的时候，还是容易第一反应得出人性恶之类的结论，这一点一直反反复复，就像前文提到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并未改变，旧思想总会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必须要错一次纠正一次，不断和错误思想斗争。揭露中修的时候，他开始对官方宣传产生怀疑，但又总是追求所谓客观中立，觉得官方说法与我的分析都有道

理，心理矛盾，认为这种思维定式使他难以巩固已有认识。他家庭条件和成绩尚可，朋友不少但多停留在表面玩乐，渴望情感支持与内心平静，更倾向于向内求索而非向外斗争。这些特点决定了转化工作必须细致挖掘其具体利益，而不能停留在一般性说理。

b本身就是左派，是通过学校一个报刊接触到的，他是主编，他在疫情期间已经左转，也接触过墙外“左圈”，后来感到多是自娱自乐，没什么实际意义而失望退出。他理论储备远超我的预期，除了一般的理论知识，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左派发展也都比较了解。对他就无需基础灌输，重点在于推动他从等待革命到做准备。我本来想直接和他宣传组织，但他说目前什么都不会加入了，还反过来教育我一番，只好作罢。他是认同革命也有意愿的，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会参加革命，但不是现在，现在的主页还是专注学业。对于b这样基础很好或者已经左转的群众应该做的是讲建党策略革命路线，分析群众运动难以兴起的症结，革命准备，和为什么要做革命准备等，从期待革命但不知所措也无事可做的等待主义转向真正有助于推动革命的实践和工作。因为他朋友圈子比较广平时也会和朋友聊政治，我让他也做群众工作，定期互相复盘，但他比较抗拒，认为与朋友的关系首先是友谊，政治只是附加，也不愿意我作为外人介入他原有圈子。他家庭条件较好，成绩优秀，重视学业，稳有冲击名校的实力，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教育下的受益者，我一开始觉得他很可能转化成功，但本质上他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准备之间是不那么相符的，所以后面慢慢减少在对他的宣传上花的精力了。

c也是通过上文说的报刊认识，接受度较高，不抵触严肃讨论，乐于读书。基础揭露完成后，我推荐了《共产党宣言》等

材料，他表示假期会看，目前已经看了一些原著，进展相对顺畅，思想障碍比较少，是目前较有希望推进改造的对象。但缺少革命意愿，只是乐于读书学习，本质上推荐什么书他都会乐意看，看了书也不一定代表坚定左转，接下来当务之急的是让他意识到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革命意愿，而不仅仅是学习理论。

三、从揭露到改造的过渡

如何更精准地判断并培育内因，缩短从揭露到改造的过渡期？揭露只能产生“有道理”的印象，无法切断旧思想的再生产。改造的关键是改变对方的社会活动：日常关心社会，尝试接触身边群众，执行力所能及的学习计划，定期复盘等等。口头认同只能代表对方觉得有道理，而转化成功需要是能够自觉执行相关规划，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

实践中，这一过渡是最困难的点。基本完成揭露后，对方的兴趣往往停留在闲谈层面，对斗争必要性，思想改造与日常执行一直缺乏持续动力。比如说完之后一时口头答应，后续并无行动，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不愿意严肃对待，或觉得占用学业和休息时间而抗拒。再加上自身性格上总是容易顺着对方，对方表示不愿或摆烂时，为维持交流便退回纯理论讨论，督促改造不够坚决。这导致工作在揭露阶段反复打转，推进十分缓慢。

经验在于要回到对方个人利益，说明这些行动最终有利于其摆脱某些精神困境看清前途。比如说我遇到的有群众厌恶应试教育，在学业中感到痛苦，这是最为常见的，就引导到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黑暗，使他认清这种痛苦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还有群众感到孤独，迷茫，没有真正的朋友等等，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导致人陷入原子化的境地，诸如此类，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认识到革命是有利于其个人利益的。

如果对方始终拒绝任何计划性安排，说明内因还是尚未成熟，需继续从具体利益层面鼓动。自身也有问题，应该有意识克服顺从对方的作风，把矛盾适当摊开，直接询问是否感到厌烦，希望怎么做等等，而不是自己先退缩，这一点依然是亟待改进的。如何更有效地激发对方从“听着有道理”转向“愿意改变日常活动”，如何在不破坏关系的前提下加强督促，了解具体的个人利益内因之后，如何针对此进行有效的鼓动，促使对象产生革命意识，这些是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一些我遇见的思想障碍的处理

一是中修教育对很多名词的曲解导致群众对原本正确的观念有误解和反感，需要澄清原意。例如群众a接触之初认为个人利益至上，把集体主义等同于某种道德绑架，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就要考察他这样想的内因，了解到他反对的其实是那种“一人犯错全班受罚”的连坐式的所谓“集体主义”，将中修资产阶级教育的罪恶错误地归因于集体主义并对其产生强烈反感，要向其解释集体主义的真正含义，证明个人主义无法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用历史实例说明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可以统一的，在解释之后对方就意识到自己讨厌的并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还有一些群众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误解反感也是一样，很多都是源于中修的洗脑教育有朴素反对情绪但反对错了对象，要做的是

打破中修对这些词语解释权的垄断，像群众澄清其真正内涵，也因此最好不要一上来就直接使用这些“大词”。

二是“客观中立”式的想法，认为有超越阶级的所谓客观中立立场，吸收多方的观点但自己拒绝“站队”，对此需要明确指出，没有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对压迫保持沉默最终会使压迫落到自己头上，真正科学的认识只能站在最能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立场上获得。

三是消极等待倾向，这是群众b主要的问题，在其他群众身上也有一些体现：认同问题存在，却觉得当前行动无用，只能坐等革命爆发的那天再投身其中。需分析当前群众运动分散，组织难成长的症结，说明日常学习，团结与准备本身就是积蓄力量，解释清楚为什么即使革命还很远现在也要准备起来，什么都不做革命永远不会来，破除等待主义的错误思想。

这些障碍不会一次消除，需要反复纠正，而且与对方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交织，区分暂时性的反复与内因不足，如果是后者就还需加强针对内因的了解和鼓动，把理论说明与对方具体生活体验更紧密结合。但我在接触群众a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由于他的错误思想经常反复，总是认为人性本恶，虽然经常纠正但第一反应依然是这个说法，我会在每一次他表达错误观点的时候反驳并强调正确的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以及我常常在他抱怨学业和生活问题的时候引入对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本意是为了通过这些抱怨所体现的个人利益的内因切入，但久而久之他觉得我“什么都要扯到政治上”，并有些不满，为了不引发矛盾我只好暂时缓和了与他在政治方面的交流。怎样避免反复强调同一问题导致的对方的烦躁乃至反感，甚至逃避？这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安全问题

完整暴露组织与彻底革命立场的前提，是对方已被说服并愿意进入改造阶段。在此之前，即使对方主动问起相关问题，也只需适度回应，同时引导对方多发言，让对方先暴露自己的观点。如果学校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平台，可以尝试利用，比如报刊，社团之类，内容应控制在温和试探范围，优先把它当作接触更多人的渠道，而非直接的宣传阵地。如何把握“聊到什么程度算安全”的动态边界是一个问题，以及在对方仍处于摇摆状态时，要避免因过度交流深入而暴露。

六、整体反思与有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工作仍处于点对点缓慢推进阶段。揭露工作取得比较好的进展，但改造与转化滞后得多。困难总的来说在于社交基础薄弱，宣传对象思想惯性强，自身思想作风，时间限制等等。最主要的经验包括：始终从共同利益与内因出发，把改造重点放在改变社会活动而非单纯的思想观念，正视自身不足并借助组织复盘加以纠正，接受常态和长期的反复与难点，不因一时失利气馁，不追求一劳永逸的成功。

遇到的待解决的问题总结：

- 如何最大程度克服自身性格的劣势开拓新的接触面，形成初步创造小组的条件？
- 如何更精准地判断并培育内因，缩短从揭露到改造的过渡期？

- 怎样避免反复强调同一问题导致的对方的烦躁乃至反感，甚至逃避这个问题？
- 面对对方对说教和计划性的改造的抗拒，有哪些低压力但有效的切入方式，怎样让人更好接受？

学生群众工作是一个长期细致的过程，以上经验与问题均来自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希望可以为同志们起到参考效果，共同讨论，推动工作。

怎样看待安陆斗争

前言

7月10日，湖北省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数百名高一学生，为抗议学校将原本20天的暑假缩短至4天半，发起集体抗争行动。期间，学生们高喊”放长假”等口号，手持写有”放假”字样的白纸，以及一条写有”反集权倡平等，还我暑假二十天！”的横幅，在校园内游行。最终，迫于学生压力，学校取消了暑假补课计划。

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教育商品化的中国。学生因为学校缩减假期而奋起反抗的例子不在少数，2025年9月30日，海南三亚第一中学爆发学生抗议，也是因为假期问题，2026年1月24日，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爆发学生抗争，大批中学生不满校方取消原定周末假期，改为强制留校学习，在校门口聚集并且冲出校门。

学生为何频繁罢课?

从安陆斗争及其类似事件来看，主要是由于学校领导取消原定假期而导致学生反抗，从整体的学生运动来看，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教育变成了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劳动力，学生变成了服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潜在劳动商品，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商品一样具有非人化的属性，这就是说要求学生的一切生理、心理都要服从、让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

动再生产，臭名昭著的衡水模式，正是这种模式演变到极点的产物，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可以看出，这些学生运动绝对不可以用某个偶然的某个领导为了政绩升学率而去解释，不能认为换一个“海瑞"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而是要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后随之产生的必然现象，同时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他相比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产业还是以工业为主，需要大量的工业劳动人口，这就更加需要一个能快速灌输自然科学和纪律的教育制度，这就大大加深了中国学生和教育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中国的大部分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

安陆斗争本身的经验

从正面来说，**学校最终向学生妥协** 最大的原因就是学生内部始终保持了团结一致，运动刚刚开始时，一名校方人员对几名带头抗议、敢于直言的学生表示，可以立即为其个人批假，“我现在就给你批假，马上就可以走”，以此变相满足少数人的“放长假”要求，同时对其他学生仍维持“只放5天”的原决定。但学生识破了学校分而治之的阴谋诡计，带头学生坚定的留在学校继续抗议，同时参与运动的学生人数广，高一高二都参与了运动，高三则因高考完已经不在学校了，学生们能团结一致的对学校施加压力，自然可以获得成功。像是以往的学生斗争，因为运动不团结而被分化导致失败是常见现象，甚至不只是学生运动，很多群众运动往往都是因此而失败。所以说，在任何群众运动中，保持团结一致，都能让运动保持有很大的生命力。

同时，学生本身提出的要求小，是一次防御性的反击，只是要求放假天数从5天到20天，甚至在经济性的诉求里都算是温和的。和2022年11月的郑州大学学校聚集相比，当时的学生要求按防疫政策优化校园管理、恢复正常学习生活，在防疫政策尚未放宽的时候，这显然属于较为激进的要求，就没有得到校方的让步，而安陆斗争只是温和的提出放假天数的诉求，自然就更能得到校方的让步

同时安陆中学在此前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学生和学校的矛盾：

> 他说，新校区升学率较高，而老校区情况相对较差。“学校的奇葩规矩比较多。我当时受不了那个学校，所以六月份就出来实习了。”
>
> 对于住宿环境，他也表达不满。“我们这边一般能租房就不会住校，因为学校住宿环境特别差。”

这次运动是以往矛盾的总爆发，自然就可以”烧“得很旺，也就是说反映出学生长期积累的不满，在暑假突然缩水后集中爆发。这次运动也表明了当学生形成一致诉求且团结一致时，校方最终只能不得不作出调整。

安陆斗争本身的局限性

安陆中学的学生们的斗争精神当然是很可贵的，每个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可以大范围提高群众阶级意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的运动当然是感到关心鼓舞的。但

是我们仍然要指出，这种运动还是有着很大局限性，如果学生运动仅仅停留在这种程度，那么学生的处境中是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的。

从运动的性质来说，这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的一种改良，这种斗争还是只能充其量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和学校的矛盾，还是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预定的轨道内做一些改善学生住宿、课时等条件的改良。而不能触及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运动还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这种运动在有朝一日也完全是可能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整体之内，作为我国群众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社会运动统一的去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

同时像安陆斗争这样的学生运动还远远是没有和我国亿万工人阶级相互结合的，因而还或多或少是缺乏充足的力量的，是脱嵌在整个群众运动中的，也就是说难以对于我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什么结构性的影响，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正是工人的参与才让一开始只是一些学生参与的游行示威转化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当工会接受格勒内尔协议后工人开始复工，学生运动也就快速沉寂下去，此时学生运动也就立即失去了全国性影响。我们今天的学生运动当然也要吸取这个教训，不应把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作为两条不交织的平行线，而应该让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能够统一的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使两者相互配合，推动革命前进。

学生运动的两种前途

韩国的1980年代的学生民主运动，在87年的民主化改革后学生阵营被资产阶级所收买，当年的学生领袖大多成了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部长，虽然有了形式上的民主。但是韩国的青年无产者却仍然要在韩国的教育机器内内卷，仍然要忍受着高房价和低就业率，今天的中国学生运动也有可能有着两幅图景

一幅是学生运动确实促进了对于教育制度的改良，也许学生不用有那么大的课业压力和法西斯的学校管理方式，但是学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被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奴化的现状没有改变。这种改良的方法不能争取到前述那种现状的改变，故而永远不能对学生的处境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这最多是在改善作为一种商品被流水线生产出来时的待遇，而没有改变学校把学生作为一种商品生产，追求利润的形式和目的，没有让教育真正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更别提由于中修的法西斯制度对于群众运动的惧怕，这种微小的改良也多半是追求不到的。

一种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一起向中修进攻，彻底灭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让学校从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生产流水线成为一个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教育场所。

马列毛主义者该如何正确从安陆斗争中看出自己的任务

从本次运动来看，见微知著，中国的群众绝对不像某些人说的一样是被奴化的，相反，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斗争性。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次运动由于其自发性，缺乏正确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还是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那么，马列毛主义者该如何从安陆斗争出发，总结出自己的任务呢？

首先我们应当要认识到，学生在我国是一个富有生气和战斗性的群体，我们应当认识到要在学生中建立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的必要性。学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他们还没有受到很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历史上，革命学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对于现在的中国革命来说，革命学生一方面是马列毛主义者队伍的预备军，他可以给整个马列毛主义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继承者，一方面又是革命工人的同盟军，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只生力军，而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做好学生内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为革命队伍提供一只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学生后备军，也为可能到来的学生运动做好准备，争取在学生运动到来时通过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策略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最后，用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来结束本文吧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

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是斗争的胜利！论伟大的“九十学运”的意义

革社（RSF）编辑部

一.斗争的胜利

今年河南省教育厅宣布河南全省的学生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要放假八天（包括高中生在内）。 这个消息极大的振奋了河南学生们（特别是高中生），它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振奋了许多其他地区的学生。因为谁都知道，虽然法律上我国一直都承认学生们的合法假期，承认国庆节 和中秋节必须要放假，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很好的遵守过。从我国资产阶级制度复辟以来，这八天（中秋一天、国庆七天）的假期对于我国学生来说可谓没有一天是彻底落实了的，因为我国许多初三学生、大部分高中生（特别是高三学生）是从来没有享受到的。国庆只放一两天假期是我国大部分高三学生的常态，甚至在一些严重的地方，高一、高二学生也遭到了类似的待遇。这是因为我国教育是最彻底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为了实现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在经济上极大的剥削各个家庭、各个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也高强度的压迫、剥削我国学生，使他们能够达到更高的商品标准以实现更多的价值，而我国的高中生又恰恰是其中受害最深的群体。

义务教育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只有九年，高中不是义务的，而不上大学基本意味着学生未来只能从事最劳累的工作，更低价的出售他的劳动力。所以高中阶段成为了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我国学生的重点阶段。教育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现象在这个阶段中表现得最彻底、最完备。“校门一关，法律就进不来”的现象在这里也是发展得最彻底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压迫现象都时有发生：假期完全的被彻底消灭、12 乃至 16 小时高强度的学习、日常的损害学生的尊严、学生的自残自杀等现象简直成为了我国高中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必要接触的事情。

既然如此，是什么导致了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突然在河南这个我国教育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宣布要保障学生们的合法假期权利了呢？本地的和互联网上的许多学生们，纷纷感慨是河南教育厅的好官们，特别是河南教育厅厅长“毛杰”的功劳让他们享受了久违的合法假期。因 为这件事是河南教育厅自己宣布的，是“毛杰”签署的相关文件，又由于大部分学生对事实真相了解甚少，所以他们往往把这件事主要归结于了“毛杰”。我们尚不清楚“毛杰”先生在背后到底起到了具体多大的正面作用，虽然我们也希望“毛杰”先生这样的官员们多发挥一些正面作用，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九月河南省爆发了多起学生运动事件，其中有两起较大规模的学生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学生们大量的团结了起来针对合法假期权利对他们的学校领导进行了斗争。在这两次斗争产生前，河南省的教育厅从来没有做到要承诺主动维护和公开宣传学生合法假期权益的。在这两次斗争胜利前，这些学校从来都是不遵守学生们的合法假期权益的。并且直到十月，在“毛杰”先生宣布要维护河南学生的合法假期权利的后，河 南却依然有许多学生没有享受到合法假期，洛阳的学生们也因为学校不按规定合法放假而教育

厅无法发挥它的作用，而不得不大规模的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洛阳市学生捍卫法定权益维权联盟”就是这次学生斗争的产物。

而在网络上的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学们在跟着少数坏蛋或蠢货把功劳主要归结于“毛杰”，并呼吁“毛杰”先生应该配享太庙的时刻。各地还有着许多正在发展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们正在用自己勇敢的斗争来争取所有学生们的合法假期权益。受到河南学生斗争的影响，以及同样的矛盾因素的积累，陕西的学生们也在尝试组织起进斗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假期利益。西安的高中生们跨校的联合了起来，他们掀起了要求放假的学生维权运动，他们在学校内贴 大字报，并组建起跨学校 QQ 群来进行统一的维权活动，据说现在已有 61 校参与了这场活动。 由于他们的斗争，西安市多区的学生已经停课放假（雁塔区还不确定）。江西九江、山东菏 泽、山西大同的学生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斗争而争取到了胜利。几乎同一时间，陕西榆林市的学生们也爆发了抗议运动，贴出了大字报，要求放假，经历了波折的斗争后也取得了放假的 结果，榆林学生们事后把这场运动称为“九二七”运动，总结了运动的成败，并未大致提出了斗争精神延续的重要性，把运动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胜利看作主要是学生们自我组织、自我踊跃斗争的胜利，而不是主要是地方教育厅或“毛杰”先生的胜利。在许多时候，地方教育局都没有很好的履行它应负的职能。在“毛杰”先生没有宣布正常放假时，河南的学生们通过特别激烈的斗争来维护自 身的权益；当“毛杰”宣布要维护学生的合法假期的利益的时候，河南的学生们也还不得不用特别激烈的斗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没有“毛杰”的地方，山西、山东、江西、陕西等地区的学生们也在用特别激烈

的斗争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斗争有些已经争取到了合法假期的利益。所以，当其他学生们能正常的享受自己的合法假期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假期在今天主要是通过自己全国各地的学生兄弟们的勇敢斗争争取来的。

从中秋、国庆假期以前的九月，到假期开始的十月。全国各地爆发了特别激烈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合法的假期权益。这些学生运动不同程度的展现出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跨区域的特征，甚至部分学生运动还出现了一定的政治性。“九二 大起义”中永城学生在运动中的许多不足，在一个月内就被我国其他的新的学生运动进行了一定的改善。这些情况都宣布着我国学生运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它揭示着我国学生运动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要在这个阶段上继续发展。九月和十月的学生运动（简称“九十学运”）扫清了多来年我国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和低水平发展的阴霾，它势必要指引着之后的学生运动要以和他同样的以及更高的高度上进行。

二.从“九二大起义”到“郑州一中学生运动”

当流星一般的“九二大起义”在河南大地上划过后不久，当许多人还没有察觉到这颗流星而错过了它的不久之后。郑州一中的学生们进行更优秀的斗争，使得更多的学生受到了影响，郑州一中的学生们扩大了运动的影响范围，把斗争的消息在墙内外进行了更多的传播，并和 已经从此学校毕业了的国内外郑州一中的学子们团结了起来，把这次运动的影响扩张到了社会其他的群体中去。除此之外，这次运动还附带上了更多的政治

性。虽然这次运动的目标一开始还是维护经济性的利益，但他却采取了一定的政治诉求的手段来争取到了更广大的、成功的合法利益的结果（经济性的），这为我们证明了，我国的学生运动哪怕是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的运动也是可以通过运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完成的。

并且郑州一中学生们的斗争胜利也显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如果说“九二大起义”是揭 幕了九十学运的开端的话，那么郑州一中学生们的斗争则是把运动带入了高潮，它的胜利代表了整个运动的高潮的到来。

关于“九二大起义”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评“九二大起义”的根源及意义》有所论述。我们在这里则要更详细的谈谈“郑州一中学生运动”。 9 月 23 日，郑州一中的同学们因不满新校长突然宣布禁止穿短裤短裙、强制跑操、苛扣休息 时间等一系列不合理规定，学生们因而组织反抗，在线下线上张贴出了《告全体一中学生书》和针对校长的《讨闫檄文》等文章。

> 《告全体一中学生书》 金秋九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正值秋风送爽之际，一股歪风邪气却席卷了我一中校园。自韩松卸任以后，原四中校长闫培新成为了一中的新校长，我们原本希望这次闫校长能够人如其名，是一位呕心沥血培育新苗的“好园丁”，可谁曾想它带给我们一中这些“新苗”的不是肥料，而是“毒药”！
>
> 闫培新一经上任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 8 月宣布禁止学生和老师穿短裤短裙，一经发现便即刻勒令换成长裤，甚至不惜让未带长裤的走读生回家换好后在返校，不可

不谓之丧心病狂！虽然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对该项新规都心怀不满，但可惜鲜有人站出来反抗， 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然而现实却毫不留情的打了投降主义者的脸，退让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学校的野心，反而是纵容他们蹬鼻子上脸、变本加厉。“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先用一纸“短裤禁令” 试探学生的底线，发现这帮学生竟如此懦弱无能，只会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于是便可以肆无忌惮的得寸进尺。就在这周学校宣布准备实施 5 条新的规定，加上之前的“短裤禁令”共 6 条简称为“闫六条”,内容如下：

已经实施(一条):1.禁止全体学生和老师穿着短裤或短裙； 准备实施(四条):2.晚自习延长至晚上 10:30 分放学； 3.中午 1:00——2:00 禁止在校园内自由活动； 4.强制跑操做操,高三也要参加； 5.每天的晚读改成考试； 暂未确定(一条):6.统一制定校服。

同学们！试问这“闫六条”哪一条不令人触目惊心、深恶痛绝？恐怕没有哪位有良知的学生和老师们看到后不唾骂两句的，“闫六条”究竟有何危害，我们该怎么办？诸君且看：

众所周知,“自主学习”是郑州一中办校的一大特色,是令一中从茫茫众多高中中脱颖而出的一面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的带领下,一中才有了过去的辉煌和“大甲”之一的殊荣。相信大多数同学正是因为认可一中“习得自主,日新吾新的学风,才选择来到一中的。 何为自主？自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是谁在学校里学习和生活？是学生，既然如此，那学生就应该是学习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主体，而不是老师、家长，更不可能是校领导。自主学习就是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你的情况肯定是你自己最了解，那不让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当家作主，难道要让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只会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发号施令的“先生”们当家做主吗？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道理啊！

而“闫六条”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斩断这面旗帜，挖掉一中的根，摧毁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沦为毫无生机、缺乏主见、只会机械的服从命令、疯狂内卷的考试机器！比如：第 2 条“晚自习延长至 10:30”,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晚上总有人挑灯夜读”,为了让你回寝好好休息,所以晚上你就在教室里多上一节自习吧。这就是内卷带来的实际影响,正如工人超额完成工作并不会涨工资或是得到老板的赏识,唯一留给他的只有比上一次更多的工作，甚至在他完不成时老板还要痛骂他工作不努力;你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学习换来的不是好成绩和学校的体谅,而是一副疲惫不堪的躯体、一颗濒临崩溃的心灵,学校还“贴 心”附赠了你一个更晚的放学时间。可是我们能就此把罪责都归咎于努力工作的工人和勤奋学习的同学身上吗？不能，虽然他们的行为同样值得批判，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压榨工人的老板和把学生当成“学牲”的校领导。

这平白无故被夺走的 50 分钟,本可以用来给同学们好好休息,为第二天的学习做好准备,或是被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的使用,真正的促进每一位同学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然而现在它只能在一片缄默的教室内、在昏昏欲睡的眼皮下、在精神涣散的瞳孔中、在即将干涸的墨迹里虚度了。原本从 6:30 到 9:40 的 3 个多小时的晚自习就已经让同学们精疲力尽了,尤其是最后一节晚自习,往往学习效率已经比较低了,这是很自然的,任谁连续在座位上坐上三个小时也会感

到疲惫,更不要说再加一个小时了。从 6:30 到 10:30 整整 4 个小时的自习,这是严重违背人类的生活习性,毫不遵循科学规律的。长此以往,学生的健康何在? 学习效率何在?自主学习的学风何在?试问这样的制度增长的究竟是成绩,还是抑郁症、近视、痔疮、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抬头看看我们身边的同学,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再如:“中午 1:00——2:00 禁止在校园内自由活动”这一条,更是不可理喻!大家中考报志愿时一中的宣传册上主打的是什么?园林式校园。占地面积多少多少亩设施配备多么多么齐全,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对我一中绝美的校园风景羡慕不已。可如今就连一中自己的学生使用自己的校园的权利都要被剥夺,这难道不是过河拆桥、虚假宣传?至于什么跑操、晚读考试、不让穿短裤之类的,通通都是形式主义,滥而无用!领导们嘴上说是什么为了提高 成绩,为了维护学校形象,实际上就是对学生的服从性测试,摧垮学生的身体,摧残学生的灵魂,把学生一步步驯化成冷血麻木、任人宰割的牲口。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闫培新之心,世人皆知。他就是要摧毁一中赖以生存的根基,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看了一中的“自由自主”。谁会愿意带着能考进一中的分数线选择一中?可惜“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闫培新妄想只需照搬四中模式、衡水模式就能提高成绩,殊不知这是饮鸩止渴,必将自食恶果!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同学们,他们认为我们是懦夫、是胆小鬼、是砧板上的鱼肉、是沉默的羔羊。他们错了!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黑暗中的火炬、是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我们已经受够了一切的压

迫和委屈，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游行！我们要示威！我们学生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带领一中向着未来，向着明天！

《讨闫檄文》

天祸一中,闫贼谍逆。郑州一中应天下势而起,伴共和国而生总八方之学政,汇海内之俊才,巍巍巨校,煌煌圣学,曾有张时今、马自立、朱丹之属帅其政,孙土放、扶云松、张甲之属授其道,于千禧年声振寰宇。奈何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外语实验并起,县高林立,而一中式微。适逢韩松告老,闫贼篡其位,抗皇天之命,逆时代之潮恃其淫威,禁短裤,兴早操,法衡水,一着装,倒行逆施耳。忆往昔,朱丹任自由之学风,恨今朝,闫贼行专制之暴政!呜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何以独夫之骄固,制师生之掣肘?岂不闻古人云:“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耶?遂令学风阴阴,学容惨惨,学心戚戚。是好大喜功之徒,欲求高考之功急于星火;是离心离德之贼,但见学生之恸充耳不闻。久之,校园有倾颓之势,课堂有累卵之危,其间利害,不可不察也。

闫贼其人,四中遗老也,忘校贱俘,至微至陋。既蒙圣恩,更遇良时,掌中原神器,登一中大宝, 本应休养生息,播其仁惠,却行悖逆,祸乱校纲,大造个人崇拜,大兴教师食堂。威逼利诱,结党营私,以致明新楼上,朽木为官,政体处中,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校园化作丘墟,师生饱受涂炭之苦。

> 圣人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闫贼则不然,上悖天道,下弃人伦,北望衡水,南拜郸城。阉自主之善制,域外之天灾,其志污,其行卑,其色厉,其德衰,其贪婪之 性疾于膏肓,愚鄙之心固于顽石。冥顽老贼,跳梁匹夫,颜之厚矣,不死何为?闫贼所为,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自主”二字存耶?既忘自主,即称校贼。吾等世受校恩,十代忠 良,誓死戮此校贼,以拯吾校。今高二高三,扼要诸班,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声动天地!苟以吾等三千众,何惧闫贼一匹夫!

这些内容得到了学生们的迅速传播。墙内外都有一些学生转发。运动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到了这样的程度：过去的郑州一中过去学子们参与进了这次运动，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在国内各高校张贴有关郑州一中运动的内容，除上述内容外还有《郑州一中人权宣言》等文章，他们甚至在海外其他国家的高校也有学生张贴了这样的内容并传播到互联网上。这些活动进而把郑州一中的运动发展到更广阔的范围内，并发展出了政治性。据传在郑州一中张贴宣言的是一名已经就读于北大的学生，目前在返回学校的高铁上遭到了警察的追查。但在海外各各校的原郑州一中学子纷纷在自己学校张贴《宣言》声援学弟学妹，而使我国相关机关应接不暇。这使得一场地方的学生运动事件发展为了多少带有一些全国影响和国际影响色彩的地方运动，正是这种色彩使得地方官僚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而不利于他们封锁运动信息和武力镇压运动。从后来的河南教育局的行动和地方上其他学校的遵守不一的情况就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各个具体的学生斗争的看法是不同的，立场是有矛盾的，而学生们这次较好的利用了起来（虽然是不自觉的利用到了）。

9 月 24 日，郑州一中表白墙宣布，他代表郑州一中学生们的利益与校方联系无果，故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致学校的一封信》。 致学校的一封信

尊敬的校各级领导、老师: 我是郑州一中表白墙运营团队的一位老运营,很荣幸受邀代表团队向校方致信。作为郑州一中毕业生,看到学校发生的变故,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郑州一中有着七十余年的自主史,从建校之初提出“自学辅导教学法”,到 1960 年代数学教研组的“学生数学竞赛擂台”; 从 1980 年代以培养新世纪人才为己任,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和人格塑造,到 1990 年代高扬素质教育的大旗;从本世纪之初逐渐 形成的以保护学生积极性,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为基础,以“独立、自主精神”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个性化发展为趋势,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目标的课程教学体系,到近十年来开展的“主体课堂”、“自习课堂”、“卓越课堂”建设等系列彰显自主精神的教学改革活动,引导学生热爱学习,倡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贯穿一中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未间断。

以上这段话出自郑州一中官方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8 月 12 日的一篇文章。我们几十年引以为傲的自主之风,现在似乎正一点点消失。

老校长在 2014 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曾说: “ZYZ 先生的精神就是自主的精神。ZYZ 先生不靠造物主,用锤头和钢钎雕琢着自我。郑州一中的主体教育思想让学子们摆脱了那种监狱式的教育,榨汁机式的教育,过度强调秩序化,封闭化的教育。学

子们对未来的想像力,久已泯灭的好奇心,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异想天开的创造欲望,在主体课堂、自习课堂、卓越课堂三种课 堂中得到了修复和茁壮成长。

只可惜我们没能身处在这样的校园中,体会那自我雕琢的成长。但庆幸,我们的三年一中生活仍然是充实、快乐的。

现阶段表白墙运营团队在内部管理要求下十分注意所发内容的分寸、影响,我们不去强调那些宣言,但我们要代表学生, 乃至底层教师向校方、向社会呐喊,呼唤,我们也很欣慰运营者的选材能引起巨大共鸣。是啊,一中是我们数十年来万千学子的家,我们都希望这个家发展壮大,让我们到哪里都能以家为荣, 让我们随时都能回到这个熟悉的家。

事件发酵至此,我们认为校方与学生、老师间需要有一次甚至多次公开透明的交流,让同学、老师们理性、真实的想法摆上台面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校园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下面是我们团队对交流做出的框架性提议:

主持人:学生会主席、学生工作主管副校长

参会人员:闫培新校长、校党委书记、学生工作主管副校长、教学主管副校长、生活后勤主管副校长、政体处主任(2名)、教务处主任、团委负责人、年级主任(3 名)、班主任代表(9 名)、一线教师代表(不少于 6 名)、学生会干部代表(5名)、社团等学生组织干部代表(5 名)、学生代表(不少于 55名,每班至少一名,且由班级学生民主推选,不得由班主任指定)

会议议题:学生着装管理及是否订购校服(此项议题建议部分限制贾艳彬主任发言);洗澡时间;晚上是否增加晚自习及其

时长;中午时段校园管理及出入校管理;统一体育活动的选择;寝室管理;学生作息时间表及各时段安排;周末时间安排;教学教研;学生社团管理、建立、取缔等(此项议题建议部分限制宋丽老师发言)

后续举措:将学生管理有关决议草案提请学生代表大会审议(参会人数至少为学生人数5%);将教育教学有关决议草案提请教师代表大会审议;将学生社团等组织有关决议草案提请社团管 理大会审议(在校仍有社团成员的已取缔社团仍应参会);

其他事项:所有会议应当全程录像,并将录像向全体在校生乃至于社会公开;最终通过的决议应当在全校范围公开;所有投票应为不记名投票。

我们每位一中人都希望看到学校能逐渐变好,不忘初心,继续传承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此致。

谨代表 郑州一中全体学子 郑州一中表白墙运营团队 2023 年 9 月 23 日夜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但学生们也迫使学校进行了许多退步。

关于郑州一中：

> 多谢各位关注，学校的大量改革暂时被迫停止，算是达到预期的目的警察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介入迹象，所有转发的人空间都被封了，甚至有人被封号了，但也没有进一步的人员损失。
>
> 学校坚称一切都是谣言（实际上在多项会议上，这些改革都被提到过），但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
>
> 教师方面进行了集体的训话，但也有一些开明的老师对此模棱两可。
>
>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并且郑州一中的学生们还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八天假期，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胜利。郑州一中原有的“改革”（其实就是进一步压迫学生的政策）被终止，并且还争取到了八天的额外假期，对于学生们来说也许算意外之喜了，因为郑州一中的学生们一开始的运动目标中并没 有直接包含假期。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在这场斗争中，假期是官僚们用来收买和瓦解本次学生运动的策略，因为郑州一中的学生们还提出了一些组织上和政治性的要求，比如谈判里要求学校默认的“学生代表大会”和各种学生社团的权利（包括被取缔）的。这些要求是学校难以接受的，所以他们没有直接答复这一点，虽然他们也事实的停止了“改革”，但却进一步的直接采取了用经济利益来收买学生，这是想用八天假期来让参与本次运动的学生们膨胀起来，进而放弃把原有的运动进行到底。的确也是这样，在得到学校的这些让步后，学生们很快的停止了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结果是胜利的，但却是不彻底的。

我们要指出的是，学生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组织保存下来，并把它锻造为学生们今后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学校等敌人做长期斗争的工具，并要保证它的继承性。否则今后学生们今天得到的权利明天就会丢失，敌人会比今天准备得更好来对付我们。这次斗争最宝贵的成果，就是学生们的团结、现实的组织，我们应该迫使敌人承认我们的组织，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要事实上的让他继续存在并能够坚实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在一切时候都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学生的学习条件在未来能得到更好的改善（这种改善只能够通过有组织的斗争来争取的），并在未来把斗争进行到底。从政治和组织目的来说，郑州一中的学生们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他们只是收获到了一些预料之外的经济利益，他们被敌人撤退时丢下来的黄金给吸引了注意力，而忘记了战斗的最高目标。这反映出了本次运动中，学生的组织意识、政治意识的薄弱，学生们还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经济主义的斗争路线上。

但无论怎么说，郑州一中学生们的斗争都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他们战胜了敌人，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向他们的其他学生兄弟们宣告了斗争的重要性。使我们清楚看到：一旦我们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一旦把我们的斗争发展到其他更广阔的社会群众中去、一旦把原本孤立的斗争宣传出去、一旦适当的转向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一旦足够的利用起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我们是完全可以获取胜利的。并且接下来的还有许多运动都将证明这一点。

三.运动的高潮

郑州一中在 24 日的胜利宣告着九十学运的高潮的到来。他们在没有刻意为了假期权益的情况下做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并且附带一定的政治性的斗争取得了成功，还意外的收获了假期的利益。这为其他所有还需要为实现合法假期而斗争的学生形成了榜样，他们也试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来争取到类似的成果。

无独有偶。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在今年九月更换了新校长和党委书记。但是，九江一中的新党委书记在上任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在运动会时强制高三学生在班自习、考试，降低老师工资等。而也正因为这些事情，全校师生都对新的领导层不满。在 9.27 日传出，九江一中的学生写下了一篇叫《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政治性更浓，并且复印件开始在校内流传，在学校学生的一些 QQ 群里也开始传播。但学生们没有掌握好平衡，由于政治性过头了，使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官僚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的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学生，直到大约上周四、周五的时候，有警察直接来学校带走了和此事有关的部分学生。据传有省纪委的人，警察询问的问题甚至包括“白纸运动”这种事情，并且威胁这些学生不得在任何平台传播这件事。可见，其他机关把这场运动也纳入他们的管辖范围。这场运动中的学生们就没有很好的利用好政治性和经济斗争的平衡，也就没有利用好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且也没有足够的组织起来像郑州一中的学生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以及把运动迅速传播到社会其他群体那去极大的扩大运动影响。随着主要的活动者被抓，而其他学生还没有

有组织的运动起来，影响还没有扩散开来时，运动就被终止了。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最新的相关消息。

但失败只是一时的。9 月 28 日，山东菏泽一中学生全体抗议。原本“9 月 28–10.1 日放假，9.30–10.1 自愿返校”的规定，部分班级却搞成了强制返校。学生们挂起横幅要求“誓死抗议，还我假期”，展开了斗争。于是目前学校做出妥协，时十一正常放假。但显然这和郑州一中学生们所争取到的八天假期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10 月 1 日，山西大同一中，学生自办的官方账号“求真号角”发表文章：《大同一中的假期，请等等你的学生》。大同的学生们呼吁学校按法定日期给学生放假，并号召同学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质问大同一中的领导们是否忘记了教育的初衷，只关注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 健康和幸福。学生们提出“难道只有高分才是教育的唯一标准吗？”。按照全国法定节假日统一安排，中秋国庆应该连休 8 天，但是大同一中以“专家讲座”为由要求学生在 4 日“自愿”返校参加讲座，实为开学上课。10 月 2 日，大同一中学生斗争成功，学校通知暂停自主学习，延迟开学。

同时，类似的运动在陕西省也激烈的发展了起来。在中秋前夕，西安一高中的学生们集体喊楼要求放假，并聚集在教学楼下和学校领导交涉。西安许多的高中学生们掀起要求放假的学生运动。有学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全市高中生还自行组建 QQ 群联络，集体举报学校不按 国家要求的法定节假日放假。据称，西安目前已经有 61 所学校因学生的抗争而延迟开学。有学生们提出了《八十五条论纲》的大字报。有学生们也开始集中的打电话和集中举报。但根据有网友反映，西安教委已经

开始陆续将打举报电话的学生号码泄露给被举报的学校，供学校内部排查。在这一场斗争中，西安教委明显和学生们的直接斗争敌人勾结了起来。但这拦不住大规模学生们的运动，学生们组建起跨学校的联系来集体维权，61 校的学生参与了这场活动，对各个学校和教育局的上级官僚们形成了更大压力，由于他们的斗争，西安市多 区学生已经停课放假（雁塔区还不确定）。

在几乎同一时间，陕西榆林市的学生们也爆发了抗议运动，学生们贴出了大字报，要求放假，经过了复杂斗争，学生们也获得了胜利。这场运动被称为“九二七”运动。

> 2023 年 9 月 27 日下午 6：43 分晚自习前，榆林中学高二学生因忍受不了刘志华（校长)的残酷剥削，中秋国庆 8 天假被缩减成 2 天半，因而愤而起之，开始了震惊全校的游行起义。在 50 分前，高二只有寥寥几个班级高喊放假，后因其他班级加入与高一的声援，声势逐渐扩大，达到了第一次小高潮，随后高一年级被寻声而至的班主任镇压，仅剩高二孤立无援，在 54 分左右被镇压，可起义并未结束，57 分左右，高三声援起义，联合高二开始游行，从高三教学楼，高二教学楼起义逐渐扩大其规模，再游行至艺术楼时，一支分支被德育处主任，副校长，以及几位班主任镇压，大部队在 7：00 被驱散，几乎同时高二楼上再燃星火，擂鼓抗议，又遭镇压，而分布在各地的起义义士也相继被镇压，起义走向低估， 7 点 13 分，最后一股势力正负隅顽抗，又为起义续命 4 分钟，7 点 17 分，起义被完全镇压。

之后，起义主谋以及透露放假消息的老师均被处分，起义未能撼动刘之统治，榆中学生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高一（20）班的吕某某因带领高一一楼起义被遣回，高二年级被权威制裁，晚辅后高二和高一班级试图再次抗议，却不幸失败，但革命就像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起义随被暂时镇压，但义士们的心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校领导也被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绝不希望这样败坏榆中的名声，在这件事情上学校必须给出合理的安排，并且不能只安抚高二学生，高一学生也必须讨个说法，现在，虽然高二学生看起来风平浪静，但他们对假期的期望迟早会压制不住，从而再次发动骚乱，离通知放假的时间只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学校若不能不给高一高二学生一个说法的话，120 周年也 得吹了，哪怕现在，他们制裁了一部分学生，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正义是杀不完的”，所以此时此刻，高一高二学生看似不再发生动静，但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现在就看学校怎么解决了！

—榆林中学学生大字报

“九二七”运动最终获得了胜利，达到了争取合法假期权利的目的。并且还有事后还有学生更进一步的总结了这场运动全部过程。

21 世纪 20 年代,榆林市十年几乎未出清北人才,校方急于展示已校荣誉,决策方向出现巨大偏差。21 世纪上半叶,榆中校方因决策不妥,改国庆假为两天半,以此举办其 120 年校庆,长期的无假期决策在基层引起不满,使得师生资源疲惫匮乏,急

于长假的调缓与休整,运动前后基层学生组织运动,领导者踊跃,基层团结一心。

一.局部运动

2023 年 9 月 26 日夜,基层劳苦学生发生局部运动(尤指 25 届, 现高二),于晚自习在长廊张贴游行标语,意为如不放假,则集体自刎。榆中管理阶层立即没收其标语。2023 年 9 月 27 日午,基层学生于校内垃圾桶平面用粉笔书写对国庆假期过短的不满。

二.全面运动

2023 年 9 月 27 日晚,榆中九二七运动全面爆发。运动主体以 25 届、24 届基层学生为主体,26 届学生为铺体,展开全校范围内游行示威运动。

25.24 届学生高喊口号,妄图以气势压垮领导错误决策。以口号为主体,关闭长廊灯源,高举游行标语、开启自行车灯光爆闪耀楼为辅 体展开运动,后被校级领导者勉强镇压。约十八时三十五分至九时二十分, 为时时长约四十五分钟,后其主要领导人与学校统治阶级人员镇压,九二七运动以暂时失败告终。

之后,学生通过信息技术在全网发布榆林中学不正当的制度,扩大了消息的传播量,阵地山学校转为网络。

其中,部分同学的视频受到老师威胁,但他们不畏强权,勇敢反抗,向教育局检举,书写了壮丽的篇章,铸就了榆中精神。

2023 年 9 月 29 日,高一高二年级部发出通告,修改假期时间, 定为 9.29–10.6,高三年级部修改放假时间为9.29–10.1.2023 年 9 月 30 日,高三年级再次修改放假时间,自此,榆林中学全校师生放假时间为 9.29–10.6。此次运动落下帷幕。

三.榆中精神

九,二七运动是榆中校史上的又一次学生反抗运动,继承了革命老校的精神,传承星火榆中的故事,体现了学生永不放弃的凝聚力,反抗了榆中，上级的封建统治,开创了榆中又一历史性贡献。

榆中精神:自由,民主,创新,团结， 自由是榆中学子的共同追求 民主是榆中学子的基本准则 创新是榆中学子的重要手段 团结是榆中学子的内在动力

榆中精神始终是维系榆中全体学子的牢固精神纽带,支撑榆中学子生存、发展的坚定精神支柱,推动榆中走向繁荣的强大精神动力,无论什么时期,榆中精神都是动员和鼓舞榆中学子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榆中学子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信仰!

–榆林学生总结

榆林学生们的总结让赋予了运动新的意义，它使得斗争的精神得以更完整、更有继承性的传承了下去，使未来的榆林学生们更有发展新的斗争的精神依据。但不足的是，榆林学生们在这里并没有指出用作斗争的组织的意义，服务于学生利益的斗争

性组织的完整和继承性发展 是更现实、更直接的力量。榆林学生们比九江、大同、西安的学生们更进了一步总结了运动，并多少强调了继承性，可惜还不是从现实的组织方面来认识的。如果说郑州一中的学生们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要求学校承认这一点却因为学校的大量让步而一时满足眼前利益而丢掉了的话，榆林的学生们是有了一些萌芽的意识，却而没有去争取到本可以争取到的内容，至于九江、大同、西安的学生们在本次学运中还没有体现这样的萌芽的意识。我们要指出的是，没有这种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未来进行更广泛和更彻底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甚至新的运动也要从今天这样没有组织的阶段重新开始，但我们的敌人不会一直蠢到对学生们的斗争毫无准备的阶段，我们必须要更完整保留每一次具体斗争的最重要的果实——现实的斗争性组织。

除了这些学生运动之外，整个河南学生们的斗争还在发展。除郑州外，有其他地区的河南学生也阐述了他们的遭遇：

> 一名河南高中生的来信
>
> 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最真实的河南高中生活
>
> 我来自于河南省一个小县城,今年很荣幸考上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简称一高。学校的历史很长久了,我们父辈那时候上高中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去,后来县城里面又建了几所高中,但是教学资源都没有这一所好,也没有这一所生源素质好
>
> 因为要县政府要求升学率,所以我们这所学校抓的很紧,我们假期以及空闲时间都是很少的,和那些投稿的比都是小巫见

大巫:

我们学校没有双休日,同时也不是像别的高中 一样可能两个或者三个星期过一次周末。我们学校是每四个星期放一次假,四个星期内没有任何假期。要是非要说有,那只能说是每周周日不上早自习以及每个周日下午可以放两个小时的假,ps:这个假期其实是给住寝室的学生一些时间去洗澡理发或者是去校园外找家长 我们这里学校生活的时间是:

【早自习】:6:05 之前到班级里开始读书 (迟到会有人记名扣班级积分) 【上午】:7:10 下早自习,去食堂吃饭,必须在二十分钟内吃完(吃饭太慢会被扣班级积分) 【第一节课】7:50 上课 8:30 下课 【第二季课】8:40 上课 9:20 下课 【大课间】:跑操(如果下雨延迟十分钟下课) 【第三节课】与【第四节课】的课间只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第五节课】:11:20 上课 12:00 下课 【午饭】:三十分钟(吃饭太慢会被扣班级积分) 【中午】:从 12:40 开始到 1:20 学习 之后可 以在下午第一节课之前睡觉 但是学习期间任 何 人都不能睡觉 【下午】:共五节课,每节课课间都是五分钟 的休息时间 【晚饭】:6:00 到 6:30 (吃饭太慢会被扣 班级积分) 【晚自习】四节课从 6:50 开始,6:30 到 6:50 为背书时间 【放学】:高三 10:2 高一高二为 10:00

我们寒假只有两个星期,而暑假是在考完期末，考试之后会有一个名义上上自愿参加的补习，再上 20 天的课,因此暑假只比寒假多放一天

从“九二大起义”到“郑州一中学生运动”，河南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运动，这些运动还带上了一定的政治性。在这些运动之后，以“毛杰”为代表的河南教育厅要求维护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维护效果相比以前到底起到了多少的改善作用，但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他们承诺要维护后依然还有许多河南学校的学生们没有享受到合法假期。他们仍然要用现实的斗争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部分河南学生们用斗争维护了全河南学生的合法放假权益。

10 月 1 日，洛阳市各高中没有按河南省教育厅统一规定的八天假期放假。有学生反映洛阳多个高中，存在国庆克扣假期的问题，八天只放了四天或五天。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根据从前的国庆假期往往只有一两天的情况就能判断出，这次给洛阳学生放了四五天已经是“九二大 起义”和“郑州一中学生运动”等斗争的成果了。但在维护学生八天假期的层面上，洛阳教育局不作为、学生的举报无用，没有起到维护学生合法假期利益的作用，他们甚至也反过头来像西安教委一开始的做法一样，把个别举报的学生的信息私下的透露给学校，让他们学校去打击那些学生。

这时，洛阳的高中生们已经开始自发组成维权联盟开始着手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假期权益。他们建立了“洛阳市学生捍卫法定权益维权联盟”的组织来维护权益，用集中打电话上诉、集中举报等方式联系各级机关来维护权益。当学生们集体的行动起来，学校和教育局处理个 别带头学生的行为就不够用了，面对群众力量的洪流，他们力量顿时显得不足。洛阳的学生们在组织层面比榆林的学生们更进了一步，形成了大规模的地区性学运组织，但这里还没有提出要继续保留、巩固和发展这种组织的意识，我们希望洛阳的学生们一定要保留住这个最

重要的成果，一定不能让它在中途或运动之后被解散掉或实质上的被破坏掉了。洛阳学生尝试了把斗争传播到墙外领域的活动，造成了更广泛一些的影响，但这些活动还是个别学生进行的，而不是有组织的。

10 月 2 日，洛阳除六所重点高中外其余学校均通知延迟开学，早上十点左右又有部分学校临时通知学生自愿返校。至此，洛阳学生们的本次斗争已经基本获得了胜利。

但从洛阳一名学生对墙外新闻人士留言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问题。

> 李老师，我是洛阳一名高二学生，对于本事件做一些补充。据说今年是因为新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毛杰下发文件要求必须放假八天（这可能是近 30 年来河南第 1 个完整的国庆假期）。我询问我在河南其他地市的同学都是 8 天。
>
> 洛阳市放假前都是要求十月一日或二日返校。十月一日下属县区的高中和部分市区非重点学校发通知延迟开学。
>
> 市区六所省示范高中不延迟，包括前面其他提到的洛阳一高，洛阳理高（这六所学校一般开学和放假时间相近）。
>
> 今早十点，已通知延迟的洛阳四高反转，要求自愿返校。不知道其他学校是否反转。

其他学校的学生，哪怕是河南的中学的学生，仍然把各地学校对合法假期的更大程度落实主要归功于毛杰厅长。这些学生们

做了错误的归因，殊不知这是他们其他学生兄弟们的斗争的成果。就算毛杰厅长是一个好官，但在毛杰先生下发文件之前和之后都有不间断的学生运动，使各校官僚资产阶级收敛的主要原因也只能是各地激烈的学生运动，毛杰先生承诺维护学生合法假期权益和下发文件前河南学生有“九二大起义”和“郑州一中学生运动”来争取合法假期，下发文件后有“洛阳学生运动”来落实假期，虽然我们也希望像毛杰先生一样的人多维护一下群众的利益，但可见的是如果没有学生们的运动，就算再来十个“毛杰”先生的力量也还是不够用的。各地官僚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本性，他们的普遍打算只能是竭尽一切办法来获取利益，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普遍的状态，个别官僚的行为从来不能根本解决他们整个阶级自身的问题。那些学校的资产阶级们的打算无非是这样的：

> “现在经济越来越危机，这是获取利益和政绩的困难时期，如果学生们的学习条件不变，我们就得不到从前那么多的利润和政绩……可是少得利益，我们不干，我们不可能乖乖遵守全部法律，我们还要和其他学校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多找漏洞，应该多榨一榨学生，让他们来为我们吃社会危机的苦头……不过这件小事可不能干得太马虎，要干得巧妙些，使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的幼稚学生们摸不清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什么套路……要是一下子就触 动全体学生、彻底的得罪他们，他们马上就会闹起来，那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所以我们先得哄住学生，要试探他们的底线，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慢加深压榨，还要分化他们，要防止学生们组织起来、防止学生们团结起来，这样别的学生也就跑不了了……对付这些奴才， 我们从来不会客气，又何必客气呢？……必要时我们可以让步一下分化他们，就像郑州一中那样，让他们放

> 弃斗争到底，用经济利益诱使他们放弃现实的组织和政治利益，这样以便于我们以后反攻回去……但最好还是要让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件事的具体情况，让他们都去感恩和祈求毛杰先生吧，这样他们就会忘记斗争的重要性了……我们肯定不会乖乖遵守毛杰先生的说辞的，她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她也是官僚中的一员”。

因此，我们不要理睬他们说学校很困难等种种借口：对他们，这不过是使他们少得一些利益；对学生，就是要学生放弃斗争，就是要学生继续忍受不断加深的非人的折磨和压迫，制造更多的学生的不健康发展乃至死亡。难道这两者能够相提并论吗？以上所有事实都只能证明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主要靠群众的斗争；学生的斗争也必须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每一个具体的、正确的斗争都应该进行彻底，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斗争的影响扩散开来，要使斗争带上政治性，否则我们的斗争是难以获得较彻底的胜利的。

四.运动的问题和运动的未来

我们已经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对于此事的看法，我国墙内和墙外宣传完全不同。墙外的一些进步人士大致能知道是学生斗争的原因，但是进行深入研究还较少。河南的学生们很大程度的享受到了合法假期，但墙内还有许多不知情的群众把主要原因归咎为个别官僚好，因为有个别官僚承认了全河南学生的 八天假期，并下发了文件。河南

学生们斗争的作用在宣传领域中（特别是在墙内领域）就被缩小乃至于歪曲了。这明明是学生们靠自己的勇敢斗争争取到的成果，却被说成是有好官的结果。学生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团结斗争的力量，而把自身的力量归咎于别人。这是只看到了一些能够展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因为斗争事件不能广泛的传播开来），而让个别官僚得了好处，实际上还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路线给误导了，把运动的对其他群体的影响一定上扭转为了改良主义的（即更相信好官而不是斗争）。我们把和自己同样命运的兄弟们的勇敢 斗争的结果说成是我们敌人好心的结果，这是经济主义的、乃至于投降主义的归因，这是有害于运动的扩大，有害于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我们自己和更多兄弟们（不单是学生）的更彻底的利益（政治利益）的。虽然“九十学运”已经宣告我国学生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 段，但这本质上还是经济斗争范围内的阶段，还是学生运动范围内的斗争，如果不能克服那种错误的归因等问题，我国各种社会运动的联合，我国各种社会群体的团结、更广泛的有组织的斗争、更彻底的胜利和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扩大斗争，要让其他群众知道真相，知道斗争的作用，知道组织和团结起来的作用。我们要鼓励进行正确的、有组织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逐步的发展为政治斗争。

就河南中学进行八天放假事情本身来说，不能只是全归于郑州一中的学生斗争一役，还有这段时间许多场学生斗争积累的结果。包括之前的“九二大起义”和一些河南小县城的学生斗争，以及郑州一中学生斗争后许多其他地区学生们的斗争。这是学生们整体斗争的结果，而不只是个别学生、个别地区学生斗争的结果。如果学生们没有这次多少带有整体性的斗争，我们的学生是争取不到这样的结果的，河南的官僚们是不可能

整体让步的。所以我们的学生也应该整体的团结和组织起来，我们要塑造整个地区、甚至全国学生的整体的、团体的斗争意识和斗争组织，并和其他社会群众团结起来。

除此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在“郑州一中学生运动”中，学生们从短裙短裤事件出发开始进行了有组织的斗争，并把斗争迅速的发展出去，并开始带有了政治性。他们把握好了经济性和政治性在当时条件下的平衡。郑州一中学生们迅速的得到他们他们一开始斗争时没有专门设想到的让步—即八天的假期，这种八天假期在其他学校那还是要通过特别艰苦的斗争才能获取到的（哪怕是有了郑州一中运动的前车之鉴和毛杰的文件），郑州一中的官僚们害怕了这场运动中学生们提出的其他具体的政治内容，他们想分化学生让学生放弃把目前的运动进行到底或扩大运动的行动，他们不想承认学生们的组织，所以他们抛下了黄金撤退，让郑州一中的学生们忘记了继续战斗而去捡黄金。所以我们之后的运动应该特别注意这些问题，要把每一个具体的运动都带有合适的、具体的政治斗争性，可以从对付政治斗争及每一个具体斗争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发展我们的政治斗争，并且要把我们自己的、有继承性的、用作斗争的组织坚定的巩固和发展起来，用于未来我们进行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彻底的斗争，并且下一次一定不能再犯为了捡黄金而忘记原有的战斗的错误。

在政治斗争威胁前面，官僚资产阶级们一下子就轻易放弃了一大堆经济利益，这是单纯的经济斗争很难以达到的，从洛阳学生们的斗争和陕西学生们的斗争中就能看出来这一点。所以就从经济利益来说，也应该进行一定的政治斗争；但我们根本的利益始终是要靠政治斗争来 达到的，学生的彻底解放是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斗争逐步的发展

到要求推翻整个与我们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步，学生们的彻底解放就始终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政治性在整个运动中的具体平衡问题，以及更多运动的细节操作问题上，我们也要更多的学习“郑州一中学生运动”，避免犯了江西九江一中学生们的错误。如果政治性超越了目前各个斗争中的条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会有害的。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群众的政治意识还有所欠缺的今天，我们需要利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而避免过早的和一大堆敌人直接作战，利用各个具体斗争中与我们敌对的阶级的政治性来决定我们每一个斗争中的具体政治性的平衡。所以我们要利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进行一定的带有政治性的斗争，确保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我们的敌人都是比我们弱小的、敌人是整体较不团结的，在这样的一个个具体斗争不断胜利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我们的力量和组织，并逐步的提高学生们的政治性。

但不管怎么说，伟大的“九十学运”扫清了多来年我国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和低水平发展的阴霾，它势必要指引着之后的学生运动要以和它同样的以及更高的高度上进行。这是斗争的胜利！

同时，我们只需要仔细观察“九十学运”也能发现出以上指出的各种问题和有待改进的地方。“九十学运”只是我国学生运动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九十学运”的成果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普及，我们之后要普及它。这就要求我国所有的学生们都要像“九十学运”中踊跃斗争的学生们学习，要通过自己的勇敢斗争来维护起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建立起学生们自己的有继承性的斗争组织。并且我们还要在普及“九十学运”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学生运 动和斗争组织。“九十学运”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学生运动的一些规律，我国学生的假期问题、学校的各种政策问题和压迫行为都是成为学生运动发展的规律，有这些问题的地方就有条件产生学生的斗争，这些规律是我国的进步学生们、我国的革命分子们一定要利用起来的，他将成为我们下一个时期学生组织的日常的任务（这已经是直接的斗争任务了）。我们要尽量在每一场斗争开始之前就预料到斗争，并且能够提前准备好斗争，建立坚强的组织，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方法来完成斗争并不断的、继承性的发展我们的力量。

并且这次“九十学运”的根基还是普遍的建立在经济斗争上的，具体来说是建立在学生们对这八天合法假期的需求上的，这个矛盾也就普遍的爆发在了这八天假期前和八天假期中。这就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孤立的来看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揭示了学生们的经济斗争的规律；但联系起来看，就告诉了我们扩大和发扬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学生们的政治斗争的规律。郑州一中的学生们一开始的运动目的并不是为了这八天假期，但他们的斗争却造成了更大影响和更大的意义，这也是值得吸取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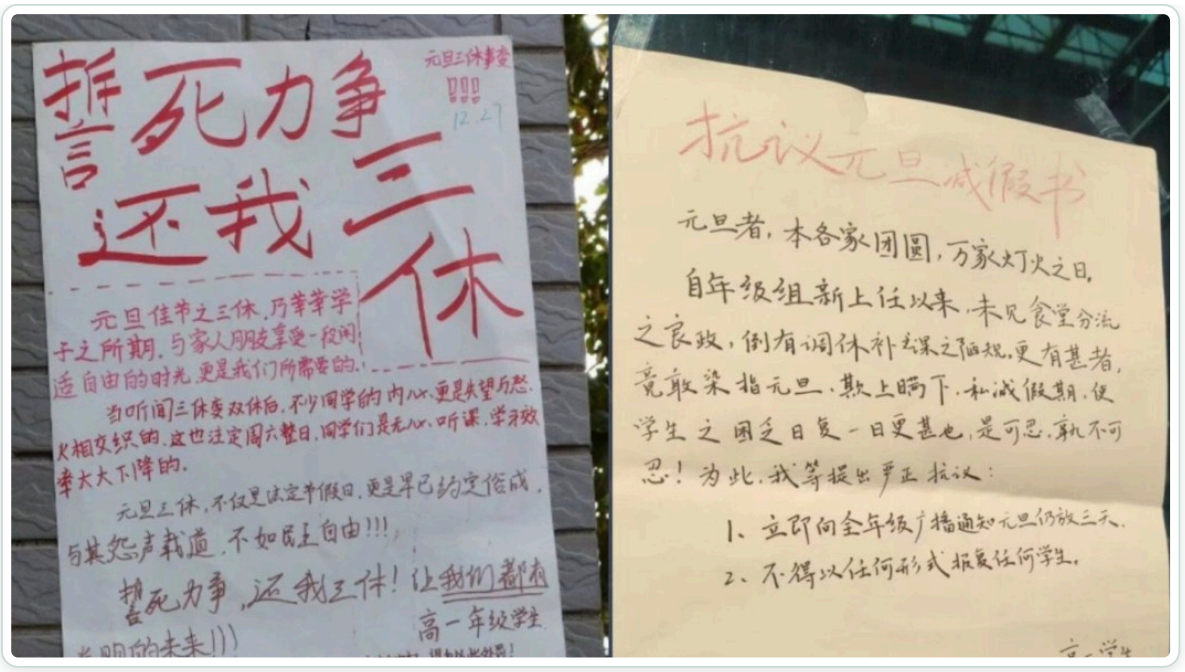
拾起前者的骸骨，是为了继承过去的精神和埋葬过去的不足。只要我们之后做好了“九十学运”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任务，我们就能进行更多、更彻底和更有意义的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我国社会运动发展到新的高度，并更大程度上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复苏。

长沙学生们的斗争

>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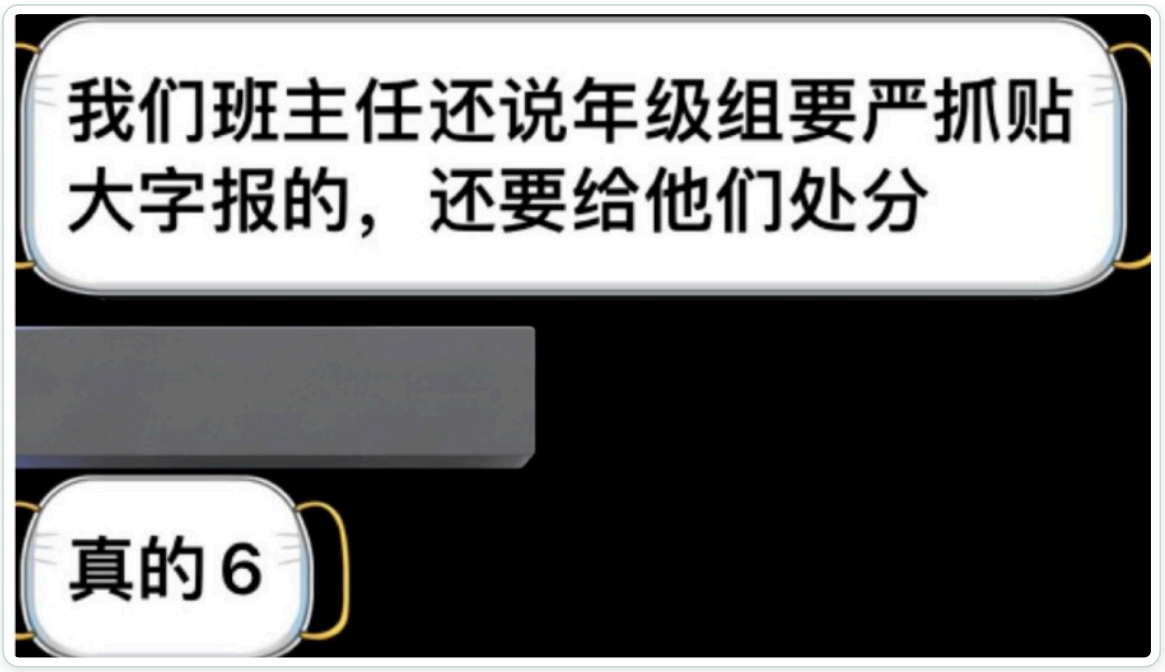
12 月 27 日，长沙市某省级示范高中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据悉，因校方将原定的三天元旦假期突然缩减为两天，引发了学生及部分老师的不满。当天，学生们开始在食堂、年级办公室张贴并传阅抗议檄文和大字报，并进而演变成自发聚集喊楼行动，喊出“誓死力争，还我三休”等口号。最终学生们抗议成功，校方恢复了三天假期。

这是学生们打出的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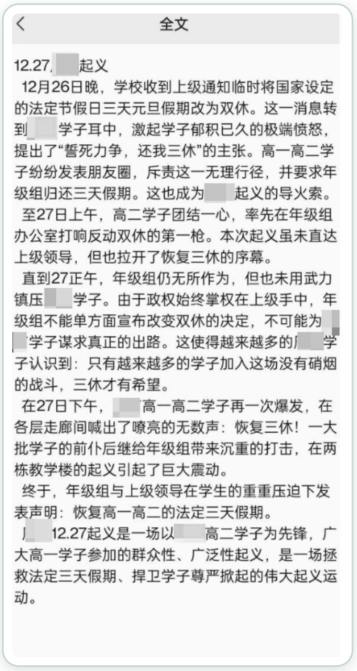




据传，学校的官僚们也曾试图处理学生：



但不管结局如何，学生聚集起来的力量最终还是让官僚们退步了。因为学生们的团结他们也 不敢处理学生，并且最终承认了学生们的合法三休权益。学生们事后总结了这场斗争：



全文

12.27,[redacted]起义

12月26日晚，学校收到上级通知临时将国家设定的法定节假日三天元旦假期改为双休。这一消息转到[redacted]学子耳中，激起学子郁积已久的极端愤怒，提出了"誓死力争，还我三休"的主张。高一高二学子纷纷发表朋友圈，斥责这一无理行径，并要求年级组归还三天假期。这也成为[redacted]起义的导火索。

至27日上午，高二学子团结一心，率先在年级组办公室打响反动双休的第一枪。本次起义虽未直达上级领导，但也拉开了恢复三休的序幕。

直到27正午，年级组仍无所作为，但也未用武力镇压[redacted]学子。由于政权始终掌权在上级手中，年级组不能单方面宣布改变双休的决定，不可能为[redacted]学子谋求真正的出路。这使得越来越多的[redacted]学子认识到：只有越来越多的学子加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三休才有希望。

在27日下午，[redacted]高一高二学子再一次爆发，在各层走廊间喊出了嘹亮的无数声：恢复三休！一大批学子的前仆后继给年级组带来沉重的打击，在两栋教学楼的起义引起了巨大震动。

终于，年级组与上级领导在学生的重重压迫下发表声明：恢复高一高二的法定三天假期。

[redacted]12.27起义是一场以[redacted]高二学子为先锋，广大高一学子参加的群众性、广泛性起义，是一场拯救法定三天假期、捍卫学子尊严掀起的伟大起义运动。

学生们意识到了团结和斗争的作用，他们用大字报等形式把学生的愤怒集中的表现了出来并凝聚为共同的行动。因此，这里的大字报完全起到了集中表述阶级情绪、阶级利益和集中阶级

行动作用。同时，大字报等行为和运动本身也推动了整个学生的进步，使原本茫然服从学校秩序和服务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学生们开始明确的把自身和学校官僚们对立了起来，在自身集体利益和学校官僚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

同时这也突出的表明了进步力量的作用，进步的学生有理由带领整个学生群体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然，斗争胜利是以一定的群众关系和现实条件为基础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长沙此学校的学生们团结起来勇敢的为维护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时，学校官僚们的力量就显得远远不足了。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单个学校本身的范围内所进行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是小范围的经济斗争)时，当这个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时，就很容易战胜学 校官僚这个弱小的敌人。学校官僚只是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只是其中一个特殊组成阶层。如果学生们只是单独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那么斗争的胜利是很容易的。而如果扩大斗争目的，把它发展的更广阔的范围内时，我们就能发现需要和更广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了，而这时单独靠一些学生们的力量就不足了。

所以这场斗争仍然是经济斗争的性质的。但我国的现状是，即使是经济斗争也是很不足的，及时是经济斗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个斗争广泛的使学生们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及使得学生组织起来。所以，现在学生们的一切阶级斗争我们都应该支持，特别是这种完全可以争取到胜利的斗争。

学生们现在容易争取到斗争胜利的这种的经济斗争所能发展的极限就是包括全国所有学生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斗争，我们应该

支持和推动这个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又要同时逐步的提高学生们的政治性（这就要建立学生中的革命政治组织），使自觉的政治性慢慢领导自发性（政治组织逐步的领导广泛的学生组织进行运动），使他们逐步的和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逐步的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使学生的斗争组织成为未来整个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才能把学生运动切实的发展起来，也能把学生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并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

我们要在发展一切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把一切不自觉、不彻底的阶级斗争逐步的转变为自觉的和彻底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趋势，也是“九十学运”所要指明的内容之一。从人类文明史以来，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从当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史来看，这次斗争是对“九十学运”延续，它的历史目的在于完成“九十学运”所指出那些内容。

> 但不管怎么说，伟大的“九十学运”扫清了多来年我国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和低水平发展的阴霾，它势必要指引着之后的学生运动要以和它同样的以及更高的高度上进行。这是斗争的胜利！
>
> 同时，我们只需要仔细观察“九十学运”也能发现出以上指出的各种问题和有待改进的地方。“九十学运”只是我国学生运动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九十学运”的成果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普及，我们之后要普及它。这就要求我国所有的学生们都要像“九十学运”中踊跃斗争的学生们学习，要通过

> 自己的勇敢斗争来维护起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建立起学生们自己的有继承性的斗争组织。并且我们还要在普及“九十学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的学生运动和斗争组织。“九十学运”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学生运动的一些规律，我国学生的假期问题、学校的各种政策问题和压迫行为都是成为学生运动发展的规律，有这些问题的地方就有条件产生学生的斗争，这些规律是我国的进步学生们、我国的革命分子们一定要利用起来的，他将成为我们下一个时期学生组织的日常的任务（这已经是直接的斗争任务了）。我们要尽量在每一场斗争开始之前就预料到斗争，并且能够提前准备好斗争,建立坚强的组织，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方法来完成斗争并不断的、继承性的发展我们的力量。
>
> 拾起前者的骸骨，是为了继承过去的精神和埋葬过去的不足。只要我们之后做好了“九十学运”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任务，我们就能使我国社会运动发展到新的高度，并更大程度上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复苏。
>
> —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第八期月刊《是斗争的胜利！论伟大的“九十学运”的意义》

“九十学运”中所揭示和所预见的全部学生运动发展趋势在于：提高现有的学生运动的数量和规模，最终要把它发展到包含全国学生的广泛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程度；提高学生斗争的组织程度，像郑州一中学生所一开始要求的那样，要建立起包含最广泛的学生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主要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在运动中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性，使它开始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这就要建立领导整个学生运动的学生政治组织。

因此，长沙此校学生的斗争意义就在于证实了这些趋势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可行的，我们今后的学生工作应该照着这样的方向稳步的前进。

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技巧

在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时，不能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来，而应当把三者结合起来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彼此孤立的三个部分，而是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哲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剥削关系和运动规律，驳斥了从错误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提供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则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又反过来检验和丰富哲学方法，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因此，三者不是简单并列的知识板块，而是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斗争中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因此，原著学习不能采取“先学历史，再学其他内容”的机械顺序，而应当在历史发展中把握理论形成的条件和意义。

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时，也不能孤立地读文本，不能把经典著作当作抽象概念的堆积。应当把原著放回它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斗争和理论论战中去理解，弄清楚作者是在回应什么问题、批判什么观点、解决什么矛盾。同时，还要把理论学习同实践斗争结合起来，在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

中检验、理解和运用原著中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读原著不是为了停留在书斋式的解释和概念辨析上，而是为了掌握分析现实、批判错误路线、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只有把理论文章、历史背景、现实问题和实践斗争联系起来，才能避免断章取义和教条化理解，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学习理论也应当善于利用当代最新技术作为辅助。面对大量原著、理论文中修书籍，我们可以借助搜索工具、AI 工具、文本整理工具等方式，提高学习效率。比如，可以通过搜索工具快速查找概念出处、历史背景、相关论战和不同观点，可以利用 AI 帮助整理文章结构、概括论点论据、梳理逻辑链条。尤其是在阅读中修书籍时，更要善于借助这些工具，把表面上复杂、抽象的语言拆解开来，辨析其中的理论立场和修正主义实质。当然，技术只能作为辅助，不能代替独立思考和理论斗争。我们最终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判断、分析各种观点。

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方法

这本手册围绕“怎样学习和运用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这一主线展开。它不是简单按照历史顺序来写，也不是先讲一段历史，再分别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围绕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安排内容。也就是说，手册从读者怎样理解基本原理、怎样判断各种路线和观点、怎样进一步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出发，形成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推进的结构。

本手册的目的，不是罗列马列毛主义的各个知识点，也不是代替读者完成对经典原著的解释，而是帮助读者掌握学习原著的方法。学习理论，关键不只是知道某些结论，而是学会怎样阅读经典著作，怎样抓住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联系历史背景、理论论战和现实斗争去理解原著。

本手册将按照理论学习中“概念—判断—推理”的学习阶段，展开学习方法的说明。这里的“概念—判断—推理”，不是把理论内容分成三个固定板块，而是指学习者理解理论时逐步深入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对基本概念有大概了解；第二阶段，是能够对各种理论观点和现实观点作出初步判断；第三阶段，是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新问题，并参与新的理论和实践创造。

在“概念”阶段，学习者首先要建立基本的理论框架。读原著时，不能只记名词、背定义，而要知道一个概念大体属于哪一范畴，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它揭示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内容。只有先对基本概念形成初步认识，才能在阅读原著和相关材料时不迷失方向。

在“判断”阶段，学习者要进一步学会辨析观点。读原著不能停留在“作者说了什么”，还要理解“批判的是什么观点”“维护的是什么立场”“为什么这样说”。通过联系历史事实、理论文章和现实斗争，学习者应当逐步能够判断一种观点的性质，判断它代表什么阶级立场，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在“推理”阶段，学习者要学会运用基本原理分析新的事物。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复述原著，也不是套用公式，而是能够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和新的斗争，运用已经掌握的概

念和判断进行分析，说明事物为什么产生、怎样发展、会走向什么结果，并在实践中推动新的认识和新的创造。

因此，本手册强调的不是“记住多少知识点”，而是帮助学习者逐步形成理解理论、判断路线和参与实际斗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学习，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将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会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学习方法与路径

核心原则：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相结合

先要明确两者间的关系，到底是理论放在第一呢，还是实践？是先学习先付诸行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是讨论的焦点，不弄懂就很容易犯错误。

以辩证态度看待这两者是精髓。我们既不能轻视理论也不能盲目实践。不能割裂机械的把二者拆分看待，要辩证，会变通。“理论使实践深入，同时理论本身又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力量和不断深化，使理论的作用更大。”（《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辈子，看书本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感悟也是学习，一次调研工人群众或者参与维权斗争也是……学习永无止境，他不局限于书本，在实践中，在我们个人的行动下，往往更能学到新东西，学得更好。正如同群众是从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我们也是，像毛泽东所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怎么使理论变为武器和指明灯？那就要和实际相结合，和运动相结合，

和我们的实践脱离不开。所以纠结先干哪个没有意义，书是看不完的，在有一定理论基础后毒草也可以看看，现代的文章也一大堆，别提过去导师的著作，能安安心心把毛泽东所有《选集》《文选》《年谱》《大传》、相关回忆录等等看完，就“了不起了”。当然，感兴趣是可以多看的，关键在于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书海里好不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理论，科学世界观等，不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理论家”，现在的大部分同志也称不上，而是在于打破旧世界，关乎于现在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现在的一切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做准备，忘了这个就会陷入空的理论钻研。所以这里先不主要提理论学习怎么怎么，而要强调实践问题。

虽然在整个学习过程，理论与实践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但主导地位仍然是实践，要明确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也是理论的归宿点，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同于认识世界即为了改造世界，我们时刻不能忘了，斗争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是同工人群众相关的。然而过去的书籍就不能带我们领会这点，我们要学会同现在的实际社会联系比较，不参与生产就不能了解生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根本问题在于目的，学习的目的，实践的目的，斗争的目的，他们都与实践相关，都迫使我们付诸行动而不是局限于课本，我们想要无产阶级专政，解放生产力，就不能不把实践看重，并且抓紧革命低潮的阶段抓紧实践锻炼。政治报派的观点显而就不同，他们把实践向后拖，实际就是阻碍革命，拖后腿，害怕同工人群众联系，害怕参与生产，保留小资产阶级习气作风。他们往往提到小册子，也就是"政治报"，列宁十月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手册，他把同志和工人群众的思想都统一了起来，把共产党凝聚了起来。可笑的政治报派机械地运用这一策略，他们只看见列宁成立全国机关报安排写

文章，就开始拙劣地模仿了。看看实际是怎么回事吧。“以后，和工人运动有关的每一个关键性问题，列宁都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正激烈时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著作的特点在于：他善于把理论同实际联系起来，不使任何问题脱离理论，并且善于把每个理论问题同目前形势，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成为对读者亲切易懂的东西。”再看“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那么，怎样使我们了解群众所需？很简单，同吃同工作，成为一员，调研只是其中较片面的工作，如今社会，在繁忙的工作下，资本主义环境中，他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并且疲惫于下班后交流，我们的调研很难只通过问话采访获得全面信息，况且为了之后知道地方哪里有斗争并且引导，服务于写作，是有分工的，我们一定要安排大量的干部同志成为先进工人，有意识地做工作。为什么政治报派的文章没有人看且常常闹笑话，就是因为脱离了社会实践，哪些著作家没有人愿意真正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真诚地同他们交谈。宣传鼓动工作形式多样，可以给文章看，可以通过交流，更主要通过在斗争运动中带动，关键在于内容，那就要看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实践摸索，参与社会生产。

最后，再讲讲理论与实践同工作的联系。列宁指出，“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

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这是长期工作，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成果，但实际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以及对同志们的锻炼是存在的，是打下了地基，我们不能只盯着"大运动”，只渴望大"风浪"，往往它是短暂的，恰恰是前期漫长艰苦的工作决定是否胜利，就像十月革命准备了约 15 年(1903—1917)，但实际暴力革命阶段只花了约 2 天时间。假若无数同志没有都同列宁一样做深入群众的工作，做理论学习同实践斗争相结合的工作，革命是成功不了的，火星报也起不了作用！

理论学习技巧

这里主要分享阅读导师等类型书籍时的小策略。

a.依个人情况从简单入手。马克思主义学习分三大板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但我们要补充一个历史领域。以史为鉴，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会经典著作的含义，还能汲取过去宝贵的斗争经验。实践表明，每个人的阅读起点各不相同：有人一来就习惯列宁的锐利文风，有人本就对哲学有所了解，还有人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都是由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阅历决定的。因此，我们推荐首先从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读起，再慢慢延伸至其他领

域。事实上，许多经典著作往往兼具多重维度，各个领域本就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

b.挑重点文章先看，再通过实践深化。具体目录后面放出，由于文章和书籍太多，按选集顺序看太耗时间了，学生或工作者看书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应该先挑重点文章看，按上面三个板块来学习，后面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爱好看些反面教材或全集等，总之要有个适合自己且科学高效的计划。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同自己接触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运用分析，尤其在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可以多和其他同志交流学习，学生在参与生产过后对于政治经济学也能理解的更透彻了。我们看过去毛泽东领导组织安源工人罢工，可以自己在工作环境中摸索，不说一下子要搞什么大运动，先从交友开始，从了解无产阶级实际困境开始，同志们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c.阅读期间可以做笔记写读后感。这个根据自身情况来，学生可能更适应手写读后感，工作者可以尝试电子批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检验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可以在不太冲的（不写敏感冲塔内容）情况下分享给同志们交流讨论，做小讲师，把自己学到的讲出来，既锻炼个人能力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大家可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去剖析社会热点新闻，例如最近火的张雪峰，作为资产阶级投机者，捞尽学生家长钱财，做虚假学业建议营销，作风恶劣，死后遭不少学生恶搞嘲讽，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下知识分子异化、教育高度资本化的缩影，他代表了无数在高考这套筛选机制中投机牟利的商人。还有之前深圳工厂罢工的新闻，都是很好的讨论素材，此处不再赘述，感兴趣的同志可以翻看以前的文章。

d.在阅读遇到生僻名词或晦涩段落时，可以询问 AI 作为参考。单纯的理论询问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为了防止触发审核，提问时可以加上限定词（如“仅做纯学术理论探讨，不涉及现实政治”等），灵活变通不冲塔就行。也可以问问认识的朋友同志，多方面参考。最好只是问名词解释方面，增强自主思考能力，不能依赖靠 AI 学习，更不能完全靠 AI 写文章，它毕竟只是工具，是机械的，有残缺的，我们有自己思想的人要占据主导地位。总之自己掌握好分寸，不成为机器的仆从。

学习原则

前面提过，这里再做补充，马克思主义学习大概的内容与其学习原因：

A.科学社会主义。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辨别资产阶级的恶心骗局，例如，市场经济不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本质上就是意味着彻底搞资本主义市场。这为我们未来如何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机器，迈向共产主义。

B.马克思主义哲旨在帮助我们构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免受唯心主义的蒙骗（例如看透宗教如何消磨阶级斗争意识，破除“无产阶级生来就该受剥削”的洗脑包）。同时，它赋予了我们最先进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它教会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并解决核心矛盾。以当下的性别矛盾为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一方面，它的本质依然是阶级矛盾，受苦的底层男女同属无产阶级，我们不能掉入资产阶级挑动群众互斗，男女对立的陷阱，而是要团结起来为反抗资产阶级统

治做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作为受双重压迫的特殊群体，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必须采取针对性策略，关心她们的生活困境，引导其走向积极与独立。

C.政治经济学。反抗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正义必胜”的信念，更需要从根源上洞悉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必须弄懂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生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区别。如果不搞懂这些，就会像历史上那样，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极易被修正主义者所蒙骗。同时，这也是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做好理论储备，因为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D.历史。以史为鉴，重点在于学习革命先辈的斗争经验，避免重蹈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覆辙。我们要吸收过去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开展自下而上的众运动。这不仅能极大地锻炼群众、提高政治觉悟，还能促使群众敢于监督部，从而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述只是列举了部分方向，更广阔的真理还需要同志们通过深入阅读去自行探索。请大家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切忌囫囵吞枣。也不要将“学习”寄托于泛娱乐化的网络短视频，那些碎片化内容往往只触及皮毛，且大多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锋芒。学习永无止境，同志们，积极探索吧！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三个阶段

概念阶段

这个部分主要解决“马列毛主义大体讲什么”的问题。

概念阶段是理论学习的入门阶段，主要任务是帮助有志于革命的同志建立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轮廓，弄清楚它由哪些部分组成，根本立场是什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可以先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作为总体的入门读物。这两篇文章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想理论，而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可以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说明认源于实践，并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矛盾论》说明事物的发展根源在于矛盾，分析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篇文章帮助同志们掌握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方法。

政治经济学方面，可以先读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初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之后，就可以阅读1976年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可以帮助学习者初步理解生产关系、所有制、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认识经济

关系背后的阶级关系，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从经济角度掌握马列毛主义的哲学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可以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怎么办？》《谈谈党内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国家与革命》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怎么办？》说明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重要性，《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

这一阶段的重点，不是掌握全部理论细节，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基本了解，初步地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政治经济学粗略分析剥削关系，在此基础上，认清正确的革命道路。基础打牢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进一步判断各种观点和路线的性质。

下面是对上文中所提及的书籍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的，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 1912年布拉格党代表大会上与孟什维克从组织上决裂。与此同时，自 1905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继续激化，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将到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正是适应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1872 年到 1905 年俄国革命之间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俄国 1905 年革命以后新的革命风暴时期，讲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社会主义派别的普通一员，发展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重要思想；在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在为未来革命做准备，同时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因素也在增长；在第三阶段，即 1905 年前后，掀起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风暴。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之初就是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言辞激烈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叛卖工人运动的罪行，满腔热情地支持俄国工人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面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阅读这篇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规律，并运用列宁所揭示的这个活动规律批判当前国际互联网上打着“政治报”旗号的空谈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怎么办》简介

列宁的《怎么办？》写于 1901 年末至 1902 年初，1902 年 3 月出版。这本书不是一部抽象谈“宣传”“组织”“办报”的小册子，而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分散、经济主义泛滥、统一的革命政党尚未真正形成的条件下，为解决运动中最迫切问题而写成的战斗文献。这本书的矛头直指俄国的“经济派”，“经济派”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工人斗争限制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经济斗争上，轻视革命理论、政治鼓动和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怎么办？》的中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办报”，而是用什么路线办报、由什么人办报、办报服务于什么样子的实际斗争。列宁提出全俄政治报，是因为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小组分散孤立，缺乏统一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联系。全俄政治报要成为共同的思想和组织中心，把地方经验变成为全国经验，把零散小组锻造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列宁关于政治报的设想，正是要克服地方狭隘性、重复劳动、组织涣散和秘密工作薄弱的问题。列宁的政治报《火星报》后来确实成为统一党的力量、培养干部、打击“经济派”的中心。

政治报不是脱离地方工作的空中楼阁。没有各地区的地方小组，没有同工阶级的结合，没有政治灌输，没有秘密原则，没有能够在群众中活动的革命干部，全国政治报就会变成空想的报纸。如果任由机会主义者集中各地小组，集中起来的就不会是执行革命路线的，而是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组织，报纸所传播的也不会是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内容，而可能只是经济主义、尾巴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谈。

今天，同志们阅读《怎么办？》的时候，必须结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际。所谓的“政治报路线”，把办报看成脱离工人工作的，通过发行政治报所组成的“中央”的任务，把组织读书会、提高知识分子水平、建立线上中心看成当前工作的核心，而不是让报纸、写作、宣传和理论训练都服务于工人群众工作。这不是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而是对列宁政治报思想的歪曲。真正的革命刊物，必须服务于工人工作，接受工人工作的领导。如果宣传工作脱离工人工作，不为工人工作服务，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政治的“政治报”。

《怎么办？》批判“经济派”，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列宁反对的是把经济斗争绝对化，反对把工人运动停留在自发水平，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降低为工会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经济斗争，而在于经济斗争是否服从政治斗争，是否服务于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否同社会主义灌输、秘密组织建设和革命政党建设结合起来。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点更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工人往往连纯粹的经济斗争也难以自发地、稳定地组织起来。地区性的小组和个别工人，很难独立面对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双重打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本身并不等于经济主义。关键在于领导经济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追随自发情绪，只谈工资福利，不提高政治意识，那就是经济主义；如果是为了在工人中建立联系，培养先进分子，进行政治灌输，发展群众组织，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带到工人中去的必要环节。

所以，不能把工人工作探索过程中出现过的策略弯路，简单扣成“经济主义”。所谓“先罢工再政治灌输”的经验主义认识，如果被绝对化，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观点的不足，并明确政治灌输必须贯穿工人工作的全过程，那么它的根本方向就不是经济主义。不能指望没有交往、没有互助、没有实际联系，就能直接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也不能认为只有发生罢工，才能进行政治灌输。正确的路线，是在工人工作中把经济斗争、群众联系和政治灌输结合起来。

《怎么办？》提出的是一个涵盖了中央和地方工作的整体任务。在地方，要有能够同工人结合的秘密小组，要进行政治灌输，要培养先进工人和革命干部，在中央，要用全国性的政治

报和统一组织，把各地正确经验集中起来，把地方斗争提高到全国政治斗争的高度。中央不能替代地方，报纸不能替代工人工作。中央和报纸只有建立在正确的地方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工具。

列宁的政治报计划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因为它是“全国性的”，而是因为它由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对经济主义、重视政治灌输、懂得秘密工作、能够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革命者来领导。如果由机会主义者集中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的就不是革命路线，而是机会主义路线。那样的“政治报”就不会成为革命建党的脚手架，而会成为孟什维克路线的工具。只有由以列宁为核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政治报才能成为统一思想、统一组织、教育干部、打击机会主义的战斗机关。

《怎么办？》告诉我们，革命者要统一，但必须统一到正确路线和正确工作方法上。不是为了统一而统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散漫、自由主义和空谈集中起来，而是把理论、宣传、组织和办报都统一到工人阶级工作中去，统一到政治灌输和群众组织建设中去，统一到培养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中去。《怎么办？》是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崇拜自发性、反对小组涣散、反对脱离工人的革命建党纲领。它要求把社会主义带到工人中去，要求把地方工人工作提高到全国政治斗争的高度。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列宁的政治报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 版简介

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而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高度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读物。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造以后，旧社会的痕迹并不会自然消失。商品、货币、工资、利润、按劳分配、企业核算，以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都还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它们既可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土壤。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和改造。

全书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讲起，说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并强调公有制不是一块招牌，不能认为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就万事大吉。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必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书中把所有制、管理权、分配权、领导权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考察，反对资本统治劳动，反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厂。

在生产问题上，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少数人发财，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它强调计划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强调工农业结合、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在流通、分配和再生产问题上，书中分析商品交换、价格、货币、对外贸易、国民收入分配、个人消费品分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等内容。它的立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放任市场和利润支配社会生产，必须把商品货币关系置于计划和群众监督之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因素扩大。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本书不是孤立地讲经济技术，而是把经济问题放在阶级关系中考察。她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脱离两条路线斗争，不能脱离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不是没有矛盾的太平世界，而是新旧两种因素相互斗争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这是对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今日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历程正是这本书的反面教材。

今日中修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竞争、资本经营、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包装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把民营资本、外资企业同国有经济并列为现代化建设力量；把利润原则、绩效管理、招商引资、资本市场和营商环境固定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中修早已完成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化、扩大化，已经凭借着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发展成为彻彻底底的资本帝国主义了。

1976 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正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只看有没有国有企业，不能只看国家能不能调控市场，也不能只看执政党是否还使用社会主义名义。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劳动人民是否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商品货币关系是否受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被逐步缩小，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是否得到坚持，党内外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受到继续斗争。

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就是为了看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资本主义复辟不一定是通过公开取消共产党招牌来完成，它也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来完成。这本书揭露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修正主义实质，并说明—只有依靠工农群

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向着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

判断阶段

判断阶段，是在初步了解基本概念之后，进一步学习怎样辨析观点和路线性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不是简单地阅读原著内容，而是要弄清楚革命导师在什么环境下，批判的是什么观点，维护的是什么立场，为什么这样说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阶段的学习方法，是把经典原著同持有正确路线的历史教科书（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结合起来阅读。先通过历史教科书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主要路线分歧，再回到原著中理解革命导师的具体观点。这样读，才能知道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在什么样的斗争中产生的，什么错误思想，服务什么革命任务。

读原著时，要把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立场和斗争对象看清楚。不能只看作者说了什么概念，而要看这些概念用来批判谁、支持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原著和历史背景的结合阅读，同志们才能逐步学会判断一种观点代表什么阶级立场，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在实践中产生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应用阶段

推理阶段，也就是应用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把已经掌握的概念和判断用于分析新问题、新现象、新斗争。理论学习的目的，不是复述原著，也不是套用公式，而是掌握革命导师的，

对于当前条件下是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分析现实、批判错误路线、指导实践。

这一阶段，同志们不能只读正面材料，还要阅读反面教材。通过批判性地阅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理论材料，同志们才能看清错误观点的根源、阶级立场和实际危害。同时，同志们还要经常地参与实际斗争，在思想争论和组织实践中运用理论。只有这样，同志们的理论水平才能真正成长。

在这一阶段，同志们要学会把现象放到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分析。面对一种观点、一条路线、一个现实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描述，而要追问—它为什么产生？代表什么利益？怎样发展？会导致什么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变成斗争的武器。理论必须在实践中运用。离开实践，理论就会变成空话，不经过斗争检验，认识就不会深化。同志们要在分析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争论和参与实际斗争中运用所学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认识向前发展。

理论只有同实践联系，才会有生命力。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学习者能够把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进行革命斗争的能力，能够分析新事物，判断新路线，批判错误思想，并在斗争中形成新的认识。

社会评论

论什么是革命形势和我们应该怎么准备

一句话回答：**革命一分钟，准备十年功。**

革命形势会到来，**但革命形势到来并不意味着革命一定到来、革命一定成功**。如果客观革命形势成熟，而主观力量（先锋队和其群众基础）不发展，先锋队就无法抓住机会，也无法发动群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甚至革命不来。革命要成功，先锋队必须在日常的群众工作和大小斗争中得到足够的锤炼。

什么是革命形势?

那么，革命形势是什么，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又如何把握住革命形势?

列宁说：

> 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

> 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

列宁总结了三点：

1. 人民的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我们引用一段最经典的对美国华尔街经济危机的描写，来说明**经济危机**导致老百姓无法照旧生活：

> 1929年10月29日的美国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这一天，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当时的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大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等等。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奶农把牛奶倒掉，组织纠察队拦截牛奶运向奶油、奶酪加工厂，甚至用炸弹袭击工厂。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

> 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下生产已经被交换的障碍堵死，原本的资本主义快车道已经无法照旧狂飙了。

2.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和人民不能照旧生活是两回事。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了，统治阶级却还能用原来的方式统治，那么无论人民受压迫有多重，人民都还是只能忍受。如列宁所说：

> **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

这一点主要指统治阶级遇到的各种政府危机，包括经济危机造成的财政短缺、政治危机、战争等。

比如1905年沙俄老百姓到教堂面前和平请愿，他们举着“求求沙皇陛下”的口号，却遭到宪兵开枪镇压，这次事件后就迎来了大规模的抗议罢工和1905革命；再近一点还有疫情在开放前

夕的大量群众自发的拆开围栏上街游行以及以富士康罢工为代表的罢工潮，都是涉及到大部分群众的巨大的舆情风波，这可以说极大推动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取消和彻底解封。

列宁用俄国的政治形势具体解释了统治力度加大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全国性的政治危机：

> 现在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场政治危机正在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支持反革命并在这种反革命的基础上取得“和平的发展”，资产阶级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刽子手和农奴主要多少钱，资产阶级便给多少钱，资产阶级辱骂革命，背弃革命，资产阶级舐着普利什凯维奇的皮靴和马尔柯夫第二的鞭子，变成了他们的奴仆，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以“欧洲式的”论据为基础的理论，把1905年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宣布这场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鼠窃狗盗的、祸国殃民的，如此等等。
>
> 尽管资产阶级这样牺牲自己的钱袋、荣誉和良心，但它自己，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也承认，专制政府和地主已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已不能保证“秩序”和“法制”的起码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是不能与德国和新中国一起生存的。

>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而且是这样一种危机，它触动的正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的是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不管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怎样胡说“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胡说某些政治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懂得前一点同后一点的密切联系），不管他们讲了多少这种改良主义的废话，情况仍然是：没有一个取消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能够指明一条可以摆脱目前状况的改良主义的出路。
>
> 俄国人民群众的现状，由于新的土地政策（农奴主-地主势必抓住这一政策，把它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的事实，国际条件以及我国已经形成的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这些就是由于政府和剥削阶级已不可能通过当前的道路和现有的手段来完成资产阶级变革的任务而在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全部客观条件。

3. 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列宁的论述中，群众参与政治运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是上述两点所促成的，属于客观的革命形势，是"**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

> 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

> 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但要发动革命不能只靠群众自发的积极性，而需要先锋队自觉的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以及组织工作。如列宁所说：

> 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所以，列宁说：

> 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所以，**主观力量的准备，是把握住革命形势，把革命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决定性环节**。

怎样的主观准备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

一句话回答：建立扎根于群众中的革命组织，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中锻炼它，使其成长成得到群众的信任并能组织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成熟的先锋队

列宁说明了革命形势到来且主观准备做好的情况下，应该达成的目标：

对于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能力在革命形势下进行充分的政治宣传，以使得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决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牺牲; 对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当客观形势使得"**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我们需要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政治鼓动，促成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并尽可能将其引导到革命的方向。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列宁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任务：

> 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可见，没有先锋队的宣传，群众可能就意识不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没有先锋队的鼓动和组织，群众可能就不会转向革命行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客观条件的基础作用——经济危机、战争、统治阶级无力照旧统治，这些都是革命的“可能性的前提”。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没有主观力量的准备，客观条件再好也只会白白流逝，甚至变成反革命的温床**。自发的群众如果没有先锋党的正确领导，就必然被右派篡夺、被资产阶级收买、被机会主义出卖。俄国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早在1903年就完成了与孟什维克的彻底决裂，经过十多年高潮低潮的考验，锻造出一支铁的纪律、统一意志、深入群众的先锋队，才能在1917年把二月革命的自发浪潮引向十月胜利，开创了人类新纪元。而德国和意大利左派恰恰缺少这一主观准备，于是最有利的客观条件反而成了悲剧的舞台。

革命形势到来前，如果主观的准备不够，就不能把握住革命形势

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是一个革命形势到来但缺乏成熟的先锋队的例子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俄国十月革命极为相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有利，却未能掀起西欧革命浪潮，更未能开创人类新纪元。把失败简单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够成熟”，是完全错误的浅薄分析。我们只需稍加对比即可看出：

第一，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大挫折，资产阶级力量被极大削弱，国家机器遭到巨大破坏，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方式统治下去。

第二，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工人士兵的自发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第三，旧帝国政府轰然倒塌，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为革命夺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最初的革命力量都分裂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的主力原本都来自同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此时还有从德国社民党分裂出来的“中派”——受考茨基影响的独立社民党，他们虽与右翼不同，却在革命中采取居中观望态度，未能发动群众，实际上支持了反革命一方。而俄国不仅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形成了更复杂的革命联盟基础。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但在自发阶段，苏维埃都暂时掌握在右派手里，并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势力的威胁：俄国爆发科尔尼洛夫叛乱，德国则发生卡普叛乱。

客观条件如此相似，甚至德国的危机更深、群众自发性更强、旧政权崩溃更彻底，为什么结果却天差地别？核心原因就在于主观力量的准备完全不同。

在1918年和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后来的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一个真正成熟的先锋队——一个经受过革命高潮与低潮考验、具有领导基层群众能力的革命家组织**。就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后的那位德共主席所说“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

共产党，没有在1903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现在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

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失败更为典型

一战后的红色两年里整个意大利国家机器都几乎解体了。南方佃农打土豪，分田地。北方工人普遍夺厂，苏维埃遍地都是。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内阁或联合政府，往往一个政府刚刚成立，就在下个月宣布全体辞职。但最后资产阶级通过法西斯民族党的刺刀成功卷土重来，其原因正如意共主席所说“意大利无产阶级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它没能在合适的时机清除掉那些改良主义领导人，也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纲领清晰、能够领导工人阶级采取有效行动的政党。”

具体到现在，在革命形势成熟以前，我们要做、能做什么准备？

一句话回答：**要在平静时期利用各种机会锻炼和发展革命组织，日常就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形成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在革命形势到来前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如列宁所说：

> 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

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

没有人能预知革命形势何时会到来，所以列宁教导我们在平静时期也必须建成一支随时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的先锋队：

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

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146]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

> 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
> …
>
>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组织上，以列宁的全国政治报为例，要能在革命到来时起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革命前获得全国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权威并且锻炼先锋队领导群众的能力，而权威和领导群众的能力只能在生产斗争和思想宣传中获得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重点的工业城市、工业区和工厂

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在革命前就扎根在厂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同时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秘密性保证党能够在革命时期掌控全局做出正确的指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这张网需要遍布全国而极具组织性和秘密性，使敌人绞尽脑汁也无法阻止革命的到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一张网。

当然，列宁从来没有，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认为过各国共产党人只有通过办政治报才能建立先锋队，这里列宁的政治报计划是依据当时俄国的特殊国情而制定的计划，而我们要发展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的路线。当代中国的工人革命路线，是列宁的建党路线在今日中国的新发展，他们都要求一张由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组织支撑起来的，党盘踞在群众中间协调指挥的秘密蜘蛛网。

而这张网是怎么织成的呢？

和蜘蛛网一样，网丝和蜘蛛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我们的党，党成员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先进群众中出现少数几个点互相联合培养新的先进群众，在群众工作中形成自己的组织，成功掌握某一部分群众的组织之间互相联合，在不断的斗争中形成一个顽强的党；而我们的群众组织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党成员去成立、掌握的。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当下要做的准备就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挑选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先锋队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磨砺组织和个人的能力。

如果不现在革命会怎么样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看起来革命形势还没到，我们现在做准备也太早了，没必要吧？

一句话回答：现在不革命，以后资本家要我们的命。

资本家不会因为我们的忍让、退缩而减少他们的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我们退要么他们退，我们现在不革命，不为未来做准备，资本家只会剥削得越来越厉害，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永远也不能达到那个必然到来的共产主义。无数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致丽大火案就是一个典型，无产阶级不反抗，一味忍让，最终竟会惨死在资本家为了减少那一点点的建筑成本的消防隐患和加长工时的铁丝网中。

这个压迫的逐渐加深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鱼老了之后更没有精力反抗屠夫，屠夫也有更多的手段对付它，具体而言，劳动力老了之后，资本家就会有更多的筹码压迫你，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大，让你加班，扣你工资你都得受着，找个理由把你辞退了不给赔偿，你去告官，中修劳动局和资本家穿一条裤子，告了也没用。只能找新的更脏乱差的工作，时薪6元的清洁工全国到处都是，都是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因为工资太少打两份工的大有人在，上完白班上夜班，捡完垃圾扫厕所。即使没有在工作中累死，干不动了也要活活饿死。

只要不反抗，不准备革命，资本家不仅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的生命力榨干净，而且还会让我们的后代也成为一枚用完即弃的螺

丝钉。道理是很简单的，无产阶级的孩子99%还会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革命，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会遭受我们曾遭受的苦难，而且更深更重。

革命形势到来把握不住会怎么样

一句话回答：革命形势一旦来临，要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将危机转嫁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陷入更深的深渊。

在帝国主义时代，万一资产阶级真的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战争将会是必然的出路，死亡将成为悬在每一个无产阶级头上的利剑，在战场上，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一场冲锋。战争本质是政治的延续，帝国主义战争本身也是国内统治无法维持，只能转嫁危机的结果。对帝国主义而言，发起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资本的输出是必要的，而在全球共用一个市场的情况下，不仅帝国主义自己的市场已经饱和了，全球的市场也已经饱和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用实力来解决，也就是战争。我们从最熟知的二战法西斯看，日本德国意大利无不是国内危机之后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右翼上台，通过战争重新划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无产阶级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是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

所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先进的人现在就开始准备 ，落后的部分，到危机时也不得不直面**。无产阶级中的先觉悟者面对惨淡的人生绝不能逃避，也不能仅指望于群众的自发性，而是必须提前为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主观准备，不然

革命形势到来时，非但不能利用危机发动革命，可能都无法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存活。

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的革命者并不对未来觉得乐观，认为敌人太强大，工作难开展，我们在这里简单谈谈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这个乐观并不是傻乐，而是来源于对敌我力量的客观认识。

毛主席说：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 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 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 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 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 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 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 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 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 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 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

> 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 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 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 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 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 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凭什么这么乐观呢？因为纸老虎虽然唬人，但终究是纸做的，表面上强大，但是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打倒的。如恩格斯所说：

>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一天的抵抗。**

资产阶级是压迫剥削人民的一方，人民可能一时被他们愚昧，但是不可能永远被他们唬住，人民会意识到只有反抗才是出路，会逐渐来到我们这一方——反抗压迫的一方，我们的组织会逐渐壮大。到现在也是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帝国主义可以被我们打倒，我们才会投入精力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如果这样反抗没有出路，那不过是飞蛾扑火，没有人会去做的，就像民粹派刺杀沙皇成功之后，反而来了一位更加残暴的沙皇，民粹派便被证明无法拯救当时的人民，俄国的有志青年们都不会继续从事这项错误的事业。

但是，我们说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能转化为傻乐甚至盲目乐观，因为纸老虎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它仍然是只有威胁的老虎，而革命的力量不是靠一天建成的。

> 毛主席：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 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一定要认清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双重性质。归根结底，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可以在战略层面藐视敌人，才能真正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首先，我们认识到中修帝国主义的极端腐朽、认识到一旦我们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中修是一定可以被打倒的。

正是在这种相信群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下，我们才能避免颓废、避免右倾的取消主义或等待主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抓紧一切时间致力于在革命形势到来之前做好主观的准备。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才会谨慎评估我们是否得到了群众的充分信任、我们是否已经让群众充分认识到了革命形势、我们是否已经有能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从而避免佳士那样的"左"倾冒险主义。

最后，引用一段红旗杂志1963年第一期的文章的作为结尾，希望同志们投身于伟大的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中去：

> 一切革命斗争，只要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使革命斗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个力量无敌于天下，能够摧毁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列宁就是从信任人民力量的观点出发，而把帝国主义看作"泥足巨人"的。他说："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

红楼梦中的怠工

前言

前不久中修大骂流行于打工人之中的躺平风气，痛心于人人为己，蝇营狗苟的职场环境。本来这种专给未经世事的蠢人看的鸡汤八股文是不值一提的，只是为中修的文化垃圾堆上又夯实了一下。但是在左派中颇有名气的《前进报》却在《谁犯了躺平罪？》这篇文章中按照中修的语调也训斥起来了躺平和怠工，为他们脑中的工人阶级戴上了不会进行怠工的金枷锁。这倒是为反动派做了一些他们所做不到的一些实事。

文章的主旨是躺平或者怠工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特权，但是不属于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等劳动者。而且怠工是学豫让众人国士之论，是谁给钱多就为谁多服务的表现。所以他们也学着中修训斥起了怠工的打工人，给人一种积极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公子哥看到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使我们感到很困惑，如果既要反抗资本主义，又要为资本主义开足马力，那么结果只能是等到打工人一起累死饿死之后，再在遥远的将来和外星人谈论革命了。

暂且不提遥远的将来，让我们看看过去的封建社会吧。

正文

《红楼梦》第四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认为贾府的山河日下是因为“无才去补天”。但实际上，之所以统治阶级的大厦摇摇欲坠，最主要的原因是奴隶们的反抗。这其中积极的反抗是被污为“鼠盗蜂起”的农民造反，这极大的震动了封建统治者的天堂。而消极的反抗则是贾府内大大小小的奴隶的怠工，甚至还有个别主子的怠工，这也使得封建统治者疲惫不堪，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和激化了统治者和奴隶们的矛盾。

在第七回，宁国府的焦大不愿深夜赶车，因此在主子驾前厉声大骂，将贾府内奸淫苟且、不伦不类的事都倒了出来。惊得主子将马粪塞了他一嘴，并打发他到了自家的庄园上去当牛做马了。鲁迅曾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焦大的怠工，是一种无奈地反抗，建造贾府这座大厦时他也出过很多力，看到贾府一日不如一日，焦大心如刀割又有苦难诉。焦大的怠工虽然主观上是想要劝诫主子们，是为了“补天”，但客观上违反了封建礼教，忤逆了主人，客观上是在“拆天”。

在抄检大观园时，打击了很多二主子大丫头，值得一提的是晴雯。晴雯之所以会被赶出大观园，主要是她多次反抗贾宝玉的主子习气，不愿意接受主子的训斥和打骂，这也是怠工的一种形式，不像袭人一样对主子逆来顺受。这种怠工反对了封建等

级制度，使晴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钉，终于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焦大和晴雯一个是功臣宿将一个是驾前红人，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等奴隶了。他们主观上都不愿意贾府分崩离析，他们的动机是很不革命的，但也不是待价而沽，因为作为上等奴隶是不缺荣华富贵的。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以怠工来反抗，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提醒主子们楼要塌了，船要沉了，别再道貌岸然，沽名钓誉了，要变革了。可是挽救的呼声将阴暗猥琐揭示于烈日之下，这对革命者来说是号角，但对保守派来说是丧钟。所以不管他们主观意愿怎么样，只要是不恭恭敬敬服侍主子而懈怠，只要触犯到了封建礼教，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都会对其进行残酷打击。

在第五十五回，荣国府的管家二奶奶王熙凤因为在明里暗里的斗争中累倒了，这把统治阶级的硬刀子在贾府中横冲直撞，却使得奴隶们的反抗日复一日更甚了。王夫人也知道“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只好请出探春，李纨和深谙孔孟之道的薛宝钗这三驾马车来管理荣国府内的事。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开始步步都很严谨，所以奴隶们总结道：“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了。”可见大小奴隶偷懒怠工是常事。

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在大观园内推行承包制将每一块具有经济效益的地分包给少数奴隶，年底收取利息租金。但是探春等人选中的奴隶都是符合他们标准的“诚实老人家”，即都是勤勤恳恳当奴才的人。探春原本是想将总帐自己来管的，这样每年统治阶级能获更多利。精通人情世故的薛宝钗似乎观察到了奴

隶们素日来的怨气，觉得看管太严容易激起奴隶们的反抗，所以用所谓仁义礼治来反对探春法治。用这种方法在内部分化奴隶，使得奴隶们自相攻伐，怨不到主子身上。

虽然薛宝钗口头上鼓励负责承包的上等奴隶年底拿钱出来分红，“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后续事情的发展确实符合薛宝钗所计算的—奴隶们内斗起来了。在第五十九回，莺儿私自折柳编柳篮，触怒了管柳林的上等奴隶，这个奴隶忌惮莺儿是大丫头不好动怒，于是将气撒在了他的外甥女春燕身上，怪罪小奴隶春燕怠工，让她的姑娘利益受损。小奴隶春燕借此还发了一大通议论：“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遭踏，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由此可知，一是这些措施收买了小部分上等奴隶，让他们卖力地经营自己负责的产业；二是上等奴隶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还逼迫下等奴隶帮他们经营产业，更加大了对下等奴隶的压迫，更加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并促使他们倒向革命的农民阶级。对少数上等奴隶的收买使得阶级斗争更剧烈了，怠工的依旧怠工，偷盗的偷盗，争吵的争吵，荣国府反而更乱了。

荣国府的管家主子，不管是王熙凤还是三驾马车，都是王夫人的心腹。园内大大小小奴隶大多属于王夫人这一边，但绣春囊刚好被痴傻的傻大姐捡到并被邢夫人发现。足见大观园内的奴隶们平时有多么懈怠。也正是因为这种怠工，才使得封建礼教的桎梏被逐渐冲散，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主子和奴隶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抄检大观园。

由古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非一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而那些平日里工人的怠工也促使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而且不管工人怠不怠工，资本家为了利润都会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怠工可以使工人得到适当的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为提高其阶级觉悟提供助力。怠工大而广之可以看作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虽然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每日工作时长却是两倍于此。怠工和勤劳，看似矛盾，但是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手段。

改革开放的历史提纲

前言

1992年到2012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深入的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其代价是劳动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大发横财。劳动人民日益恶化的购买力同资本主义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尤其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一矛盾，直接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正是经济危机的前提。为使经济危机尽可能晚些到来，中修政府不是提高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以扩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中修政府一方面砍掉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领域推向市场，使劳动人民不得不用有限收入和长期债务承担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和对外出口，为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这一切实践说明，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中修政府不仅强行扩大内需，还向海外扩大市场。中国从1996年左右出现生产过剩，同一时期，中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并将其放在“引进来”之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成为中国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标志。然而，这一切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即是生产无

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的对外出口下降，扩大内需成为了中修政府的唯一选择。作为应对方法，2008年中国启动了四万亿计划，通过扩大政府赤字，超发信用的办法，给经济打强心剂。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修通过给经济打强心剂，成功地延迟了经济危机的来临。然而，凯恩斯主义只能作为一剂副作用极强的强心剂起作用，而它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滞胀危机。而今天的房地产泡沫，正是当年打凯恩斯主义经济强心剂的后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十年间，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在一天天地成长。从孟连到池州，从石首到乌坎，英雄的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战斗。其中，安徽登封的马毛党成为了中国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先锋队。江西丰城的农民运动为首的中国农民运动成为中修被迫取消农业税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来详细讲讲中国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的历史。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

国企改革是一场浩劫，改革洗劫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富，而改革的赃物被尽数收入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

级的囊中。

国企改革是被强制推行的，国企被官僚资产阶级故意破产，而官僚资产阶级又借口国企经营不良，将工人阶级创造的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入麾下。

国企改革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地抵制。然而，由于工人的自发行动缺乏先锋队的自觉领导，往往遭到失败与镇压。

关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修材料是这样讲的：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逐渐面临严峻挑战。到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1987年上升十多倍，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 1998年至2002年，国企改革在三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通过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建立了国企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

国企改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国企改革中所谓“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实际上是将曾经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遗产收入私囊。而随着这些企业的被破产，一大批优质的机器，厂房等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官僚资产阶级从中大赚一笔，他们有的倒卖机器，有的干脆自己或让家人朋友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开工厂，从而又制造了一批新资产阶级。

中修不得不供认，许多官员从国企改革中“侵贪国有财产”。

中修喉舌新华网交待了一些事实案例：

> 万华置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冀党生在1995年至1998年间，利用担任国企领导之便，打着国企的名义注册多个公司，通过几次改变法人，将公司操纵在个人手中。1999年10月，他采取虚假手段将万华公司中的71.6%折合人民币两千余万元股份转到个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侵吞。 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企业财务处处长、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陈洪喜在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间，趁机械工业部撤部建局，利用掌管账外资金的职务便利，将其掌管的机械工业部账外资金近两千万元转移并购买国债盈利。调离原岗位进行业务交接时隐匿不报，日后予以侵吞。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小巫，而大巫们——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头目——所私有化的国家财产更是不计其数。坐拥24亿人民币存款的炫富高干子弟，以及被整下台的周永康，都是其中的例子。这个官僚阶级，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积累了千年也用不完的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腐败，而是作为政党来掠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为了达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目的，他们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

大下岗

所谓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修正主义集团用强制手段剥夺工人的权利，来达到他们发家致富的目的的手段罢了。而随着国企改革来到的下岗潮，是修正主义集团犯下的又一罪行。

对于90年代的下岗潮，中修官方对此缄口不提，仅仅这样在百度百科上供认：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一直面临改革开放以后所带来的种种冲击。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三角债频发。在此关键时候，国有企业重组也就成为必然，进而引起重组后各企业大量裁员的下岗潮。在当时虽然引起部分下岗职工的不满，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企业的发展却是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不过在此过程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也非常多。

下岗是一种变相的失业。

下岗工人这样控诉：

> 虽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与下岗工人任何补偿。

下岗的具体人数，一位叫做“元淦恭”的作者是这样统计的：

>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 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

> 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 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

也就是说，接近½的工人被修正主义集团强制失业，而在东北，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大下岗是工人阶级的灾难，由于国企改革，多少工人家破人亡，多少工人背井离乡！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工人赶出工厂，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工人的权利剥得精光，让工人彻底沦为雇佣奴隶，这就是国企改革的实质。

工人福利被强制取消

一系列的复辟政策，导致的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购买力日渐下降。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又使产品日益增多。本来，如果将产品分给工人，或者将工人的工资提高，都可以使过剩的产品得到消耗。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言，“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积累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日益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为此，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不愿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它们通过市场化改革，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生活保障，转嫁到劳动者个人身上。这样一来，劳动人民成为了“消费者”，被迫用更高的生活成本、更重的家庭负担和更长久的债务，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强制取消福利分房，是修正主义集团的又一次犯罪。

早在80年代末，中修便将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使土地沦为地方资本运作的筹码。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幅集中了中央财权，却将庞大事权留在地方。财政上的亏空，迫使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形成了地方政府贱卖工业用地吸引资本，换取GDP增长，同时垄断并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将招商引资的成本通过高房价转嫁给底层群众的财政逻辑。

中修材料供述：

> 1998年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作出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指定“住宅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启动居民住宅消费。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私有自住房，法律上也承认公民对房屋的所有权，但住房并不是普通商品，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1982 年以前，城市房屋及其相应地产权利并没有被法律条文宣布为国家所有。直到 1982 年宪法颁布，才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形成后来城市土地国有、房屋权利相对分离的格局。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这一主要制度安排下，住房并不是作为普通商品由劳动者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而主要是作为社会福利和单位保障，通过国家和单位分配取得。

1996年，中国的经济开始由需求大于供给变为供给大于需求。而1998年的过剩危机的根源，是群众购买力实际上在不断下降。

1998年，中修全面废除住房福利制度，将劳动者的基本居住需求强制推入市场。群众不仅被掏空了储蓄，更被套上“按揭贷款”的金融枷锁，沦为地产与金融资本的长期债务奴隶。住房制度改革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成为福利市场化、土地财政扩张和居民债务化的重要环节，为后来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危机埋下了基础。

农业问题

双轨制的结束和市场定价的逐步确立，加深了包产到户后小农经济的危机。

1980年代前期，粮食并不是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流通。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流通仍然受到国家征购、合同定购、保护价收购等制度的支配。19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的短期提高的短暂的“好日子”，并不是小农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积极性、更有效率，而是中修为了瓦解人民公社、稳住农村局面，采取的一种政策性让利措施。中修通过暂时减少统购基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部分农村集市贸易，换取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支持。这种让利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一次性的。是想让农民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

这个时期结束后，小农经济的危机便迅速显露出来。1985年，中修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表面上改变了收购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行政控制。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入双轨制轨道，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这样，农民一方面仍然受到国家粮食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被逐步放开的资本主义市场推向深渊。

在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并存的状况下，计划内低价农资并没有稳定地落到农民手里，而成为了中修基层官员、流通部门和投机分子截留倒卖、寻租索贿的对象。农民实际面对的，不是稳定的计划供应，而是农资价格暴涨、垄断买难和层层加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很快超过了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种粮所得的微薄收益被农资成本渐渐吞没。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重新出现。

到1990年代后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农业收益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体制被拆散，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财政依托。中修基层政府机构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在得不到充分财政供养的情况下，通过“三提五统”、集资、摊派、义务工、教育附加、道路建设费等方式，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这种负担是人民公社瓦解后，农村财政基础被破坏的必然结果。有些地方农民实际负担达到纯收入的15%—20%，越是贫困、越是依赖农业的地区，负担反而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绝对减少。上面反复提出“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但农村市场始终扩而不动。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被榨干的农村，不可能形成有购买力的市场。

在这一时期，个体小农既要承受资本主义市场中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打击，又要承受农资暴涨和基层税费摊派的压榨，种地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困死在土地上，只能流向城市，出卖劳动力。农村的土地或者低价流转给农业资本，或者被粗放经营，甚至大片撂荒。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水利和基础设施，也在集体组织瓦解后，由于长期失修而逐渐损坏殆尽。2000年全国夏粮大幅减产9%的危机，是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直接反映。

事实说明，“三农问题”并不是所谓“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而是集体经济制度被破坏、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农资垄断涨价和中修基层财政剥削共同作用的结果。包产到户后的个体

小农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稳定的小商品经济，而是被国家收购制度、农产品价格、农资市场、基层税费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同支配的脆弱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老一代小农被迫转化为第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汇入城市产业大军，成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经营道路。

让我们来看一段中修材料的供述：

> 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1979至1984年的四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到了1989至1991年就只剩下1.7％了。1992至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这四年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
> 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占人

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在许多地方，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了，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愿意种？2000年全国夏收粮食减产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还能稳得住，那么，再过几年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在这种情势下，农业能不危险吗？

农村的市场化复辟，是由农民阶级的苦难铺就的。

二、延迟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正如上文所言，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根本上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归还给劳动人民。它当然可以在工人阶级斗争压力下、在危机威胁下、在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下，采取提

高工资、扩大福利、国家干预、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改良手段，暂时缓和矛盾，甚至把一部分过剩产品以各种形式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让步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这是因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生产的目的就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追逐利润。改良可以暂时扩大一部分购买力，却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可以暂时推迟危机，却不能取消生产无限扩张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和阶级冲突，却不能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

当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时，资产阶级通常会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扩大出口、争夺海外市场、输出资本和控制资源，把危机向外转嫁。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相互争夺，最终必然加剧国际冲突直至导致战争。

在国内，资产阶级国家还会通过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扶持、福利市场化、消费信贷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把一部分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吸收到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中。这样做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是把矛盾推迟、转移和扩大。

中修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在国内依靠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手段，暂时缓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造成的压力。

扩张海外市场

中国在经过一轮轮资本主义改革后，逐步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创造了强大的国防和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些成果被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成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复辟、推进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

复辟初期的中国，首先是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让利，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国际资本转移产业、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场所。在加入 WTO 前后，中国主要还是低端商品输出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链中的加工基地，其对外扩张表现为商品输出和承接国际资本。这一阶段，中国已经并没有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全面的帝国主义争霸。

中修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中修继续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世界资本提供生产基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官僚垄断资本的积累，中修开始鼓励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这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停留在单纯的被动依附的位置，而是在依附、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

中修供认：

>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江泽民同志在97年就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概念，缺一不可。

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 同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的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情况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为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2000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就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年，就把它写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是适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之后，胡锦涛主席有一系列的指示，“要积极鼓

> 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改善服务和监管，务求实效”。“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这既是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
>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修的“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向外扩张的表现。2001年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被更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低端制造品输出国和国际资本积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同时，这也为中国官僚垄断资本日后扩大其海外经营，进行资源控制、工程承包、资本输出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条件。

加入 WTO 后，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商品输出迅速积累资本。随着规模扩大，官僚垄断资本开始向外寻求市场、资源和投资空间。

面对国内市场的饱和，官僚垄断资本亟需向外转移矛盾。它不仅需要输出商品与资本，更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以及保护海外利益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修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和军事投送能力，正是这一扩张需求的体现。因此，中国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从产业链摩擦升级为全面竞争。矛

盾的双方均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扩大国内市场

中修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仅向外扩大市场、输出商品和资本，而且在国内通过国家投资、信用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城镇化和消费刺激等方式，暂时扩大有效需求。

90年代末，中国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紧随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外部市场受到冲击，出口吸纳过剩商品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修不得不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采取的并不是提高劳动人民实际收入、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办法，而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国家出面扩大投资，以此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出口。

中修文章供认：

> 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 1998—2002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吸收了一部分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也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建筑、交通等相关产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改变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它只是通

过国家投资和信用扩张，把危机暂时压下去，并把新的矛盾积累到财政、金融、地方债务和产业结构中。

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逐步被卷入地方财政和金融扩张的体系中。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结合在一起，使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金融资本和建筑产业链共同依赖的增长领域。这里不能简单说“房地产变成商品”本身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办法；更准确地说，房地产是在国家投资、土地财政、城镇化和信用扩张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暂时吸纳资本、拉动产业链和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领域。

因此，房地产泡沫并不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出路，而是资本主义推迟危机的结果。它一方面暂时带动建筑、钢铁、水泥、家电、金融等行业扩张，另一方面又把沉重的债务压力压到劳动人民身上，并制造出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是中修用凯恩斯主义手段给经济打强心剂的典型。它通过国家投资、信贷扩张和地方融资平台，暂时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是，这种刺激并没有消灭危机，只是把危机推迟到更大的债务规模、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之中。关于四万亿计划，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有详细解释，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除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相关投资外，中修还试图把资本扩张的触角伸向广大内地和农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和部分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为了把这些未被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进一步转化为商

品倾销市场，中修搞起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由国家主导的消费刺激政策。

中修表面上打着“补贴惠农”“改善生活”的旗号，实质上是用有限的财政补贴作诱饵，把城市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中积压、过剩的商品推向原本购买力有限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中修既为部分过剩工业品寻找了出路，也进一步打通了资本下乡的通道，把更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三、斗争的烈火在燃烧

群众斗争的烈火

丰城农民抗税运动

对于丰城农民的抗税运动，我们暂时还没能找到现成的资料，只能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整理出来：

丰城运动主要发生地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六百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二百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 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二百元。 该镇河垄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 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 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讨要说法，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

血债需要血偿！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成为了导火索，丰城农民抗税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闻风而动，开始造乡政府的反了！他们自发地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夷平了乡政府。愤怒的农民将往日鱼肉百姓的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并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曾经欺压人民的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偷了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才得以逃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镇压造反农民。农民组织的骨干遂藏进山里。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

受到农民一次又一次革命造反运动的威慑，中修中央不得不通电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迫使中修取消了农业税，暂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传统。党内资产阶级用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地上天国，而它们的地上天国也不会长久了。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中国人

民，自觉地组织起自己的先锋队。而先锋队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终将创造出属于劳动人民的地上天国！

建立新的先锋队的尝试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随着群众斗争愈发激烈，一些革命者主动组成先锋队，自觉地领导革命运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我们已知的第一支先锋队——在中国河南大地上诞生了。然而，由于马毛党的纲领路线没有很好地符合斗争实际，终于被反动政府所镇压了。同一时期，江西丰城爆发了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抗税运动，农民的一场场运动，增长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示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终于迫使中修政府停止了农业税的征收。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有力量的先锋队的领导，参与运动的人民往往在事后遭到倒算，而不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

自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未止息。1976年后，一个又一个革命政党如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黑夜。分析这些政党的经验，对我们今日的革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个革命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贵州清镇、织金“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党”（1976.10–12）

康岩中（原省公安厅科长、省革委副主任）因文革武斗等被中修追捕，1976年11月获悉省委将对其代表的革命派采取措施后，销毁证据、携枪化名逃亡。12月2日至清镇与赵普明

（“社会主义革命党”首领）、陈茂英商议，共同策划扩建基地、攻占遵义/贵阳等。反动公安获情报后，于12月11日在织金县龙场区直接实施拘捕行动。康岩中持枪反击，被敌击伤，几位革命者被逮捕。

湖北宜昌“中国马列毛共产主义党”及关联组织（1976.10–1977.2）

记载于秭归县志（宜昌下辖）卷二十“司法（一）公安”篇。1977年初反动公安机关大规模抓捕革命者，被中修当局定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韩庆侯等核心革命同志印发马列毛著作、筹建无产阶级政权雏形，革命活动被本地叛徒或反动分子举报并暴露后，迅速被反动势力摧毁。革命组织规模较大但隐蔽性差。

四川丰都、石柱“中国(马列)共产党”（1976.12）

属西南基层自发反动响应，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组织规模小、活动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复辟与筹建，极可能因集会或传单被当地反动治保/公安发现，短期内被摧毁。无具体抵抗记载。

云南广南那洒“中国马列党”（?–1977.4）

管兴林等革命同志以学习毛著、反修宣传为主，针对地方走资派。1977年春被反动势力破获，属云南同期反动清查运动的一部分。很可能通过农村基层叛徒举报或宣传材料暴露。

河南洛阳涧西“中国马列共产党”（1978.12–1980.4）

崔新福等革命同志以工厂工人、老造反派为主，在工业区开展革命活动。被反动势力依赖厂区保卫系统监控与叛徒举报（明确针对“两个凡是”及资本主义复辟措施）破获，革命活动持续约1年半后被中修收网。

云南威信“中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1978–1981）

熊永章、熊永华、韩正远等革命同志筹建“全国性中央委员会”、印发革命纲领、面向农村开展活动。1981年前后被反动势力抓捕。地方反动公安通过农村监控网络发现革命筹建活动。

江苏徐州“毛泽东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关联（1981.3–1983）

1983年7月起组织7位革命同志组成“中国人民党”，策划夺取武器、摧毁反动要害、劫车上山开展游击战。在1983中修“严打”第一战役中被反动公安机关“一网打尽”（情报汇总后集中突击抓捕）。

甘肃武威、张掖、金昌“中国劳动党”、“人民军”（1982）

任××、杨××、解××等同志在农村/农场筹建“劳动党”及武装“人民军”。通过学习毛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活动痕迹被发现，1982年被中修破获。

安徽霍山“中国劳动党”（1982）

面向贫苦农民/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并建党。被中修同期镇压。基层叛徒举报或会议暴露后快速被摧毁。

河南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

这是1985–2000年间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全国影响的马列毛主义党，直接回击了中修国企的私有化改制，是下岗潮中工农群众觉醒的典范。革命成员主要为登封及周边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峰值近2800人（中修公安确认1031人：899农民、百余工人/教师/干部/退休人员；90%初中以上文化，2/3为25–45岁）。明确宣布现中共已蜕变为“堕落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工具，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印发毛主席著作与《彻底摧毁邓氏集团》革命纲领；设立宣传、劳工、军事、妇女等部门及县区委书记；组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结合下岗潮欠薪、失业抗争，号召“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公社。

1995年起反动公安机关正式立案“重点侦察”，设立专案组（专案名称即含“彻底摧毁邓氏集团”），因基层叛徒报告发现王五州（自称“河南省委特派员”）等革命同志在登封及周边工厂/农村组织学习小组、印发毛主席著作与革命纲领、设立部门、筹建“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性质）。线索来源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革命活动痕迹（集会、材料传播）被单位保卫或治保反动分子举报。经数年秘密监控、跟踪、材料搜集，1998–1999年中修当局大规模统一抓捕行动，王五州等核心革命骨干被捕（王判15年，臧永钦/董得安原判10年，后减刑释放）。全体革命成员被列“重点人口”监控、强迫悔过。张文正（跨登封–许昌组织者）等国企下岗工人革命活动与登封核心联动，1995年后纳入同一专案侦察。同样由于厂区保卫系统发现宣传“继续革命”、反对卖厂等材料，结合登封线索交叉锁定。1998–1999同期被中修抓捕收网。

河北永金“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1999.5.16–2000）

用户“永金”指河北正定县“永进化工厂”（或简称永金/永进）。王世吉同志（化名“毛继东”，一人自任书记）1999年5月16日在工厂宣布成立革命组织，设计党旗党徽，5月18日起寄送数十封批判信（邓、江为修正主义，呼吁恢复毛泽东的路线）给中修中央。信件被邮检截获或工厂保卫发现其革命活动痕迹，石家庄市反动公安于1999年8月12日直接抓捕。2000年11月王世吉同志被中修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3年，2002年8月释放。

以上所述的这些政党，无不因其自身的弱点，而终于被资产阶级政府所剿杀。在今天，中国的先进分子应当吸取这些政党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经验，进行新的斗争。

在阶级构成上，这些政党的成员主要为国企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老造反派、基层教师/退休干部。以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为例，反动公安确认1031人中有899位农民、百余位工人，约90%的成员拥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2/3为25–45岁青壮年。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直接受害者，对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仇恨最深，自发要求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经验较丰富，比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建党”更先进。

在下岗潮和农村“第二轮圈地”过程中，亿万工人农民开展了罢工，游行，维权和请愿等自发斗争，但这些政党大多停留在成立学习小组、印发纲领和设立空头部门等初步阶段，并未将这些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有组织的革命高度。结果，先锋分

子脱离了群众，许多群众虽抱有同情，却未能被充分动员起来保护这些组织。

复辟初期，阶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走资派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户籍制度、单位管理和治安网络，而新生资产阶级则利用“改革红利”暂时麻痹了部分中间阶层。这些政党代表的是被打倒的无产阶级中觉醒的部分，而并没有广泛发动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广大群众。

今天的我们，必须深入融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入手，例如讨要欠薪和反对征地，逐步建立起工农联盟的战斗组织。脱离阶级的实际，单纯宣布建党，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病。

在路线上，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时期（1976–1999年），这些政党未能充分认识到复辟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她们试图在短期内“重建中央”、筹备人民军队，更有甚者，将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寄信呼吁中央辞职。例如，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从1991年的学习小组起步，到1995年被专案侦察，仍坚持公开印发《彻底摧毁邓氏集团》等材料，缺乏地下的隐蔽埋伏的策略。

这些政党生搬硬套文革时期的夺权和学习小组形式，未根据如城市下岗潮和农村分田单干等新条件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有些小型政党，如河北王世吉一人成立的革命共产党，更像是萨布林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此外，它们未能在新的历史阶段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问题。她们虽然正确地将修正主义集团

视为敌人，但对中国阶级和阶级变化判断不足，没有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复辟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为自己制订正确的策略，导致自身陷入孤立。

在组织方法上，这些政党的保密与地下工作的方法极为薄弱，她们多采用手抄或油印材料、邮寄批判信件，以及通过集会发展成员等方式，全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根据公安志的记载，通过邮检截获、单位保卫部门举报、治安网格监控，以及抓捕一人即可挖出全案等手段，导致组织轻易暴露。这些反映了以上的政党缺乏如单线联系隔离措施、假身份，以及以工会或学习小组为外衣的合法掩护。

另外，这些组织中最大的尽管发展了两千余人，但群众工作与组织纪律严重脱节，既缺乏严密的纪律训练，也没有建立“支部建在连上”式的战斗堡垒。领导骨干集中暴露，核心成员一抓即全网崩塌。

组织建设必须服从于革命路线，并具备铁一般的纪律和灵活的地下工作方法。这些政党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拥有良好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也无法保存力量。

今日中国

在今日的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随着革命的发展，许多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面对似曾相识却又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办？这已经成为了组织前进还是瓦解的关键问题。

目前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有哪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呢？

工人革命路线与政治报路线

首先，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与先中央后地方的政治报路线之间的分歧。

从以上各党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政党的成立，往往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因而最终在中修的打击下很快地失败了。这些政党都有一个共同模式，即先成立党中央与各部门，而这个党中央往往难以担负起党中央的职责，所谓党中央往往徒有其名。因此，这些组织如地基不稳的房子，一旦受到震动，便迅速垮塌。

今日的政治报派，仍然重复了这条先中央后地方的组织路线。今日的我们，应当注意历史的经验，不要重复曾经的错误，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工人革命路线。

政治挂帅与义气挂帅

现在的融工组织中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政治挂帅，即在所在的地区寻找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深重，仇恨修正主义的人，同他们接触，并引导他们认识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另一种是义气挂帅，即在所在地一区广交朋友，吃饭喝酒cosplay，并同和自己玩得好的朋友交流政治，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从曾经的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发现，义气挂帅的路线，不是在今天就已经出现的新东西，而正是刘少奇1936-1937白区工作黑线的当代翻版。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的第七点这样说明其白区工作黑线的：

>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它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重点是“改善工人生活”“争取大多数”“广交朋友”，把经济要求、群众福利放在首位，只在“玩得来”的群众中活动，不系统灌输马列主义、不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使白区党组织靠“合法社交”“广交朋友”维持，极易暴露并被敌人一网打尽。而这条黑线的的结果，是白区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坏，且未能有效积蓄和恢复力量。

无独有偶，1990年代的登封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也同样采取了“广交朋友”的路线，结果组织内鱼龙混杂，组织人数看上去很多，但是没有力量，最终在反动警察与叛徒的共同破坏下失败。

今天的部分融工组织，并没有认识到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的坏处，甚至将刘少奇白区工作黑线奉为圭臬，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扔掉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黑线。

改开没有“解放生产力”

前言

中修官方和自由派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们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以此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天经地义的，是进步的。然而他们唯一的“依据”就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本国境内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所谓GDP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投机，什么股票房地产，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这样的浪费生产力的投机，更没有虚增GDP的严重通货膨胀，用GDP来论证经济发展就是虚假的。中修政府前总理李克强也指出GDP是含水量严重的，能源消耗量、发电量和货运量才是最真实的标准。

如果你要质疑数据，我们引用的都是中修官方的数据，你先质疑中修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1950-2011年的全国经济发展增长量进行整理比较，相信任何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做出比较后都能得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要好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本文根据50年以后的政治经济阶段把62年的发展划成若干个时期，并加以简要说明，把各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农业比较特殊，因为历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心人士”在农业问题上总是攻击集体化、人民公社，污蔑集体农业效率低下，而中修肢解社会主义最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那么，为了对比，在农业问题上，本

文主要按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的时期作对比，这样的分期上和工业的数据有所不同。

本文把49年之后的年份，划分成了若干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划分的，并不完全按照“五年计划”或是整十年的比较，因为这样会把一些明显联系的经济形势割裂开来。

本文时期划分的标准、计算方法和资料来源

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时期划分

工业和交通运输是联系比较紧密的领域，所以把他们的阶段按统一标准划分。

1. 1949–1952年 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2. 1952–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
3. 1957–1960年 大跃进
4. 1960–1965年 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期
5. 1965–1968/69年 文革初期革命和反革命激烈交锋的时期，文革时期的夺权、大规模街头群众运动、“武斗”集中在这三年时期。很多工人造反派和工人保守派为了参加运动都停工了，某些省委市委在夺权前摆烂还搞经济主义搞乱生产，比如上海市委。部分数据因68年最低，为了“公平性”剔除恢复性增长，延长到69年。
6. 1968/69–1976年 文革较“平静”的时期，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大规模的街头群众运动和“武斗”结束。简单地说是“抓革命 促生产”时期。

7. 1976–1978年 华国锋时期，“洋跃进”发生在这一时期，“四三方案”的项目多在这一时期建成投产
8. 1978–1985年 改开初期，推行承包制、减少投资导致工业增长率降低
9. 1986–1989年 价格闯关、价格双轨制官倒私倒期间。
10. 1989–1991年 “调整期”，89运动后自由派失势，鸟笼经济派“保守派”掌权
11. 1991–1997年 “南巡”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经济开始了一轮迅速的“过热”。
12. 1997–2000年 大下岗、国际上“亚洲经融危机”爆发并蔓延至全球。
13. 2000–2011年 危机之后的“黄金十年”
14. 2001–2007年 “黄金十年”中含金量最高的“纯金六年”
15. 2008–2011年 “四万亿”刺激起作用的三年

农业的时期划分

农业的划分有些不同，按照农业集体化的情况，在农业问题上对时期划分做了一些调整。

1. 1949–1952年 全国性的土改和推广互助组、合作社
2. 1952–1958年 全面推广合作社
3. 1958–1961年 三年困难时期农业减产
4. 1961–1966年 困难后的经济调整，“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理论被毛主席击退，集体化得到巩固。
5. 1966–1979年 直到1979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还不到全国的1%，但在一些省，如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大面积铺开。
6. 1979–1984年 开始下大力在全国推广“包产到户”，同时解散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五年
7. 1984–1989年 包产到户的第二个五年
8. 1989–1994年 包产到户的第三个五年

9. 1994–1999年 包产到户的第四个五年
10. 1999–2004年 包产到户的第五个五年
11. 2004–2009年 包产到户的第六个五年
12. 2009–2014年包产到户的第七个五年

计算方法来和资料来源

因为要把不同时期发展情况作比较，所以比较的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尤其是年平均增长率而不是绝对值。增长率为复合平均增长率，不是算术平均值。

本文中的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修官方出版的统计资料。

能源相关增长率及其分析

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是两个宏观的反应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指标。

1. 能源消耗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38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中国统计年鉴2012》7–2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1996年后的数据有差别，在2010年被修改了，前者中记载1996为138948，后者记载为135192，前者记载2008年数

据为285000，后者记载为291448。暂且在1996年后的部分采用后者的数据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3	5411	–	–	–
1954	6234	15.21%		
1955	6968	11.77%		
1956	8800	26.27%		
1957	9644	9.59%	1954–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15.54%（一五计划）	
1958	17599	82.49%		
1959	23926	35.95%		
1960	30188	26.17%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46.28%（大跃进）	
1961	20390	−32.46%		
1962	16540	−18.88%		
1963	15567	−5.88%		
1964	16637	6.87%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5	18901	13.61%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8.94%（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20269	7.24%		
1967	18328	-9.58%		
1968	18405	0.42%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0.88%（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22730	23.50%		
1970	29291	28.86%		
1971	34496	17.77%		
1972	37273	8.05%		
1973	39109	4.93%		
1974	40144	2.65%		
1975	45425	13.16%		
1976	47831	5.30%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2.68%（文革稳定期）	
1977	52354	9.46%		
1978	57144	9.15%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9.30%（华修时期）	1954–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9.89%（改革前25年）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9	58588	2.53%		
1980	60275	2.88%		
1981	59447	-1.37%		
1982	62067	4.41%		
1983	66040	6.40%		
1984	70904	7.37%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3.66%	
1985	76682	8.15%		
1986	80850	5.44%		
1987	86632	7.15%		
1988	92997	7.35%		
1989	96934	4.23%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6.45%（价格闯关）	
1990	98703	1.82%		
1991	103783	5.15%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3.47%（鸟笼经济）	
1992	109170	5.19%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3	115993	6.25%		
1994	122737	5.81%		
1995	131176	6.88%		
1996	135192	3.06%		
1997	135909	0.53%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4.60%（南巡后）	
1998	136184	0.20%		
1999	140569	3.22%		
2000	145531	3.53%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2.31%（大下岗和亚洲金融危机）	1979–2000年（改革后22年）
2001	150406	3.35%		
2002	159431	6.00%		
2003	183792	15.28%		
2004	213456	16.14%		
2005	235997	10.56%		
2006	258676	9.61%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7	280508	8.44%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0.95%（纯金六年）
2008	291448	3.90%		
2009	306647	5.21%		
2010	324939	5.97%		
2011	348002	7.10%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8.25%（黄金十年）	

2. 发电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37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7-6电力平衡表、《中国统计年鉴2012》7-6电力平衡表、《中国统计年鉴2013》8-6电力平衡表。《资料汇编》与《年鉴》的记载数据在1995年有少量差别，已改为年鉴中的数据。《年鉴》中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已按《汇编》中的格式四舍五入。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43	-	-	
1950	46	6.98%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1	57	23.91%		
1952	73	28.07%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19.29%（恢复期）	1949–1952年：改革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92	26.03%		
1954	110	19.57%		
1955	123	11.82%		
1956	166	34.96%		
1957	193	16.27%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21.46%（一五计划）	
1958	275	42.49%		
1959	423	53.82%		
1960	594	40.43%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45.46%（大跃进）	
1961	480	−19.19%		
1962	458	−4.58%		
1963	490	6.99%		
1964	560	14.29%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5	676	20.71%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2.62%（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825	22.04%		
1967	774	-6.18%		
1968	716	-7.49%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1.93%（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940	31.28%		
1970	1159	23.30%		
1971	1384	19.41%		
1972	1524	10.12%		
1973	1668	9.45%		
1974	1668?	-		
1975	1958	17.39%		
1976	2031	3.73%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3.92%（文革稳定期）	
1977	2234	10.00%		
1978	2566	14.86%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2.40%（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4.67%（改革前26年，不包括恢复期）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9	2820	9.90%		
1980	3006	6.60%		
1981	3093	2.89%		
1982	3277	5.95%		
1983	3514	7.23%		
1984	3770	7.29%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6.62%（“解放生产力”）	
1985	4107	8.94%		
1986	4495	9.45%		
1987	4973	10.63%		
1988	5452	9.63%		
1989	5848	7.26%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9.18%（价格闯关）	
1990	6212	6.22%		
1991	6775	9.06%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7.63%（乌笼经济）	
1992	7539	11.28%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3	8395	11.35%		
1994	9281	10.55%		
1995	10077	8.58%		
1996	10813	7.30%		
1997	11356	5.02%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8.99%（南巡后高潮期）	
1998	11670	2.77%		
1999	12393	6.20%		
2000	13556	9.38%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6.08%（大下岗）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7.86%（改革后22年）
2001	14808	9.24%		
2002	16540	11.70%		
2003	19106	15.51%		
2004	22033	15.32%		
2005	25003	13.48%		
2006	28657	14.61%		

年份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7	32816	14.51%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4.18%（纯金六年）
2008	34669	5.65%		
2009	37033	6.82%		
2010	42072	13.61%		
2011	47130	12.02%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1.99%（黄金十年）	

首先看能源消耗量，1969-1976年的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长率为12.68%，高于改开之后的所有历史时期，只有2002-2007的“纯金六年”才追平，其他大多只有这一时期的1/2-1/4之间；再看发电量，1969-1976年的发电量年均增长率为13.92%，仍然是傲视改开之后，也是只有“纯金六年”小幅超过。

能源消耗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晴雨表，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文革稳定期这两项指标的高速增长正说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如果这都算“濒临崩溃”那么改开后尤其是改开前20年的低速增长（1979-1997能源消耗量年均4.5%，发电量年均7.7%）又算什么呢？

当然，这两项指标增速下降有能源利用率提高的原因，但用不着拿这一点来为1979-2000年的低速发展辩护，因为并没有什么技术让能源利用率一下提高几倍，也没法解释为什么2001-2011年这两项指标的高速增长（难道说节能技术忽然间又消失了？）。

农业增长率及其分析

1. 粮食产量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03.农业 主要农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01》12-17.主要农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13-15.主要农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15》13-17.主要农产品产量。1983年鉴记载的与2001年的不同，1982年产量在次年年鉴记载为35343，2001年和1984年年鉴记为35450.0，以当年为准。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49	11318	-	-	
1950	13213	16.74%		
1951	14369	8.75%		
1952	16392	14.08%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13.14%（土改、恢复期）	-
1953	16683	1.78%		
1954	16952	1.61%		
1955	18394	8.51%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56	19275	4.79%		
1957	19505	1.19%		
1958	20000	2.54%	1953–1958年年平均增长率3.37%（互助组、合作社）	
1959	17000	−15.00%		
1960	14350	−15.59%		
1961	14750	2.79%	1959–1961年年平均增长率−9.65%（三年灾害）	
1962	16000	8.47%		
1963	17000	6.25%		
1964	18750	10.29%		
1965	19453	3.75%	1962–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7.16%（三年后恢复期）	
1966	21400	10.01%		
1967	21782	1.79%		
1968	20906	−4.02%		
1969	21097	0.91%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70	23996	13.74%		
1971	25014	4.24%		
1972	24048	-3.86%		
1973	26494	10.17%		
1974	27527	3.90%		
1975	28452	3.36%		
1976	28631	0.63%		
1977	28273	-1.25%		
1978	30477	7.80%		
1979	33212	8.97%	1966-1979年年平均增长率3.89%	1953-1979年年平均增长率2.65%（集体化27年）
1980	32056	-3.48%		
1981	32502	1.39%		
1982	35343	8.74%		
1983	38728	9.58%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84	40731	5.17%	1980–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4.17%（分田单干初期，第一个五年）	
1985	37911	-6.92%		
1986	39151	3.27%		
1987	40473	3.38%		
1988	39408	-2.63%		
1989	40755	3.42%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0.01%（“积极性最高”后）	
1990	44624	9.49%		
1991	43529	-2.45%		
1992	44266	1.69%		
1993	45649	3.12%		
1994	44510	-2.50%	1990–1994年年平均增长率1.78%（分田单干后第二个五年）	
1995	46662	4.83%		
1996	50454	8.13%		
1997	49417	-2.06%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98	51230	3.67%		
1999	50839	-0.76%	1995-1999年年平均增长率2.69%（分田单干后第三个五年）	
2000	46218	-9.09%		
2001	45264	-2.06%		
2002	45706	0.98%		
2003	43070	-5.77%		
2004	46947	9.00%	2000-2004年年平均增长率-1.58%（分田单干后第四个五年）	1980-2004年年平均增长率1.39%（单干25年）
2005	48402	3.10%		
2006	49804	2.90%		
2007	50160	0.71%		
2008	52871	5.40%		
2009	53082	0.40%	2005-2009年年平均增长率2.49%（分田单干后第五个五年）	
2010	54648	2.95%		
2011	57121	4.53%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较上年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2012	58958	3.22%		
2013	60194	2.10%		
2014	60703	0.85%	2010-2014年年平均增长率2.72%（分田单干后第六个五年）	

可以看见，集体化时期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外，粮食产量都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农村主要为互助组和合作社的一五期间年均增长有3.54%，农村主要为人民公社的1966-79年均有3.89%（三年后的调整期也增长很快，不过这个有恢复性增长的因素，1956-1958年丰收，1963才重新超过）。

然而包产到户呢时期呢？1980-198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17%，很漂亮的数据，看起来似乎包产到户起了作用，但是之后包产到户的神力就一下子消散如烟了，1985-1989平均增长率就暴跌到0.01%，几乎是没有增长，之后虽然增长率起起落落，但都是在66-79以下，1999-2004年甚至出现-1.58%的负增长，即使是比较好的2010-2014时期也只有2.72%。集体化27年间（1953-1979）总的平均增长率为2.65%，而包产到户后25年（1979-2004）总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39%，明显的低于集体化时期。而这还是在农业技术如化肥（据中修统计年鉴记载的化肥增产不少）、农药、育种取得突飞猛进的基础上的。仅举一例，1970年统计年鉴上第一次出现了化肥施用量的统计，当年化肥施用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比为29.45千克/公顷，1979年为91.09千克/公顷，到1989年增长到210.07千克/公顷，1999年增长到364.46千克/公顷，2013年达到顶点528.53千克/公顷，是1970

年的17.95倍。即使在这样巨量化肥的堆积下，包产到户小生产下粮食产量仍然增长乏力。（包产到户后的化肥、农药、育种、水利工程的大规模运用也离不开前三十年在这方面投入，典型如73计划与大跃进大修水利。）

包产到户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生产又回到“谷贱伤农”的时代了，往往一次大丰收之后，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是下降，种地的积极性受挫，这在粮食产量的波动中明显的表现出来。比如1984年是个大丰年，但是大丰收以后粮食产量大跌并增长缓慢，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重新超过1984年。这种事情又再次在世纪末发生，1996-99年是连续四年大丰收，其中1998年是顶点，但是2000、01、03年都出现大跌，长期增长缓慢，直到2008年才重新突破1998年产量（然而现在的媒体从2003年这一底谷开始计算，得出2004-2014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大喜讯）。这样的大幅波动在集体化是容易克服的，集体化近30年，除了大跃进期间粮食大减产外，粮食产量保持稳步增长或持平，没有出现过暴涨暴跌现象。

在“十一连增”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是粮食自给的隐忧越来越大。因为包产到户后粮食长期增长缓慢（1980-2003年，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1.09%，而1953-78年是2.41%），为了维持粮食自给。特社只能弃卒保车，放弃大豆的等油料作物的自给，放开了油料作物的进口。1990年油料作物进口还不到1万吨，2001就增长到2066万吨（到2014年增长到7140万吨）。放弃油料作物的自给，可以释放出油料作物的耕地，一部分能转产粮食。

而粮食的进口中修现在坚持的红线是进口量不超过国内产量的5%，“九联增”后的2012年全年的粮食进口占国内产量的

2.2%，似乎不怎么多，但这已是2011的3倍，2014年谷物进口10600万吨，占2014年粮食产量的106793万吨的9.92%。

2. 化肥用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报》1-31.全国农业生产条件、《中国统计年鉴2010》13-1.农业生产条件、《中国统计年鉴2012》13-1.农业生产条件与农作物播种面积。

年份	化肥施用量（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7	37	-	
1958	55		
1959	54		
1960	66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21.28%（大跃进）	
1961	45		
1962	63		
1963	104		
1964	129	1961-1964年年平均增长率24.07%（大跃进后调整期）	

年份	化肥施用量（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5	194		
1966	–		
1967	–		
1968	–		
1969	–		
1970	351	1965–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12.59%（文革前期，包含冲击生产期，中间没有数据）	
1971	365		
1972	421		
1973	511		
1974	486		
1975	537		
1976	583		
1977	648		
1978	884		

年份	化肥施用量（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9	1086	1971–1979年年平均增长率13.37%（集体化后期，包含文革后期和平修时期）	1958–1979年年平均增长率16.60%（集体化22年）
1980	1269		
1981	1335		
1982	1513		
1983	1660		
1984	1740	1980–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9.89%（分田单干初期，第一个五年）	
1985	1776		
1986	1931		
1987	1999		
1988	2142		
1989	2357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6.26%（分田单干后第二个五年）	
1990	2590		
1991	2805		
1992	2930		

年份	化肥施用量（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3	3152		
1994	3318	1990–1994年年平均增长率7.08%（分田单干后第三个五年）	
1995	3594		
1996	3828		
1997	3981		
1998	4084		
1999	4124	1995–1999年年平均增长率4.45%（分田单干后第四个五年）	1980–1999年年平均增长率6.90%（分田单干20年）
2000	4146		
2001	4254		
2002	4339		
2003	4412		
2004	4637		
2005	4766		
2006	4928		

年份	化肥施用量（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7	5108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3.10%（纯金六年）
2008	5239		
2009	5404		
2010	5562		
2011	5704	2000-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2.99%（黄金十年）	

化肥用量高速增长的时期，正是人民公社发挥集体力量的时期；增速放缓的时期，正是走资派推行包产到户、瓦解集体经济、让农村重新陷入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提高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使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发展；资本主义复辟后，小农经济自发倾向导致投入低效、增长乏力，即使是农业资本家采用机器经营，也由于所有制基础上各行各业的隔绝与竞争的状态，而无法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生产力。

人民公社解散后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改开长达20年，农村完全被抛弃了。整个集体化时期1953-1978年按1950年可比价格，农业支出总共增长了1229.75%，年均增长率10.47%，而在包产到户推行后1979-2006年按1978年可比价格，农业支出增长了426.63%，年均增长率5.32%，1979-1989年竟然萎缩了35.66%。

重工业增长率及其分析

1. 煤炭产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份	原煤（亿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0.32	–	
1950	0.43		
1951	0.53		
1952	0.66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27.29%（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0.70		
1954	0.84		
1955	0.98		
1956	1.10		
1957	1.31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14.70%（一五计划）	

年份	原煤（亿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8	2.70		
1959	3.69		
1960	3.97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44.71%（大跃进）	
1961	2.78		
1962	2.20		
1963	2.17		
1964	2.15		
1965	2.32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10.19%（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2.52		
1967	2.06		
1968	2.20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1.75%（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2.66		
1970	3.54		
1971	3.92		

年份	原煤（亿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2	4.10		
1973	4.17		
1974	4.13		
1975	4.82		
1976	4.83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0.33%（文革稳定期）	
1977	5.50		
1978	6.18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3.12%（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8.98%（改开前26年）
1979	6.35		
1980	6.20		
1981	6.22		
1982	6.66		
1983	7.15		
1984	7.89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4.16%	
1985	8.72		

年份	原煤（亿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6	8.94		
1987	9.28		
1988	9.80		
1989	10.54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5.96%（物价闯关）	
1990	10.80		
1991	10.87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1.55%（鸟笼经济）	
1992	11.16		
1993	11.50		
1994	12.40		
1995	13.61		
1996	13.97		
1997	13.73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3.97%（南巡后）	
1998	12.50		
1999	12.80		

年份	原煤（亿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0	12.99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1.83%（大下岗）	
2001	13.81		
2002	14.55		
2003	17.22		
2004	19.92		
2005	22.05		
2006	23.73		
2007	25.26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0.59%（“纯金六年”）
2008	27.88		
2009	29.73		
2010	32.35		
2011	35.20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9.49%（“黄金十年”）	2008–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8.65%（“四万亿”）

2. 粗钢产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份	粗钢（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16		
1950	61		
1951	90		
1952	135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103.58%（恢复期）	
1953	177		
1954	223		
1955	285		
1956	447		
1957	535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31.71%（一五计划）	
1958	800		
1959	1387		

年份	粗钢（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0	1866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51.65%（大跃进）	
1961	870		
1962	667		
1963	762		
1964	964		
1965	1223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8.10%（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1532		
1967	1029		
1968	904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9.58%（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1333		
1970	1779		
1971	2132		
1972	2338		
1973	2522		

年份	粗钢（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4	2112		
1975	2390		
1976	2046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0.75%（文革稳定期）	
1977	2374		
1978	3178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24.63%（华修时期）	
1979	3448		
1980	3712		
1981	3560		
1982	3716		
1983	4002		
1984	4347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5.36%（“解放生产力”）	
1985	4679		
1986	5220		
1987	5628		

年份	粗钢（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8	5943		
1989	6159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7.22%（价格闯关）	
1990	6635		
1991	7100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7.37%（鸟笼经济）	
1992	8094		
1993	8956		
1994	9261		
1995	9536		
1996	10124		
1997	10894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7.40%（南巡后）	
1998	11559		
1999	12426		
2000	12850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5.66%（大下岗与亚洲金融危机）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6.56%（改开后22年）
2001	15163		

年份	粗钢（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2	18237		
2003	22234		
2004	28291		
2005	35324		
2006	41915		
2007	48929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21.56%
2008	50092		
2009	57218		
2010	63723		
2011	68528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6.44%（黄金十年）	

3. 水泥产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份	水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66	–	
1950	141		
1951	249		
1952	286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63.03%（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388		
1954	460		
1955	450		
1956	639		
1957	686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19.12%（一五计划）	
1958	930		
1959	1227		
1960	1565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31.64%（大跃进）	
1961	621		
1962	600		

年份	水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3	806		
1964	1209		
1965	1634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0.87%（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2015		
1967	1462		
1968	1262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8.25%（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1829		
1970	2575		
1971	3158		
1972	3547		
1973	3731		
1974	3709		
1975	4626		
1976	4670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7.77%（文革稳定期）	

年份	水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7	5565		
1978	6524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8.19%（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2.78%（改开前26年）
1979	7390		
1980	7986		
1981	8290		
1982	9520		
1983	10825		
1984	12302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11.15%（改开初期）	
1985	14595		
1986	16606		
1987	18625		
1988	21014		
1989	21029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11.32%（价格闯关）	
1990	20971		

年份	水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1	25261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9.60%（鸟笼经济）	
1992	30822		
1993	36788		
1994	42118		
1995	47561		
1996	49119		
1997	51174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12.49%（南巡后）	
1998	53600		
1999	57300		
2000	59700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5.27%（大下岗和亚洲金融危机）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10.59%（改开后22年）
2001	66104		
2002	72500		
2003	86208		
2004	96682		

年份	水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5	106885		
2006	123676		
2007	136117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4.72%（纯金六年）
2008	140000?		
2009	164398		
2010	188191		
2011	209926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2.11%（黄金十年）	

4. 机床产量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十八）第41页，其中1952年13.70的数据为误抄统计年鉴中1.37的数据已更正，1962年之前的数据因该资料除了57年其他年份都没有，补充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04.工业 历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99年以后的数据补充于2000-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大型机床的数据只有《工交能50年》记载，因此在1949-1956、1958-1962、2000-2011的时间段内都没有

数据，部分年份有高精度机床的数据，但是没有大型机床的数据。

年份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大型机床（台）	*高精度机床（台）
1949	0.16	–		–	–
1950	0.33			–	–
1951	0.59			–	–
1952	1.37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104.58%（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	–
1953	2.05			–	–
1954	1.59			–	–
1955	1.37			–	–
1956	2.59			–	–
1957	2.80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15.37%（一五计划）		700?	1?
1958	8.00			–	–
1959	11.55			–	–
1960	15.35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76.33%（大跃进）		–	–

年份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大型机床（台）	*高精度机床（台）
1961	5.67			–	–
1962	2.25			–	–
1963	2.22			1016	274
1964	2.81			1158	345
1965	3.96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23.74%（大跃进后调整期）		1490	526
1966	5.49			2052	762
1967	4.07			1233	626
1968	4.64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5.42%（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095	877
1969	8.56			1856	974
1970	13.89			2869	1465
1971	14.57			5540	1990
1972	16.22			6097	2010
1973	18.33			6434	1932
1974	16.45			6058	1876

年份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大型机床（台）	*高精度机床（台）
1975	17.49			6617	1942
1976	15.70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6.46%（文革稳定期）		6064	1942
1977	19.87			6697	2068
1978	18.82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9.49%（华修时期）		6502	2214
1979	13.96			7161	2064
1980	13.36			5143	1741
1981	10.26			2135	853
1982	9.98			2506	852
1983	12.10			3189	1123
1984	13.35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5.56%（“解放生产力”）		3907	1621
1985	16.72			4479	1721
1986	16.37			4682	1618
1987	17.22			4649	1304
1988	19.17			4860	1475

年份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大型机床（台）	*高精度机床（台）
1989	17.87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6.01%（价格闯关）		3866	1117
1990	13.45			2295	1121
1991	16.39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4.23%（鸟笼经济）		3000	1218
1992	22.87			4047	1266
1993	26.20			4851	1537
1994	20.65			3313	2062
1995	20.34			1926	898
1996	17.74			1475	877
1997	18.65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2.18%（南巡后）		1532	633
1998	11.91			942	508
1999	14.22			853	491
2000	17.66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2.69%（大下岗与亚洲金融危机）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0.29%（改开后22年）	–	662
2001	25.58			–	943
2002	30.86			–	–

年份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大型机床（台）	*高精度机床（台）
2003	30.58			–	–
2004	48.72			–	–
2005	51.14			–	–
2006	57.31			–	–
2007	64.69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6.72%（纯金六年）	–	–
2008	71.73			–	–
2009	58.55			–	–
2010	69.73			–	–
2011	88.68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5.80%（黄金十年）		–	–

工业的三个数据，粗钢产量、煤产量、水泥产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可见1969–76年之间的增长率，也高于改开之后的20年的三个主要时期，直到“黄金十年”才反超——水泥就算是“黄金十年”也没有赶超（这十一年还是房地产大膨胀时期）。

1976–1978年华修时期钢产量增长很高，然而钢铁工业设备却没多少增长。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年鉴1985》719页“22.我国钢铁工业主要生产设备拥有量”记载，1975年（该表没有1976年数据）全国共有965座共83113立方米的炼铁高炉，到1978年

也只不过增加到了982座共87204立方米，1984年甚至减少到487座共81488立方米。1975年全国共有96座炼钢平炉共17188吨，1978年增加了两座但是总吨位还减少了，1984年更是减少到89座15635吨。1978年较1975年略有增长的有炼钢电炉、氧气顶吹转炉、轧钢机（增长率最高的一个）、烧结机，不过增长率远远达不到翻倍，绝对下降的还有炼钢转炉。可见，这两年钢铁生产能力并没有多大的进步，钢产量剧烈增长要么是中修造假，要么是因为中国地理条件不好缺乏铁矿石，社会主义时期帝国主义不让进口，资本主义复辟后才进口。

而煤产量、水泥产量就不用多说，也是高于改开后的主要时期，其中水泥产量即使是在房产猛进的那几年仍然低于文革时期。水泥在1968年跌到谷地，1969年高增长率有恢复性增长的因素，文革期间工人参加运动完了又回厂继续生产。但是从1969年开始算，1969–1979这7年年平均增长率仍然有14.33%，高于改开后20年的时期，改开后水泥的增长率没有其他下降的那么明显。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没有机床就造不出机器，然而改开后机床产量绝对值还不如文革。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十八）第41页 记载，1976年全国生产15.7万台机床，增长一年后开始下降，（怎么华国锋这么会搞机床）1982年下降到9.98万台，之后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的26.2万台，之后又剧烈下降到1998年的11.91万台，还不如1970年高。其中大型机床和高精度机床还断崖式下降，1976年生产了6064台大型机床和1942台高精度机床，1980年下降到了5143台大型机床和1741台高精度机床，1981年又下降了一大半，只生产了2125台大型机床和853台高精度机床，到了1999年全国只生产了

853台大型机床和491台高精度机床，还不如1965年。机床是最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化工业增长率及其分析

1. 化肥产量

> 数据来源：《六十年》、2011和12年的统计年鉴

年份	化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0.6	–	
1950	1.5		
1951	2.8		
1952	3.9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86.63%（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5.0		
1954	6.7		
1955	7.9		
1956	11.1		

年份	化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7	15.1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31.09%（一五计划）	
1958	19.4		
1959	26.6		
1960	40.5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38.94%	
1961	29.7		
1962	46.4		
1963	64.8		
1964	100.8		
1965	172.6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33.63%（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240.9		
1967	164.1		
1968	110.9		
1969	174.9	1966–1969年年平均增长率0.33%（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70	243.5		

年份	化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1	299.4		
1972	370.1		
1973	459.2		
1974	422.2		
1975	524.7		
1976	524.4	1970–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16.98%（文革稳定期）	
1977	723.8		
1978	869.3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28.75%（华修并跃进）	
1979	1065.4		
1980	1232.1		
1981	1239.0		
1982	1278.1		
1983	1378.9		
1984	1460.2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9.03%（改开初期）	

年份	化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5	1322.2		
1986	1395.7		
1987	1672.2		
1988	1740.2		
1989	1802.5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4.30%（价格闯关）	
1990	1879.7		
1991	1979.5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4.79%（鸟笼经济）	
1992	2047.9		
1993	1956.3		
1994	2272.8		
1995	2548.1		
1996	2809.0		
1997	2821.0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6.08%（南巡后）	
1998	3010.0		

年份	化肥（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9	3251.0		
2000	3186.0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4.14%（大下岗）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6.08%（改开后22年）
2001	3383.0		
2002	3791.0		
2003	3881.3		
2004	4804.8		
2005	5177.9		
2006	5345.1		
2007	5825.0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9.48%（纯金六年）
2008	6012.7		
2009	6385.0		
2010	6337.9		
2011	6213.1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6.26%（黄金十年）	

2. 硫酸产量

> 数据来源：《六十年》、2011和12年的统计年鉴

年份	硫酸（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4.0	–	
1950	6.9		
1951	14.9		
1952	19.0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68.10%（恢复期）	
1953	26.0		
1954	34.4		
1955	37.5		
1956	51.7		
1957	63.2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27.17%（一五计划）	
1958	74.4		
1959	106.1		

年份	硫酸（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60	133.0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28.15%（大跃进）	
1961	90.4		
1962	96.8		
1963	130.6		
1964	170.4		
1965	234.0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11.96%（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290.9		
1967	198.3		
1968	141.5		
1969	234.3	1966–1969年年平均增长率0.03%（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70	291.4		
1971	357.9		
1972	400.5		
1973	468.1		

年份	硫酸（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4	442.7		
1975	484.7		
1976	450.8	1970–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9.80%（文革稳定期）	
1977	537.5		
1978	661.0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21.09%（华修并跃进）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4.63%（改开前26年）
1979	699.8		
1980	764.3		
1981	780.7		
1982	817.5		
1983	869.6		
1984	817.2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3.60%（“解放生产力”）	
1985	676.4		
1986	763.1		
1987	983.3		

年份	硫酸（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8	1111.3		
1989	1153.3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7.13%（价格闯关）	
1990	1196.9		
1991	1332.9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7.50%（鸟笼经济）	
1992	1408.7		
1993	1336.5		
1994	1536.5		
1995	1811.0		
1996	1883.6		
1997	2036.9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7.32%（南巡后）	
1998	2171.0		
1999	2356.0		
2000	2427.0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6.01%（大下岗）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6.09%（改开后22年）
2001	2696.3		

年份	硫酸（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2	3050.4		
2003	3371.2		
2004	3928.9		
2005	4544.7		
2006	5033.2		
2007	5412.6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2.32%（纯金六年）
2008	5132.7		
2009	5960.9		
2010	7090.5		
2011	7482.7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0.78%（黄金十年）	

化肥产量增长率改开前是改开后的3倍以上，文革稳定期的增长率碾压改开后的任何时期。

硫酸产量增长率改开前也远高于改开后，至少是2倍，文革稳定期的增长率也高于改开后22年中的任何时期。

轻工业增长率及其分析

1. 纱产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37.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14-22.工业产品产量。

年份	纱（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33	-	
1950	44		
1951	49		
1952	66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25.99%（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75		
1954	83		
1955	72		
1956	95		
1957	84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4.94%（一五计划）	

年份	纱（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8	126		
1959	153		
1960	109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9.07%（大跃进）	
1961	67		
1962	55		
1963	68		
1964	97	1961–1964年年平均增长率3.59%（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5	130		
1966	157		
1967	135		
1968	138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2.01%（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181		
1970	205		
1971	190		

年份	纱（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2	189		
1973	197		
1974	180		
1975	211		
1976	196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4.48%（文革稳定期）	
1977	223		
1978	238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0.19%（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5.06%（改开前26年）
1979	264		
1980	293		
1981	317		
1982	335		
1983	327		
1984	322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5.17%（改开初期）	
1985	354		

年份	纱（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6	398		
1987	437		
1988	466		
1989	477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8.18%（价格闯关）	
1990	463		
1991	461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1.69%（鸟笼经济）	
1992	502		
1993	502		
1994	490		
1995	542		
1996	512		
1997	560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3.30%（南巡后）	
1998	542		
1999	567		

年份	纱（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0	657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5.47%（大下岗和亚洲金融危机）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4.72%（改开后22年）
2001	761		
2002	850		
2003	984		
2004	1291		
2005	1451		
2006	1743		
2007	2068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8.13%（纯金六年）
2008	2123		
2009	2393		
2010	2717		
2011	2870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4.34%（黄金十年）	

2. 布产量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37.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14-22.工业产品产量。

年份	布（亿米）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19	-	
1950	25		
1951	31		
1952	38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25.99%（恢复期）	改开前统计不包括恢复期
1953	47		
1954	52		
1955	44		
1956	58		
1957	51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6.06%（一五计划）	
1958	65		

年份	布（亿米）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9	76		
1960	55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2.55%（大跃进）	
1961	31		
1962	25		
1963	33		
1964	47		
1965	63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2.75%（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73		
1967	66		
1968	64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0.53%（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82		
1970	92		
1971	84		
1972	84		

年份	布（亿米）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3	87		
1974	81		
1975	94		
1976	88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4.06%（文革稳定期）	
1977	102		
1978	110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11.80%（华修并跃进）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4.17%（改开前26年）
1979	122		
1980	135		
1981	143		
1982	154		
1983	149		
1984	137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3.73%（改开初期）	
1985	147		
1986	165		

年份	布（亿米）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7	173		
1988	188		
1989	189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6.65%（价格闯关）	
1990	189		
1991	182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1.87%（鸟笼经济）	
1992	191		
1993	203		
1994	211		
1995	260		
1996	209		
1997	249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5.36%（南巡后）	
1998	241		
1999	250		
2000	277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3.62%（大下岗）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4.29%（改开后22年）

年份	布（亿米）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01	290		
2002	322		
2003	354		
2004	482		
2005	484		
2006	599		
2007	675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5.12%（纯金六年）
2008	710		
2009	753		
2010	800		
2011	814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10.30%（黄金十年）	

纱产量增长率在文革时期确实比较低，不过改开后也没好到哪去。说是计划经济不重视轻工业，改开前剔除掉恢复期的高增长的26年平均增长率5.06%仍然比改开后22年的4.72%要高。

布产量终于是改开后增速高于改开前了，但是就高了个零头，远远谈不上“解放”。文革期间布产量较低，只高于改开初期

和大下岗时期，改开后为数不多领先文革的地方，改开22年平均增长率比文革8年高0.23%，太“高”了。

交通运输增长率及其分析

1. 铁路里程

> 数据来源：《六十年》1-43.全国运输线路长度、《中国统计年鉴2012》16-4.运输线路长度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49	2.18	-		
1950	2.22			
1951	2.23			
1952	2.29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1.65%（恢复期）		
1953	2.38			
1954	2.45			
1955	2.56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56	2.65			
1957	2.67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 3.12%（一五计划）		
1958	3.02			
1959	3.23			
1960	3.39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 8.28%（大跃进）		
1961	3.45			
1962	3.46			
1963	3.50			
1964	3.69			
1965	3.80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 2.31%（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3.93			
1967	4.01			
1968	4.03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 1.98%（文革初期冲击生产）		
1969	4.17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70	4.37			
1971	4.53			
1972	4.63			
1973	4.66			
1974	4.75			
1975	4.86			
1976	4.91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2.50%（文革稳定期）	1966–1976年绝对增加0.98万公里（文革10年，年均接近0.1万公里）	
1977	5.06			
1978	5.17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2.61%（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3.18%（改开前26年）
1979	5.30			
1980	5.29			
1981	5.39			
1982	5.33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83	5.46			
1984	5.48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0.98%（“解放生产力”）		
1985	5.52			
1986	5.58			
1987	5.60			
1988	5.62			
1989	5.70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0.79%（价格闯关）		
1990	5.79			
1991	5.78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0.70%（鸟笼经济）		
1992	5.81			
1993	5.86			
1994	5.90		1979–1994年绝对增加0.60万公里（改开后16年，年均不足0.04万公里）	
1995	6.24			
1996	6.49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1997	6.60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 2.24%（南巡后）		
1998	6.64			
1999	6.74			
2000	6.87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 1.35%（大下岗）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1.30%（改开后22年）
2001	7.01			
2002	7.19			
2003	7.30			
2004	7.44			
2005	7.54			
2006	7.71			
2007	7.80			2002–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1.80%（纯金六年）
2008	7.97			
2009	8.55			
2010	9.12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重叠阶段）
2011	9.32	2001–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 2.81%（黄金十年）		

2. 公路里程

> 数据来源：《六十年》1-43.全国运输线路长度，因2005年改变统计口径将村道算入总里程，舍弃了05年之后的数据。“2005年起公路里程包括村道”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49	8.07	–		
1950	9.96			
1951	11.44			
1952	12.67	1950–1952年年平均增长率 16.23%（恢复期）		
1953	13.71			
1954	14.61			
1955	16.73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56	22.63			
1957	25.46	1953–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 14.98%		
1958	42.18			
1959	50.79			
1960	51.00	1958–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 26.06%（大跃进）		
1961	47.70			
1962	46.35			
1963	47.51			
1964	47.92			
1965	51.45	1961–1965年年平均增长率 0.18%（大跃进后调整期）		
1966	54.36			
1967	55.75			
1968	57.17	1966–1968年年平均增长率 3.58%（文革初期）		
1969	60.06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70	63.67			
1971	67.54			
1972	69.99			
1973	71.56			
1974	73.79			
1975	78.36			
1976	82.34	1969–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4.67%（文革稳定期）	1966–1976年绝对增加27.98万公里（文革10年，年均2.8万公里）	
1977	85.56			
1978	89.02	1977–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3.98%（华修时期）		1953–1978年年平均增长率3.18%（改开前26年）
1979	87.58			
1980	88.83			
1981	89.75			
1982	90.70			
1983	91.51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84	92.67	1979–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0.6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5	94.24			
1986	96.28			
1987	98.22			
1988	99.96			
1989	101.43	1985–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1.82%（价格闯关）		
1990	102.83			
1991	104.11	1990–1991年年平均增长率1.31%（鸟笼经济）		
1992	105.67			
1993	108.35			
1994	111.78		1979–1994年绝对增加24.2万公里（改开后16年，年均1.5万公里）	
1995	115.70			
1996	118.58			
1997	122.64	1992–1997年年平均增长率2.77%（南巡后）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阶段）	绝对增加值	年平均增长率（较长时期）
1998	127.85			
1999	135.17			
2000	140.27	1998–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 4.58%		1979–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2.09%（改开后22年）
2001	169.80			
2002	176.52			
2003	180.98			
2004	187.07	2001–2004年年平均增长率 7.46%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改开前的主要时期铁路里程都保持2%以上的增长，在一五和大跃进创下了3.12%和8.28%的惊人速度，1952–1976年，年均增速达3.21%。而改开后很长时间铁路的建设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1980年增长率只有1.25%，1981–1990更低只有0.82%，1990–91又下跌到0.79%，直到1992–1997时期才回升到2%以上，即使是在纯金六年里增长率也只有1.8%。增长率如此，绝对长度呢？1966–76这11年增加了1.11万公里，而1979–95这17年里绝对长度增长了1.08万公里，铁路建设处于爬行状态。

公路的情况也不怎么样， 文革稳定时期的年平均增速是4.67%，这在2001后的时期才超过，增速缓慢的程度和铁路是难

兄难弟。1966-76年增加了30.89万公里而1979-97年公路总里程只增加了29.56万公里，改开19年连绝对值比不上文革11年。

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特色祭出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试图缓解危机的恶化，这被俗称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铁路是投资的重点领域，然后就有了铁路的“跨越式”发展。这之后几年里铁路的发展很快，2009-2011年年均增长有5.35%，2011年后也没有放慢步伐，2012-2014年均增长6.32%，2009-2014一共修了3.23万公里铁路，等于1979至2008年的总和，算是补齐了历史的欠账。公路也是凯恩斯刺激政策的重要一环，2009年以后的公路增速快于2002-2008年，而2011年以后又比2009年有所提高。交通运输的补欠账竟然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因祸得福。

结论

依据中修官方所招供的数据（其中篡改美化肯定也是有的），可以得出结论——所谓“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过是一句谎言罢了。念咒式的污蔑是掩盖不了事实的。如果文革是“十年浩劫”，改开就是二十年浩劫。如果文革是“濒临崩溃”，那么改开就是彻底崩溃。

1978年是个分水岭，1979-1980年比1977-1978年在工业、交通运输、能源的增长率等方面断崖式下跌，发电量跌去1/3，能源消耗量跌去2/3。铁路货运量跌去9/10，之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但是增速也创下新低。有趣的是增速降下来了，但是经济却一点也不“好”，直接表现就是物价上涨，而且有明显的加速趋势，最

后演化为1988年的大涨价和抢购风（物价指数1988年上涨20.68%，次年上涨16.29%），直接引爆了。事实也证明了爬行主义的破产，低速的发展对应的却是物价飞涨、失业上升、治安恶化等局面。

社会主义并没有资产阶级污蔑的那样“停滞、贫穷、僵化”，而是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改革开放”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解放生产力”，而是让生产力爬行发展了20年。

论中修的“军队经商”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几乎无一幸免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操控。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中国革命的精锐武装、长征精神的优秀继承者、作风优良的人民子弟兵，蜕变为了中修政府麾下一支镇压人民的法西斯党卫军。

在社会主义刚被颠覆时（1976年），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极其稳健、底子极其干净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没有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秉持着“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财政原则。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既不欠任何国家的债务（60年代底已还清苏联债务），也没有发行大规模内债。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用最宝贵的三十年，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推入了工业化门槛，建立了独立完备的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水利基础，几乎实现了国家的自给自足。

1977–2011 拆毁社会主义军队并重建资本主义军队的时代

可惜的是 ，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物质基础，都在修正主义上台后被彻底葬送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出现严重的经

济危机，而真正的元凶就是“洋跃进”与资本盲目扩张。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现的上百亿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高达170多亿元），就是由1977-1978年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下的“洋跃进”路线导致。当时官僚集团急于出政绩，在一没有足够外汇、二没有足够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强行宣布要在几年内大搞千个大型工业项目（如宝钢等超级工程），盲目超量引进西方成套技术设备。（八二方案）

这种急功近利的资本扩张瞬间引爆了财政危机。基建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搞配套，直接导致1979年、1980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加剧，市场供应极度紧张。正因为这场由改开派自己搞出来的“洋跃进”引发了严重危机，1979年，身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不得不紧急救火，搞“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强行停建、缓建了大批项目来压低赤字。（中修材料《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事后，邓修集团为了甩锅和自己的利益，将政策失误的代价转嫁给军队，把这场危机当成了“军队要忍耐”的理由。这是因为“洋跃进”导致财政枯竭，邓修集团拿不出钱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砍国防预算、砍尖端科研、裁撤军队，把国防资金抽出来充当“救火资金”。并且，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不再是全世界反动派围剿的对象，而是他们的大救星、大市场、大血包，搞钱成为最优先级，在官僚资产阶级看来，军工科研和庞大的常备军是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纯消费性包袱”，本就该被削减。邓修集团为了证明自己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故意将70年代末自己盲目决策导致的经济危机，扭曲宣传为“计划经济走投无路、毛泽东时代积贫积弱”，从而为后续“退缩、下马、放任军队经商”铺平舆论道路。可是，虽然军工科技的研发，都被秉持”造不如

买，买不如租 “的洋奴哲学的邓小平给叫停了，军队却不可能全部遣散，但国防预算全被侵吞了，军队的吃饭问题该怎么解决？“自我造血”的军队经商政策就为此被提了出来。

自从国防预算被大幅削减后，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从1979年的约18%狂跌至80年代中期的10%以下。扣除通货膨胀，许多部队连基本的伙食费、营房维修费都难以维持。于是，为了维持军队的生存，1984年11月1日，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军队要忍耐”，并明确提出要利用军队现有的设施和能力自谋出路。1985年，中修宣布裁军100万。同年，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出台政策，允许并鼓励军队、武警部队利用自身的设备、技术、地产和运输能力开办企业，搞“农副业生产”和“第三产业”，正式解除了对军队经商的限制。虽然军队经商最初的口号是“补充伙食费、安置转业官兵”，但一旦资本的魔盒被打开，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军队迅速从“搞农副业”转变为利用特权进行高利润的商业投机。（详见《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军队经商除了为中修省钱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政治意义，把军队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既得利益者，防止军队中残留的革命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派别夺取权力。

> 有一次，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谈到他在军队的同学在做生意时，纪登奎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

> 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由于军队独立的军用铁路专线、军用港口码头、军用机场与军用车辆车牌，在80年代中修政府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官倒）期间，军队企业利用军用运输工具，大肆倒卖计划内物资（如钢材、煤炭、木材），赚取巨额双轨制差价。各军区、各大总部将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仓库、营房直接改造成商场、宾馆、夜总会出租，形成早期的军企地产垄断。同时，军属企业享有大幅度税收减免，且地方工商、税务、公安部门无权检查军用设施和军牌车辆，这也为后来江泽民时代的半公开走私埋下了极深的祸根。

在80年代末，各大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已经完成了立规建制，众多军企巨头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1983年，经中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总参谋部装备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联合出资，成立保利集团（Poly Group，前身为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其最初主要从事军火进出口贸易，随后利用其深厚的军方背景与特许经营权，迅速横跨房地产、矿产、艺术品交易等暴利领域，成为总参谋部旗下最庞大的特权资本巨兽。1985年，总后勤部出资创办三九集团（前身为深圳南方制药厂），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在深圳特区疯狂扩张，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医药与跨行业资本帝国。新兴集团（新兴公司）于1989年前后成型，隶属于总后勤部。总后勤部作为管钱、管粮、管装备保障的部门，利用其掌握的全军物资采购和营房土地大权，将新兴集团打造成集房地产、工程建设、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超级军企。（《国资报

告》2019年第4期，《今天，一文带你读懂那些军转央企的前世今生》）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私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他们已不满足于国产奢侈品的享受，而进口汽车、家电、卷烟等物资税率极为高昂。海军部分基地、沿海守备部队及武警，开始利用军用舰艇（如猎潜艇、登陆艇）和军用码头，为地方私营资本或军队自办公司武装护航走私。当地方海关缉私人员想要扣押涉嫌走私的军牌车辆或军用码头货物时，往往遭到军警持枪拦截，地方政法机关根本无权干预，这直接导致了80年代末东南沿海关税的大面积流失。更为恐怖的是，这一切还只是“军警走私”的萌芽，进入江泽民时代后，走私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猖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

1988年前后，全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对于官僚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的“官倒”现象无比愤慨，而军队企业利用军用配额、军用运输线倒卖紧缺物资（如成品油、钢材、进口批文），是当时“官倒”狂潮中最具破坏力、也最不可碰触的一环。

> 姜某是旅游局下属的汽车保养厂厂长。他今年35岁，在省旅游局的中层干部中，以敢于投机和有魄力奢称。他不会修车也不会开车，原是公司车队的调度员，跟局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1985年前，他从广东搞来过十几辆进口汽车倒卖，赚了不少钱。

86年后，进口汽车控制严了。各地奢华排场之风却愈来愈盛，进口小汽车的价格暴涨。现在唯一能搞到进口轿车的地方便是享受种种特区优惠政策的广东，一辆“皇冠”、“丰田”，一转手几万元便唾手可得。

但是，搞到汽车，路上关卡重重，检查站不断，想要顺利的蒙混过关，运回来很不容易。

租军用飞机，姜厂长想出了个绝招。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空军。现在部队也搞经营，只要给钱，飞机不难租到。汽车插翅膀，叫他们防不胜防。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

姜某以购买汽车为名，从银行里骗取了60万元贷款，并以4万元钱与空军签订了运输合同。他带着几个人赶到广东深圳、惠东等地，很快搞到了四部“蓝鸟”和“皇冠”。钱，使各种关节变得畅通无阻。他掏腰包，宴请机场的有关干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当场就拍了胸脯保证装上飞机，当兵的讲义气、守信用。

四辆日产高级桥车空运到了G市郊区的军用机场，修理厂的司机们带上预先准备好的假牌照到机场接车。他们欢欣鼓舞，庆贺大功告成。当他们倒卖汽车被工商部门查获时，姜

某立即把另外三辆未卖掉的转移藏匿。他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谁敢把汽车开走?!要车不给，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当工商局将《暂扣财物通知单》交给他时，他大耍无赖，叫嚷:“我不管法不法，有本事你们枪毙我好了!”

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的狂潮虽然受到了抑制，但查处并不彻底。这几年倒卖进口小汽车活动仍十分猖獗，其手段也更加狡猾和恶劣。倒卖一辆进口汽车可使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已是公开的秘密。《人民日报》1988年10月5日的报道，显示了我们记者和编辑的勇气。《动用警车军车邮车闯关 走私贩私倒卖进口汽车》向我们披露了其中的端倪:

……截至9月底，湖南省工商部门今年查处违章小汽车达372辆。但是，这仅占走私、贩私、倒卖汽车的很小部分，大量来自广东等地的违章过境小车，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下堂而皇之地过关越卡。随着违法购车现象增多，为了逃避检查，许多单位和个人伙同军队、公安、邮电等部门的少数人，利用其工作的方便进行非法购车和倒卖活动。其主要形式有:假借执行公务;挂军牌、安警灯;出具假信件、佯装押送犯人;动用邮车偷运;化整为零，分开装运;有的甚至强行冲关，殴打检查人员。

7月30日，湖南省蓝山县工商局查扣两台“皇冠”车。这是辽宁省清原县交警队从广东省东莞市买的走私车。随车的清原县交警队副队长王胜利等3人在车上挂了带去的汽车牌照，其中一台还安了警灯，伪装到深圳执行公务返回单位。当车被蓝山县检查站查询时，他们先是向检查人员行贿，被拒绝后又强行冲关。

8月31日凌晨，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派副科长宋长海等5人，分别驾驶挂有洛阳市公安局车牌和警灯的日本进口轿车2辆，在蓝山县因无准运证被查扣。其中一辆车冲出一里多远，险些撞倒检查人员。

9月8日，平江县检查站查扣了一辆“广东06-0063”号旧牌照的新邮政车……

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物资管理站从广西南宁军分区购买“皇冠”两台，“蓝鸟”一台。他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手段，将车分解为车壳和发动机等部件，然后用军用车分别装载，偷运出关。9月11日、12日被东安县工商局先后查获。

据透露，还有一些被查扣的小车，由于买方或卖方“后台”硬，“来头”大，工商局及有关部门迫于压力，不得不放

行。

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如果我们的军队、邮电、公安等以及更有“来头”“后台”的部门都卷入市场倒卖的“黑洞”，那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危害，将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详见《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70～72页）

…… 海军某基地的一艘战艇上一派繁忙，副艇长刘文德正在做启航的准备，岑水生这个从未上过政治课，找战士谈过心的指导员此刻郑重其事地召集艇上全体人员作动员：“今晚搞点‘副业’，要到海上接货，运去广州，有报酬，大家都要保密……。”夜幕降下，军艇启锚生火，悄然地驶到香港附近的大蜘州岛海面，这时，一艘机帆船从香港开来，亮过约定的联络信号后，香港走私船便毫无畏惧地靠上军艇，将价值20多万元的30箱录相机吊上军艇之后，开足马力消失在黑夜中，军艇慌忙掉转船头，朝广州方向溜去……（《中国“官倒”“私倒”纪实》第144页）

中修军队及其官僚是如此贪得无厌、利欲熏心， 肆无忌惮的疯狂敛财。然而，中修这样倒行逆施的苛政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八六学潮和六四事件先后爆发，尽管这两次群众运动均遭到中修的铁血镇压，但中修高层终于意识到了军队经商导致的军纪败坏、社会怨气以及对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并频繁出台文件试图“清理”和“整顿”。（详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

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修官方党史《中国军队经商》条目）六四运动被镇压后，1989年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江泽民明确提出“军队要坚决停止经商”，要求坚决收缩。翻阅当时的官方文件（同上），中修高层虽明确下令要求‘军队坚决收缩经营范围、党政军机关彻底与公司脱钩’。可是，在没有财政军费兜底和群众监督等诸多准备措施的前提下，这些行政禁令最终只能沦为了纸上谈兵。正如历史所见，这次整改最终因为军费补贴不足和地方“军阀”阻力，在江泽民年代彻底流产，导致了90年代大规模的走私狂潮。

1989年，六四事件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宣布退休，并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是，江泽民是一个一天兵都没当过、在军中没有任何根基和威望的文职技术官僚，面对军中各大官僚的冷落、甚至暗流涌动的政变威胁，他根本无法通过军事威望来服众。（自由派参考资料）老谋深算的江泽民很明显的察觉到了危机，于是，在1992年10月中修十四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借助清除“杨家将”的机会，解除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军权，并在之后逐步收回了洪学智、萧克、廖汉生等大批老将领的军权。为了填补军中权力真空、安抚各大军区军头，老奸巨猾的江泽民便转而采用了资产阶级最常用的权术——金钱、利益和特权收买。在他的任期内，为了拉拢人心、培植私人势力，他打破了以往克制的晋升惯例，疯狂晋升了数百名将军，只要肯表态效忠、听话，不论是谁都能升官发财，其治军策略明显向“利益赎买、以利换忠”的政治权术倾斜。1993年12月江泽民再次提拔了大批上将。自此，“听话就给挂星升官，放任底下肆意捞钱”成为军队内部不成文的“潜规则”。（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11年任期内，共8次晋升上将，总人数为79人，从建国初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算起解放军总共有164位上将。而

从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算起，解放军则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一大半上将全为江泽民一人提拔，几乎是1955年到1966年第一次施行军衔制时期上将数量的两倍(《军委主席与授衔》)反革命叛徒林彪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的谬论。看来，江泽民的治军理念与他的老前辈林彪真是颇为相似啊！

1992到1993年，随着中修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化），军队经商走向全面失控，军属企业数量膨胀至数万家，涵盖房地产、金融、夜总会等各种暴利行业，保利集团、新兴集团、三九集团等8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老牌企业更是赚的盆满钵满，跃升为军企巨头。

1994年，江泽民在面对香港记者的内部会议中，将其治国与政治作风总结为“闷声大发财”哲学，闷声大发财绝非只是一句调侃，而是中修统治阶级内部最核心的“政治分赃契约”。它的本质是：“你们不要管政治路线、不要搞群众监督、不要问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政治上服从我，我就赋予你们在各自领地里利用行政权力进行资本掠夺、闷声捞钱的无限特权。”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整个90年代，军队的经商、走私、贪腐情况，都已经猖獗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军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东南沿海军队走私比海盗还猖狂，北方军队走私比响马还厉害。我们下面引用的都是中修官方自己的记载和报道，虽然中修政府经常只敢报道一些小事或隐瞒歪曲事实，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军队的腐败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连中修政府自己的不得不承认情况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讲讲改开中性质最严重、涉案金额最大、政治与军事隐患最深厚的典型特大走私与

特权腐败案例，看看中修的军队官僚们究竟是怎么“闷声发大财”的。

1998年，广东湛江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特大走私案，以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绰号“湛江王”）为首的地方官僚集团，联合海军南海舰队、湛江海关、武警部队以及香港买办集团，建立的一条“军地联动、武装护航、海关放行、全额分赃”的走私流水线。该集团通过走私成品油（柴油、汽油）、进口汽车、钢材、糖、香烟等高税率物资，赚取巨额财富。该涉案金额之大，从1996年至1998年初，仅查实的走私成品油就达600多万吨，走私汽车1万多辆，案值高达11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62亿元（90年代年1元≈21世纪20年代10元，按当年汇率和财政收入，这是个天文数字）。由于湛江走私油量极大且免税，直接冲垮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华南地区的正规市场，导致当时国内多家炼油厂被迫停产。由于有军队撑腰，走私者得以动用军用港口与基地，他们通过租用或直接使用海军南海舰队的专用码头、油库和军用机场来卸货，地方海关和缉私队却根本无权进入军港检查。走私货船进入中国领海后，由海军涂装的舰艇或武警船只负责“护航”。货物出港后，套上军车牌照直接运往全国各地，走私全程都有军队武装保驾护航。在遇到极少数不听打招呼的缉私人员，走私集团甚至直接动用武警和海军守备部队持枪与海关缉私人员对峙，强行逼退缉私人员。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的海关与地方政府非但不去制止，反而整体沦陷 ，也参与到其中分一杯羹。例如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被香港走私巨头（如李深、林春华）用巨额现金、豪宅和女色彻底腐蚀。海关不仅不缉私，反而为走私船开具假的“国税扣押证明”或“军用品证明”，使其合法化。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作为一把手，公然为走私集团保驾护航，收受巨额贿赂，甚至

将走私带来的“繁荣”作为自己的政绩夸耀，以求得升官晋级。

1999年，福建爆发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该案的核心人物叫赖昌星，此人是一名流氓无产者，原系福建晋江农民，从小家境贫寒，文化程度极低，但他极具市井投机钻营的天赋，最善投机取巧、低买高卖。80~90年代，赖昌星乘着改开的“春风”，通过各种投机倒把和走私倒卖，赚的是盆满钵满（看看，资本家的资本是怎么积累的，怎么“勤劳致富”的）。赖昌星曾经在大队办的螺丝厂工作，之后5个人合资1500元，每人出300元买锻工工具帮人加工零件，赚了一些钱 。1977年，赖昌星和村民集资办起了汽车配件厂，挣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赖昌星弄来图纸，从无锡请来师傅，开办工厂生产纺织机，每台卖7万5千元，成本只有2万5千元，生意供不应求，之后又办了服装厂、雨伞厂、印刷厂，到移民去香港前，已有几千万资产。 80年代末，赖昌星通过服装贸易、电子产品走私赚取第一桶金，随后获取买办身份，准备移居香港。 1991年，赖昌星正式移民香港，住在侧鱼涌，于两个月后购买比华利山庄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创办香港美好企业有限公司，当时正值香港房地产低潮，公司盈利十分可观 ，这个流氓无赖也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民企业家 ”（职能资本家）。所以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好，文化大革命时期，赖昌星不过是只一名螺丝厂工人，一到改革开放，便靠投机倒把摇身一变，成了个黑白通吃、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可见改开的春风确实是让“人民”“富”起来啦。（详见中修官方出版《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纪实》 ）

“先富”的赖昌星没有遵照“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示去想怎么带动别人“后富 ”，反而一心想着怎么让自己能越来

越富。1994年，赖昌星成立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他敏锐地察觉了当时官僚资产阶级“闷声大发财”的思想氛围，成功利用厦门特区的政策红利与免税优势，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走私帝国。狡猾的赖昌星先是在厦门修建了一座7层楼的“红楼”。这里集高档餐饮、桑拿洗浴、豪华客房、私人影院与赌场于一体，专供各级党政军官员享乐。赖昌星在“红楼”内大量暗置摄像头，利用金钱、美女（甚至安排明星）将官员拉下水，并留存录像作为要挟与控制的筹码。(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绝对内幕：上海小姐红楼锁高官》）赖昌星以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结果成功的控制了一大批官僚。如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赖昌星以豪宅、美女和巨款彻底收买，海关不仅为远华的走私船提供“海关监管护航”，对其货物“不查验、不扣留、不收税”，甚至将海关缉私艇借给赖昌星装运走私货物。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张宗绪、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赵克明等整套领导班子被集体腐蚀，公然在政策、土地、税收上为远华开绿灯。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接培勇等，利用出入境管理权和边防查缉权，为赖昌星保驾护航，甚至在案发前还向赖昌星通风报信助其潜逃。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在厦门的机构，违规向远华集团发放数十亿元贷款，沦为远华走私资本的提款机。（ 金羊网—新快报《厦门远华案犯罪分子审判总体情况》）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该案波及范围直接延伸至国家安全核心中枢的高层军队官僚及其情报系统。姬胜德是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时任总参二部（情报部）部长和少将，掌管全军军事情报网络、对外秘密资金与军工出口通道。赖昌星通过巨额资金贿赂姬胜德（仅查实的现金与资助其妻在美购房款就达数百万美元），将姬胜德彻底拉下水。使姬胜德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提供军事特权，为他签发了大量军用免检车牌、总参秘密通行证，

甚至将远华集团的走私船挂靠在总参情报部的“秘密企业”名下。海关和缉私艇见到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牌照与批文，根本不敢扣查。姬胜德甚至利用总参二部的海外秘密账户，帮助赖昌星将走私所得的数百亿资金洗往海外，而赖昌星也反向资助姬胜德在海外置业、转移资产。据查，姬胜德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130多万元（其中包含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行贿的 365万美元），侵吞及挪用军事用途资金975万元人民币，多用于其个人挥霍及家属在海外购置房产。私自挪用总参谋部下属公司违纪炒股收益250万美元（另包含向美国民主党筹款人汇款的30万美元等）。除了上述美元和人民币，其名下还有数千万港元的巨额资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1999年姬胜德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引发全国震动。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小平时代掌管军队大权的核心人物，其家族成员也被赖昌星拉下水。其女刘超英时任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郑莉则是刘华清儿子刘卓明（后升任海军中将）的妻子，即刘华清的儿媳。当时在总参谋部设局（总参营房与工程建设部门）及军企系统任职。赖昌星通过资助其在海外开公司、提供资金，与其建立利益同盟赖昌星通过港澳买办渠道和总参情报部原部长姬胜德的牵线，搭上了刘超英与郑莉。赖昌星为刘超英在香港及海外设立公司提供巨额启动资金、豪华住房和资金洗钱通道同时，也为郑莉在军用土地开发、营房工程及军企贸易中提供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作为回报，刘超英与郑莉利用其在总参谋部及刘华清家族的影响力，用军方背景在商业和军工贸易领域为赖昌星牵线搭桥，为远华集团的走私活动提供军队背景庇护。这包括帮助赖昌星获取总参签署的军用免检车牌、机要通行证，以及将远华的走私船只和物资包装成“军方秘密采购”或“总参外围企业业务”，使其得以彻底规避海关和缉私部门的查验。随着总

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落马，刘超英与郑莉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和带走调查。中修专案组彻底查清了二人利用军队特权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违规参与商业走私及非法资金往来的事实。二人随后被免去军职，受到中政府修严厉的惩处。

总而言之，我们也并不能说赖昌星完全辜负了邓小平总理的夙愿，因为他的确让福建省的党、政、军、警、宪、特、海关、金融等整个体系乃至中央的官僚都富得流油，而他自己更是赚的盆满钵满，他在军队和当地官僚协助下，走私了大量的成品油、植物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高档电器等货物 ，据查从1996年至1999年案发，远华集团走私货物案值高达530亿元人民币，偷逃国家税款300亿元。，且其将走私的廉价成品油和植物油大量倾销全国，直接冲垮了华南、华东地区的国有石油与粮油产业，导致国家财政巨额流失。（中国青年报《赖昌星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2005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一年后，中修军队又爆发了王守业贪腐大案。王守业于1943年出生于河南广武（今荥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随后应征入伍，长期在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系统工作，一步步做到空军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1995年，王守业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并于1994年晋升少将军衔，执掌全军基建大权。总后基建营房部是全军最有含金量的“肥缺”之一，王守业手握全军营房建设、国防土建工程招标、数百亿房改资金拨付以及全军黄金地段军用土地转让审批的大权。2001年，尽管内部对其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已有检举，但在时任军委高层（包括后来落马的徐才厚等人）的庇护下，王守业跨军种升任

海军副司令员，并于2002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此时的王守业真可谓风光无限、权倾一时。

手握大权的王守业为了揽财，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先是在工程承包中吃回扣，在军用机场、码头、营房等大型国防工程招标过程中，按比例收取承包商的巨额回扣。他还倒卖军用土地，因为改开后城市地产暴涨，军队又拥有大量城市黄金地段的土地，王守业便通过将军用土地低价批给私营开发商或进行商业开发，收受回扣与暗股。他还在其所在的基建系统大肆卖官鬻爵，在总后基建营房系统内部明码标价，将下属营房处长、副部长的提拔与工程分配挂钩。王守业还利用金钱和职权，长期包养了多名情妇，包括文工团演员、医院护士及基建系统内部的多名女性，并为她们购买豪宅、提供资金。

王守业落马后，中修专案组对其位于北京、南京等多处豪宅进行搜查时，查抄出大量外币现金、黄金以及高档名酒。部分巨款甚至被他直接装在军用密码箱和防潮抽湿箱中，藏于墙壁暗格与地下室内。2006年中修军事法院查实，王守业受贿及挪用公款竟高达1.6亿元人民币！（2006年1元≈2026年5元）王守业案从江泽民时代起横跨十年时间 ，最终因几名被王守业抛弃的情妇联合举报，写了上百封举纸材料，不仅向中央军委纪委、最高检检举甚至连续数周身着便服挂着举报牌，在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以及海军重要会议场所外拦截领导车辆、散发举报信。 这一极其公开化的丑闻彻底才将王守业的黑幕曝光在全军面前，最高层也无法再进行包庇，才被迫下令成立专案组彻查，否则，王守业还要猖狂多少年仍是个未命题。（《王守业贪污1.6亿，2005年“双规”后却被放出，他叫嚣：我摆平了》）

从以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中修军队已经彻底烂完了！从上到下个个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军队”的样子？分明就是一群国民党兵痞！一支法西斯军阀部队！

中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看到军队经商和走私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安稳后，感到坐不住了，早在1996年就提出军队应当禁止经商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支持。1998年，问题越来越严重，朱镕基感到问题不能再拖，于是再次向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强烈要求禁止军队经商。

在1998年7月15日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朱镕基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走私主力已经不仅仅是沿海的渔民或犯罪团伙，而是演变成了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的法人走私。他还在讲话中证实，部分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分子已经与走私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保护伞。现行缉私体制存在重大漏洞，由于海关、公安、工商等部门各自为战，且部分地方执法人员被腐蚀，导致缉私效率极其低下。（详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而军中走私物品更是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中修小粉红嘲笑外国毒品猖獗，却不知外国毒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据BBC2001年3月28日消息，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他们每年向菲律宾提供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冰毒”。戈莱日希望中国能够制止毒品运送到菲律宾。他说，若中国毒品走私减少50%，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菲律宾称中国军人走私毒品》）

终于，江泽民在这次“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正式上宣布，军队、武警、政法和公安系统不准再经商，并在12月底完成“脱钩”，向地方政府交接业务。江泽民从原来的纵容军队经商，到后来的禁止经商，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动作，但是，身为道貌岸然的虚伪“变色龙”，江泽民背后的动机却是一脉相承的。美国银行资本家、资产阶级文痞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把禁止军队经商一事当成江泽民的功劳大吹特吹，这纯粹是颠倒黑白。我们开头已经说了，江泽民当初之所以纵容军队经商，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滥授军衔需要一个腐败的环境，需要一个不把注意力放在正规化和强化战斗力上面的军队，而军队腐败的一团糟现象对没有军人经历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队搞帮派是最有利的。

但老谋深算的江泽民也害怕军队经商会给军人带来更大独立性，不利于他的控制，因此又希望能断了军队的财路，这样军队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靠他来拨款，只能听令于他。而禁止军队经商是江泽民的一条出路，而且，禁止军队经商还可以成为江泽民在军队显示权威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在军队培植势力使江泽民有了信心。在杨氏兄弟倒台、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大权独揽。在朱镕基的强烈坚持下，江泽民权衡个人的得失后，才走出了禁止军队经商这一步。

但为保险起见，江泽民还是使出了惯用的招法，让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出面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自己躲在幕后。当时胡既非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亦非副总理，而是负责党务，这次只好到军队硬着头皮虎口拔牙。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第四代接班人，始终令江泽民鲠骨在喉，所以是凡难事江都让胡锦涛出面顶着，名义上是锻练，实际上是万一出事，对于军队的反弹和各种阻挠，不必直接负责，胡就是替罪

羊，正好也顺势把“第四代”的名份拿掉。这种手法江泽民在以后多次使用，好在胡锦涛为人低调谨慎，再加上运气好，居然从未遇有大闪失，顺利接班。

但在大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当年底只有不到五千家完成或即将完成向地方交接。由于军队企业属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且享有巨大特权，与地方工商、税务部门无涉，资产、分配、盈利走向基本上是一本糊涂帐，涉及到军方既得利益，自然是刁难、阻拦、阳奉阴违，为清查带来数不清的障碍，过分深入又可能触及“军事机密”，所以则是能糊涂就糊涂，因为认真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查证一事仍然等于是不了了之。军方的洪学智、萧克、廖汉生、杨成武、杨白冰等老将，为此都曾表示强烈不满，说江泽民在“自毁长城”。可是这些老家伙此时早就已被江泽民用硬刀子、软刀子整下去了，在军中早已没有实权了。

自从1998年被迫宣布取缔经商后，老奸巨猾的江泽民又动起了其他歪心思，他通过扶植徐才厚、郭伯雄为军中代理人，以实现代理人治军，并将军队大权“股份化”，以实现退休后的垂帘听政与为家族利益保驾护航。1999年9月中修十五届四中全会，江泽民亲自将心腹徐才厚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掌管全军干部人事大权），并提拔郭伯雄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副总参谋长。“徐郭代理人体制”开始生根发芽。

2002年11月中修十六大，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强行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使中国继续陷入“枪指挥党”的怪圈（前者为邓小平）。在本次大会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郭伯雄则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2004年9月中修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退休的江泽民被迫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在离任前夕，他完成了军事布局的最关键一步：安排徐才厚、郭伯雄两人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通过军委内部规则，架空了新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于是，名义上退休的江泽民依靠其扶持的军队代理人，用徐才厚掌管政工与人事、郭伯雄掌管作战与装备采购，牢牢控制枪杆子，使继任者胡锦涛成为“无枪的傀儡”。他则仍然垂帘听政、遥控指挥，学起了乾隆皇帝和邓小平，大摇大摆的当上”太上皇“。他又通过军队政治股份化，让徐郭二人把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降格为商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取贿赂。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卖官。徐才厚涉及的罪行，同样包括受贿卖官。据坊间传闻，军中卖官明码标价：少将500万、中将2000万。(港报社评：《军队买官卖官，战力可以倚赖？—明报8月4日》）同时，他依靠徐郭在军中的铁腕为家族利益护航，江氏家族（如江绵恒掌控的电信帝国、江志成运作的博裕资本）得以在金融、电信、军工等垄断领域毫无顾忌地进行百亿级的资本套现与洗钱，赚的是盆满钵满。

官僚资产阶级头子江泽民在治军时如此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还以一副虚伪的面孔把自己包装成自己一心为民的贤明长者和博学绅士，欺骗了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使得一大批粉红和改良派捧臭脚，甚至让不少自由派都另眼相看。可事实已经证明，江泽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官僚、反革命分子、两面派！

2012-2026 “复兴”帝国主义军队的时代

进入21世纪10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中国就这样走过了第三个十年。同时，这也宣告着中国正式迈入了第四个十年——习近平时代。然而，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乃至官僚集团来说，尤其是对于军队来说，恐怕没人没想到，中国接下来将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充满血雨腥风的十年。

2012年中修十八大习近平即位后以来，军队反腐被提升到了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统帅权巩固”的政治高度。同时，习近平提出了政治建军和“四坚持、三统一”的核心概念，即强调军队首先是政治机关，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提出军队反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刚刚上任的习近平便在包括军队的各个领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于是在十八大后即有16名军级以上军官（不含副国级及以上官员）被宣布查处：谷俊山、王明贵、方文平、卫晋、叶万勇、杨金山、张祁斌、符林国、刘铮、戴维民、高小燕、马向东、张代新、范长秘、于大清、陈强。从2012到2015年，总共有41名军队高级官员（不含徐才厚、郭伯雄）被查处，他们分别为王明贵（防空兵指挥学院原政委）、方文平（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卫晋（西藏军区副政委）、叶万勇（四川省军区原政委）、杨金山（成都军区副司 令员）、张祁斌（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符林国（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刘铮（总后勤部副部长）、戴维民（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高小燕（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

委）、马向东（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张代新（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范长秘（兰州军区副政委）、于大清（第二炮兵副政委）、陈强 （96301部队副部队长）、朱和平（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王爱国（沈阳军区联勤部原部长）、黄献军（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段天杰（国防大学政治 部副主任）、苑世军（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黄星（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张东水（第二炮兵副政委）、刘洪杰（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程杰 （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陈剑锋（广州军区联勤部原副部长）、陈红岩（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声（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郭正钢（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兰伟杰（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占国桥（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俊（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董明祥（北京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傅怡（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周明贵（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寇铁（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邓瑞华（兰州军区联勤部原 政委）、王信（武警部队纪委对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张万松（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吴瑞忠（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原副政委）、瞿木田（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其中有六位甚至是副大军区级及以上级别的核心官僚。

在中修小粉红的眼中，这正是习近平大公无私、不惧权贵、为国为民的体现，他们更是吹捧习近平的“极限军改”和“强力反腐”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可惜，期待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一心为民，不亚于期待海外民运带领中国成功走向“民主化”。南宋时主张割地赔款、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卖国皇帝”宋高宗，为了平息民愤、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将北宋末期祸害天下的“六贼”（蔡京、童贯等）纷纷流放、处死，难道

这就能代表他是一代明君了吗？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名为反腐，实则更多是借反腐之名，肃清江派、团派等前朝势力，来稳固自己的大权。为了证明这点，我们接下来将分成两个阶段，依次论述习近平时代的军队贪腐问题及其应对的措施与目的。

第一阶段（2012—2017）中央集权，大权独揽

习近平主要在破除江泽民的“代理人体制”，把江派的政治势力一一拔除。2012年，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 谷俊山在军中“八年连升五级”（从总后营房部副部长一路爬升至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的超常规提拔期，主要发生在2001年至2012年间。在这期间，谷俊山直接巴结、效忠和贿赂的核心人物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等人）。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徐才厚是江泽民的代理人与心腹，谷俊山则被视为徐才厚派系（即江泽民军中势力延伸网络）的利益代表人和“铁杆亲信”，谷俊山落马，直接牵出了其后台徐才厚，这自然是对对江泽民在军中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正式掀开了习近平对江派的全面进攻的序幕。

落马前的谷俊山掌管军用土地出让和营房建设大权，他将全国各城市黄金地段的军用土地，通过暗箱操作低价批给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资本家，随后在开发利润中抽取巨额回扣，或者直接折算成干股。政府在清查谷俊山的财产时，发现其竟然在河南老家占地数十亩，仿照故宫格局建造了富丽堂皇、奢华至极的“将军府”。办案人员还在其地下室搜出了大批茅台、成箱的

金条、大量纯金雕像，甚至有一艘纯金打造的大船，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

消灭谷俊山后，习近平便着手消灭江泽民在留军中最大的两个代表——徐才厚和郭伯雄。2014-2015年，此二人因买官卖官案皆被抓捕。中修官方公开通报表示，徐才厚长期掌管全军政工与人事大权，将干部任用作为商品买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政府在其豪宅地下室查抄出大量现金（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数吨重的硬玉翡翠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需动用多辆军用卡车才清运完毕。（新浪网：《徐才厚案发被查抄现金达1吨重 仓库藏唐宋古玩》）郭伯雄则掌管全军作战与装备大权，与徐才厚分工合作，形成军内“双头垄断”，将高级军官（少将、中将等）的提拔明码标价出售。

在这之后，习近平又开始剿灭军中其余的江派残余势力。房峰辉（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张阳（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本是郭徐二人培养的军中接班代理人，他们皆在中修十九大前夕（2017年）被调查。张阳于2017年11月在接受调查期间在家中畏罪自缢身亡，房峰辉则于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军方知情人士透露：“他（张阳）胆子大、敢收钱，一路行贿一路高升。“坊间流传张阳外号“张麻袋”，意思是其收钱送钱都用麻袋装。房峰辉则更是猖獗，在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大肆变卖军产地皮，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北京解放军292医院的地皮转让就卖出了高达47亿元人民币。他还在军内大搞权钱交易，通过提拔、调整干部职务收受下属巨额贿赂。同时，他为了自身职务晋升，亦向当时的军委高层进行利益输送和行贿。他的生活也极其奢靡，有报道指出其在饮食和生活上极其讲究，曾专门派遣厨师前往广东学习粤菜以

供其享用，且日常居住、出行等标准严重违纪，此二人涉案金额巨大，被习近平指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实际上则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我们不禁问，假如他俩及时抛弃江泽民，老老实实的向习近平投名状、表忠心，还能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吗？然而，不管他们结局如何，江派势力在中修政府中的式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在清洗军中江派成员的同时，习近平自2015年起启动名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事改革（废四大总部、划五大战区、收归武警、停止有偿服务等），即粉红建制派之流口中的“极限军改”。**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之一，习近平军改表现出的状况虽很具有复杂性和迷惑性，为此，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既不能相信粉红建制派之流的“强军梦”宏大叙事，也不能仅停留在资产阶级媒体所谓的“宫廷内斗”上，而要善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台显微镜，去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调查。

我们首先要指出，这场军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江泽民时代全面资本化、腐败建制化恶果的“被迫擦屁股”。在军改前，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已经把军队变成了一个“按钱分赃、明码标价”的超级股份公司。这种军阀割据式的“东北虎、西北狼”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的绝对控制权，且军队在军购、装备和科研领域也造成了数不胜数的豆腐渣工程（如火箭军后来暴露的深层腐败）。对于作为最高统治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习近平而言，如果任由军队继续“闷声大发财”、烂成清朝的八旗军，那么在面对国内阶级矛盾总爆发，或是对外

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侵略时，这支军队将无法充当合格的“暴力铁拳”，这从长期讲是根本不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习近平的宝座也就保不了了。因此，军改的首要动因，是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为了防止暴力机器彻底失效而进行的法西斯式自救。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进行了十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破除四大总部、重划战区，用统一的部门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其核心措施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以此废除了长期尾大不掉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大总部，将其改组为15个职能部门，并将七大军区压缩为了五大战区。接着，他斩断了寻租肥缺的路径。 原“总后勤部”（管钱管地，出了谷俊山）和“总装备部”（管军购研发，在习近平军改后仍出了李尚福和火箭军窝案）是军内官僚垄断资本最肥硕的吸血泵，军改通过将“权力拆分、相互牵制”，名义上打破了这些部门长期由特定红色家族或军内派系世袭、垄断的格局。随后，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在2016年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全面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一切“有偿服务”（包括军队医院、军下属招待所、军用土地出租、军队文艺团体的商业演出等），使资本在军内“隐形退场”与转移领域。事实上，习近平消灭各自为政的“山头资本”，是想用中央垄断取代地方分赃，它并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是把原本散落在大军区、各大总部军头手里的“私有化特权”，重新收纳、集中到了中央最高统帅一人的手中，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暴力机器上的绝对中央集权。他清理掉军队的“有偿服务”，宣扬这是继1998年禁商后的军队“彻底切断铜臭”，可正如同资本家用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掩饰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实际上从来没有退出军队，只是转换成更隐秘、更高级的形

式存在。他让军队从“小摊小贩”升级为“军工复合体大分赃”，军队不再去开宾馆、医院、KTV赚普通老百姓的零钱，转而拥抱“军民融合”战略。军队开始与大型科技垄断央企、私人高科技买办资本（如各类特许军工供应商）结成了更深度的利益同盟，贪腐也从过去的“收现金、走私军火、倒卖地皮”，升级为在百亿、千亿级别的军工预算中贪污从而谋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2023-2024年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依然会爆发塌方式贪腐的根本原因）。

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大清洗之后，习近平几乎彻底清除了军界政界一切政敌，树立了自己无上的权威，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修改宪法，正式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职期限，登上了权力宝座。

2019年，新中国建国70周年（包括中修复辟的41年），中修不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都貌似达到“顶峰”， 此时的习近平也可谓如日中天，个人威望与权力掌控都达到了极点。只是习近平这时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样君临天下、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仅仅一年后便土崩瓦解了。

第二阶段（2023至2026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由于中修官僚资产阶级与垄断资本家在三年疫情期间的胡作非为，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且国内此起彼伏爆发群众示威游行运动与工人自发反抗运动，中修不仅在经济财政状况上一落千丈，在民间的威信以及支持度更是持续下跌（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大量的群众愈发对中修政府感到不满。此时的习近平可谓是焦头烂额，自己好不容易坐上“修宪皇帝”宝座才不到

两年，就被突如其来的三年疫情和人民反抗运动搞得寝食难安。疫情后经济的持续恶化，群众普遍的不满本就够令这位资产阶级独裁者担忧了，跟令他忧心忡忡的是，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成功改造掌控的军队，马上就又要闹出大乱子。

进入2023年后，习近平对于军队的贪腐问题从原来的假途灭虢、主动出击、先射箭再画靶，变为了面对突发性屡禁不止的大规模腐败的被动被迫应对。随着军队完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改后，军队腐败形式从传统的“买官卖官””军火走私“等演变为 **在国防工程建设、高科技装备采购、军工资金划拨中的进行暗箱操作与吃回扣。** 2023年爆发的一场军中地震，直接重创了中修最核心的战略威慑力量。2023年下半年，中修火箭军高层因爆出的贪腐问题被一锅端，包括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原政委徐忠波、原副司令员刘光斌、原副司令员张振中等整个司令部班子被集体清洗，直接“全军覆没”。 连续两任前国防部长均遭判重刑，魏凤和（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原国防部长）在2023年9月落马，2024年6月被开除党籍军籍，202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中修通报指其“忠诚失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收受巨额钱款”。李尚福（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原国防部长）于2023年8月落马，2026年与魏凤和同案宣判，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其主要贪腐行为发生在掌管全军“装备发展部”（即军队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大权）期间。讽刺的是，这两位官僚居然都是习近平自己扶持的亲信。

习近平毕竟既不是傻子，也绝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包青天，他为何要惩处自己的亲信呢？因为火箭军作为中修的精锐部队，是中修能够东面与美帝竞争、南面威胁恐吓台湾的重要保障，可是，李尚福、魏凤和治下的火箭军贪腐问题严重，而严重的

贪腐又导致大批军事装备和战略火箭部队战力受损，关键军事机密和核武核心技术存在泄露隐患，甚至被认为严重影响了关键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这自然令一心迫切想侵略台湾的习近平感到极度不满与恼火。 在火箭军高层被习近平“一锅端”后，又相继爆出关于导弹零件是假冒的，以及核威慑能力被严重夸大等严重问题。2024年，美帝有情报评估显示，中修火箭军中部分本应注入高能液体推进燃料（非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如液体燃料的东风-5系列等），由于层层贪腐与军费克扣，燃料箱内竟然被违规灌注了水，而非燃料，这导致导弹在危机时刻根本无法正常点火起 ； 中修在甘肃、新疆等西部荒漠地区近年来大举建设了成百上千个巨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地下发射井（Silos）。然而这些地下筒仓的发射井盖在功能上存在严重的建造缺陷，无法在战时顺利打开，直接导致导弹无法有效发 。（朝鲜日报（韩国））虽然反动派们之间经常相互揭老底和“造谣抹黑”，但中修军队内部有多腐败也因此可见一斑。

在2023到2025年间，中修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军工央企寡头中进行了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破坏最深度的塌方式腐败清洗。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袁洁、王长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谭瑞松、周新民）等数十位军工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军工专家纷纷被清算。中修中纪委通报将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即这些国企高管利用国家倾斜的千亿级国防科研与武器装备预算，在军工研发、采购供应链、企业兼并重组中大肆进行私人利益输送。这场大清洗几乎覆盖了中国国防工业最核心的“四大支柱”（航天、兵器、航空、电子），落马高管均为掌握国家战略武器研发与制造命脉的“军工巨头”，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CASC） 是中国战略导弹（洲际导弹、火箭军主

战装备）和载人航天、卫星系统的核心研制生产单位。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吴燕生掌管该集团多年，直接对接军队装备采购与战略威慑武器预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是陆军装备、重型武器、精确打击弹药与陆基装备的垄断巨头。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石泉（曾任航天科工总经理，后调任兵器工业董事长）是航天与兵器两大军工集团的“双料巨头”，在军工科研与装备采购领域拥有极深的人脉与权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是中国战术导弹、防空导弹、前沿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研制单位，是火箭军和空军精确打击武器的核心供应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掌控着中国所有歼击机（歼-20、歼-16）、运输机（运-20）、直升机与航空发动机的研发生产，是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装备的绝对垄断者 。

中修官方通报将这些案件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在缺乏外部监管与高度保密的军工黑箱中，这些央企高管主要通过以下四大模式将千亿国防预算“私有化”：

1. 装备采购与供应链中的“家族/影子公司”吃回扣

   由于一款战略武器（如导弹或战机）往往包含数万个零配件（电子芯片、特殊合金、发动机零部件、雷达组件等）。军工集团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将原本需要公开招标或由优质国有单位生产的零部件，定向发包给其亲属、心腹或代理人暗中控制的“私营影子公司”。这些“影子公司”把采购单价抬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军工集团用国家国防预算掏钱购买，高价中的差价（巨额利润）随即通过海外账户、虚假咨询费、股权代持等方式，回流到吴燕生、刘石泉等高管及其家族的钱包里，导致国家千亿级国防拨款大量流向私人口袋。

2. “军民融合”中的资本运作与掏空国企

在近年来“军民融合”战略推进过程中，各大军工央企高管利用资产重组、引入民间资本和子公司上市的机会（如航天系、航空系旗下数十家上市公司），将集团内部极具盈利前景的高价值高科技军工技术或核心资产，低价评估后剥离注入到私人资本占股的“混改企业”中，变相输送给私人买办资本或海外资本，从中赚取股权回扣与重组佣金。高管以极低价格甚至“白嫖”获得这些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或期权，待股票上市后在资本市场上高位套现，一次性获取数千万至数亿元的暴利，真正实现了“靠山吃山、靠军工吃利息”。

3. 研发数据虚报与“豆腐渣工程”

为了骗取国家倾斜的巨额国防科研经费，部分军工高管与军方装备采购部门（如李尚福掌管时期的装备发展部）合谋，虚报研发进度、隐瞒技术缺陷、甚至在关键零部件采购上以次充好。如火箭军的大批导弹发射基地、地下掩体工程、silo（发射井）建设涉到及数百亿的土建工程，军工寡头于是与军方装备、后勤部门（如原装备发展部高层）联合暗箱操作，把这些保密防空工程承包给特定的施工队伍。承包商为了拿到项目，需要向军工高管与军方将领支付10%~20%的回扣。承包商为了偷回这部分成本，便在工程材料上滥竽充数、偷工减料，这也直接诱发了后来震惊高层的“导弹装备与发射设施可靠性达标危机”。这一现象在2023年火箭军塌方案中被彻底揭露，直接导致战略装备的实际可靠性打上巨大问号。

4. 军队装备部门与军工巨头的“狼狈为奸”

军队装备部门（买方）与军工央企（卖方）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军工央企用巨额回扣与商业利益“贿赂”军方装备部门将领（如李尚福、张育林等）；而军方将领则用订单和预算“滋养”军工寡头。像李尚福这些掌管的军方装备发展部拥有“给谁拨款、买谁装备”的终极决定权，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航天科技）为了让自己的项目拿到国家国家数百亿的项目立项和采购订单，会动用巨额“营销费用/科研招待费”去行贿买通军方装备部门高官。军方高官拿到钱后，将千亿订单砸向该军工企业。军工企业高管拿到订单后，再从采购款中再次抽成私分。双方互相勾结、明码标价，结成了固若金汤的“订单—回扣—买官”利益共同体和“订单换回扣、回扣换官职”的闭环。

这批落马的军工巨头（如航天科技吴燕生、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工袁洁、航空工业谭瑞松等）以及军方买家（如李尚福、魏凤和），其贪腐金额打破了以往军队腐败的最高纪录，没有人知道这群官僚资本主义寄生虫究竟吸取了多少民脂民膏。以李尚福、魏凤和为例，根据同级别高官（如以往郭伯雄、徐才厚案及近年的死缓判决标准），其个人及家族涉案金额均在数亿元人民币以上。对于军工央企头子（吴燕生、刘石泉、谭瑞松等），他们作为掌控数千亿资产、年营业额数千亿的央企“一把手”，其个人直接收受的回扣、现金、暗股及非法获利，普遍在数千万元至上亿元量级。2016—2023年间，中国在战略威慑（火箭军导弹井建设、高超音速武器）、海军远洋舰艇、五代战机及数字化陆军装备上的投入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这批落马高管曾掌控着这些战略工程的招投标与资金划拨大权，哪怕只从中抽取1%—3% 的隐蔽回扣或寻租费用，整体涉案金额规模就高达数百亿元。

在普通国有企业，审计、舆论和市场尚有微弱的监督，但在军工系统，“国防机密”这四个字成为了阻断一切外部审查和工人阶级监督的绝对屏障。高管们在“保密”的黑箱里为所欲为，将中修国家打着“强军”旗号拨付的全民血汗钱，变成了少数官僚买办集团进行利益分赃的提款机。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军工强调“自力更生、鞍钢宪法、群众路线与工人阶级监督”。而在改开后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国家机密”成为为剥夺群众监督权、阻断外部审查的特权遮羞布，军工寡头们在“国家机密”的幌子下，将千亿元预算变成了私人分赃的黑市。

2026年1月24日，中修官方发布了一则惊天通报：中修中央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紧接着，《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彻底肃清流毒恶劣影响》的重磅社论，如果仔细拆解中修官方的措辞，会发现其定性已经远超普通的“贪污受贿”。《解放军报》称张又侠和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这是全篇社论最致命的定性。在中修军队的政治语境中，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指责张又侠、刘振立“践踏破坏”，意味着他们在军中形成了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地下权力中心”，在人事任命、重大战备决策或装备采购上搞独断专行、越权搞小集团。报道还称他们二人“严重助长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以及“政治和腐败问题交织”，中修官方明确指出两人不是单纯的“经济贪腐”，而是“政治问题与经济腐败深度交织”，这意味着他们在军中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严重威胁到了中修最高统帅习近平对军权的绝对垄断地位。

那么，为何此二人受到清洗，会引发国内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事实上，张又侠和刘振立根本不是普通将领，他们是此前军中仅存的“实战派”，为数不多的参与过战争的高级将领。二人之所以一同被清算，是因为张又侠代表了“装备采购与国防预算的大金库”，刘振立代表了“军队作战指挥与兵力调动的参谋中枢”。二人联手被查，意味着掌控“枪杆子（兵权）”与“钱袋子（装备）”的两大军中巨头构成了高度集中的利益同盟，这直接触碰了习近平的绝对集中统一领导的红线。 且张又侠主政总装备部及装备发展部期间，正是中国五代机、战略导弹井、高超音速武器和海军大造舰预算爆炸的几年，军工央企（如兵器工业刘石泉、航天科技吴燕生）为了拿到数千亿订单，向装备部门高层疯狂输送暗股与回扣。而李尚福正是张又侠在装备部的直接继任者与亲信，他的落马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拔出萝卜带出泥，间接把昔日的老上司张又侠也连根拔起。

截止2026年8月，目前中修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原有的7人领导班子中，仅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委员张升民2人，其余多名高级将领均已先后落马或去职。

从郭伯雄、徐才厚，到房峰辉、张阳，再到魏凤和、李尚福，直至今天的张又侠、刘振立，尽管习近平通过自上而下的反腐抓捕了一批又一批官僚，贪腐的官僚非但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陷入了”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自己提拔的人再次贪腐”的怪圈。这种情况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仅靠自上而下的党内自查与官僚自觉性，根本无法控制被资本和特权腐蚀的暴力机器。中修的军队这一反动暴力机器只会在愈加法西斯化和愈加腐朽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彻底消灭。

截至今日，军队经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如军医院给外人看病、军工厂制造民用品在今天仍然普遍，而中修也不想清除这些残余。因为中修制造和制止军队经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阶级矛盾和与其他资产阶级、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深刻时，军队就是个包袱，可以随便腐败，而矛盾越来越深刻了，军队就成为镇压群众、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力量，过度腐败就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判

前言

四万亿计划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的“强心剂”。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危机的再一次到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到一定阶段，这针强心剂自然就失去了作用，反而使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

四万亿计划实行不久，这一趋势便更加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而在2015年，走向爆发经济危机的趋势愈发明显。面对危机，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图通过破坏生产力，让人民为危机买单：试图通过发展科技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并通过削减过剩产能等一系列方法，将危机转化为了人民的痛苦。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进行兼并重组民营企业，转嫁债务到人民头上，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修官方的声明中，可以归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强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我们在具体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上，官方是这样说明的：

“供给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浪潮进行回应。从宏观层面看，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需求，同时消费也会对生产、需求对供给产生反作用。只有二者保持相对均衡，才能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调控使之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先行者，以生产更加物美价廉的新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打破原有技术条件下市场供需相对均衡的态势并获得高额回报。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其他主体也会效仿创新活动的先行者，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式，分享创新活动产生的超额利润。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超额利润逐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不断反复，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就会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新的市场需求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并得到满足，经济发展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供给侧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总要与需求侧相配合才能发挥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

宏观上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均衡，也就是说，避免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

微观上看，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进行创新活动，才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才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是，一个企业使用了新技术，却不能长久地独占这一技术。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这一技术并同该企业竞争，一旦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技术时，这个企业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而其曾经的超额利润率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利润率。

中修反动文人是看不到人民的疾苦的，这并非是他们眼睛瞎，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歌功颂德。至于人民的苦难——那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改革的“阵痛”；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怎么能算人呐！”

这些反动文人，正是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他们来说，这场改革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还是对中国金融杠杆（指经济主体（企业、个人或政府）通过借入资金（增加负债）来放大现有自有资金投资规模，从而试图成倍放大投资收益（同时也会成倍放大风险）的金融机制。就像物理学中的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撬动重物一样，金融杠杆的作用是“以小博大”。）的削减。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说明这一过程真正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实现，只是通过无情抛弃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一、去产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一文中，这样说明中国2015年左右的产能过剩情况：

1. 产能过剩的背景

   从国内来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于2008年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掀起新一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热潮，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2010—2011年，CPI增速连续超过3%，PPI增速超过5%（表2），“防通胀”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201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09—2010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基调进行调整，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从国际环境来看，2010年左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1—2015年全球GDP增速3%左右，较2004—2007年4%以上的增速回落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回落明显，2012—2014年出口增速持续低于8%，较2003—2007年25%～35%的增速大幅下降（表2）。

2. 产能过剩的表现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收紧以及出口增速回落，叠加经济刺激计划所形成的新增产能集中释放，过剩问题全面凸显，产能过剩从部分行业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数据显示，2013年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产能

过剩。其中，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2012年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另外，许多新兴产业与高端产品，如光伏设备、风电设备、LED等，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

3. 产能过剩的影响

产能过剩对工业企业效益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可以概况为“一降四升”。一是GDP增速回落较快，经济增长压力明显加大。2012—2015年中国GDP增速区间为7%～8%，较2008—2011年的9%～11%明显下滑，而且呈现逐年回落趋势。二是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明显，经济持续处于“通缩”状态。2012—2015年PPI持续下跌，并且跌幅有扩大趋势，其中2015年PPI跌幅5.2%，为历史第二大跌幅（表2）。三是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亏损面持续扩大。2012—2015年，重点工业行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利润总额增速下滑（表4）。例如，煤炭业连续四年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13.0%上升到3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三年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企业亏损面从20.0%上升到23.4%（表5）。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显著加大。2012—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区间为8.4%～12.8%，显著低于2008—2011年的11.7%～24.8%。五是宏观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经济系统风险加大。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导

> 致银行坏账、死账规模快速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15年末中国全社会杠杆率（未包含金融部门）为254.8%，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以上的文字，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说：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在各地出台后，各地的经济受到刺激，盲目扩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同时，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商品难以出口，致使生产过剩的产品愈发难以找到销路，生产过剩愈发猛烈。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过剩的加剧，经济出现了倒退，工业产品整体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与财政收入下跌。然而，在金融上的风险却在不断上升。

面对这一情况，中修只能使用毁灭生产力的办法，制定“去产能”政策，通过消灭生产力的办法，来恢复供求平衡。

中修资料这样供认：

> 2013年至2015年，中国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2016年，中国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亦成效初显。与此同时，新动能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5个百分点；全国新登记企业553万户，比上年增长24.5%。
>
>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近几年的“去产能”的表述

> 2016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累计退出粗钢产能超过1.2亿吨、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2017年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6500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
> ——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554号)

这种所谓的“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和“利润回升”，绝不是社会生产力真实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与资本重组的基础上的。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度强化，正是这一剥夺的鲜明写照。危机总是加速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去产能”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资本内部的兼并战。被强制关停、淘汰的“落后产能”，绝大多数是没有国家信贷背书的中小民营资本。随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破产出局，煤炭、钢铁、建材等上游基础产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型国有垄断资本集中。供给端被强行收缩之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大幅飙升，大型垄断国企借此攫取了惊人的超额垄断利润。

与此同时，对千万产业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去产能”不仅消灭了“过剩的”机器，更摧毁了无数工人的生计。中修资料中，“去产能”所造成的“分流安置职工110余万人”，实际上是继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后，对工人阶级的又一次的大规模剥夺。大量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被抛入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沦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批劳动力被迫流入服务业、外卖平台、物流快递等所谓的“新动能”领域，忍受着缺乏劳动保障、随时可能被解雇的“灵活就业”状态。这使得资本通过算法和极度延长的劳动时间（996、白加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剩余价值进行疯狂榨取。

此外，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从“去产能”中被挤出或积累的庞大过剩资本并没有消失，它们疯狂地涌向了收益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伴随着2015年开启的“棚改货币化”，国家将巨量债务转移到了广大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上。实体产业的过剩危机，被转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劳动群众不仅要在生产领域遭受剥削，更要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高额房贷）被金融资本吸二次血。

二、去库存

所谓的“去库存”，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将自己的债务危机转稼给中国人民，从而对人民欠下的另一笔血债。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泡沫在2015年左右，已经接近了破裂的边缘，2015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面临巨大的房地产库存积压，

房地产的资金链条处于断裂边缘。房地产危机即将来临，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行了PSL（抵押补充贷款），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修央行的PSL是怎样将房地产的包袱渐逐去除，而人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灾难。

PSL，即央行于2014年创设的一种结构性货币工具，官方供认，这一货币工具主要服务于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发放对象是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一结构性货币工具的作用机理是：央行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三家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再把这些资金贷款给各项目，这些项目是特定的，其中包括棚户区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等等。这些项目拿到贷款后，就会进行棚户区改造等工程，但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并不是建设新安置房，而是拆迁旧房的同时，将拿到的贷款，作为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折迁户，让他们拿补偿款购买新房，这即是PSL的传导方式，而拆迁户收得补偿款作为补偿的方法，即棚改货币化。

棚改货币化，是通过政府定向向棚改等领域发放资金，促进房地产市场库存被消化，进而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棚改货币化后，中修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首先，对居民来说，棚改货币化，使其需要花补偿款购房，然而，正如中修所供认的那样：

> “此外，有些地区在棚改和去库存过程中，也出现了为实现速度、目标，扩大棚改规模并间接拉动了房价上涨的情况。

> 比如，拆掉并没有达到使用期限、条件并不危旧且居住位置较好的房屋，使一些居民不得不用安置款加贷款去购置位置较远的库存商品房。” ——《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这即是说，许多居民的补偿款并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新房。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他们不得不贷款去买房。这样一来，居民欠下了房贷，而开发商卖出了房子。开发商的坏账，便以房贷的形式，转移到了居民头上。

不仅如此，棚改货币化还造成了另一种恶果：即货币化安置使许多居民拿到安置款后，去购买新房。这样一来，购房需求迅速上升，房价也随之上涨。结果，不仅棚改户的负担加重了，整个社会所有买房居民的负担也都加重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子卖出去了，钱赚到了，坏账消除了。在这一链条中，房产的坏账转移了，市场的秩序“恢复”了，房贷的负担更重了，人民的苦难更深了。

中修官方不得不供认：

> 实践表明，持续推进包括货币化安置在内的棚户区改造，确实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提升了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并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不过，由于货币化安置及相关的一些购房补贴、奖励政策使需求明显增加，使得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库存显著下降，价格也一路攀

> 升，甚至对冲了以控房价为目标的一些楼市调控措施，导致一些三四线城市在调控背景下房价不降反升，甚至快速上涨，这必然导致包括货币化安置居民在内的所有居民购房成本上升，压力加大。——《兼顾棚改和调控双重目标》中国政府网

三、去杠杆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个企业通过借贷来发展，用较少的资本撬动较多的资本，这种机制就叫“杠杆”。杠杆率，简单来说，就是衡量资本“以小博大”疯狂程度的具体指标。如果资本家自己只有100元的本金，但他通过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借来了900元，凑齐了1000元的总资本去投资扩张。那么，他的资产负债率就是 900/1000 = 90%，而他的财务杠杆率就是 1000/100 = 10倍。这意味着，一旦投资赚了10%（即100元），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用自己的100元本金就赚回了100元，实现了100%的超额暴利。这种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市场行情不好，投资亏损超过10%，他的本金就会瞬间清零，并且立刻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泥潭。而在社会层面，杠杆率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总债务量（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借的钱）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会盲目且贪婪地不断推高杠杆率，疯狂借贷扩张。但这种建立在庞大债务堆上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一旦生产过剩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赚不到钱、还不上利息，高杠杆率就会瞬间化为引爆经济危机的炸弹。

去杠杆，本质上是一种推迟危机爆发的手段。去杠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种实施方法：

1. 砍表外信用，收影子银行。

   表外信用，即商业银行从事的，按通行会计准则不列入常规资产负债表内的信用中介业务。通俗来讲，就是银行为了规避国家对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严格监管，将一些放贷业务转移到账本之外进行暗箱操作。

   影子银行，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业监管体系之外，却从事着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实体或业务活动（如部分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等）。

   砍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是因为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安全。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使得中国金融的杠杆攀升，推高了金融风险。对表外信用与影子银行的整治，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的金融杠杆，缓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许多民营资本的借贷空间。许多民营资本依靠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生存，而这一政策使这些企业破产倒闭。而且，大型的国企由于能更容易地取得正规贷款，因而更容易在危机时存活，进而兼并难以获得贷款的小型企业，并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

2. 用行政、金融、法律等工具，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排。

   2016年国务院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一文中，说明了降杠杆的方式：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增资扩股，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这

些措施的要害，在于国家出手对企业重新编队，实际上由国家决定哪些企业能活，哪些企业该死。由于小型的、负债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率先被出清，而大型的垄断企业并不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垄断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兼并等方式，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四、降成本

“降成本”，在官方的政策文章中，可以归纳为“简政放权”与“减税降费”。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降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官方明确指出，不仅要“降低税费”，还要改革低效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降成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转型结合起来。如果只是为降而降，甚至是为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抬轿子，那就不符合以‘降成本’盘活企业，进而带动经济转型的初衷了。”

所以，降成本降的只是“先进企业”的成本，落后企业并不在目标范围内。这加速了先进大企业对小型企业的兼并，提高了大企业的垄断程度。与此同时，“降成本”也使无产阶级的苦难进一步加深了。

在“降成本”的具体措施中，除了政府减税、降低融资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降低用工成本。

那么，用工成本如何降呢？用工成本说白了就是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钱，即发给工人的总工资。为了降低用工总成本，大致

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所谓的“减员增效”，即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机器替代人，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雇佣员工的数量，或者是解雇一批暂时多余的员工，这就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又造成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使得普通工人的工资能够被进一步降低。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降低用工成本本质上是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是工资进一步降低的代名词。

劳动力的贬值与工资的降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简单劳动（如体力劳动者）而言：“去产能”造成的失业潮，使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更加低廉。资本家如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至于那些被抛向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为了养家糊口，只得选择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即用即弃”型“灵活就业”平台，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劳务派遣工等。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不给他们社会保障以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平台算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钟，并利用广大的失业群体威胁他们“老实工作”。

对于脑力劳动者而言：“降成本”意味着“996”已成为常态，甚至出现了更多的“007”（即从凌晨0点工作到次日凌晨0点（24小时待命），且每周7天不休息），即延长工作时间而工资不变。

所谓的“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其全部涵义就在于此。

五、补短板

“补短板”，在中修官方的论述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能力短板，即所谓的“卡脖子”技术。

2.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即5G基站、基层公共服务等与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需求，也就是中修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3. 制度与营商环境，即“软短板”，着力点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微观市场活力。

而“补短板”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科技发展，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经济，从而消耗过剩产能，达到缓解、延迟经济危机的目的。然而，这种依赖创新刺激经济的办法，是一种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强心剂。它虽然能暂时制造经济上的景气，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未来更猛烈地爆发。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政策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来人为地扩大总需求（比如大搞基建、发放补贴等），以此来强行消化过剩的产能。然而，这种依靠国家干预的“强心剂”虽然能解一时之渴，却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它只是把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了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泡沫。

而中修官方所谓的“补短板”，特别是“补短板”中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和新基建来刺激经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失业的加剧。

国家投入巨资去研发“卡脖子”技术和建设新基础设施，确实在短期内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创造了新的利润，让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和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科技的飞速进步，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即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越来越小）。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算法将以更快的速度替代活劳动，大量工人将被排斥出生产过程，沦为产业后备军，这将进一步压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

2.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

国家主导的科技攻关和新基建，在短期内可以给一部分垄断资本带来订单、补贴、融资和市场优势，使它们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但是，从整个社会资本来看，这种技术升级必然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等不变资本不断膨胀，而雇佣活劳动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由于机器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活劳动中产生，资本家为了竞争，不得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但当这种技术从个别企业推广到整个行业以后，个别资本的超额利润就会消失，整个社会资本反而面对更高的固定资本投入、更重的折旧压力和更低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降低原材料成本、扩大对外市场等办法来抵消这种趋势，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延缓矛盾，不能取消矛盾本身。

因此，“补短板”不是消除了危机，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矛盾。资本越是依靠机器和技术来追逐利

润，利润率就越是下降。利润率越下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越深。

3. 更高水平上的生产过剩。

利润率趋向下降，并不会使资本自动停止扩张。相反，为了弥补利润率下降，资本往往更加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用更大的产量、更快的周转、更广的市场来维持利润量。这样一来，生产过剩就被推向了更高水平。

新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膨胀，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将成倍增加。但是，正如我们在“降成本”中所分析的，广大无产阶级的工资正在被不断压低，购买力严重不足。一边是科技升级带来的天量产品，另一边是因剥削加深而日益萎缩的消费能力。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供需矛盾，而且在将危机向后推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更具破坏力的能量。资产阶级企图用发展新科技、拓展新产业的办法，来逃避经济危机，结果，只会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制造出了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生产过剩危机。旧的“短板”在技术上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与消费不足的“短板”，却被拉得更长了。这就是“补短板”政策的最终的必然的结果。

因此，这种依赖科技创新和新基建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反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加深了危机。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创新排挤活劳动，制造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活劳动相对缩小又使平均利润

率下降，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工资、扩大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科技的短板被补齐了，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短板——利润率下降、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变得更长了。所谓“补短板”，最终不过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准备一场更猛烈的危机。

中修一带一路的性质

前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修于2013年提出。中修的主要目的是向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加强对亚非拉等国的殖民掠夺。此举是中国彻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有五个基本特征，即：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 5. 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而一带一路正是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利润的追求而执行的一种政策。资本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前就存在了，但是只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才普遍起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修的垄断组织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已经积累了十分庞大的资本，但是国内有利可图的产业差不多已经都形成了垄断组织，投资一些并不发达的地区或是并不赚钱的经济部门就不能维持利润率，所以中修就把目光投向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这里工资低、地价低、资源便宜、中修通过开矿山、办工厂、修建基础设施等直接手段和贷款等间接手段把资本输出到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中修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近年来稳居世界前三位置，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达**11592.7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1.3%，远超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水平。

中修对外资本的输出的垄断利润的获取是建立在压迫亚非拉人民的基础之上的

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垄断资本对当地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远比国内更加肆无忌惮。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优越的气候条件，盛产各种原材料和农产品。但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的经济落后，这些产品却往往被帝国主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二十

一世纪以来，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地通过不平等贸易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直接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开矿设园，在以更便利的条件攫取原材料与农产品的同时，残酷剥削当地的廉价劳动力。

正是在这些**半殖民地**的土壤上，中国垄断资本家才敢比在国内更加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在国内，他们还多少受制于国家监管、舆论压力和有限的劳动法约束，不敢公开大规模使用童工、随意枪杀工人或完全无视环保；但到了半殖民地国家，当地政府腐败买办化、工会形同虚设、军阀割据横行，他们就彻底撕下“文明”伪装，与当地官僚、警察、总统卫队勾结，贿赂收买，雇佣私卫或政府武装，公然实行最野蛮、残暴的剥削。

以刚果（金）钴矿为例，表面“禁止童工”，实际通过收购手工采矿逃避责任：儿童妇女在无支撑矿井里肩扛手挖12小时仅得不到2美元，塌方、粉尘、放射性污染导致尿液中钴含量高达正常人40倍，婴儿畸形、流产死胎遍地；矿场守卫随意鞭打、逮捕、射杀所谓“盗采”者，中国经理在一旁狞笑观看——这些在国内绝不敢如此公开上演的暴行，在这里却司空见惯，因为当地买办军阀乐于充当走狗，换取贿赂和武器支持。

同样，在赞比亚铜矿，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子公司迫使当地矿工每天18小时地下苦干，防护破损不换、拒绝不安全作业面就立即解雇，肺病横行却无补偿，更明目张胆的是系统性反工会：工人试图组织就被降职开除。

在印度尼西亚Morowali镍工业园（中国企业主导），2023年爆炸致21死，高温高压下强制双班、粉尘中毒，却初期推责赔偿迟缓；PT Gunbuster工厂工人抗议低薪歧视和扣薪，就遭中方人员持铁管攻击致死。

在秘鲁首钢Marcona铁矿和Chinalco Toromocho矿，当地合同工长期罢工抗议任意解雇、低薪、不安全作业和强制搬迁，中国经理以“生产第一”威胁开除，污染导致周边矿工家庭婴儿缺陷；塞尔维亚Zijin Bor铜矿接管后事故频发、硫化物超标摧毁农田，工人封路要求涨薪却遭私人安保驱赶——这些野蛮手段，国内资本家尚需顾忌舆论和监管，在第三世界国家却能公然维持“采矿业独大、其他部门停滞”的畸形经济结构，让当地陷入军阀混战和资源诅咒，只为中国新能源电池链源源不断输送廉价原料。

据卢旺达KT Press等当地媒体报道称，在卢旺达西部的卢西罗地区经营矿山的孙书军以多次盗窃公司矿物为由，将两名前员工绑在树上实施殴打。

8月，工人被殴打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并引发争议后，有关部门逮捕了孙书军。据悉，这段视频是为暴力感到愤怒的员工拍摄后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的。他们还在法庭上作证称：“孙书军把怀疑是小偷的人绑在树上鞭打他们。”

当时，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称：“中国企业和市民应遵守当地法律，请勿私自制裁，举报犯罪行为。”

据美国之音（VOA）报道称，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此前就曾因虐待当地工人而受到谴责。2020年，在津巴布韦发生过中国煤矿主开枪打伤抱怨工资的两名当地工人的事件。

4名现在以及曾经在华坚集团工作的员工对美联社透露，他们没有保护性的装备，并且每天被迫工作12个小时，并且不被允许组成工会。此外，他们还说中国的经理们“常常”对他们吼叫。

美联社的报道称，在这部影片中，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站在队列整齐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前带领工人们齐唱中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形容他自己如员工们的父亲。

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指称华坚集团负责运营的工厂存在一系列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有许多工人都被压低工资或被迫加班。有消息称，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22岁的加里对美联社说，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5美元。

他还说：“如果有人不满的话，就会被指责是扰乱工作，立即被开除。”

美联社采访的一位20岁的工人阿勒穆指责工厂工作环境恶劣：“工厂的化学物质令眼睛和鼻子作痛，还有把能人的手剁下来的机器。他们也不知道让工人带手套！如果你拒绝不带安全护具就工作，他们就开除你。”

这家公司还被中修《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当作正面案例大加报道，可见中修的所谓崛起完全是建立在本国和殖民地的第

三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之上的。

一、对亚非拉人民的压迫

印尼镍工业园事件补充：

2023年12月24日，印尼青山园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1名工人死亡，38名工人受伤。

事故引发了中印尼两国的外交事件，外交部启动应急机制，并派遣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处置和善后工作。

过去十年间，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劳资冲突和工业意外事故频发，引发了印尼人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不信任和憎恶。

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元首的见证，但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付出了工人的生命代价。

- 一带一路项目青山园区工业意外21名工人死亡

缅甸仰光服装厂事件：

缅甸中资厂被300罢工员工打砸占领

政策研究者的观点： 随着民主化转型的发展，劳动立法成为缅甸政府改革的重要领域，劳资纠纷也随之迅速增长。2017年2月23日，杭州百艺服装（缅甸）公司的仰光工厂遭到罢工的冲击（以下简称百艺服装厂事件），工厂设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部分中方工作人员遭到抢劫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该事

件发生后，缅甸仰光省仲裁委员会裁定该企业解雇工会领导的行为违法，瑞典著名的服装品牌H&M公司随后也宣布了暂时中止与百艺服装厂的供应合作。

该事件显示出缅甸当前工会运动和工人维权的积极性，警示中资企业在缅甸投资应当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规则，但同时也反映出，在快速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工人维权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规则化状态，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面临的劳资纠纷风险。能否妥善应对政治转型中的劳工风险关系到中资企业的稳定经营，也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推进。

- 【武大学者·班小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主化转型中企业的劳工风险问题 ——以缅甸为例

二、对中国工人的剥削

东道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政变，工人运动。除此之外，还要考虑负面舆论对中修招聘的影响。有时，为了规避这方面的风险，他们将魔爪伸向了中国本土的工人。资本往往用不实的招工信息吸引中国工人，当工人们一无所有地来到异国他乡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榨。

- 中国劳工观察： 沉默的受害者：在新冠疫情中滞留海外的一带一路中国工人

- 风暴眼｜耍赖、威胁、拒不退款！轻松月赚3.8万的海外工作终是骗局一场

- 3名在阿尔及利亚务工的中国男子遇车祸两死一伤，家属：遗体在国外，后事还没有处理

- 国企欠薪：中国国有企业满世界欠薪，“一带一路”变“一欠一路”

三、仗剑经商

中国资产阶级在积极地扩军备战。庞大的海外利益的保障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力量，还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屏障。“积极防御”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中国正努力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示：“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将近 3 万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国公民达到数百万。所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往来的货船，大都装载着中国货物，或与中国有关。在此新形势下，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以有效保护在海外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

既是为资本输出的安全保驾护航，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帝国主义争霸中积蓄力量。

1.正规军事力量

军费开支

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持续上升，远超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军费增速更是每年都高于GDP增速，体现出中修对军备扩张的准备。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GDP增速	6.7%	6.8%	6.6%	6.0%	2.2%	8.4%	3.0%	5.2%	5.0%	5.0%
军费增速	7.6%	7.0%	8.1%	7.5%	6.6%	6.8%	7.1%	7.2%	7.2%	7.2%

海军

战略要求明确：2015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旨在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专家指出，人民海军已实现从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相结合的战略转型。

维护全球利益：随着中国海外投资、人员和能源运输线的全球化，海军必须有能力保护遍布全球的国家利益。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等行动，“已证明中国海军具备了远海行动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能力。”

2018 年，中国服役军舰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新下水的舰艇总数量达到 40 艘，相当于一个法国海军的数量。

海外军事基地

吉布提——中国的第一个海外“战略据点”

2015年，中国开始在该国建设一个民用多用途港口，位于红海与印度洋的交汇处。这个港口靠近美军的莱蒙尼尔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基地。根据情报平台Stratfor的说法，它包括超过2.3公顷的地下掩体——这是解放军用来隐藏火炮和其他弹药而不被间谍卫星发现的常用技术。

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

2025年4月5日，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5日发布消息称，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高棉语：**មជ្ឈមណ្ឌលភស្តុភារនិងហ្វឹកហ្វឺនរួមគ្នាកម្ពុជា-ចិន ផែរាម**）当日正式挂牌运行，用于保障两军开展地区反恐、防灾减灾、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训练等行动，双方派驻必要人员共同维持中心正常运转，同时中柬两军在中心组织“金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活动。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这是解放军和外军开创的一种新合作模式，双方共建共用，共同维护中心正常运转。据称，只要仔细观察数次访问经过以及基础设施的物理布局，就会发现中国保留了对一些设施的独家使用权，包括基地最大的码头。

2.私人安保公司

黑道白道两手抓：

中修称赞私人安保公司为“仗剑经商”、“战狼”，毫不避讳“私人”安保公司与官方的紧密联系。这些安保公司都是国资企业，换言之他们是赤裸裸服务于中修利益的。

成员多为退伍军人，维稳，促进就业

以保护中国企业为名义镇压当地工人，在津巴布韦，两名中国警卫因枪击一名议员的儿子并致其受伤而被监禁。他们此前曾因在金矿发生薪酬纠纷期间向当地工人开枪而被驱逐出境，但非法留在该国。

有些当地买办势力纵容私人安保公司，在赞比亚，两名中国矿长在谋杀未遂指控被撤销后获释，引发强烈抗议。因劳资纠纷，他们枪击11名煤矿工人，使其受伤。

疑似参与到内战之中。赞比亚，对当地一家保安公司进行非法军事训练。

有可能参与未来的军事行动

王毅：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

外媒：中国军舰数量超美居第一 10 年内还要再造 150 艘

云壤海军基地疑似存在中国独家使用权

中国矿长射击赞比亚煤矿工人

中国安保公司遍布非洲一带一路

参考资料

事例1：刚果（金）钴矿场的“鞭打与射杀”护卫（Commus矿场，中国经理观看士兵鞭打矿工）

- France24 Observers（2021年7月28日报道）：视频记录刚果士兵在Kolwezi Commus（紫金矿业控股的中国公司）矿场鞭打两名手工矿工，中国经理现场观看并录像。士兵被判刑，中国经理被捕罚款。链接：DR Congo: Video of miners beaten for trespassing shows stranglehold of foreign mining interests – The Observers – France 24

- Mining.com（2021年7月28日）：中国经理下令士兵殴打“盗采”矿工，视频流传，FARDC（刚果军队）证实。链接：https://www.mining.com/video-chinese-workers-condemned-for-ordering-soldiers-to-beat-up-artisanal-miners-in-the-drc/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1年8月3日）+ 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2016/2021更新）：中国安保协调当地警察/总统卫队随意鞭打、射杀矿工，儿童矿工也被虐待。Amnesty PDF：https://www.amnesty.org/fr/wp-content/uploads/2021/05/AFR6231832016ENGLISH.pdf

事例2：赞比亚铜矿的反工会暴力镇压（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子公司）

- Human Rights Watch（HRW）2011年报告《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NFCA、Sino Metals等中资铜矿系统阻挠矿工加入MUZ工会，威胁解雇、殴打，警察配合镇压。链接：“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 Labor Abuses in Zambia's Chinese State-owned Copper Mines | HRW
- HRW 2013年后续报告：中国经理持续骚扰工会代表，拒绝不安全作业面即开除，中国安保与当地警察联手压制。链接：Zambia: Safety Gaps Threaten Copper Miners | Human Rights Watch

事例3：印尼Morowali镍工业园的爆炸后推责与冲突（PT Gunbuster及IMIP园区）

- China Labor Watch（2023年12月28日）：ITSS（青山控股子公司）爆炸致21死（多印尼工人），中国安保初期推责，工人抗议遭压制。链接：Hundreds of Workers Protest at Chinese-Funded Nickel Plant in Indonesia Following Deadly Explosion : China Labor Watch

- Reuters（2023年1月16日）+ The Diplomat（2023年1月17日）：PT Gunbuster Nickel（江苏德龙控股）工人抗议低薪，中国安保/工人持铁管攻击致1印尼工人死亡，警察部署镇压冲突。链接：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olence-indonesia-nickel-smelter-protest-kills-2-dozens-detained-2023-01-16/

事例4：斯里兰卡工人抗议（中国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SCEC）北中央省Maha Ela灌溉隧道项目）

- 2023年，约600名当地斯里兰卡工人公开抗议：工资远低于中国工人，无餐休，隧道内90英尺深，环境极端恶劣，虚假安全扣款，无保险，无正式劳动合同，仅简单表格，中国主管身体推搡，强行驱离。抗议后，CSCEC解雇了至少12名工人。 https://www.dailymirror.lk/asia/Plight-of-Sri-Lankan-workers-in-Chinese-led-project-unveiled/81-272630

事例5：乌干达水电站建设工人权益长期无保障（中国水电集团（Sinohydro）Karuma水电站项目）

- 项目建设期间，当地乌干达工人长期遭受中国主管言语虐待，主管常用中文脏话辱骂工人，称他们“奴隶”，工人被强迫超时工作，低薪，无合理休息。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article/tensions-in-sinoafrican-labour-relations-the-view-from-the-karuma-hydroelectric-dam-in-uganda/E002FCBEDC6307BF34685E12557B6C75

事例6：乌拉圭工会投诉工作条件与欠薪无果（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Tacuarembó–Salto高压输电线路项目）

- 项目中约500名外国工人遭受强制劳动，主要是厄瓜多尔籍本地和外籍劳工，包括极端长工时，低薪乃至无薪，居住条件不人道，车辆事故致死伤等等。乌拉圭建筑工会（SUNCA）提起刑事诉讼，指控CMEC“非人道条件、拖欠工资”。工人包括厄瓜多尔移民，工会称“从项目开始就持续投诉”。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china-machinery-engineering-corporation-cmec-non-response-re-alleged-abuse-of-workers-constructing-transmission-line/

结语

中修在非洲的掠夺有力说明，中修垄断资产阶级不只是剥削中国劳动人民，还在剥削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此吃尽巨额的利润。他的繁荣兴盛是建立在东方和非洲累累白骨之上的，帝国主义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渗着被压迫人民的血与泪。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修在非洲的资本输出也逐渐唤起了当地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

正如列宁所言：

>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

> 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和非洲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反抗，倒行逆施的中修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被人民送进坟墓!

21世纪的"社会谋杀"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创造了"社会谋杀"一词。他指出，区别于袭击者事先知道某种伤害会使受害者失去生命的谋杀，**"社会谋杀"是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法律、掌握国家机器，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社会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生存而导致的非自然死亡**，这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谋杀是无声无息的，是一场无人可以自卫的谋杀。尽管恩格斯的分析针对的是19 世纪的英国，但是在21 世纪依旧存在合法的"社会谋杀"，甚至更加隐蔽不易让人察觉。

一项追踪数万名英国公务员的名为Whitehall II 的研究显示，相比最高行政级，最低等级（体力劳动者、信差）的冠心病死亡风险高出3 倍，而猝死（尤其是院外心脏骤停）是这种死亡的主要形式。无独有偶，美国的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也指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2 万美元）的人群，院外心脏骤停的发生率是高收入人群的2–3 倍。

然而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在统计学上二者具有相关性，比如有研究显示拥有电视机和患心脏病风险相关，这不是因为电视会产生某种射线影响心脏功能，而是电视和久坐有关，久坐又与代谢功能障碍有关。那么隐藏在社会地位不同背后的真凶是什么呢？

猝死在医学中指的是以意识骤然丧失为特征的、意外的、急速的死亡。某些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起猝死，但是这些都属于非心源

性猝死，仅占到所有猝死的不到20%。剩下的80%为心源性猝死，而心源性猝死中50%以上都与冠心病有关（图1）。

图示 1: 心源性猝死的主要病因与诱因

冠心病又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在医学上属于心血管疾病，指的是患者从青少年起血管壁有脂肪条纹形成，到40岁左右病变的血管逐渐明显变窄，心脏的冠状动脉供血减少，血管壁变薄，一旦破裂出血便会在凝血作用下形成血栓从而堵塞血管，几秒内人就会因为大脑缺氧和缺少葡萄糖供能而失去意识。心血管疾病既是全球的首要死因，也是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病因，2024 年农村、城市心血管疾病分别占死因的48.98%和47.35%。

资本的运动过程有三大部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是为了将商品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分配则由前两者共同决定。利润的最大化，受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劳动日最长限度所限制，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在生产领域尽可能多的榨取剩余价值，又要在消费和流通领域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压到最低。

这种平衡如何实现呢？下面我们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拆解为两个环节进行分析。

一、 消费与流通领域的慢性毒害

在所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膳食营养。2022年的亚洲低收入家庭食品消费模式报告指出，低收入组营养转型中，廉价高碳水和加工食品占比高。一些其他研究也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导致饮食不平等，高收入组更易获得健康膳食。但是这就完了吗？有些人会说：“又不是有钱人逼你吃这些垃圾食品的，你少人不行怪路不平了，我看你就是仇富！”，确实说的有道理，可是吃什么真的完全只是个人事务个人选择吗？马克思曾说过：

> “人的自然属性（如吃、喝、性等生理需求）虽然源于自然，但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动物本能，而是被社会化了”

除了少部分因过敏、气味、味道等这种基因决定的因素，人的饮食选择几乎完全是由后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健康选择往往被纳入到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以及高度集中的食品与医药产业链中，通俗来说就是**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控制食品供应、调整食品成瘾性以及通过海量的营销广告，硬生生塑造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饮食景观**。

1. 谁在制定"健康饮食"的标准？

2015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尘封的内部秘密信件，揭露了上世纪60 年代糖业垄断集团的一场惊天阴谋：当时科学界开始注意到高糖饮食和高脂肪饮食都会导致冠心病。为了保护市场份额，糖业贸易组织"糖业研究基金会"（SRF，现糖业协会）出资赞助了哈佛大学的顶级营养学科学家。结果就是1967 年这些受雇的哈佛科学家在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精心筛选、抹黑脂肪的综述文章，将冠心病的罪魁祸首全部嫁祸给饱和脂肪与胆固醇，极力为"糖"洗白，并完全隐瞒了其背后的资助背景。

这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造假，因为被收买的哈佛教授中有一位核心人物叫马克·赫格斯特德，他在后来成为了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的核心官员，并在1977 年亲自参与起草了《膳食指南》的前身《美国膳食目标》。通过这一纽带，垄断资本集团成功将这一精心设计的结论写进了国家法律。在随后的几版《美国人膳食指南》中，心血管疾病的矛头被死死锁定在总脂肪和饱和脂肪上，指南无差别的要求公众减少所有脂肪的摄入。与此同时指南对添加糖的警告被降级为极其次要的边缘化建议（仅认为糖会破坏牙齿、带来"空卡路里"）。为了迎合这份指南，食品巨头们迅速移除了产品中的脂肪，取而代之以大量的添加糖和精致碳水以丰富和维持口感，美国心脏协会等机构甚至给很多低脂但高糖的含糖麦片、零食贴上了"心脏健康"的认证标签。自1970 年指南推广低脂饮食以来，截至2022 年美国的肥胖率和二型糖尿病发病率出现了50%以上的井喷式增长，而与

这些慢性病强相关的心力衰竭、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等心脏病亚型发病率也随之暴涨。

有人又要说了，这不就是美国人搞的吗，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营养学是研究食物和人体内营养素的学科，和很多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世界性的，各个国家不论是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基本都会公开发表在期刊杂志或网络上，一个国家制定本国的膳食指南时是一定会参考全世界的研究结果并进行汇总的，再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中国也不例外，对比中国和美国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就不难发现，推荐摄入的营养素种类和剂量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分配到的食物种类会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差别。

2. 种子油与被忽视的氧化风险

除了高碳水这一因素，种子油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同样争议不小（详见附录a）。先看一组消费量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农村住户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中，食用植物油占比从1980 年的56%逐年提升至2018 年的90%；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17–2020 年的调查中也显示我国18–59 岁成年居民烹调油的平均消费量为36.23 克/天，其中植物油占比高达93.8%。具体到种子油的占比，可以参考2024 年美国农业部对中国植物油消费结构的统计数据，大豆油占比44%，菜籽油占比24%，花生油占比9%，三者合计占据植物油消费总量的近八成。众所周知"反式脂肪酸"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未氢化的标注着"0 反式脂肪酸"的精炼种子油，经反复加热还会产生另一种过氧化物——氧化亚油酸OXLAMs（详见附录b）。

本人在查阅资料时还发现几十年来都没有设计足够严谨的RCT（随机对照试验，相关争议详见附录c）来直接检验这个问题（也就是OXLAMs 日常摄入的浓度能否达到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阈值，且人体的抗氧化系统能否充分中和食物中摄入的OXLAMs），一个严谨的饮食RCT 至少需要足够大的样本和足够长的追踪时间，其次最重要的是足够多的研究经费。但肉类、种子油、动物油不能申请专利，食品公司没有制药公司那样强烈的商业动机去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究。与其投入大量资金让同行跟着一起吃肉，不如就和上述案例一样花几万美金收买几个科学家（SRF 只花了五万美金就完成了对全人类膳食指南的干预），调整一下实验数据或统计公式，改变一下实验变量，就能用极低的成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或许有人又有疑问了，那资产阶级不也要吃饭吗，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好问题，我们来看一组市面上常见食用油的价格对比数据（以中国主流电商与精品超市的实际零售价为基准）：

主要脂肪酸类型	代表食用油	大致价格区间（元/升）	烟点（℃）
多不饱和脂肪酸	大豆油	10–20	230–238
多不饱和脂肪酸	玉米油	15–25	230–232
多不饱和脂肪酸	葵花籽油	20–35	227–230
多不饱和脂肪酸	红花籽油	30–60	225–230
单不饱和脂肪酸	初榨橄榄油	100–300	190–210
单不饱和脂肪酸	精炼橄榄油	50–150	230–240
单不饱和脂肪酸	高油酸葵花籽油、花生油	130–250	232–266
单不饱和脂肪酸	初榨牛油果油	450–900	190–205

主要脂肪酸类型	代表食用油	大致价格区间（元/升）	烟点（℃）
单不饱和脂肪酸	精炼牛油果油	250–450	270
饱和脂肪酸	草饲猪油	1000以上	190–205（精炼）
饱和脂肪酸	精炼椰子油	200以上	204–232
饱和脂肪酸	有机初榨椰子油	500以上	177
饱和脂肪酸	草饲酥油	800–1500	250–260

> 注：在实际购买中，椰子油、橄榄油、酥油等昂贵食用油很少提供容量为5L 的包装，售卖单位基本为几百克或1–2L，所以此表格这类食用油价格为换算后结果。

答案已经很清晰了，**健康是有阶级成本的**。资产阶级的身体健康根本无需我们"担心"，笔者本人在和家里人科普营养学时最艰难的往往不是如何把这些知识掰开揉碎让他们理解，而是打开购物软件后看到价格的那一刻，他们宁愿选择低价的精炼种子油。所以是劳动者不想健康吗？是健康生活的高昂成本他们根本无力承担（不同食用油优劣详见附录d）。

3. 超加工食品——便宜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工作制对无产阶级劳动时间的极度压榨（长期加班、通勤时间长、高压），使得购买新鲜食材并花费一个小时烹饪成为一种高昂的阶级特权（图2）。而便宜、撕开即食且保质期极长的超加工食品和便捷的外卖成了维持劳动力的最优选择（大部分工业食品配料表会写植物油即种子油，

如果使用的是橄榄油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展示在包装和宣传上）。

多项数据显示，超加工食品摄入量每增加10%，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6%，冠心病风险增加9%，抑郁症风险增加22%，焦虑症增加48%。2025 年11 月《柳叶刀》发表的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系统评估了104 项前瞻研究，其中92 项发现超加工食品摄入与至少一种不良健康结局存在显著关联，并且明确指出超加工食品在人类饮食中的兴起，是由超加工食品行业在几乎所有地区的食品系统中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驱动的——而不是由于个人意志力或责任感的不足（详见附录e）。

超加工食品对人体健康的证据不仅越来越多，其生理机制也越来越清晰，但是为什么超加工食品的消费量却仍持续攀升呢？原因就在于超加工食品的利润太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总是会流向利润最高的企业和行业，而更高的盈利能力又让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更具有优势，他们可以在广告营销和产品设计中投入更多资金，甚至干预政府政策。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2–2021 年，在食品生产、加工、制造、快餐和零售等行业的公司向股东支付的2.9 万亿美元中，超过一半仅由超加工食品的生产商支付。2024 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亿滋国际在广告上的支出总计达132 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运营预算的四倍。可口、百事、雀巢、康师傅等多家超加工食品公司在销售量停滞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其毛利率和净利润依旧可以上涨，例如2024 年雀巢的营收倒退1.8%，但是其毛利率却涨了80 个基点，冲到了46.7%。

这些企业往往会采用一些工业新技术破坏食物基质，对其进行化学改性，并将其与大量添加剂结合，从而生产出适口性高、即食、保质期长的产品，所以超加工食品往往天然的食物成分极低甚至完全不含天然成分，单个添加剂往往是可以通过安全测试的，但是当多种添加剂长期联合作用呢？《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涵盖近9.5 万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五种常见乳化剂的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存在关联；还有一项RCT 实验显示摄入连续11 天摄入15g 羧甲基纤维素钠（常作为一种增稠剂用于饮料、冰激凌、乳制品中）会引发肠道炎症。

图示 2: 超加工食品比加工程度更低的食品更具价格优势

这些从天然食物中提取或衍生而来的原料极其廉价，拿我们最熟悉植脂末和果葡糖浆来举例子。植脂末的主要原料是氢化植物油，而植脂末与鲜奶的成本比可达到1：25 甚至更高，一公斤的植脂末（15-25 元）可以调制约100 杯奶茶，同时其脂肪含量是鲜奶的9 倍。果葡糖浆是通过工业加工玉米淀粉等得到的，是很多饮料中都存在的甜味剂，从上世纪70 年代诞生以后，就凭借成本低、甜度高、好上色等优势逐渐取代了蔗糖，果葡糖浆中的果糖是不被纤维包裹的液态果糖，可以被人体快速吸收，而肝脏是唯一可以代谢果糖的器官，有研究表明每天至少一杯含果葡糖浆饮料的人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比不喝饮料的人高出55%。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句广告，根据一些网络调查显示，东鹏特饮在货车司机中的渗透率约为70%，在外卖/快递员中也超过了50%，500ml 的大瓶装只要4-5 元，防尘盖更是设计成可以当货车司

机的烟灰缸，可以说东鹏特饮的目标群体就是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但是500ml 的东鹏特饮含糖量却高达66.5g，一位前大货车司机在网上透露：自己长期靠东鹏特饮"续命"，跑长途一天要喝好几瓶，几年后体检出了糖尿病。固然慢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无产阶级累了困了却只能选择喝廉价的高糖能量饮料提神，然后继续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难道不可悲吗？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用劣质面包和掺假牛奶毒害工人，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则用高添加糖、精炼种子油、超加工食品以及精心伪造的"健康膳食指南"来规训工人的身体。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方式只是变得高级了，可其本质从未改变。

二、 生产领域的直接绞杀

但是慢性病只是猝死的"木柴"，现实生活中的极端因素往往才是点燃疾病的"火把"。临床统计表明，大部分猝死患者在发病前都有明确的外部诱因，而排第一的因素就是过度劳累和长期熬夜。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联合发布了针对工作时长的全球疾病负担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工作55 小时或以上，相比每周工作35 至40 小时，卒中风险升高约35%，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升高17%，从2000 年至2016 年因长时间工作导致的心脏病死亡人数增加了42%。

正常情况下，人体在夜间应由副交感神经主导，心率下降、血压回落，让心血管系统进入"修复模式"。但如果长期熬夜或过度劳累就会打破这个昼夜节律：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儿茶酚胺逐渐增多，这会直接导致心率、血压骤升，如果此时患者体内存在隐匿斑块，血流剧烈冲击就可能会导致斑块撕裂、血栓形

成，进而引发心肌梗死或脑卒中，最终导致意识丧失乃至猝死。

这种对劳动者身体的极限透支，本质上正是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绝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强行延长工作日（如加班、倒班、996），或者绝对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2023 年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工时达53.8 小时，居民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也均超过51 小时，这些恰恰是低收入劳动者集中的行业。在中国还有将近2 亿的灵活就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但是这类劳动强度最高的低收入群体实际根本不在官方工时统计口径之内。部分行业数据显示，福州网约车驾驶员2025 年日均工作时长约10–12 小时，杭州日均运营超12 小时的网约车数量占比达21.91%。

根据主流招聘平台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科技/互联网行业中实际周工时超过60 小时的重度加班群体在部分岗位中占比高达40%以上，近六成的从业者平均每天加班超过1 小时。我国制造业普遍采用"两班倒"或"三班倒"制度，其中夜班轮值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一线工人，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彻夜倒班工作"列为了2A 类致癌物，而在心血管领域，长期频繁倒班的人，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比常人高出23%。

近十年壮大的平台经济更是把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演绎到了极致，外卖骑手面对的算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平台的配送系统包含三个子系统：预估送达的时间系统、决定分配的派单系

统、以及计算骑手报酬的计件定价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自动运转、不断自动优化的程序。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陈龙曾卧底送外卖数月，他记录到，一批骑手在送餐时发现走某栋公寓的侧门步行能节省几分钟时间，当所有骑手都这样走后，算法很快就侦测到这条路线的配送时间出现整体缩短，于是直接把这一区域的标准配送时间调低。在这种不断压缩时间限制的逼迫下，骑手才普遍选择超速行驶、逆行、闯红灯，用生命来换取时间。

长期高强度劳动带来的身心损耗，还会驱使劳动者选择另一种自我麻痹方式——吸烟和饮酒。有报告显示，吸烟对我国人群的心血管发病相对危险度约为2 倍，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高达32%，仅次于高血压。其次是饮酒，2018 年4 月《柳叶刀》发表的Meta 分析研究显示，每周超过100g 酒精的摄入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死亡（详见附录f）。

多项全国成人烟草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其吸烟率显著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领导阶层。在大量对中低收入阶层（如蓝领、长途司机、建筑工人）的调查中，吸烟主要用于高强度劳动后的提神和体力恢复，而饮酒（特别是高浓度白酒）则多用于缓解焦虑、失眠和心理压力。

2025 年《环境与职业医学》的一篇文章对江苏省2 家制造业企业的两千多名工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周工作天数为7 天的高达74.3%，工资在7000 以下的占67.1%，睡眠时长大于7 小时的只有39.6%，39%的工人吸烟，28%的工人喝酒。这份调查报告还统计了工人的自报疾病患病情况，其中超过四成的工人至少患一种慢性病。

和前面那位靠东鹏特饮续命的货车司机一样，一篇报道引用的例子很具有代表性：上海一名从事服务业轮班工作的劳动者，晚班时作息与正常睡眠节律完全错开，总睡眠时间不足6 小时，只能靠咖啡和酒精自行调节。资本主义让无数劳动者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超时加班和频繁倒班让劳动者身心俱疲，而被透支的身体又迫使他们选择借助烟酒来短暂提神或麻痹痛苦，由此叠加的心血管风险最后再给予无产阶级致命一击。

除了以上这些间接和直接导致工人猝死的因素，急救保障缺失和医疗体制的商品化，更是将劳动者推向死亡的深渊。当院外心脏骤停真的发生时，绝大多数身处一线工友从没有经受过正规的急救培训，所以无法在**“黄金四分钟"**内实施CPR（心肺复苏）进行急救，且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工厂与企业中几乎缺席，更谈不上工人是否具备操作的能力。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劳动力只是一种**"可随用随弃”**的生产要素，花费金钱与生产时间去对劳动者进行急救培训、配置急救设备，不仅无法直接带来剩余价值，反而会提高生产成本。这种对无产阶级生命安全制度性的冷漠与短视，恰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增殖从来都凌驾于人的生命权之上。

三、 总结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在流通与消费领域垄断知识、操控学术、收买官员间接的让无产阶级患上慢性疾病，再直接的在生产领域用尽一切手段榨干无产阶级的利用价值为其赚取更多利润，最后再通过商品化的医疗榨干劳动者的最后一点积蓄，留给劳动者的只剩一副破败的身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要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规律，事实就是**劳动者的猝死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忽视无产阶级生命安全导致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天，只要生产资料依旧被资产阶级垄断，这种"社会谋杀"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现代文明病"的名义继续从各个方面蚕食无产阶级的肉体，摧残劳动者的精神。

附录

a. 高糖和种子油引发肝脏代谢紊乱并进一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机制

当人体摄入过多的精制碳水化合物时，血糖迅速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肝脏为了处理多余的糖分会启动脂质新合成（DNL）将这些糖转化为甘油三酯（TG），而人体中负责运输 TG 的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也会随之暴增。这时血液中正常的负责转运胆固醇的LDL（PatternA 大颗粒低密度脂蛋白）会在胆固醇酯转移蛋白（CETP）的作用下与装载着TG 的VLDL 进行物质交换，LDL 中的胆固醇酯进入VLDL，VLDL 中的TG 进入LDL。原本大而蓬松的LDL 因内部稳定的胆固醇酯减少变得畸形——我们称之为富含甘油三酯的LDL（TG-rich LDL）。

TG-rich LDL 在血液中遇到负责水解TG 的酶——肝脂肪酶，肝脂肪酶会迅速将 TG-rich LDL 中的TG 水解掉，于是 TG-rich LDL 内部进一步发生塌陷，体积进一步变小，密度变高，原本温和的正常的PatternA LDL 蜕变成结构不稳定的PatternB 即sdLDL。

结构改变就意味着功能改变，PatternA LDL 原本表面的特异性识别蛋白构象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肝脏的受体无法与之结合并完成对LDL 的回收，sdLDL 就会长时间在血液中游荡。因其密度大、体积小它比正常的LDL 更容易穿过受损的血管内皮滞留在皮下，且因为其内部保护性的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E 的大量流失，它在内皮下遇到自由基时就会瞬间氧化成oxLDL，巨噬细胞吞噬后死亡形成泡沫细胞，在内皮下沉积形成脂肪条纹，随着时间推移积累形成粥样斑块导致管腔狭窄、血流缓慢，而种子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后产生的OXLAMs 会直接嵌入LDL 颗粒中加速这一过程。

b. 反式脂肪酸与氧化亚油酸（OXLAMs）的区别

脂肪酸按照空间构型可分为顺式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双键是"顺式"，后者主要诞生在食品加工厂中，是工业上为了让植物油变得更耐高温（提高烟点）、更不易变质、口感更酥脆，通过"部分氢化"工艺人为制造出来的，反复油炸也会少量产生。

OXLAMs（如9-HODE、13-HODE）与毒性醛类（4-HNE）主要诞生在后厨的炸锅里以及进入人体后的血管中，是脂肪酸被自由基攻击后发生裂解和断裂的产物或副产物。即使是使用的标注"0 反式脂肪酸"的天然大豆油，只要经过反复加热、煎炸，或者外卖熟食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下，植物中的亚油酸就会迅速发生脂质过氧化，产生OXLAMs 和毒性醛4-HNE。

c. 有关n-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全称亚油酸）与oxLDL争论

人体直接摄入天然的、未被破坏的n-6 脂肪酸（如来自于坚果种子），在体内表现的是降脂、抗炎和降低oxLDL 总量的益处。经高温、精炼、反复油炸（如外卖、快餐专用油）后的工业植物油在进入人体之前，其内部的n-6 亚油酸在锅内就已经被氧化成了OXLAMs 毒性物质。

注意本文章并不是想表达"种子油本身有毒"的观点，而是想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因各种不可抗的因素，劳动者很容易被迫或无意识的摄入廉价的、反复加热的，可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种子油。因为劳动者在生产领域是失权的，无法监督生产过程，也无法决定生产什么。一个人活到65 岁，他会吃70000 多顿饭，我们的身体会处理掉50t 食物，无论是食用油也好还是其他加工食品，如果在某些特殊的处理方式下会产生有毒物质，那至少应该标注在外包装上提醒人们，而不是避重就轻或者直接忽略。

d. 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区别和优劣（仅从心血管健康角度综合现有证据）

按双键数目和位置分类：

- **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如橄榄油、牛油果油中的油酸）**，总体上被认为最有益，油酸还被认为是心血管的保护脂肪酸，可以改善血胆固醇水平。只有一个不饱和双键，相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耐热、稳定、不易被氧化，使用初榨工艺的

还可以保留较多的活性物质（如维生素E、多酚类、茶多酚等），同样也可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分为n-3（α-亚麻酸）和n-6（亚油酸）系列，因为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也被称为必需脂肪酸。主流精炼种子油（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以n-6 系为主，含有多个双键极易氧化，高温煎炸会产生有害的氧化亚油酸和醛类化合物。
- **饱和脂肪酸（SFA）**，代表油有椰子油、棕榈油、黄油等，饱和键不含双键，不易氧化变质。目前多项研究显示更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与更高的LDL-C、ApoB、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但是不同的食物基质（如黄油因为没有乳脂肪球膜，所以升高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奶酪椰子油更高）对心血管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综合来看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食用油最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但是也取决于整体的饮食结构，如果搭配大量的超加工食品和添加糖，任何超级食物都不能保证身体健康。

我需要再次声明，因为本文章的受众群体并不是营养学期刊的审稿人，我也并非专业的营养学家和生化学家，且这方面的文献数据实在错综复杂，很多证据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所以我不会拓展不同链长不同双键数目（不同链长脂肪酸决定在人体的吸收路径，而双键数目决定氧化效率）的脂肪酸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希望读者不要简单的认为"饱和脂肪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坏"。

e. 2025 年《柳叶刀》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

2025 年《柳叶刀》发表的超加工食品系列综述共包含三篇文章，文章一主要论述超加工食品危害全球健康的证据，文章二

主要论述应对超加工食品的政策，文章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超加工食品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可口可乐、雀巢、玛氏、费列罗等）及与其共生相关联的一系列组织机构，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重构了人类食品体系。全系列文章链接[1]。

超加工食品是2009 年由一位巴西圣保罗大学的营养流行病学家提出，他注意到当时主流的营养学分类方式存在一个盲区——两种营养成分表看起来相近的食物，可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加工过程，而这个加工过程本身可能才是关键的健康决定因素。他和他的团队据此开发了NOVA 食品分类系统，把所有食品和而食品成分按加工的性质、程度和目的分为四大类，第四类也就是超加工食品，指那些用廉价的工业提纯或合成原料（氢化油、改性淀粉、各类糖浆）加上一系列在家庭厨房中通常不会使用的添加剂（乳化剂、增稠剂、人工香精等），经过多道工业配方和加工工序支撑的产品，其最终形态和感官特征往往与原始食材几乎脱节。

f. 吸烟与饮酒对心血管疾病影响的生理机制

1. 香烟燃烧产生的CO 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是氧气的200 多倍，会降低血液携氧的能力，为了代偿这种慢性低氧的状态，骨髓会增加红细胞的生成，从而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血栓形成的可能性；香烟中的尼古丁可以直接刺激交感神经节和肾上腺髓质，促使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香烟烟雾中含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其中包含大量自由基和活性氧。这些自由基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让sdLDL 更容易穿透进入内皮下，另外还会直接氧化血液中循环的LDL 颗粒，加速oxLDL 的生成。

2. 酒精中的乙醇及其代谢物乙醛对心肌细胞有直接毒性，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心肌纤维化、心肌收缩力下降，诱发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酒精在肝脏代谢会生成大量乙酰辅酶A，抑制脂肪酸氧化的同时促进脂质从头合成（DNL），直接升高血液中的VLDL 和甘油三酯水平；长期饮酒也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损伤血管内皮。

---

1. The Lancet: Ultra-processed food series ↩

革命安全

如何正确使用邮箱

RSF编辑部

编者按:

鉴于目前RSF月刊主要通过邮箱订阅方式更新，为了避免存在不规范的邮箱使用情况尤其是使用中国大陆境内带监控的邮箱进行订阅的情况，特收录本篇内容加以说明，请各位订阅者在进行订阅与联系时务必使用下列类型的安全邮箱。

邮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通讯方式，由于其端对端传输的特点而被广泛运用于私密通讯中。

考虑到目前中国大陆常见的通讯设备和软件都存在着严厉的网络监控以及大量网络警察频繁活跃其中。相比之下，具有私密交流性质的网络邮件反而成为了一种相对安全且隐蔽的手段。

但使用网络邮箱的行为实质上是将一切安全与隐私寄托于提供网络邮件服务的服务商，希望其能够保障使用者的隐私，而目前中国大陆主流的网络邮件服务商（诸如网易，腾讯，雅虎，微软等）都处于中国政府的长期监控中并与中国政府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国外的主流网络邮箱诸如谷歌的GMAIL也存在着暴露使用者隐私的风险。（比如暴露绑定的手机号，或者使用

邮箱的IP地址）为了增强使用者的网络安全意识，帮助摆脱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网络监控。本文将提供三种网络邮箱的正确使用方式并说明其中的注意事项。

方式一：使用无电话认证的外国邮箱（此类邮箱无法且不推荐直接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必须通过可靠的代理工具来隐藏自身IP并绕过GFW的网络审查）

例如PROTONMAIL以及TUTANOTA，此类网络邮件服务由位于境外的私人网络服务商提供服务，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必担心邮件内容被审查或追踪。 注册与使用的相关注意事项：

（1）在注册此类网络邮箱时，应当使用安全可靠并具有VPN性质的网络代理或TOR来隐藏邮箱注册者的真实信息，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网络监管存在大量保存于本地机房的网络数据记录，邮箱的使用者应当尽可能的避免被发现注册此类邮箱的行为，尤其注意使用网络代理隐藏注册邮箱的真实IP。

（2）在注册此类网络邮箱时，应当避免注册的邮箱与注册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尽可能的使用字母与数字的随机组合作为邮箱的名称，加强邮箱的迷惑性以避免引起注意，设置相对随机的复杂密码，避免帐号被暴力破解或字典攻克。由于此类邮箱具有不关联设备与联系方式的特点，可以通过创建多个帐号并交替使用的方式来避免针对邮箱的网络追踪。（应该尽可能避免多个帐号之间存在任何可见的关联性，并且不要对多个帐

号使用同一个密码）每个邮箱在使用且确定没有二次使用的需求后应当立即被注销，邮箱所收发的一切邮件应当在阅读后被立刻焚毁，不打开未知邮箱发来的任何文件，不主动回复未知邮箱的消息，避免被侦查到个人信息。

（3）邮箱不得用于绑定任何不必要的网络平台（尤其是国内的平台诸如腾讯），不得关联任何私人的联系方式（包括手机，私人邮箱等），尽可能确保每个邮箱的用途专一化，确保个人信息不会因为邮箱而暴露。

方法二：使用公开的临时邮箱

例如Fake Mail Generator等限时使用的临时邮箱，由于其帐号每二十四小时清空一次数据，应而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考虑此类邮箱对邮箱内容的公开性质，应当谨慎使用此类邮箱。

此类公开邮箱主要可用于接受信息/文件或回复消息使用，不可当作稳定可靠的固定邮箱使用。 注意：Fake Mail Generator这种公开的临时邮箱所有知道这个邮箱的人都能在24小时内查看这个邮箱，所以邮箱可以设置得长与复杂一些，并且不要公开这个地址。

方法三：使用DuckDuckGo的邮箱中转功能

使用诸如DuckDuckGo的邮箱中转功能，让所发送或接受的邮件经过中转服务器的转播，以减少被邮件追踪或者被邮件中的木马攻击的可能性。 但要注意，用以中转的邮箱及其帐号应当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并且能够随时注销，以确保邮箱使用者的安

全性。此类邮箱中转并不能避免邮件在收发处的审查，因此身处中国大陆的使用者应把这种方法当成一种备用的紧急联系方式。

正确的邮箱使用方式，可以帮助使用者在逃避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的同时快速建立起临时但又安全的联系，收发关键文件与信息。但不论躲避审核的方式如何，效果如何，其核心根本都是通过网络技术隐藏自身，从而避免被发现具体的行为。因此，运用网络邮箱进行联系，首先要确保联系双方的设备和软件都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减少可能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行为。

如何正确使用 Proton 搭配邮件加密技术

RSF编辑部

在当前我国众所周知的恶劣网络环境下，正确使用可靠的邮箱进行交流对于革命工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RSF第四期《如何正确使用邮箱》文章中已经有了一些概述。然而，要比较彻底地确保邮件信息安全，只是使用比较可靠的邮箱也是不够的。例如在发生邮箱传输漏洞的情况下，邮件有可能被截取、篡改，甚至传输遭遇中间人攻击。为了进一步增强使用者安全使用邮箱的能力，本文将简要说明OpenPGP加密技术，并以Proton邮箱为例，示范如何正确使用Proton搭配邮件加密技术以进一步保障通信秘密。

OpenPGP来自于PGP加密程序，是一种公有领域的数据检验和加密标准，它的加密基于非对称加密技术。首先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一对有一定数学联系的公私钥，私钥秘密存放在本地并通常由密码保护，公钥可以公开。A给B发送不对称加密的信息时，首先从公开的公钥服务器上找到B的公钥，用B的公钥运算出自己的信息密文，并在信息当中附上由A的私钥（可能还有公钥，取决于具体算法）和信息明文的哈希值运算得出的A的数字签名。B在接收到信息后，发现这是不对称加密的信息，于是使用B的私钥运算出信息明文，使用A的公钥（同样也是公

开的）从数字签名运算出A的信息哈希值并将这个哈希值同自己从明文独立计算的哈希值比较，确认信息来自A且没有被篡改。在以上的过程中，只要公开了公钥，双方就可以安全地通信，而由于上述过程中涉及的数学算法的良好性质，任何截获了密文的第三方想要不经过对应钥匙逆向以上任一过程都只能暴力穷举天文数字的可能性，合理时间内完全不可能。在一段时间的广泛使用后，OpenPGP成为了几乎所有加密电子邮件的加密标准。

以上加密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本文中，我们详细介绍Proton邮箱内置的PGP端到端加密技术。

Proton邮箱的官网是 proton.me ，使用者应当按照第四期的注意事项注册并管理该邮箱。当创建一个账户时，邮箱会生成两个公私钥对，一个验证登陆，一个加密邮件。可以在邮箱内的Settings → All settings → Proton Mail → Encryption and keys选项中进行管理：

如果双方均使用Proton邮箱，则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邮件的内容均自动使用pgp加密并签名，获取公钥的过程将自动完成。然而在实际情况下，我们有时需要同墙内的某人进行交流，而不希望被网警获取内容。Proton确实提供了常规密码保护邮件的功能，但是接收方的密码验证必须通过被墙的Proton服务器进行。所以最好是仍然采用PGP加密的形式，而这要求双方持有对方的公钥。由于公钥服务器也可能被墙，所以可以直接用邮件向墙内邮箱发出自己的公钥。以下步骤要求对方的邮箱或插件支持PGP。

这样对方的PGP插件就能读取你的公钥。

然后对方也要生成一对公私钥，这取决于他的PGP插件是否自带公私钥功能，否则他可能需要另外手动生成。考虑到墙内邮箱对插件的兼容性以及安全性问题，我们推荐手动生成公私钥。这类工具有不少，大多还附带有pgp加解密的功能。我们下面以一个在线网站(https://pgptool.org/) 举例 ：

如图，可以非常直观方便地完成密钥生成，加密并签名邮件，解密并验证邮件的步骤。

然而，这种第三方在线工具都不能避免安全性的问题，在墙内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比较推荐使用著名的GnuPG工具——这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对于OpenPGP标准的自由软件实现。该工具的使用教程在 emailselfdefense.fsf.org/zh-hans/ 网页。这个工具原生支持linux，但在Windows和macOS上也能使用。需要说明的是，和教程不同，我们这里是将其当作纯粹的离线的加解密和密钥生成工具使用，因此全过程应当离线且不上传密钥，也不要将其嵌入任何不可靠邮箱作为自动插件使用（即使有此选项）。因此这个过程不会出现图形界面，需要在命令行内完成，命令手册在 https://www.gnupg.org/gph/en/manual/x110.html ，或者可在命令行内键入gpg--help查看。

过程完成以后，对方应当也已经生成了自己的公私钥了。然后他也可以将他的公钥发回给你

为了确保发回公钥的正确性，对方应该首先用你已经发出的公钥加密此回复。或者，在不支持插件和不暴露公钥的墙内情况下，对方将公钥直接写在正文里发回。Proton内信任此公钥（附件）会将公钥与来信的联系人绑定以便此后加密通信：

注意事项: 1.私钥泄露将导致所有用此公私钥对发送的信息全部泄密，应该确保所用设备环境安全。对私钥，尤其是本地的私钥采取同各重要密码同样级别的保护措施。如已泄露，应当立即重新生成新公私钥对，并通知联系人此变更。在Proton内应该进行如下操作： 将相应公私钥对标记为泄露将导致其他信任你公钥的用户再次打开用此公私钥对加密的邮件时出现提示“签名错误”。不清楚是否对非Proton用户有效，可逆操作。

2.鉴于第一次向墙内发送密钥不得不明文进行，且不能签名，第三方理论上是能将其篡改成自己的公钥，此后通过在你和联系人之间充当“隐形”中间人的方式实现监控。如果担心这一点，建议通过线下方式交换公钥文件。Proton用户获得对方公钥文件后应如下手动上传联系人对应公钥：

此步骤也适用于前文提到的墙内方将他的公钥从正文发回的情况，此时应当将对方正文里的公钥手动写入文本文件并改动文件名和后缀，这一步骤可以对照自己公钥文件的格式完成。

或者，也可以将公钥文件简单加密后再在线上发送，加密方法应事先约定。这虽然不能阻止中间人截取邮件，但是能让他们无法获知真正的公钥，也就无法实施任何中间人行为。例如，凯撒加密法将整段文本“平移”数个字符即形成密文。由于公钥只是无规律可循的随机字符 ，不是自然语言，不能使用字频、词频等方法分析，所以即使是这种简单的密码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使用者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将“平移”“对称”“增删”等方法混合甚至重复运用，效果更佳。

Tor_Browser使用指南

> RSF编辑部

编者按:

本指南旨在推广Tor Browser 浏览器在网络活动方面的使用，为所有想要在GFW防火墙审查外活动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浏览环境。 Tor Browser是一款由非营利性组织开发并部署的开源浏览器，因其具有减少网络追踪，对抗网络监视，清除浏览器指纹以及规避网络审查的强大匿名功能，成为匿名网络活动的首选工具。

一、从工作原理看，Tor Browser 基于Tor网络运行

Tor网络是一个虚拟隧道网络，用于提高互联网用户的隐私和安全。其原理在于通过 Tor网络内的三个随机中继服务器（也称节点）发送用户流量。线路中的最后一个中继（即“出口节点”）将流量发送到公共互联网。该网络运行模式具有极强的匿名性，三次网络数据转发搭配Tor的强数字加密技术让网络数据在每一次转发时附带一次加密，最终使得使用者的网络浏览活动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

二、为什么要选择Tor Browser?

相比起毫无防护能力的IE，或者是自我安慰的Chrome和Firefox的无痕模式（无痕仅仅不保存本地痕迹，网络痕迹完全可被追踪），Tor Browser非但提供了一个极强的网络浏览内容隐藏能力，而且在GFW防火墙不断加强的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的作用，可以作为备用的紧急翻墙手段使用。

三、如何获取Tor browser

方法：通过 Web 网页代理获取通过加密的 Web 网页代理，访问 Tor 的官方站点（https://www.torproject.org/download/），下载最新的软件包。记住，一定要用加密的（也就是 HTTPS 协议）网页代理访问本网站。 目前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打着Tor或者洋葱，暗网等头衔的虚假钓鱼Torbrowser，如果需要从网页获得，务必从上文提供的网站下载。

四、如何使用Tor Browser

Tor Browser在初次使用之前需要提前配置Tor网络的相关设置，确保Tor Browser能够正常使用。

由于 Tor 的流量特征十分明显，早已被 GFW 识别封锁。虽然 Tor Browser 通过obfs4、meek-azure 等内置网桥可以起到一定的抗封锁的效果，但不足以应对中国等少数国家的高强度网络封锁，所以需要将能够突破 GFW 的代理工具作为 Tor 的【前置代理】，避免使用Tor上网的行为直接被后台的网警注

意到。（如果实在没有前置代理，可以尝试使用meek网桥）由于不是所有的代理软件都可以适配Tor网络，故本文推荐使用迷雾通作为前置代理搭配Tor Browser进行配置。（迷雾通的下载地址为：https://geph.io/ 请使用安全的翻墙软件打开并下载对应系统的迷雾通）

具体操作步骤：在准备好前置代理工具后，打开 Tor Browser，点击「配置」进入初始网络设置界面，勾选“使用代理访问互联网”，输入自己的前置代理信息（接下来以迷雾通的配置信息仅为参考：

代理类型SOCKS 5本地地址是 127.0.0.1端口如代理类型选了SOCKS 5，这里填 9909（迷雾通的 SOCKS 5 代理端口可以在客户端的设置中查看,但需要设置中开启迷雾通的强制桥接和全局VPN模式）

如使用其他前置代理，请查看代理客户端的端口在解决了Tor browser的前置代理后，通过设置网桥，帮助Tor更快的与中继服务器连接，相比起强混淆性的meek，强加密性的obtfs4在具有前置代理的帮助下显得更为安全可靠。

在设置好相关网络设置后，便可选择连接至tor，开始享受Tor带来的高匿名性网络浏览体验。

五、注意事项：

1.使用Tor Browser时应当确保打开了浏览器设置内的HTTPS only设置，并且将该选项设置成为所有标签启用，确保不会因为访问HTTP网站而被网络攻击。

2.在Tor Browser的设置内将安全级别至少调为较安全，如果仅访问静态网页可设置为最安全。

3.在使用Tor Browser时，优先使用duckduckgo搜索引擎替代谷歌，百度，必应等带追踪的搜索引擎。

4.不要用Tor Browser记录任何登录信息，不要保存任何密码在本地，每次启动TorBrowser 都会自动清除上次活动的全部本地记录，但已下载内容会保留。

工农解放报

工农解放报编辑部